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丛书

法国

〔苏〕Г·Г·季里根斯基
В·И·库兹涅佐夫 主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丛书

法　国

[苏] Г·Г·季里根斯基
В·И·库兹涅佐夫　主编
陈云卿　李树直　潘德礼　译
陈云卿　王金存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16 8701 3

责任编辑：韩　德
封面设计：王彦苹
版式设计：王丹丹
责任校对：万亚云

法　国

Faguo

[苏] Г·Г·季里根斯基　В·И·库兹涅佐夫主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29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 册
统一书号：3190·065　定价：2.75元

·前　言·

七十年代是法国资本主义所有矛盾急剧激化的时期。就这方面来说它不是唯一的国家，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缓慢而不稳定的发展时期。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政府把经济危机的重担及其严重的后果转嫁给劳动群众的企图，也引起了人民群众采取自卫行动，使阶级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其后果的性质和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八十年代初，法国发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左派力量上台执政。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长期执政的时代从此宣告结束，政权转到了联合力量的手中，它们提出了民主的口号和对法国经济与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广泛纲领。

在政治方面起作用的不是严格的宿命论，而是易变的斗争逻辑。因此，不能说左派力量上台是预先注定了的。与此同时，无可置疑的是，在整个七十年代，为左派力量执政所必需的主、客观条件在法国已经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

近几年来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起了重要作用。几乎在战后的整个三十年内，法国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都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正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样，这种再生产是以周期形式进行的。但1974—1975年前的各次生产过剩危机，相对说来其影响并不深刻也不持久。结果，1950—1973

年间，法国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每年为5.9%；其生产结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均有相应的改革和提高；其经济也积极地加入了国际分工，最大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是成功的。为此，在官方政界和实业界人士中开始谈论在经济实力方面有可能同法国先前的竞争对手——联邦德国并驾齐驱了。这一切预示了资本主义欧洲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法国方面的转化。

但在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造成法国积累率明显地和不稳定地下降了。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滞销，爆发了通货膨胀；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生产效率下降了。由于上述原因使法国的生产速度下降了(1973—1980年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4%)。

法国经济形势的恶化，首先影响了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收入和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的失业率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前夕的1972—1973年，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也没有达到自立人口的2%。但到1982年初，失业大军达到200万人，占自立人口的8.6%。尽管名义工资在继续增长，但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却经常遭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下降。

随着劳动群众处境的恶化，法国的社会气氛也变得日益紧张。企业主为了降低大大增长了的生产费用，采取了大量解雇和关闭企业的做法。作为回答，劳动群众举行了越来越顽强的罢工，这些罢工常常超出了纯属经济斗争的范围。工人占领了工厂，在某些情况下独立地组织生产和销售产品，并越来越坚决地要求政府采取使经济形势正常化的坚定措施。

然而，法国统治集团的政策促使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思想家把由于资本积累过度和生产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资本家利润率下降，说成是产生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因此，法国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国家必须同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作斗争口号的掩盖下，把主要力量用于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使其有利于企业主。面对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共同进攻，法国劳动群众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还应当在政治领域内进行保卫自身权利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左翼急进派——在团结民主力量、制订使国家经济和社会康复的可供选择计划等方面而活跃起来了。众所周知，法国建立和巩固左派力量联盟的历史既有过胜利，也有过失败。但重要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思想已逐步深入人心，激发了能够在国内进行根本的、深刻的变革的希望。正是由于广大社会阶层的这种情绪，保证了左派力量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5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保证了这些力量在1981年6月14日和21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由于上述活动，法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本书主要是阐述七十年代——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力图对过去十年的各种事件给予尽可能全面的分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来说明事件的原因和特点。在这一方面，它继承了曾两次对战后法国社会进行综合分析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新法国学学者建立的传统。由阿·弗·基尔萨诺夫、叶·阿·缅任斯基和阿·伊·波克罗夫斯基主编的专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与政策问题》（莫斯科，1962年版）阐述了四十—五十年代；由尤·伊·鲁宾斯基主编的《现代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与政策》丛书中的专著《法国》（莫斯科，1973年版）基本上阐述了六十年代。

同上述著作一样，本书中考察了法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法国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与劳动群众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国内政治斗争、对外政策等问题。《编后》对1981年夏成立的政府所采取的头两项措施进行了总的评价。参加这届政府的除了社会党人和新急进派分子外，还有法国共产党的四位代表。

本 书 作 者

前言　第一章　经济学博士　В·И·库兹涅佐夫
第二章　地理学副博士　М·А·巴夫洛娃
第三章　经济学副博士　С·А·拉扎列夫
第四、五章　经济学博士　В·И·库兹涅佐夫
第六章　经济学副博士　В·Ю·普列斯尼亚科夫
第七章　历史学副博士　И·М·布林、Н·Б·拉扎罗娃
第八章　经济学博士　В·В·留比莫娃(第一节)、历史学副博士　И·М·布林（第二节）、В·А·斯科罗霍多夫(第三、四节)
第九章　历史学博士　Г·Г·季里根斯基（第一、三节）、历史学副博士　И·М·布林（第一、二、三节）、　В·А·斯科罗霍多夫（第三节）
第十章　历史学副博士　Ю·В·杜比宁、历史学副博士　А·З·杜比宁娜(第一节)、历史学副博士　И·А·曼弗列德（第二、三节）、历史学副博士　Л·Л·切尔卡索夫（第四、五节）
结束语　经济学博士　В·И·库兹涅佐夫
本书的学术秘书——经济学博士　С·А·拉扎列夫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当代世界中的法国……1
　第一节　在世界和西欧经济中的地位……1
　第二节　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9
第二章　生产力和生产结构……17
　第一节　经济增长速度趋势的变化……17
　第二节　劳动资源和劳动生产率……20
　第三节　固定资本的积累……27
　第四节　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32
　第五节　经济的部门结构及其改革的途径……37
　第六节　生产力的布局……52
第三章　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组织……57
　第一节　集中的规模……57
　第二节　现代垄断组织结构……60
　第三节　银行资本、工业资本与财团……69
第四章　国家垄断经济调节……74
　第一节　调节制度的危机……74
　第二节　新条件下的经济战略……77
　第三节　国有化部门……82
　第四节　国家财政……86
　第五节　经济形势的调节……90
　第六节　结构政策……96
　第七节　法国与国际经济调节形式……101

第五章　再生产矛盾的激化 ……105
第一节　七十年代事变的前提 ……105
第二节　危机的特点 ……112
第三节　1974—1980年周期 ……118
第四节　1980—1981年危机 ……127
第六章　对外经济联系 ……133
第一节　对外经济扩张的战略 ……133
第二节　外贸结构的变动 ……144
第三节　资本运动中的新现象 ……156
第四节　财政货币问题和收支平衡状况 ……164
第五节　同苏联的经济合作 ……172
第七章　社会阶级结构 ……181
第一节　一般趋势 ……181
第二节　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 ……191
第三节　小资产阶级 ……197
第四节　新中间阶层的增长 ……201
第五节　资产阶级 ……205
第八章　劳动人民的状况和斗争 ……211
第一节　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 ……211
第二节　群众反抗情绪的增长 ……231
第三节　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斗争 ……245
第四节　法国劳动人民的职业组织　工会统一问题 …253
第九章　七十年代的党派和政治结构以及国内政治斗争 ……266
第一节　党派政治斗争发展的主要趋向 ……267
第二节　中右翼联盟的危机 ……282
第三节　左翼联盟 ……303

第十章　法国对外政策的关键问题 ……334
第一节　“东方—西方”：缓和与合作的方针 ……335
第二节　法国和西欧政治一体化问题 ……351
第三节　法国与美国 ……366
第四节　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372
编后 ……395
苏联作者论述法国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著作 ……407

·第一章·

当代世界中的法国

法国属于世界五大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从总的方面来看，它奉行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英国相同的战略，但在具体政策目标方面以及采取达到目标的手段，法国又具有它自己明显的特点。它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的风格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行动方针。这部分地是由于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特点、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以及各种政治力量长期紧张的斗争所造成的之外，就是只有这个国家历史上固有的趋势和特点。正是由于这些趋势和特点，使得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些关于法国专著的作者们有理由断言："在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的特点首先在于：它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工业、财政和军事实力，而且取决于很难用数量评价的其他因素"①。这种评价在七十年代仍然是正确的。

第一节　在世界和西欧经济中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有

① [苏]《法国》，莫斯科，1973年版，第5页。

利条件，以巨大的努力来加速其经济的发展和进行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改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在五十一七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二十世纪前半期提高了2—3倍。1896—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2%，1949—1980年间，提高到了4.8%；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和5.1%①。

表1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年　分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	西欧	欧洲经济共同体(10国)	美国	日本	联邦德国	美国	法国
国内生产总值								
1950—1980	4.2	4.2	4.2	3.3	8.0	5.0	2.5	4.6
1950—1973	4.5	4.6	4.4	3.9	8.8	5.9	2.4	5.2
1960—1973	5.1	4.7	4.2	4.4	10.2	4.6	2.5	5.8
1973—1980	2.7	2.0	1.9	2.0	5.3	2.2	1.4	2.7
工业生产								
1950—1980	4.6	4.7	5.0	3.8	11.6	6.0	2.2	4.9
1950—1973	5.4	5.5	5.7	4.4	14.2	7.4	3.0	5.0
1960—1973	5.9	5.3	5.0	5.2	12.3	4.4	2.8	5.9
1973—1980	1.9	1.8	1.4	1.8	2.9	1.4	0.0	1.4

注，在编制本章表1——表4时，使用国际统计数字，它在很多情况下与法国的统计数字不一致，因此在以后各章中的一些指标可能同前述数字不一致。

资料来源：[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9年，第5期，第147页；
《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1980年和1981年初的述评》，莫斯科，1981年度，第6页；
[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数》，1981年7月。

①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日·日·卡里、普·杜布瓦、埃·马兰沃：《法国的发展》，巴黎，1972年版，第32页。[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2年，第13期C，第49页；1978年，第67—68期C，第85页；1980年，第86—87期C，第3卷，第216页。

在战后三十年内，法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从农业工业国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之一。七十年代末，按最低的估计数字，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已达美国的63%，而同时联邦德国为美国的81%，日本为61%，英国为42%①。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明显地接近了美国。198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国为11,500美元，法国和联邦德国为9,100美元，日本为7,950美元，英国为7,025美元，意大利为5,850美元。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差距仅为1/5，而1950年这个差距则为1/2②。近三十年来，法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近三倍。

表2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和1970年价格计算：%）

国　别	1950年	1960年	1973年	1980年
美　国	36.9	33.6	29.4	27.0
日　本	3.5	5.2	9.5	9.8
联邦德国	4.8	6.8	6.3	5.9
法　国	4.8	4.9	5.3	5.1
英　国	7.3	6.3	4.9	4.1

资料来源：[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9年，第5期；
[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数》，1981年7月。

与此同时，正如表2和表3的数字表明的，从1950年至

① [法]《世界报》，1979年12月4日。

② 苏联经济学家劲·鲍洛京根据他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9年第5期第147—154页)中叙述的方法计算得出。

1973年，法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不多，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比重，六十年代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后，便开始下降了。即便是战后最高水平，仍然比战前指标约低1/3。虽然如此，按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计算，法国仍居世界第四位。出现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把经济增长因素分成两类：一类是经过数十年的半停滞后，仍然保持了向前推进的因素；一类是阻止增长，并且不让进步趋势充分表现的因素。

促进速度逐渐增加的因素有：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表现为建立符合现代技术和工艺要求的大型综合体的生产集中和积聚；生产和非生产性积累率的提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本国经济加入国际分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国民经济结构的逐步改革促进了现代化的高效率生产部门（航空航天工业、电机工业）比重的增长和效率较低的传统部门（纺织、针织、制鞋）比重的减少；最后是国家垄断调节形式的形成和伴之而来的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扩大。

不难看出，这些积极因素同所有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过程密切相关。但法国的某些历史特点妨碍了这些因素的有效利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国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集中在信贷、金融和借贷资本方面（众所周知，正是这一点才使列宁有理由把法国帝国主义称为高利贷的帝国主义）；对外经济关系集中在殖民帝国范围内并对其他国家长期保持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作为前两个特点的后果，用工业方法生产剩余价值发展薄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基本上放弃了高利贷行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结束了殖民帝国。然而，直到现在

法国资本主义仍背着这种历史包袱，即信贷金融领域还远比工业部门发达*，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具有“非企业家”的心理，很容易受金融投机活动的诱惑，在实施要求大量投资的长期项目时过分小心；他们缺乏在主要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进行竞争的经验；以直接投资形式输出的资本较少。如果说英国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角落的广泛配置，稍为弥补了这个国家生产发展的弱点，那么法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不足，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则降低了它的世界作用**。

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法国也从五十—六十年代美国

表3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

国别	1950年	1960年	1973年	1980年
美国	48.7	41.9	37.8	37.0
日本	1.6	4.8	10.0	10.5
联邦德国	6.3	10.6	9.5	9.0
法国	5.9	6.6	6.5	6.2
英国	8.6	7.4	4.9	4.2

注：根据世界工业生产指数算出。

资料来源：[苏]《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1978年和1979年初的述评》，莫斯科，1979年版，第21页；《1980年和1981年初的述评》，第6年。

* 1974年工业在国民经济增加价值中的比重：联邦德国为40.2%，英国为40.8%，法国为37.4%（[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69期E，第51页）。

** 197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美国为1,920亿美元，英国为600亿美元(250亿英镑)，联邦德国为330亿美元(600亿马克)，法国约为200亿美元(800亿法郎)([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81年2月25日，第93页)。

较低的发展速度中得到了好处。西欧的工业生产总额，1950年为美国的68.4%，1979年为美国的84.1%*①。根据七十年代末的对外贸易规模，联邦德国已接近美国，而西欧各国作为一个整体，1980年向本地区以外出口了2,600亿美元，而美国出口了2,230亿美元②。近几年来，西欧输出资本（包括向美国市场输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西欧地区内部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对法国具有重要意义。英国由于几十年的落后，按产量计算，从世界第二位退居第五位，而法国却在联邦德国之后占居了西欧第二位强国的地位。这种状况，以及英国在对外政治和军事战略问题上长期面向海外伙伴和直至1973年才参加欧洲共同市场，使法国有可能加强对西欧事务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法国却不能解决自己的主要问题：在实力方面向欧洲大陆的主要对手联邦德国看齐，或在可能的条件下超过它。

法、德之间的竞争已有很长的历史。德国无可争辩的工业优势使它在同法国的历次军事冲突中占了上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德国遭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而法国成了战胜国，但有利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潜力方面的差距则继续保持下来了。到五十年代末，由于联邦德国工业的高速增长（比法国高50%），这种差距又有所扩大。随着联邦德国的军事

---

* 1980年联合国统计机构修订了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按1970年价格测定的西欧各国（冰岛和丹麦除外）工业产值1973年为美国的135.3%，1980年为美国的122.2%（见《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1980年和1981年初的述评》第8页）。

① 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1979年和1980年初的述评》，莫斯科，1980年版，第20页的资料算出。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2卷，第13、15页。

战略和政治地位的恢复，法国统治阶级开始担心法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会再次沦为次等强国。

六十年代对法国——联邦德国的经济竞争带来了重大变化。在一系列客观原因的影响下，加上法国政府有意识地力求巩固和扩大工业基础，它在增长速度方面超过了联邦德国。根据某些估算，如果长期保持这个趋势，法国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可能在工业和劳务总产值方面向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看齐。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经济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已经占有优势的法国面前，将展现出成为本大陆无可争议的领袖的前景。

直至1974年，这种“竞赛”都是有利于法国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当选总统第一年的一次演说中，曾经答应要尽一切努力保持法国在速度上的优势。他说：“从经济角度看，联邦德国比我们强。而我的政策的一个不可改变的方针是缩小这个差距”①。稍后，德斯坦在自己的纲领性著作《法国的民主》一书中，表达了一种希望，到八十年代中期要使法国的工业生产达到同联邦德国的水平并驾齐驱的程度②。

七十年代中期的世界危机以后，法国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了，这种发展的结果给法国统治阶级带来巨大的打击。1975—1980年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7.2%，而联邦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增长了19.3%；工业生产分别增长16%和19%，投资分别为7.8%和25.3%；而在法国价格上涨了64.5%，在联邦德国只上涨了22.3%。此外，法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15亿美元的赤字，而联邦德国却有41亿美元顺差（在

① 〔法〕《新观察家》周刊，1975年，第549期，第32页。

② 〔法〕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的民主》，巴黎，1976年版，第127页。

1973—1979年期间）。1981年春，失业人数在法国占自立人口的7％，而联邦德国却只占自立人口的5.5％①。1980年夏季法国和联邦德国专家所作的截止1985年的预测，其结论是法国将进一步落后：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法国为1.6％，联邦德国为2.5％；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7％和4.9％；价格年平均上涨率分别为8.6％和4.8％；失业率将分别增长11.2％和7.8％②。联邦德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也保持极大优势（见表4）。法国的出口只达到联邦德国的57.5％（1980年），这个比例在今后二十年内不会发生变化。

表4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中的比重（％）

国　别	1950年	1960年	1973年	1980年
美　国	18.1	18.2	13.6	11.9
联邦德国	3.5	10.2	13.2	10.6
日　本	1.5	3.6	7.1	7.1
英　国	10.8	9.1	5.9	6.3
法　国	5.4	6.1	7.0	6.1

根据以下资料计算：[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手册》，莫斯科，1979年版，第136页；[苏]《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　1980年和1981年初的述评》，第87页。

①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得出：
[联合国]《分国帐户统计年鉴》，纽约，1979年；
[联合国]《国际金融统计》，1980年5月；
[联合国]《统计月报》，1980年7月，第21—31页；
[法]《蓝皮书》，1981年3月30日；
[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数》，1981年5月，第20、169页。

② [法]《世界报》，1980年7月8日。

可见，近十年来，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果从主要统计指标看，保持了相对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评价法国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时，仍然是难于从数量方面去评价它的活动质量的，因在这些方面，首先涉及到政治和外交领域。

第二节　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

经济地位不够牢固，是促使法国统治阶级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去寻求补偿的主要因素。六十年代初以前，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军事政治组织的积极参加者，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对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参加国签署的条约是巩固“大西洋团结”原则的一个行动，其实质是承认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军事政治领导地位。

这个时期美国的霸权建立在它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实际优势之上，而美国统治集团并不急于同自己较弱的伙伴“分担世界命运的责任”。只有拥有原子武器的英国被看作是“享有特权的伙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戴高乐想把法国提高到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第三个“享有特权的”成员的尝试，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当时法国统治集团选择了另一种保卫本国利益的方法，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的军事组织。

法国采取了在资本主义军事政治关系体系中保持独特地位的方针。它建立了自己的核战略力量并修改了军事理论，从而拒绝了在这些问题上完全屈从于华盛顿。新的关系形式，排除了巴黎自动地卷入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能产生的军事冲突，法国恢复了由自己作出什么时候加入这种冲突并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军事行动的决策权。

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并不意味着法国资产阶级

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阶级联盟的破裂。法国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国，它仍然参加除军事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甚至在军事基础设施方面，它还保留了相当多的接触点，这使它在作出相应决策后能够迅速参加盟国的各项措施和行动。此外，在七十年代，法国同大西洋伙伴的军事合作有了很大的扩大，特别是在共同生产武器方面。而不参加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仍然使它有很大的政治机动的自由。其中，它可以有效地反对大洋彼岸那个大国公开的霸权主义意图，并常常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立场。这既涉及到政治方面（批判地对待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谴责美国侵略越南；在中近东冲突中采取特殊立场），也涉及到经济方面（法国主张在国际清算体系中逐渐取消美元并代之以更加可以接受的货币；拒绝参加在美国庇护下建立的国际能源机构；坚决揭露美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做法）。

法国在“大西洋”问题上采取独特的对外政策，不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清醒地估计了本国的重要利益。法国对美国采取审慎的和不信任的政策，是基于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巴黎不以自己行动的具体动机为转移，事实上成了西欧垄断资本特殊利益的政治体现者。这些利益并不总是同大洋彼岸竞争对手的利益相一致，后者在认为对它有利的情况下并不会放弃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战略优势。

法国作为西欧利益体现者的作用还由于另一个原因而加强了。七十年代，法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和其他西欧国家关于自己利益的特殊性和必须保护这些利益免受美国侵犯的意识加强了。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政治形势紧张时期，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除英国外，所有西欧国家的政府在戴维营协议问题和一系列涉及欧洲安全与缓和国际

紧张局势问题上采取的立场都比美国政府克制得多。

但是，除了在个别问题上保持甚至增加了同华盛顿的距离外，在近十年的法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加强“大西洋团结”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争取真正经济独立斗争的加强，客观上促使帝国主义国家关系密切了，因为这种斗争打击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原法国外交部长在访问美国时（1979年6月）对这个问题有个形象的说法：“我们处在一条船上，我们前面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应当共同行动。西欧方面如果不这样行动，那等于是自杀”①。第二，在法国资产阶级看来，“团结”的阶级价值增加了，因为在整个七十年代，国内劳动群众反对垄断组织和政府亲垄断组织政策的斗争加强了，出现了政治力量的两极分化。政党和阶级斗争的逻辑，促使本国统治阶级向右转，唤醒和活跃了在国际范围，其中包括在“大西洋”范围内进行阶级的相互支持的本能。在法国的欧洲政策上这种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

欧洲在法国的对外政策中总是占有中心位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统治集团支持了建立西欧国家一体化集团的思想，它原来期望不让传统上带有反对法国色彩的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在法国议会拒绝批准西欧六国军事政治一体化条约以后，于1957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众所周知，法国欧洲政策的基础是戴高乐将军提出的“多祖国的欧洲”的原则。它的意思是在集团内部解决对国家生命攸关的问题时，保持国家的主权。注意到法国在经济上较联邦德国弱、在军事战略上又较英国弱之后，戴高乐将军期望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当作抵销这两个不利因素的工具。法国担

① 「法」《人道报》，1979年6月6日。

心英国由于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共同体内取得占优势的影响，因此在六十年代末以前一直反对英国加入。它把同联邦德国的联盟当作欧洲政策的轴心，希望以自己的政治威望来平衡后者的经济实力。第五共和国的领导人平行地积极实施发展自己的核"打击力量"计划（坚决反对用原子武器武装联邦德国），并努力加速本国的工业发展。根据他们的意图，这两者为欧洲大陆形成有利于法国的新的力量对比创造了物质基础。

七十年代，在西欧内部关系体系中发生了某些变化。英国加入共同市场（1973年）提高了它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的作用。波恩—巴黎—伦敦的三角关系成了这个地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英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作用的加强，促使法国进一步密切同联邦德国的政治关系。但是，与六十年代不同，这种接近是在对法国更加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迅速加强经济地位的希望已破灭；联邦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东西方关系中的政治作用加强了。因此，同自己的东部邻国保持特殊关系，要求法国更加"理解"它的利益，在许多问题上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七十年代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对政治一体化发展深度、"欧洲建设"中联邦和邦联原则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上的立场有了明显的接近，并不是偶然的。1974年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更替，戴高乐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的削弱，使法国统治集团中的"欧洲主义"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导致他们对一体化的态度作了相应的修正*。法国已不再是政治一

---

* 在《世界报》的一篇总结德斯坦就任七年共和国总统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德斯坦在1974年竞选中获胜以后，立即公开表明了要把欧洲接近推向前进的意图。他认为创造一个有信心的欧洲人的形象是必要的，与戴高乐将军和蓬皮杜相比这已经是一个变化"（[法]《世界报》1981年3月10日），

体化发展道路上的抑制力量，而是加深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过程的倡导者。在这方面所有比较重要的措施——“十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欧洲理事会），用直接投票选举欧洲议会，欧洲货币体系——都是在法国倡议或是在它的积极参与下采取的。与此同时，法国在一体化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非常稳健的，并且考虑到了本国的利益。

法国的政策是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制定的。其中一部分势力不仅主张加深经济一体化和发展政治一体化，而且还号召回到军事一体化思想上去。七十年代，这派力量的压力明显地增加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出现了对法国军事战略思想的逐步修正，使之向更加密切地协调本国安全与加强同其他西欧国家、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成员国合作问题的方向发展。德斯坦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扩大的安全区”概念，要求把“核保护伞”扩大到本国的领土之外，扩大到邻国，首先是联邦德国。七十年代末通过的军事计划，规定在八十年代大大增加战略武器（核轰炸机和潜艇）和战术武器的生产费用。法国在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方面同其他西欧国家积极合作。可见，法国欧洲政策的范围包含着各种很不相同的成分。

法国在同发展中世界关系中的作用也是很矛盾的。四十—五十年代，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海外统治权的企图，不仅把法国推向上了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疲惫的和可耻的军事行动，而且还把人力和物力转移到非生产性目的，从而对法国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对外政治方面，殖民战争增加了法国对美国的军事战略依赖，削弱了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使它不能充分地参加西欧和大西洋问题的解决。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下，第五共和国不得不放弃保留

殖民主义的政治形式。法国资产阶级从自己可悲的军事行动中得出的结论是，运用武力来保持统治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因此，法国对美国在越南的武装干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对美国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持有节制的和从总体上不赞成的态度。正是这个历史经验提醒法国统治集团对石油和原料危机作出稳健的和现实的反应。

法国对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所形成的形势有较好的理解，还表现在它拒绝参加在美国庇护下由工业发达国家组成的、旨在对抗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国际能源组织；倡议在巴黎召开南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尽管是匆忙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使发展中国家保留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集体中的方法，在法国新殖民主义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把“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国”地位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国家，使欧洲资本主义可以扩大自己的外围，同时也为法国向难于打入的地区渗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不难发现法国“较好的理解”了所不能跨越的范围。当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殖民统治或新殖民统治（即殖民地人民的政治从属关系）的某一种形式，而是这种统治的基础时，法国统治集团便迅速改变所沿用的“软”的策略（谈判、开展外交活动），而毫不动摇地采用粗暴镇压的方法，包括使用武力在内。1979年在扎伊尔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尽管欧洲和大西洋政策有各种变化，法国在整个七十年代保持了在国际关系中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巩固欧洲安全的不变方针。它积极参加了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的筹备工作，促进了缓和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的扩大。在法国总统访问苏联期间（1979年4

月），签订了苏联同法国进一步发展合作的规划，它被誉为推动缓和的“国际关系实践的新发展”①。1980年，当国际关系上乌云密布的时候②，法国领导人表现了维护和平的责任感，在冲突面前宁愿选择对话。

法国站在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过程的发端一边，仅此一点就使它能直接参与最重要的世界事件。积极参加七十年代的缓和，不同寻常地提高了法国的世界作用。这一点可以在许多法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实业界人士和专家的言论中得到证实。例如，雅克·勒苏纳（1980年初在他的领导下向政府提出了一份法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它在本世纪末以前可能起的作用的报告）指出，尽管法国在金融、贸易和军事方面不能决定“国际游戏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和“人类的进步”。勒苏纳强调指出，“然而法国不能只在它的建议将有助于增加地球上的福利和巩固和平的情况下才这样做”③。

可见，直到八十年代初，法国保持了在世界舞台上执行独立的和有创造性的路线和对新事物具有敏感性的国家的声誉。尽管在能原危机后，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存在各种矛盾和不连贯性，但它在动员西欧的力量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意图方面的作用和它对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和保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常对话的积极参与，说明法国领导人对在分裂成各种军事集团、充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上保持克制、忍

① [苏]《1979年4月26—28日法国总统德斯坦访问苏联 文件与材料汇编》，莫斯科，1979年版。

②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页。

③ [法]《世界上未来的法国 以雅克·勒苏纳为首的小组的报告》，巴黎，1980年版，第177页。

耐、小心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有充分的理解。从总的说，七十年代法国对世界问题的态度，表明它比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许多伙伴对世界命运、各国人民的安全具有更大的责任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在整个七十年代保持了“东西方”对话积极参加者的地位，而保持这种对话是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所必不可少的。

·第 二 章·

生产力和生产结构

法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反映出一幅非常矛盾的图景。战后发展的成就是无庸置疑的，这些成就使国家克服了半个世纪的落后状况，保证了从“高利贷”模式向全新的经济结构的过度。但由于其经济的许多方面仍继续背着过去的历史包袱，而加深了所固有的一般性矛盾：失业、通货膨胀、资本积累过度、部门和地区间的失调、社会不平等，等等。特别是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史的特点，可以说明小农经济中就业比重高、在所有经济部门中有大量生产效率低的中小企业、大部分国土的经济开发差的原因。战后时期，所形成的许多失调现象加深了，虽然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两极分化过程被比较好的平均统计指标掩盖了。

七十年代对再生产过程的动态和性质以及生产力的利用带来了深刻变化。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组成、部门和再生产结构、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研究、生产力配置趋势的变化等有关的问题。

第一节　经济增长速度趋势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1/4世纪中，法国的经济

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着。根据法国的统计资料，1950—197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保证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产值的增长额大致相同（见表5）。

1974年以前不存在生产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放慢的情况，使法国著名的学者如埃·马兰沃、日·卡里和普·杜布互有理由把战后经济发展看作是“法国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和“强有力的”发展①。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发展保证了法国到七十年代初有可能消除在二十世纪积累起来的五十年的落后状况②。

1974—1975年的危机成了转向慢速发展的起点（见表

表5　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动态

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0—1980年	1950—1960年	1960—1970年	1970—1980年	1973—1980年
国内生产总值	4.6	4.5	5.6	3.6	2.8
市场国内生产总值①	4.9	4.8	5.9	3.7	2.7
工业生产	5.3	5.3	6.6	3.3	1.5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日·日·卡里、普·杜布瓦、埃·马兰沃：《法国的发展》，巴黎，1972年版，第672—673页；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C，第1卷，第111页；第3卷，第216页；
[法]《回声报》1981年4月8日。

① 市场国内生产总值(或市场产值)只包括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和劳动的生产。它不包括国家机构、军队、私人非赢利组织、家庭仆人的劳动。市场国内生产总值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7—90%。

① [法]日·日·卡里、普·杜布瓦、埃·马兰沃：《法国的发展》，巴黎，1972年版，第228页。

② [法]《法国手册》，1978年，第161期，第14页。

5）。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趋势相比，1974—1980年期间国内年产总值增长速度共计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国家少生产了近5,000亿法郎（1970年价格）或近一半的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的商品和劳务。

近年来，对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了许多预测。所有预测可归结为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平均每年不会超过3—3.5%。例如，1979年发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专家们的预测，认为法国在1980—1990年间所能够保证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不会超过3.2%，这大大低于1960—1970年的速度（5.6%），甚至低于1970—1980年的速度①。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提供的估算更有节制。在该研究所所作的1981—1985年的发展预测中，假定世界行情好转以及法国政府采取重大结构改革的最乐观的方案，也只期望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为3.4%，而比较现实的方案是2.6%②。

根据危机后时期（1975—1980）的发展经验和对八十年代的各种预测估计表明，法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充满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严重失调。因此，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利用劳动力、资本、科学和自然资源以及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等内部因素及其方式和效率，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特点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因为及时地和成功地适应变化了的外部条件、善于克服或缓和尖锐的矛盾、消除危险的失调，正是取

① [法]《世界报》，1979年11月6日。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115期，第12、17页。

决于这些内部条件。

第二节　劳动资源和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力，社会生产的所有其他特征，包括速度在内，都取决于它的数量和质量。在战后的法国，挖掘劳动潜力、劳动力的职业训练和再培训及其在各个部门与地区间的再分配问题，因人口数量和性别、年龄结构等特点而变得十分尖锐。问题在于，半个世纪来，即直至194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的鼓励生育的措施、自由移民政策和提高生活水平，引起了人口动态的急剧转折。从1896年到1946年，在现在的国境内的法国人口只增加了10万人，而从1946年到1980年人口却增加了1,300万，总数达5,370万人。

七十年代初，人口增长速度同前1/4世纪相比已经放慢。例如，1954—1962年间人口数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1962—1972年平均增加46.7万人，而1973—1980年平均只增加21.6万人。同时，仅靠自然增长率而增加的人数就相应为29.9万、31.3万和20.8万人。很明显，在法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特别大①。

人口年龄结构的比重也起了变化。在战后时期，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人口（20至64岁）的比重下降了（从1954年的

①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1949—1979年法国经济的进展》，巴黎，1981年，第22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2卷，第57页。

58%下降为1975年的55%）①。这主要是由于“两端”年龄组（一端是小孩和青年，另一端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人口比重增加有关。在1954—1968年间，青年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30.7%增加到33.8%。它只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有少许下降，目前这个年龄组占总人口的1/3。老年组的比重增加较慢，但这种趋势已经保持了二十年，目前这个年龄组的比重为13.3%，而1954年为11,5%。

由于青年和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增加，使总人口数的增加比自立人口快。虽然经济自立人口的人数由1946年的1,940万增加到了1980年的2,320万人，但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这期间却由48.5%下降为43.2%。

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率的上升，不可避免地使人认为，当“有生气的”一代人达到就业年龄时，自立人口就会开始迅速增加。事实上，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在自立人口动态中发生了转折，几乎立即出现了把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吸收到生产过程中去的困难。从1968年起，“寻找工作的人口”（失业者）不断增加，到1973年，还在危机到来之前，失业人数已将近有60万人（占自立人口的2.7%），日益增加的部分是青年。换句话说，法国经济只是部分地利用了劳动力年轻化过程产生的优势。

七十年代经济自立人口的增加，还由于进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性别、年龄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妇女的变化。在1968年和1975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平均每年补充的19.4万个就业人员中，妇女为9.5万人（占49%），但妇女只占就业总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7年，第50期D，第8页。

人数的38%①。

除了大量青年和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外，自立人口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从国外流入了劳动力。五十一六十年代，靠从国外流入的劳动力满足了对非熟练劳动的需求。到1974年，外籍劳动力的总数达到了190万人，占国内自立人口的8%，以后便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使用外籍劳动力的主要领域是工业和建筑业，这是创造大部分资本主义利润的部门。1971年，60%以上的工业和商业企业、65%以上的加工工业企业、89%的冶金企业、78%的金属初级加工企业、76%的电机工业、70%的建筑、采掘企业和公共工程雇佣了外籍工人②。

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整个战后时期劳动力的来源是农业。1949年至1980年的三十年内，农业中的就业人数由560万人减少到190万人。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及其子女补充了工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工人以及服务人员大军。七十年代，这个来源对于增加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以及对于失业人数的增加起了显著作用。1970—1980年，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92万人，而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同样也减少了50.9万人。上述工、农业所减少的142.9万人与新增加的174.6万自立人口，进入了服务业和国家机构，而这两方面只能吸收216.9万

---

①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79年7月12日，第16页；
[法]《法国统计指南》，巴黎，1976年版，第31页。

* 1954—1962年，外籍劳动者保证了自立人口增长数的一半，1962—1968年为1/4，1968—1973年约为1/3。1974—1976年外籍工人的流入受到了限制，1977—1980年外籍工人净移入额为零。

② [苏]叶·姆·米哈伊洛夫：《法国的外籍劳动力》，莫斯科，1977年版，第19—20页。

人，剩下的100万人则加入了失业大军，失业人数却由51万人增加到了151.6万人①。

劳动资源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利用劳动力的集约程度和劳动时间的长短。法国在六十年代初期以前，就业人数没有增加，部分地是靠延长劳动时间加以弥补。在整个战后时期，法国的劳动时间在西欧属最长者之一。尽管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曾通过40小时工作周的法律，但在1950—1974年间每周实际工作时间在44—46小时之间。很长的工作周逐渐地用增加带工资的休假而部分地得到了补偿。五十年代中期每年休假期为三周，六十年代中期增加到四周。

1974—1975年危机后的时期，工作周时间开始迅速减少，到1980年在法国整个经济中减少到了40.8小时。工业和运输业工作周时间最短（约40.5小时），只有建筑业的工作周时间较长（41.9小时）。

与劳动力有关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性资源是劳动力的技术熟练水平和受教育的程度。根据一些计算，由于提高所雇佣劳动力的职业训练和一般教育水平，在1951—1969年间法国经济每年额外地获得了相当于45%的就业人员②。这个估算当然有一定的假定性，与其说是对额外就业人数的估计，不如说是对劳动力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的估价。

1962年前，法国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至少受过初等教育。

---

①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3卷，第207页；1976年，第49期C，第3卷，第164—166页。

② [法]日·日·卡里、晋·杜布瓦、埃·马兰沃：《法国的发展》，巴黎，1972年版，第103页。

到六十年代末，近1/3自立人口受过中等教育和10%的自立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七十年代初，有1/4 19岁的青年在高等学校中学习。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劳动复杂性和对其有关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要求的迅速增加。在1955—1975年的二十年内，熟练劳动力的比重增加了一倍，由19%增加到38%①。熟练劳动力的使用情况因不同工业部门而有很大差别。例如，在加工工业中熟练劳动力平均占50%，在石油工业中占81%，在印刷和缝纫工业中占70—80%，采掘工业中占60—70%，冶金、机器制造、玻璃、化学工业中占50%，食品和电机工业中占40%以下②。

七十年代，劳动力的部门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6）。同时，五十—六十年代固有的许多趋势已不再存在，为新的规律所代替。工业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在1974—1975年的危机之前，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它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也增加了。危机以后，生产原料、半成品和消费品部门的就业人数开始显著减少。只有生产机器和设备的部门继续吸收新的劳动力，但速度比以前要慢得多。由于私营和国营劳动部门就业人数增加，就业总人数继续有少量增加。这种情况有助于减少失业，但却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

由于青年、妇女、外籍工人、农村移民人数的增长和五十—六十年代增加工作周时间，到七十年代初以前，对劳动资源的总影响不大，但提高劳动生产率便成了法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根据专家们在准备第四个计划(1971—1975年)过程中所作的计算，1960—1965年间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5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110期，第21页。

表6 就业人数的部门结构和变化速度(%)

部门	结构			平均速度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60—1970年	1970—1980年
农业	21.3	13.2	8.7	−4.1	−3.6
工业	27.7	28.0	25.8	0.7	−0.4
其中生产：					
原料和半成品①	9.3	9.4	8.5	0.7	−0.6
设备	6.3	7.6	7.8	2.5	0.7
消费品	12.1	11.0	9.5	−0.4	−1.1
建筑业	7.7	9.6	8.4	2.7	−0.9
运输和邮电	5.2	5.8	6.1	1.6	1.0
商业	10.3	11.7	12.0	1.7	0.8
商业性劳务②	11.1	15.5	20.8	4.0	3.4
其他劳务③	16.7	16.5	18.1	0.4	1.3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总计(百万人)	19,715.0	20,865.0	21,683.0		

资料来源：[法]《1949—1979年法国经济的进展》，1981年版，第28—31页；[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第94—95期C，第3卷，第212第。

① 包括能源部门。

② 为居民、企业提供服务，包括信贷和保险活动。

③ 包括教育、保健、国家机构、军队。

了市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的71%，在其后的五年内和危机时期分别保证了83.6%和92.7%①。在危机以后，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由1964—1973年的5.1%下降到1974—1980年的3.2%。与此同时，产品生产增长速度也由5.6%下降到2.6%。结果，在1974—1980年间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了

①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76年6月22日，第14卷，第818页。

104.2%商品产值，也就是说相对地高于危机前的年代①。

从劳动生产率速度和生产速度的比例关系看，1974—1975年的危机是法国经济发展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工艺、组织因素从销售市场方面没有遇到充分表现自己的特殊障碍。1974年以后，国内外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展速度下降了一半，这种情况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确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减缓则慢得多。例如，以新增产值计算的工业产值在1974—1980年间每年平均只增加1.5%，而1959—1973年为6.3%，但是，同期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则分别为4.5%和6.2%。

应当指出，在危机后的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在各个部门是很不平衡的。与1971—1973年相比，1974—1980年在整个农业中每个就业人员每小时产量的增长率由5.5%下降到3.1%，而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则由4.8%下降到3.8%，在建筑业和公共工程部门由3.2%下降到2.6%，在食品工业部门由6.7%下降到4.2%，在能源部门由10.3%下降到5.3%，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部门由5.9%下降到4.2%，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由7.2%下降到5.2%。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最多的是运输和邮电部门（由7.2%下降到3.4%）、商业部门（由6.1%下降到0.7%）以及市场劳务部门（由4.7%下降到1.6%）②。

---

①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劳动关系和就业委员会报告》，巴黎，1980年版，第32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2卷，第87页。

②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76年6月22日，第14卷，第817-818页；《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C，第2卷，第87页；1981年，第94-95期C，第2卷，第87页。

尽管在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大大减少就业和劳动时间可以阻止每小时产量增长指标下降，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增加这些指标，但从整个经济看，把劳动生产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的这种方法不可能带来积极结果。它造成没有利用的劳动力的增加，维持这些劳动力增加了法国经济的"杂项开支"，从而对法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详见第五章和第六章）。

可见，1974—1975年的危机及其产生的失调带来了双重不利后果：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减少和失业人数增加；所有经济部门中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受阻，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服务业部门。这一切对法国经济效益指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三节 固定资本的积累

五十—六十年代通过粗放经营方法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因缺乏闲置劳动力而受到限制，这促使法国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发展节约劳动的生产方法。这要求加速固定资本、首先是它的活跃部分——设备的积累，以便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在五十年代中期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以后，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从动态上看，法国固定资本积累过程同劳动力增加过程一样，也经历了由1974—1975年危机分割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投资速度超过了生产速度。在1959—1973年间，生产性投资（即除住宅和行政建设以外的所有投资）每年平均增长7.7%，而它在商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2%增加到14.9%。在第二阶段，即1974—1980年，积

累过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生产性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了1.6%，而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4.9%下降到了13.7%。（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①。

在六十—七十年代积累过程的主要特点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投资结构由于机器和设备比重的增加和生产用建筑的减少而逐步得到了改善。七十年代这个过程发展得特别迅速，当时实际上停止了新企业的建设。下面的数字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厂房和设施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1960年为42%，1970年下降到了38.1%，而1980年降为29%②。

第二，到七十年代初，在总投资额中，非生产性部分（住宅和行政建筑）一直在增加。1960年它占34.3%，1970年占37.2%。危机以后，由于这类建筑的规模缩小，它在总投资额中的比重下降到了33.3%，虽然它在建筑业中的比重由63.2%上升到了66.8%。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住宅和行政建筑的增加，而是由于新的生产性建筑和设施的建设大大减少了。

第三，生产性投资部门结构的形成趋势发生了变化（见表7）。在投资构成中，生产和消费性劳务部门、运输邮电和商业部门投资的作用提高了。相反，工业、农业和建筑业投资的比重下降了。换句话说，不参加直接生产的基础部门逐渐成了主要投资领域。七十年代，这个趋势更加加强了。

---

①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1949-1979年法国经济的进展》，1981年版，第155-156页；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3卷，第7页。

②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公布的部门联系表，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表7 部门结构和变化趋势（1970年价格；%）

部门	结构			年平均速度	
	1960年	1970年	1979年	1960—1970年	1970—1979年
农业	9.3	8.0	7.0	6.3	1.1
工业	54.3	48.6	47.1	6.8	2.3
其中生产部门：					
原料和半成品	34.3	25.7	27.3	4.7	3.4
设备	7.9	11.3	10.9	11.9	2.2
消费品	12.1	11.6	8.7	7.6	−0.3
建筑业	5.1	5.8	4.4	9.6	−0.6
运输和邮电	16.5	15.4	19.3	7.3	5.2
商业	7.2	10.6	8.3	12.3	−0.2
市场性劳务	7.6	11.6	13.9	12.7	4.6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总计(亿法郎)	445,470	961,430	1,213,250	—	—

根据［法］《1949—1979年法国经济的进展》，1981年版，第39页计算。

由于直到1973年投资过程的速度都比较高，这就造成累积的生产能力大大增加。1960至1973年间，法国的生产资本总额增加了近一倍，由6,272亿法郎增加到11,929亿法郎（按1970年价格计算）①。重工业、建筑业、商业和市场劳务的固定基金增加最快。农业、食品和轻工业、运输邮电业的固定基金增长缓慢。在1960—1970年间，第一类部门累积基金的比重由41%增加到66.6%（见表8）。

1960—1973年间，固定资本的增加毫无例外地在所有部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6期，第91页。

门都比就业增加快。这提高了劳动的资本装备率，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两个指标（资本装备率和生产率）动态的数量联系在不同经济部门是各不相同的。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资本、就业和产品的统计分析迫使人们抛弃这种假设，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似乎是资本装备率水平提高的直

表8 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

（按1970年价格计算；%）

部门	结构			年平均增长率	
	1960年	1970年	1979年	1960—1973年	1974—1979年
1．农业	13.1	11.2	9.3	3.3	2.9
2．食品工业	5.8	5.1	4.6	3.9	3.4
3．能源	15.0	14.2	12.2	3.9	3.2
4．原料和半成品生产	13.8	15.1	14.3	6.1	3.5
5．机器设备生产①	6.9	8.0	10.3	6.9	7.6
6．日用消费品生产	7.8	7.2	6.2	4.3	2.9
7．建筑业和公共工程	3.0	4.5	4.3	8.6	3.6
8．运输和邮电	17.4	15.7	16.5	4.1	5.6
9．商业	8.9	9.8	10.2	6.1	4.8
10．市场性劳务	8.4	9.2	12.1	6.5	7.6
总计	100 0	100.0	100.0	5.1	4.6
其中制造业（2+4+5+6）	34.3	35.4	35.4	5.5	4.4
总计(亿法郎)	6,272	10,064	15,646	—	—

根据［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81年3月25日，第216页计算。

① 包括耐用消费品。

接后果”①。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有：由于采用传送带和流水生产法而加强了劳动的紧张程度，减少不合理利用的时间，采取更加有效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法。此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销售市场扩大更快的部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使得有可能通过增加产品批量规模和提高其标准化水平来降低单位劳动消耗。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伴随投资过程加速而来的是许多消极倾向的出现和发展。由于资本积累的加速，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了，但是提高的程度低于各种积累基金额增长的程度。在设备和产品的价格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优先增长，早晚会导致企业财政状况恶化，预付资本赢利率下降。而这又必然会消极地影响实际积累过程（有关经济周期机制问题的这个方面将在第五章进行考察）。

对1974—1975年危机前后法国投资过程的特点加以比较，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六十年代，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广泛的经济结构改革。资本积累率大大提高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大，但远不是按照符合社会需要的方式进行的。结果，从六十年代中期起生产失调不断增加，这表现在固定资产基金利用效率的下降上。

与此同时，到世界经济关系危机爆发和法国经济原已存在而隐蔽的失调尖锐表现出来的时候，通过生产集约化来改组经济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改组的部门（黑色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6期，第91页。

冶金工业、造船业和纺织工业）经受了更大的困难。随资本积累总速度下降和对现有资金被迫进行有利于能源的再分配之后，最新部门，首先是电子计算机和计算技术生产的建立放慢了。资本积累率的下降还意味着从七十年代后半期起科学技术进步同生产的联系削弱了，因为这种联系主要通过用新的技术代替陈旧设备的途径来实现。这正好同科学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消极过程的发展相吻合。

第四节　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

战后法国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1958年以前，在生产恢复和迅速发展的时期，主要利用了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此期间新的研究范围很窄，对于完善生产过程影响不大。

1958—1967年的十年间，出现了科学技术潜力的迅速增长。在这期间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了一倍，由1958年的1.15%增加到1967年的2.16%①。科研干部人数的迅速增加（年平均8%）超过了人口和就业的增长率。与此同时，这十年的特点是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部门的发展主要采取粗放形式和科学技术潜力的逐步积累。此外，这种潜力的一部分对生产领域影响很小，因为相当比例的资源被用于进行军事方面和与军事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除了生产现代化类型的武器外，进行了航空和航天技术、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能等部门的紧张开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85期C，第11页。

发。毫无疑问，国家是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占这类费用的60％以上。

从六十年代末期起，科学研究领域开始受到整个经济的共同过程——粗放发展因素逐渐消失、投资效率下降的影响。开始了科学研究优先重点的修改。这最初表现为科研费用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

抑制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用的过程不仅波及了法国（其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7年的2.2％下降到1975年的1.8％），而且也波及了英国（同期由2.4％下降到2.1％）和美国（由3％下降到2.3％）。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联邦德国和日本继续增加这种费用，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科学研究费用水平长时期以来低于前一类国家。由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发生的这种地位的变化，在拥有巨大科学技术潜力的资本主义国家金字塔中，法国由第三位降为第五位。1980年法国的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大约为450亿法郎。如果说1959—196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4％的话，那么，1967—1977年却只有2.3％①。近年来增长率有很大提高，但从整个说，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科学技术政策的新方针，目的是要使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接近工业发展的具体实践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具体要求，把重点转移到提高众多部门的竞争能力上来。这个趋势表现在国家投资部门方向的改变和私营公司在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用总额中的比重上升等方面。政府在抑制参加这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85期C，第51页。

种费用投资的同时，继续对核能和航空航天工业的研究工作积极投资。

从1976年起，在通过革新军队装备的新计划以后，用于新式武器研制的拨款增加了。甚至在用于民用和军用目的（建立原子能工业的物质基础）的费用项目中，据法国《国防》杂志证实，贷款开始“实际上完全用于核武器的研制和完善”①。

国家靠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贷款保证科研干部的培养，以促进高技术部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促进新技术的研制和推广。最后，国家实际上解脱了私营部门进行昂贵的基础研究。1976年法国国营科研机构完成了36.9%的科学研究和试制工作，而1970年为40%。同期，国家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由61.5%下降到55.4%②。

在科学研究方面最大的国营组织首先是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宇宙研究中心、电视通讯中心等等。国家科研中心协调为数众多的实验室和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各大学的工作。在许多部内（首先在国防部）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在国有化企业中还有部门性质的科研中心，它们进行运输、贸易、天然气工业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立大学和理工学院中也进行大量研究工作③。

国家利用各种刺激方法，对私营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施加影响。进行影响的形式之一是国营研究机构同私营公

① [法]《国防》，1979年12月，第154页。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85期C，第55、58页。

③ [苏]阿·姆·契卡洛夫，《法国的科学研究和科研机构》，莫斯科，1979年版，第106、154页。

司的实验室进行协作。在电子技术、航空技术和核动力方面也进行这种协作。

法国是第一批实行国家调节科研活动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方面的国营成分是进行这种调节的物质基础。近十年来，编制科学研究计划，目的是更好地使科学研究工作同国家发展的总体设想协调一致。例如，在第七个计划（1976—1980年）中，除了列出科学研究活动的总方针（提高研制工作的效率，更好地协调国家和私营部门的科研工作）外，还列进了解决象减少能源和原料的依赖性、发展“战略”部门（信息、自动化、电子元件的生产、科研和医疗设备的生产）这样一些任务的具规划。

各项计划的指导性质，使得这些计划成为只是提出国家科学政策基本方向的文件，而不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例如，第七个计划提出在科研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方面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的方针就没有实现。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用不仅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2.3%的水平，而且仍然大大低于法国主要竞争对手的水平。

尽管国家科研机构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的发展，而法国公司进行的应用研究水平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很低的。这对专利和许可证贸易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在这个项目上对外国公司的支付超过从外国所得的收入，超支额不断增加：1964年为5,100万法郎，1976年为16亿法郎①。目前所颁发的专利66%属于外国公司，根据现有的估算，利用外国技术生产的产值达440亿法郎，即占工业产值的10%。

---

① 〔法〕《经济问题》，1978年，第1561期，第18页。

七十年代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费用变化不大，设计研制方面的效率不高，大学的科学研究同生产的联系比较差，这一切也影响了法国在新商品市场上的地位。在采用革新的比重上，法国也低于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法国的一家杂志断言，七十年代初在工业产品市场上出现的500项最大的革新中，只有21项可以算作是法国的资产，而美国有319项，英国有85项，日本有34项①。

可见，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比例失调，国家、工业部门和大学之间的科研工作缺乏密切联系和协调、军事部门的发达科学潜力与传统部门的薄弱科学技术基础之间的不协调、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过分地集中在少数大公司的手中以及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和有效的科研组织方法，这是法国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八十年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因此，并非偶然的是，左派力量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获胜后所成立的皮·莫鲁瓦政府中，专门设立了以国务部长（副总理）让一皮埃尔·舍韦内芒为首的科学研究与工业部。在他提出的计划中，建议在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中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便大大提高在经济中的作用。除了把科研费用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提高到2.5%以外，部长还打算把一项科学研究新方针计划法案提交议会审议。按照舍韦内芒的说法，这个新方针应规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最优发展比例，把注意力集中在能源、电子技术、计算技术、自动化、生物工艺学、医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方向上②。

---

① ［法］《新经济学家》，1979年，第175期，第65页。

② ［法］《新观察家》，1981年，第867期，第42-44页。

第五节　经济的部门结构及其改革的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经济结构走向了深刻的改革道路。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及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国际化。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旨在解决使国内生产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要求这一困难任务的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

起初，在西欧六国共同市场建立以后（1957年），法国统治阶级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所提供的优势，曾指望改组农业，增加农业的商品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出口。法国资本主义试图用这种办法解决对外贸易的平衡，然后提出继续和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国内工业基础由于长期以金融信贷（高利贷）活动为方向而陈旧和不发达。六十年代提出了广泛进行国家经济改革的口号。但是，到六十年代末期，这种选择的失算已经显而易见了。

第一，主要由半自给型小农“企业”组成的农业的改革，比预先的想象要复杂得多。问题与其说在它的技术经济方面（此时世界经验已经提供了一套“绿色革命”的基本条件：化肥、除莠剂和杀虫剂、改良土壤的新技术、发展畜牧业的有效方法等等），不如说在它的社会经济方面。所要求的生产改革的速度明显地超过了社会改革的速度。为了避免由于农民大量破产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激化，法国统治阶级在同欧洲共同体伙伴的激烈斗争中，放弃了在农产品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的想法，并设法通过了用制定所谓的欧洲共同体统一农业政策的办法来保护生产的方案。这自然延缓了根据资本主义效益原则改革农业的过程，削弱了农业的竞争能

力，降低了出口能力。

第二，国内整个工业的广泛发展也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一系列生产率不高的传统部门在西欧和世界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们抵挡不住国际竞争。资本集中程度低，法国公司缺乏国际规模，也是影响之一（见第三章）。

可见，五十年代选择的结构改革方针，到了六十年代末反过来又违背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内经济虽然实现了专业化，但只包括不利的和没有前途的产品。这迫使法国资本主义修改自己的发展战略（见第四章）。七十年代把希望寄托在实现另一种类型的结构改革上——优先发展同科学技术进步联系最密切的和同时还没有为外国生产者占领的或者占领不多的少数生产部门（见第六章）。七十年代窄方向专业化的必然结果是经受不住外国竞争的生产门类迅速收缩。新的专业化原则不仅扩大到了工业生产，而且也适用于农业生产。

实现新经济战略的初步结果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相对放慢（见表9）。如果说1960—1970年的十年间增长速度为7.6%，工业在全部生产中的比重由33.2%提高到了37.9%的话，那么在1970—1980年的十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6%，而比重实际上没有变化：1980年等于37.6%。这意味着，七十年代在工业内部出现了生产发展和生产收缩过程相互抵消的情况。下面考察各个部门的状况时，我们力求详细说明这个论点。

生产生产资料的一类部门，包括通用机器和精密机器制造业、造船业、电子工业、运输机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从1959年到1974年间，就业人数由130.5万人增加到195.7万人，在工业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由29.6%提高

到36.7%。以后就业人数稳定下来了，但它的比重在继续增加，1977年达到了38.3%，而其他工业部门则减少了自己的职工人数。生产资料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也增加了，从1959

表9　部门结构和生产增长速度(%)

部门	结构			年平均速度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60—1970年	1970—1980年
农　业	12.5	7.9	6.0	1.3	1.1
工　业	33.2	37.9	37.6	7.6	1.6
其　中：					
食品工业	4.5	4.9	5.0	7.05	4.1
能　源	4.7	5.5	5.6	7.8	4.25
原料和半成品生产	9.4	10.8	10.0	7.55	2.95
机器设备生产	7.5	9.3	10.4	2.7	4.7
耐用消费品生产	0.3	0.5	0.7	10.8	8.0
日用消费品生产	6.8	7.0	6.0	6.5	2.1
建筑业	9.1	9.0	6.4	6.0	0.2
运输和邮电	6.5	6.5	7.5	6.7	4.85
商　业	11.4	12.3	11.8	5.2	3.2
市场性劳务	27.5	26.3	31.2	5.75	5.5
统计修正	−0.2	+0.1	−0.6	5.75	5.5
总　计	100.0	100.0	100.0	6.55	3.65
总　计(亿法郎1970年价格)	3,355	6,464	9,257	—	—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1949—1979年法国经济的进展》，1981年，第74页；

[法]《关于1980年国家收支账目的报告》，巴黎，1981年5月。

年的30%增加到1973年的35%和1977年的37.6%* ①。七十年代这一组商品更加迅速增长的趋势，主要同加速设备出口，以及同上面指出的企业总投资中有利于设备的变化有关。

六十年代曾经是上述一类部门中最重要部门的机器和非电气设备的生产，已让位于电气机器制造业和现代运输设备的生产。如果说1973年第一类部门的生产指数为123（1970年为100），那么第二部类为178②。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一般机器制造业产品有相当高的竞争能力。这首先包括建筑和公共工程、矿山开采、黑色冶金、化工、食品工业机器和设备的生产。但是，在机器制造业发展水平上，从整体上说，法国落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生产的机械设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低于联邦德国和英国（相应为14%对19%和20%），可以说明上述情况③。

机床制造业是法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其就业人数在危机前就开始伴随生产急剧下降而减少。机床制造业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先进品种的金属加工设备，首先是锻压设备和数控机床的比重低。近年来，法国已成为西欧最大的金属加工设备出口国（从一般机床到各种专用机床）。

在电气设备（包括电子设备）的生产方面，1975年法国占世界第五位。这个部门在危机前的二十年内把产量增加了三倍，后来受危机影响不大，现在继续高速度发展。增长的

---

* 这一研究的作者使用了不同于国家统计的另一种分类法，结果与我们根据一般统计资料计算的指标出现差别。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18期，第18-19页。

② [法]《扩展》，1980年，第140期，第55-56页。

③ [法]生产率和设备计划总署：《工业委员会报告》，巴黎，1971年版，第41页。

原因之一是民用电子产品、生产用电气和电子设备消费量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

计算技术和信息处理设备的生产长时期来是效率最低的。在建立本国的计算设备部门的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政府于1976年同意将受国家控制的国际信息公司同美国汉尼威尔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合并。法美汉尼威尔一国际信息公司成了西欧最大的电子计算机生产厂家之一。在它创立的时候，法国近30％的电子计算机总量属于这家公司，到九十年代末期有可能增加至50％。至于生产小型电子计算机、终端机和外围设备的法国公司，到七十年代中期占国内市场的1/3。

尽管从外表看电气工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它也有严重的不足：元件的生产发展非常迅速，但制成品，即最有利于日用和生产用产品的增长速度却很低，1979年总指数为178，元件生产指数为217，民用技术指数为189，生产设备指数为152。

法国在运输工具生产方面的地位一直是很强的：从本世纪初起，它就是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的开拓者。这两个部门对法国总的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进步都有重大影响。同时，这两个部门在各自发展的主要特点和方向方面又有很大差别。

汽车制造业的特点是资本装备率居中等水平，高就业率和劳动力熟练程度较低。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这里现代化并没有伴随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1960—1978年间产量增加三倍（年平均增长7.9％），主要是靠增加就业人数一倍（由26.7万增加到51.2万人）达到的。部门的生产和组织结构的特点是广泛利用各种不同的公司间的国际合作形式。法国白茹一雪铁龙公司吞并克莱斯勒公司的欧洲子公司后，成为除美国之外的最大的汽车集团。

法国的与武器生产密切相关的飞机火箭制造业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一个部门，按周转额计算，从1976年起它仅次于美国的相应部门，它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超过10%①。它的特点是高资本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和高度熟练劳动力。这个部门的民用部分制造了曾经是最好的中程快帆式喷气客机、超音速协和式客机（与英国共同设计），研制了多座位空中公共汽车民航班机。同时，由于被迫削减墨丘利飞机的生产、超音速协和式飞机销售困难和空中公共汽车飞机订货量小，七十年代中期飞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商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鼓励这个部门所进行的结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使生产多样化，同西欧和美国的公司进行协作。1977年，除了采取修改部门发展方向的措施外，国家还加强了对生产活动的参与，购买了有名的私营公司达索·布雷格公司的一部分股票，建立了一家新的国营公司，把属于国家的这个部门各企业的股份交给了这个公司。1981年执政的左派力量对这个公司实行了部分国有化。

造船业是法国工业的“病态”部门之一。这个部门产生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和组织结构上的弱点以及日本和南朝鲜造船厂的激烈竞争所致。七十年代初批准的使这个部门“复康”的国家计划，虽然增加了生产和出口限额，但没有能使这个部门经受住震憾世界造船业的危机和船舶市场急剧激化的竞争的打击。1977—1978年公布的“拯救”该部门的新措施，目的在于对它进行技术改造和恢复正常生产。最终目的是通过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以及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合理化”，加强大公司的地位和竞争能力。生产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8年，第104期，第4页。

结构合理化意味着要把造船厂缩减2/3和解雇1/3的工人。在法国报刊上曾一再讨论放弃本国造船业，代之以进口外国船舶的建议。

生产机器、设备、仪器、船舶、飞机的部门同时也是法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骨干。这个综合体在法国经济中起重要作用，它不仅保证满足军队的需要，而且还把2/5的产品输往其他国家。

关于武器的生产，人们知道的不多。公布的统计资料极其有限而且很不经常，有许多空白和含混不清之处。1977年在军用企业中工作的人数为28.7万人，占生产机器设备各部门就业总人数的15.4%。他们的分布如下：航空航天工业8.3万人，机器制造业6.8万人，造船业3.1万人，电子工业4.2万人，原子能工业1.5万人，其他4.8万人。也就是说，根据官方的统计，在航空和造船业部门就业的21.9万人中，大约16.2万人（或占74%）同武器生产有关。在机器制造、电子工业和电机工业中这一比重约为12%。还在战前的三十年代，法国的一部分军事工业就被人民统一战线政府国有化了。八十年代初在军用企业工作的28.7万人中，国营企业占13.1万人，私人企业占15.5万人。1981年6月成立的左派力量联合政府提出把全部军用生产国有化。

1979年10月，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公布了法国生产武器的最大公司的清单（见表10）。

根据清单，一些专门完成军事订货的私营公司——达索公司、汤姆逊·布兰特公司、马特拉公司、马纽朗公司、涡轮机制造公司——的50—90%的销售额是在武器市场上进行的。

正如在上一节中指出的，国家用于军事研究的科研拨款

表10　属于法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公司

部　门	公　司	销售额(百万法郎)		军事生产中的就业人数
		总　额	武　器	
飞机制造业	法国宇航公司	9,503	6,181(65)	21,000
	达索·布雷格公司	5,697	5,165(91)	12,900
	法国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	2,291	1,802(79)	7,700
	涡轮机制造公司	939	438(47)	3,400
	马特拉公司	1,794	1,047(58)	3,000
	欧洲发动机公司	923	848(52)	1,500
	航空工业公司	293	293(100)	2,800
步兵武器	马纽朗公司	638	470(74)	2,300
	吕歇尔公司	904	290(32)	1,300
	汤姆逊—布兰特公司	4,021	473(12)	1,300
	帕纳尔公司	569	569(100)	600
	地面武器工业集团	3,386	3,442(99)	17,000
造船业	诺曼底机器制造公司	621	621(100)	800
	转向装置和船舶制造公司	4,979	4,602(92)	28,000
电子工业	汤姆逊电子公司	6,007	2,853(47)	15,000
	马赛尔·达索电子公司	727	624(86)	1,900
火药制造	法国火药和炸药公司	981	651(66)	3,800

资料来源：[法]《世界报》，1979年9月4日，1980年2月19日。

说明：括号内的数字是公司总销售额中武器所占比重(%)。

不断增加。国家的资金主要落入武器供应公司建立的实验

室①。生产和研制范围极广的军用技术，要求法国的纳税人付出巨大代价。1980年的军事预算中，用于购买和完善军事技术的费用为398亿法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主要依靠本国军事工业的方针是戴高乐将军提出的，在这项政策中他提出了把法国变为核大国的军事战略理论。这个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提出了主要用本国生产的现代化武器武装法国军队的任务。这样的工业建立起来了，为了维持这种工业，法国人民肩负着沉重的负担。

为了弥补一部分费用和通过扩大批量来降低武器的单位生产费用，生产武器的企业家们把法国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八十年代初，法国在国外出售武器的人均收入比美国多一倍。武器出口的详细情况将在第六章加以考察。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建立军事工业是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七十年代后半期所作出的生产结构改革的核心方针之一。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数占工业就业总人数的4.9%（1977年）；它生产了450—500亿法郎的武器，并把35—40%出口到国外。1978年武器销售额为173亿法郎，其中61.3%是航空部队使用的武器，9%是军用电子仪器。同年获得了出售250亿武器的新订货②。

从表面上看，军事工业好象是法国民族的造福者。出售武器的收入（资产阶级评论员喜欢强调的一点），在1974—1978年间抵补了1/3至1/2从国外进口的“石油帐目”。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它的高度技术水平和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被看作“这个部门是法国工业实力的动力”的证明③。

---

① [法]《国防》，1979年12月，第155页。

② [法]《世界报》，1979年9月4日；1980年2月19日。

③ [法]《国防》，1980年1月，第86页。

但是，在法国，对这些事实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和评价。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刊物的言论中提醒人们注意，军事部门占用了资金、物资、熟练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民用工业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生产费用、改进生产赢利率指标、加强在国外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可能性。因此，左派力量在1981年议会选举时所提出的纲领中，与其他要求一起写进了计划在执政以后减少武器出口，把武器生产限制在国家为保证安全的实际需要范围内。

如果说在六十—七十年代期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了的话（包括由于扩大武器生产），那么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的比重则下降了。这些部门包括纺织工业、皮革工业、家具工业和木材加工工业、印刷工业。六十年代末，这些部门还生产了加工工业标准产值的25%以上和全部工业产值的16—18%。这些劳动密集部门保证了150万人的工作，即几乎占工业劳动力的1/3。这些部门的发展特点是增长速度缓慢（1959—1974年平均为5.3%，而整个工业为6.5%）①。在这一部类内部可以看到纺织工业和皮革工业、成衣生产的比重下降，木材加工和家具生产稳定的趋势。

外国厂家的竞争，使这一类部门迫切需要进行生产结构、组织结构和工艺结构的改革。到目前为止，尽管资金装备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这些部门的出口份额却在继续下降，纺织和制革工业的情况更是如此。成衣生产的状况稍许好一点。

传统生产部门的资本，为了保持高利率，迅速转向劳动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63期E，第15-17页。

费用较低的国家。成衣的生产转移到了突尼斯、摩洛哥、象牙海岸，皮革生产转移到了巴西和塞内加尔。提高利润率的另一个方法是在更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研制和采用新的先进方法以及转产新商品。

在原料和半成品生产部门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而在它们之间又出现了有利于化学工业和不利于黑色冶金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变化。化学工业比重不断增加，主要是由于化工产品的个人消费、生产性消费和出口量增加。在化工品出口方面，法国在美国和联邦德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至于黑色冶金工业，那么，它在八十年代初就处于困难境地。法国在世界钢产量中所占比重在近1/4世纪内下降了1/3。尽管采取了生产现代化、集中和积聚等措施，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仍然低于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联邦德国、比利时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实施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导致债务的急剧增加，在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公司还本付息的费用超过了利润额。1977—1978年间，国家不得不对黑色冶金业进行干预，在保证参与各公司股本的情况下，开始改组这一个部门。左翼势力联合政府对最大的黑色冶金企业实行了国有化。

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由于石油涨价，而不可避免地要对能源部门进行改组，同时也要求国家进行积极干预。在危机前的15年内，国内能源消费和能源平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在六十年代初石油和石油产品在能源平衡中的比重为31.3%，而煤炭为54.7%的话，那么在1973年的能源平衡中石油占66.4%，而煤炭只占17.6%（见表11）。六十年代初，法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为30%，到1970年

表11　一次能源的消费(占总数的%)

	1960年	1973年	1980年	1990年①
硬　煤	54.7	17.6	18.1	11.6
天然气	3.5	8.5	12.5	15.3
石　油	31.3	66.4	54.4	33.0
水　电	10.5	5.6	8.6	5.8
核　电	—	1.9	6.6	30.2
其他能源	—	—	—	4.1
总计(百万吨)②	85.7	175.4	188.0	242.0

资料来源：[法]《法国能源前景》，巴黎，1979年版，第79页；
[法]《能源和原料》，巴黎，1980年版，第17、39页；
[欧洲银行]《1980年的经济》，巴黎，1981年版，第54页。

① 法国工业部的一个预测方案。

② 为百万吨石油当量。

提高到了80%。在石油价格长期上涨趋势情况下，这种能源平衡结构产生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对不断涨价的进口石油的高度依赖，提出了使工业转向节能工艺、发展能够抵补日益增加的“石油帐目”的出口部门以及研制代替能源的必要性。

在法国，发现新的能源资源的前景不大。适于开采的煤炭资源只有美国的1‰和联邦德国的1/20，而开采条件也更为不利。拉克和格罗宁产地的天然气储量正在枯竭，从1982年起开采量开始下降。在西海岸大陆架进行的石油勘探并没有带来有希望的结果。因此，法国把解决长期能源供应问题的重点放在发展核能上。同时平行地提出了许多其他任务：使进口石油来源多元化、减少石油的消费、发展替代能源——

太阳能、潮汐能和地热。

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提出的法国能源战略目标是：在发展核反应堆新工艺方面继续占据领先地位，并保证长期的核燃料供应。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在完善快速中子增殖反应堆和研制浓缩铀的生产方法以及核燃料重复利用的方法上。

国家把能源列为优先部门，通过了一系列发展计划。其中有两项计划列入了国家第七个计划，目的在于减少法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第一项计划是核计划，它规定保证在1985年核电站要生产相当于5,500万吨标准燃料（石油当量）的电力。第二项计划是节能计划，它的目标是到1985年节约4,500万吨标准燃料。根据上述计划，预计在1985年把购买能源的费用减少200亿法郎（按现价计算）。

在这两项计划生效的初期（1976—1980年），实际执行情况低于1975年制定的指标。实际完成的投资情况是：煤炭为83%，天然气为97%，电力为103%，石油为81%，新型能源为34%，节能为62%。根据对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计算，第七个计划提出的目标到规定期限（1985年）不可能完成。其中核电站发电量将比计划少22%，节能措施的效益也将低于计划（为2,500—3,000万吨）。石油在能源平衡中的比重将保持在45—46%的水平上，而计划为40%。① 左翼力量执政以后，再一次修改了能源计划，把力量集中到节能问题上，削减了某些正在建设的核电站。

除了能源问题以外，七十年代国家天然原料供应的保障问题也具有特殊重要性，因为进口原料价格上涨和储备的减

① ［法］《法国能源前景》，巴黎，1979年，第95-99页。

少，迫使重新考虑宗主国和海外领地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担心原料危机进一步加深，政府决定增加国内各类原料的开采，以便在1985—1990年间把本国资源自给率由15%提高到20%。

同工业一样，七十年代农业受世界市场不利影响的程度也比五、六十年代严重得多。战后由于生产增长缓慢和把一部分生产过程归入食品工业，农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六十年代法国变为公认的农产品出口国，这要求付出巨大努力来改革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但正如前面指出的，作为封闭的保护主义的地区集团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农产品出口专业化，延缓了法国农业的改造过程。世界的和本地区的条件的变化，其中包括食品价上涨和需求增加，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国农产品自给程度的提高，以及法国失去原先从农业一体化中获得的好处，向法国农业提出了转为向世界市场出口的任务。由于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和在五、六十年代没有始终如一地进行生产物质基础的现代化，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目前为止，法国农业的主要弱点是：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工业集中化水平低；农业生产波动大；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低；主要专业化生产谷物和其他廉价农产品；食品和农产品加工工业基础薄弱。法国农业生产率水平比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国低，按照一些专门研究农业的作者的话说，这是“因为在发展农业生产基础和采用先进技术方面继续落后，以及劳动力的熟练程度不够高”① 所造成的。

上述种种弱点可以说明农业生产结构变化较小，部门内

① ［法］《农业、食品工业委员会报告》，巴黎，1980年7月版，第29页。

部变化缓慢的原因（见表12）。此外，农业向有利于种植业方面变化本身（1965—1980年期间种植业的比重由40.8%提高到46.1%）就说明了法国农业专业化不够合理。畜牧业仍然是生产效率不高的部门。这特别表现为畜牧业提供国内农产品生产的半数，而提供的出口值还不到种植业的一半：1979年它们分别提供141亿和295亿法郎。

可见，对法国整个物质生产部门结构的分析证实了在考察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效率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五十年代末在广泛工业化基础上对法国经济进行的根本改革，到七

表12　农业生产结构（为总数的%）

	1965年	1970年	1980年
谷　物	13.0	13.3	17.0
土豆、蔬菜、水果	12.7	11.6	11.0
葡萄酒	8.1	10.8	10.0
其　他	7.0	7.5	8.1
种植业产品总计	40.8	43.2	46.1
肉　类	33.4	30.4	33.2
其　中			
牛　肉	11.4	11.3	12.3
家　禽	4.8	4.6	4.9
奶制品	18.2	16.7	18.0
其　他	7.5	7.1	2.7
畜牧业产品总计	59.2	54.2	53.9
所有农产品总计(亿法郎)	516	732	1785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0年，第8期C，第3卷，第136页；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8期，第66页。

十年代初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1974—1975年危机期间再生产矛盾的激化，要求以另一个侧面提出改革经济的问题。这意味着广泛工业化的过程在半途要用有选择地发展狭窄的、在出口方面有前途的生产门类的过程加以替换。即使承认在中途对工业的这种“改造”是合理的，法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六十至七十年代，投入发展生产的巨额资金和物质资源导致了生产结构的根本变化，但其利用效率并不很高，而法国经济的竞争力依然是比较低的。

第六节　生产力的布局

除了进行生产部门结构改革外，七十年代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致力于完善生产力布局的结构。

减少首都与省分之间的失调现象，发展西部、西南部和中部落后地区，改造北部和洛林地区经受结构危机的老工业区，这就是国家影响生产力布局的政策目标之一。实际上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地区纳入工业化过程。扩大工业发展地区的基地，在落后地区创造新的就业位置和建立生产能力，活跃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生活，刺激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地区发展的另一项任务出于法国参加西欧国家一体化集团。法国资本主义力图使各个地区的发展同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尽可能紧密地协调一致，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

为了解决第一项任务，采取了把首都的经济潜力向外围地区分散的办法。在1955—1973年期间，通过从首都迁出3,000多家企业，在汽车、飞机和机器制造部门、化工部门、电子技术、水泥和玻璃生产部门创造了45万个新的就业位置。到

1975年，首都地区只剩下40%的汽车工业就业人数，而1955年为75%。①

与此同时，还有行政和科研机构服务业的分散化。在许多地区，围绕从首都迁出的工业企业出现了科学工业综合体，它们成了吸收相关部门的核心，而且是有关地区的"增长极"。例如，在南比利牛斯落后地区的图卢兹周围形成了宇航工业综合体，在格勒诺布尔地区形成了核工业综合体，在布列塔尼形成了电子和电信企业和科研中心综合体。

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经济联系。这项任务是通过制订和实施大型区域性项目来解决的。例如，建立马赛港工业综合体所追求的就是这个目标。根据计划，这个综合体要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南海大门"，同时又是欧洲材料密集部门（石油化工、石油加工、黑色冶金、基本化工等）的"增长极"。西海岸各港口也起同样的作用，其目标是发展跨大西洋的联系。在这里建立了下塞纳、下卢瓦尔、波尔多—加龙、敦克尔克—加来沿岸港口工业区。在国家建立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形成了使这些综合体变为具有更高经济效率地区的各种条件。除了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和材料密集的部门（黑色和有色冶金、石油加工、石油化工、化肥生产）以外，沿岸地区还集中了出口部门，它们想依靠经济联系国际化的优势来降低费用。

在国家"区域体制政策中"（在法国就是这样称呼地区政策的），总是有两个方面同时并存。一个是经济方面，它的实质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第二是社会经济方

①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76年7月29日，第828页。

面，其实质是帮助落后的和倒退的地区，以便停止这种退步和更充分地利用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六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七十年代初，第一个方面占居优势。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保证了发展和提高本国垄断资本竞争力的条件。经济的迅速增长又能为社会经济措施提供资金：建设完善的农业、建设发展农业和旅游业的社会和生产基础设施项目。

各个地区就业人数的增加，提供了关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法国经济的生产结构变化的一些概念。从1962年至1974年间，半数以上新创造的就业位置(68.8万个中的45.5万个）是在西部、南部和西南部落后的农业地区。而其工业发达地区就业位置数只增加了29.7万个，在首都地区甚至减少了8.4万个。上述数字说明工业向西部和其他地区转移。

七十年代后半期，缩小地区差别的过程停止了。1974—1975年的危机和其后的困难大大减少了成功地执行地区政策的可能性。“法国仍然保持着深刻的地区差别，危机、增长速度放慢和工业适应新的竞争条件可能更加加深这种差别”①，——1978年底关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上述看法。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落后地区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扩大原有生产能力的进程必然要受到阻碍。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和投资效益下降，减少了积累的可能性；由于国家和地方政权收入的减少，用于实施地区政策的资金也减少。而且受影响的首先是地区发展的社会经济方面。

---

①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79年1月12日，第3页。

除了客观困难以外，还要加上私人垄断资本生产“合理化”的后果。这种“合理化”的最主要方法是降低生产费用，特别是降低劳动费用。这种情况导致生产竞争力不强的产品的部门和地区就业人数减少。金属加工、黑色冶金（洛林）、纺织和制革工业（西北部地区）、造船（勒阿弗尔）、化肥生产的地区和中心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战略后果。接着就是纸浆造纸工业和基本化学。停滞部门企业所在地区的失业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和南部海岸造船中心，失业率在8—18%之间波动；在纺织中心瓦朗兴失业率达10%；在冶金中心隆尼失业率为7%①。

七十年代后半期是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国际分工的变化，国际垄断组织作用加强，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力布局结构趋势的变化。垄断组织的活动正在由国家范围和西欧范围转向世界范围。生产力布局的过程受到了不同方向和矛盾趋势的影响。例如，一系列传统生产部门转移到国外，部分地靠发展旨在满足国内及“联系”地区经济和社会需要的“内部”部门（开发本地自然资源和代替能源、利用海洋资源、勘探大陆架石油等等）加以补偿。这些部门可能成为将来外围地区发展的潜力。

* * *

可见，七十年代法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充满深刻的矛盾。1974—1975年危机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改革阶段的分水岭；而且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是以非常病态的形式进行的，从总的方面来说带有被迫性。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得不放弃使经济结构和谐的想法，走直接加强薄弱环

① [法]《扩展》，1979年，第126期，第20-21页。

节（工业）和把较强的环节（农业）转向集约化生产轨道的道路。世界经济联系性质的变化，使得不能继续保持国内生产无所不包的原则，从而不得不勿忙地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寻找狭窄专业化的途径。

随着法国生产力的发展，垄断资本的实力增加了。这种情况对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进行成功的竞争，较之生产机构的变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下一章将论述法国经济垄断结构的改革问题。

·第 三 章·

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组织

已有的生产技术经济基础和新的国际发展条件，要求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结构进行根本的改组。资本集中和积聚过程、排除旧的和普及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形式，是进行这种改组的物质基础。法国资本用建立比以前更大的垄断集团的方法来回答国际垄断组织，首先是美国的垄断组织的进攻。这些新建的垄断组织在国家政权的帮助下在世界范围开展活动。正是这些垄断集团在七十年代决定了法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危机形势的反应，经济发展的基本指标（速度、积累率、就业率、价格）也正是越来越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行为。

第一节　集中的规模

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大大改变了现代法国经济的面貌。生产规模因合并而扩大了，许多本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更为有效了。从总的说，经济越来越适应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条件。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集中与积聚过程对经济的影响，必须对在各个企业层次上是如何进行这些过程的这

个问题加以考察。

战后时期，在法国出现了大力冲刷小企业的情形。列宁曾经写道："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①。确实，法国大工业企业占全部生产的63.4%②。大工厂也占大部分投资和销售额。通常这些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也比中小企业高。假定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指标为1，那么小企业为0.83，中型企业为0.84，大企业为1.1。

在法国，各个企业层次上的集中化过程不仅仅限于工业中。在农业、建筑业和服务部门也在发生这种过程，尽管这些经济部门比工业有更多的客观理由保留小经济单位。但是，在这里由于大企业竞争力更强、利润率更高，其数量也在增加，在农业中在家庭小农场的基础上产生出农工综合体，在商业中传统的"货摊"和小店铺被大型百货商店和超级市场所排挤*。

企业层次上的生产集中是公司层次上集中的客观基础。在五十一六十年代，公司层次上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发展极为迅速，超过了企业层次集中的3.3倍③。在这里资本加紧集中和积聚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建立现在仍在法国经济中活动的大型垄断组织，在时间上属于这些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积聚的起数在不断增加。尔后合并和吞并的起数有所减少，但是每一起合并的规模却大大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卷，第258页。

②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莫斯科，1977年版，第29页。

* 目前大商店占大约40%的销售额。

③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莫斯科，1977年版，第34页。

增加了（按被吸收的净资产额计算*）。1973年这种交易有207起，1974年为126起，1975年为160起，1976年为111起。如果说1973年平均每起被吸收的净资产额为3,950万法郎，那么，1976年达到了12,740万法郎①。

与此同时，95%的法国公司和个体企业目前仍然属于小企业范畴（就业人数20人以下）。在经济的所有部门中，这类企业有135.02万个，其中129.74万个（91%）具有手工业性质。中型公司（20—500个就业人员）共有6.34万个。小公司和中型公司分别占法国经济总周转额的27%和34%。其余39%由0.25万家大公司占有（占公司总数的0.2%）。

在工业中也可以看到公司间的巨大差别。现有的1977年关于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就业人员、周转额和投资分配的统计，只计算了10个就业人员以上的公司。如果采用上述分类法，小公司（10—19人）占公司总数的26.9%，占就业人数的2.6%，占总周转额的1.7%和投资额的1.1%；中型公司（20—499人）的比重分别为69.1、38.1、29.2和20.1%；大公司（500—1,999人）的比重分别为3.2、18.9、15.8和13.9%。最大的公司（2,000人以上）占公司总数的0.8%，占就业人数的40.4%，总周转额的53.3%，投资额的64.8%②。

历史上在法国和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生产和资本集中的最初形式是横向联合。稍后纵向联合成了主要形

---

* 扣除债务后的实际资产的估算值。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2期，第70页。

② [法]《法国工业数字》，巴黎，1979年版，第67页；
[法]《经济与统计》，1978年，第96期，第28页。

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跨部门大型联合体。从六十年代起，多样化经营被提到了首位。多样化经营通过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资本转移，为应付危机形势提供了极大的机动能力。正是在多样化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了目前仍在法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大型跨部门垄断组织——工业集团。

第二节　现代垄断组织结构

在公司层次上集中化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加强，这些垄断组织目前决定着法国大多数经济部门，首先是工业部门的发展和经营活动。法国工业垄断组织的组织形式是康采恩，或者按照法国经济文献的说法是工业集团。“工业集团是由一个统一的决策中心决定发展战略方针和协调行动的各公司的总和”①。可见，在资本和生产集中的现阶段，由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已不是各个公司，而是一系列包括生产公司、贸易公司、甚至银行的经济联合体，以及通过资本参与、领导人个人联合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科研单位等等。而且工业集团的经济实力大于所属公司生产能力的总和，因为它是建立在大生产、所属各单位之间的劳动分工、统一的科技和信贷政策、公司内部计划等优越性基础之上。

八十年代初，在法国经济中共有近100个工业集团，集中了工业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②。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集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87期，第4页。

② [法] 普·阿拉尔、姆·博德：《法国金融与工业集团指南》，巴黎，1978年版，第6页。

团都在“本部门”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按国际标准衡量，它们中只有近20家属于最大的垄断集团。其中应首先指出的是法国石油公司、白茹—雪铁龙—塔尔波公司、汤姆逊—布兰特公司、圣哥班—穆松公司、雷诺汽车公司、贝西纳—犹齐纳—库尔曼公司、电气总公司、罗尼—普朗克公司、丹宁—诺尔斯特—隆尼公司、米什林公司、布苏瓦—热米斯—丹农公司。其中的大多数是通过合并独立的大型公司或一个大公司吞并另一个公司而形成的。这可以从工业垄断组织的名称中看出来。例如，圣哥班—穆松公司是由圣哥班公司和穆松公司合并而成的；贝西纳—犹齐纳—库尔曼公司是由贝西纳公司和犹齐纳—库尔曼公司合并而成；白茹取得了对雪铁龙的控制权，而后又夺得了对克莱斯勒公司欧洲子公司的控制权，等等。法国垄断组织结构的巩固，既是客观因素（集中过程加速）也是主观因素（国家的影响）作用的结果，而且正如前面指出的，最大的变化是在近十年内发生的。如果说六十年代后半期周转额超过50亿法郎的集团就是绝无仅有的现象，那么现在圣哥班—穆松公司、法国石油公司、雷诺公司、白茹公司、电气总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周转额都在200—700亿法郎之间。

通常工业集团主要是在一个工业部门从事经营活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活动是广泛多样化，因此难于把一个集团列为某一个部门。工业集团的特点是资本流动性大，因此可以迅速积聚必要的资金以便向新的部门渗透。由于主要决策是由集团统一中心——中央执股公司作出，部门间的资本转移便大大简化了。资金从利润率下降的部门抽出，投入行情有利的部门，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简化。如果存在一个部门的利润率高于整个经济的利润率，集团可以很快出现在

这个部门。部门间的资本转移和向新部门渗透，反过来又促使工业集团进一步经营多样化。但是，每一个工业集团一般还是保留一个“基础”部门，由于历史原因其主要生产能力和大多数就业人员都集中在这个部门。例如，丹宁—诺尔斯特—隆尼公司在冶金业中集中了50.7%的就业人员、50.2%的周转额和85.3%的再投资。贝西纳—犹齐纳—库尔曼公司的类似指标(有色冶金业)为：43.2、48.3和25.6%；圣哥班—穆松公司的指标（建筑材料业)为：34.6、29.0和48.5%，等等①。

但是，应当指出，经营多样化并不排除工业集团的专业化，工业集团与跨行业联合公司不同，它经常改组自己的工业结构，并使之合理化。在各工业集团内部，可以看到子公司之间资产再分配的过程。七十年代，纯吞并额在集中总额中的比重下降了（1973年占28%，1976年占20%）②。相反，对于公司的吞并业务(它可以在母公司内部重新集结资金以便在子公司之间进行再分配）占越来越大的部分（1973年占36%，1974年占58%，1975年占59%，1976年占53%）。

多样化经营集团的实例之一是圣哥班—穆松公司。它开始是生产镜子，现在垄断了玻璃和建筑材料市场，拥有核能生产能力，并打算到1985年使电子技术的周转额提高到40%。可以把它看作是法国最大工业集团中最典型的一个。居这个集团之首的是圣哥班—穆松中央执股公司，1980年初它控制了121家工业和金融公司（57家法国公司和64家外国公司），持有每个公司50%以上的股票。还有许多它控制着20—50%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87期，第30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2期，第70页。

股票的公司同首脑执股公司有密切联系。结果，属于这个集团的公司总数达到了518家。此外，该集团通过中央执股公司、控股分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还拥有对704家公司的资本参与①。集团的内部联系用子公司之间的连环参与制固定下来，个人联合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集团的两个最高管理人员，董事长尔·福鲁和名誉董事长尔·马滕在这个垄断组织所属主要公司的行政管理委员会中拥有20个职位。

首脑执股公司的结构也是有趣的。圣哥班—穆松公司的首脑执股公司由几个职能管理部门组成：财政、工业和一般经济研究、制成品销售等部门。此外，还有许多与集团活动主要部门（玻璃和建筑材料、包装材料、钢管和设备的生产、工业建筑）相适应的工业部，以及工业计划和科研管理部。另外，直属中央执股公司领导的还有驻国外的九个代表处，它们设立在该集团占有最巩固地位的国家。

圣哥班—穆松公司广泛采用公司内部计划工作方法，其中包括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该垄断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指出："在编制计划时，广泛规定资本的转移，因为一些公司可能累积超过投资需要的资金，而另一些公司则相反，可能需要这些多余资本用于迅速而有效地打入新市场，第三类公司则可以稍等一等"②。集团领导批准的最终文件，除了最近一年的预算外，还可能包括近三年的财务预测，近六年的投资和销售目标以及十年的研究与发展规划。

法国工业集团的发展，加强了整个经济的集中程度，导致大部分国内生产集中于它们的手中。目前法国两家最大的

---

① 《圣哥班—穆松·1979年》，巴黎，1980年版，第46页。

② ［英］《今日的管理》，1978年5月，第148页。

公司控制着70％的钢的生产，50％的电子设备和电器设备的生产，近100％的汽车的生产，50％的石油产品生产，等等①。

最大的垄断组织的发展速度比整个经济的平均速度快。如果说1969年四个最大的工业集团周转额的比重为5.2％，前八个工业集团的比重为8.8％②，那么，1979年相应的数字为11.1％和15.4％③。各个部门也有类似的趋势。

最大公司和垄断组织统治的加强，加剧了中小企业的问题。中小企业常常遇到财政困难，市场行情的波动对它们的影响更大，它们占遭到破产的公司的主要部分。《世界报》写道："如果说从前危机对小企业影响最大，那么现在它也开始涉及中等企业"④。确实，从1968年至1970年关闭了15万多个中小公司，它们主要属于建筑、商业、日用消费品生产这样一些经济部门⑤。这一切使得中小企业的问题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政界人士通过把小生产者纳入大生产轨道的办法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六十年代末，颁布了所谓的经济利益联合组织法。联合组织是共同对付自己的供货人、顾客和银行家的同类企业的合作形式。联合组织享有一定的税率优惠，因而很快获得了普遍发展。但是，在这种联合组织内部较大的公司占据统治地位。

分包制是大资本统治小企业的一种形式，法国经济学家安里·克劳德认为它是集中的一种隐蔽形式。他写道："分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8年，第96期，第31页。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5年，第31—32期E，第106页。
③ 根据［法］1980年第157期《扩展》第17页的数字计算。
④ ［法］《世界报》，1978年8月15日。
⑤ ［法］《法兰西生活》，1980年1月21日。

包制是当今垄断化过程的典型表现之一”①。对于垄断组织来说，分包制有许多明显的优点：它们把一部分生产分包出去，从而节约了投资，对所供应的产品规定偏低价格，等等。中小企业由于进行狭窄专业化生产，产品只能卖给订货人，从而陷入依赖之中。在法国，长时期内分包制不如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但是在七十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现在近2/3的中小公司按分包合同工作。分包工程的总额达近1,000亿法郎。

在许多部门建立了分包工程市场。垄断组织通过提供原材料和设备，通过联系银行提供贷款等办法来束缚分包人。中小公司常常受到订货人停止延长合同和把订货交给其他企业或自己安排生产的威胁。与此同时，法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小公司的灵活性，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能够在利润率低的情况下长期坚持经营活动，使得它们成为某些部门（家具工业、缝纫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的不可取代者。

但是，整个七十年代，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是加强集中和促进其发展，支持国内外的最大垄断组织。如果说在五十年代政府只是采取了局部措施的话，那么第五个计划（1966—1970年）的目标则是“在各个部门建立或合并成为（如果已经存在公司的话）为数不多的能够对抗外国集团竞争的大公司或国际性集团”。此外，在计划中还规定，“在大多数主要工业部门这类集团的数量应当是很有限的，甚至可以限定为一至二个集团”②。

---

① ［法］安里·克劳德：《多国公司与帝国主义》，巴黎，1978年版，第107页。

② 引自［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87期，第3页。

巴尔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具有三个特点：1. 实行旨在合并公司（移交资产、合并、吞并）的特别规定和税收政策；2. 重新分配国营部门的资产，改革国有化公司的管理体制；3. 在改组部门活动时通过发放补贴直接鼓励集中①。

大部分国家订货，特别是军事订货，在最大公司中分配，这是政府鼓励集中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电子技术和电器技术部门，最大的公司（2,000人以上）占国家订货的70%。基本化工部门的情况大致相似，最大公司占国家订货的78%，其他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②。

对垄断资本给予支持的另一个方式是国家放弃它在公司中占据最大股东的权利。在法国石油公司中国家占有35%的股票，但对这个垄断组织的发展实际起作用的是只占4.3%股本的巴黎—荷兰财团③。液化气公司、电气总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的情况也相似，在这些公司中国家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国有化银行和专门信贷机构成为主要股东之一。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大私营公司成为国营公司的股东。例如，苏伊士财团占有法国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股份的6.5%④。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常常开办合营分公司。例如，法国天然气公司同昂班财团和巴黎—荷兰财团控制着石油天然气银行，等等。一些私营工业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国营垄断组织的经理理事会，其中有：弗·达尔（奥雷阿尔公司）、

① [法] 尔·布瓦耶、日·米斯特拉尔，《积累、通货膨胀、危机》，巴黎，1978年版，第21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8年，第96期，第45页。

③ [法] 普·阿拉尔、姆·博德，《法国金融和工业集团辞典》，巴黎，1978年版，第45页。

④ [法] 弗·莫兰，《国有化时代的银行和工业集团》，巴黎，1977年版，第118页。

弗·罗尔埃（米什林公司）参加巴黎国民银行的经理理事会；阿·里布（巴苏阿—苏尚—内弗泽尔公司）和日·皮诺（液化气公司）在里昂信贷银行拥有类似职位；弗·戈特埃（白茹—雪铁龙公司）和日·蒙特（罗尼—普朗克公司）在实业银行经理理事会占有这种职位，等等。

由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市场界线的扩大、美国、西欧和日本跨国公司竞争的加剧，七十年代法国主要垄断组织的国际扩张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还在六十年代中期，大部分企业家就认为走出国界并不是进行有效活动的必要条件。现在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对外扩张在各种层次进行。各个公司，有时甚至小企业都力图扩大出口。但是，在向外国市场渗透、输出资本、同外国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联系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法国最大的工业集团和财团。最大的垄断组织把扩大国际扩张和变为跨国公司看作是在外国进行投资、寻求廉价劳动力、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时分散风险的办法。

工业集团的国外周转额增加了。一些工业集团开始在国外销售半数的产品。近十年来，各工业集团的国外业务增加了0.5—1倍。七十年代末期，仅26家主要垄断组织就占了法国出口额的25%，而2,000家公司则占81%①。

近年来资本输出、在国外开设分公司、购买股票和确立对外国公司的控制权有了很大发展。这种最大的业务之一是1978年白茹—雪铁龙工业集团购买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所有欧洲资产。结果白茹—雪铁龙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非美国的汽车生产厂家。事实上到八十年代初所有法国工业集团都成

① ［法］《经济问题》，1978年，第1562期，第20页。

了跨国公司。法国石油公司在国外拥有151家公司，汤姆逊—布兰特公司拥有62家，罗尼—普朗克公司拥有61家，圣哥班—穆松拥有200家，雷诺拥有89家，等等①。一些工业集团现在在国外拥有的生产能力已超过国内的生产能力。例如，液化气工业集团所属148家公司中，只有48家在法国，这个集团的2.5万工作人员中在国外工作的约占60%②。米什林公司有51家国外公司（总共有72家公司），在全部12.73万工作人员中有7.2万人在国外分公司工作。

七十年代法国资本输出战略看起来有很大变化。大多数垄断组织的主要国外投资现在都分布在共同市场国家、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认为同美国和西欧垄断组织建立密切联系，是利用外国盟友的销售网打入新的市场，获得最新技术的一种方法。在这一方面，法国资本积极加入了使得“日本和西欧的垄断组织能够同美国资本，其中包括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进行越来越成功的竞争”的总过程③。仅在最近二、三年内就同美国康采恩签订了许多新的重要协定，购买了许多巨额股票。1978年雷诺汽车公司同美国汽车公司签订了关于在销售汽车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汤姆逊—布兰特公司同美国莫托罗拉公司集团签订了技术合作协定，罗尼—普朗克公司为了进入美国市场把对美国莫顿—诺威奇公司的股份参与额由10%增加到20.5%④。法国火箭和电子技术垄断组织马特拉公司同美国生产电子设备的哈里斯公司签订了

① [法]《扩展》，1977年，第110期，第159页。

② [法]普·阿拉尔、姆·博德：《法国金融和工业集团辞典》，巴黎，1978年版，第111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页。

④ [法]《新经济学家》，1978年，第127期，第54页。

在法国进行共同生产的协定①。1980年食品垄断组织派尔诺·里卡尔公司获得了对美国奥斯丁—尼科尔斯公司的控制权。1981年汤姆逊—布兰特公司同美国大陆电话公司签订了关于共同研制、生产和销售电话设备的协定②。

法国工业集团在国外的扩张，同它们在国内的活动一样，依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财政和工业资源，同银行资本保持密切联系也有助于它们获得成功。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期间这种联系的形式具有许多新特点。

第三节　银行资本、工业资本与财团

考察银行业，对于研究法国经济垄断结构的特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法国在工业集中程度方面长期落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这种落后状况只是近几年来才开始得到消除），那么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银行在国内经济中则占有巩固地位。目前经济中活动的大银行都是在上个世纪中叶建立的。

1949年法国共有341家银行。它们的分类情况如下：254家存款银行，33家实业银行，63家中长期贷款银行。这是所谓登记的银行，即在国家信用委员会名单中登记的信用机构。另外还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银行，如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银行，以及几个国营（或受国家控制）的信贷机构：法兰西银行——中央发行银行、国民信贷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对外贸易

① ［英］《金融时报》，1980年11月24日。
② ［法］《世界报》，1981年4月8日。

银行，等等。

银行业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三个最大的存款银行（它们是国有化的巴黎国民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和兴业银行）占所提供贷款的半数以上。最大的银行在就业人数方面不亚于主要工业集团。

在实业银行中应当指出由巴黎—荷兰财团和苏伊士财团分别控制的银行家公司和东方汇理苏伊士银行。但实业银行的规模比存款银行要小得多。三家最大存款银行的总周转额比三家最大实业银行的总周转额大约多7.5倍。三家国有化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属于世界最大的八家银行之列，在这方面大大超过了法国最大的工业集团。

两个平行的、紧密地互相交织的趋势——工业垄断组织的发展和银行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决定了七十年代法国金融资本发展的新阶段，按照列宁的定义，金融资本“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①。

长期以来，法国银行主要偏重于在国内外市场上经营借贷业务，而对工业的参与则非常分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期进行简化银行资本向工业部门渗透过程的改革以后，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加速了。许多银行改组了对工业的参与制，而大工业集团的领导人则积极打入银行的管理机构，甚至拿一部分资产去购买银行的股票，从而加强了同银行的业务关系。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交织情况加强了，不同经济部门的资本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统一的金融资本。财团是金融资本的组织“细胞”，它又是由数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卷，第258页。

十个或数百个受一个中心控制的和以巩固的相互资本参与制、个人联合和其他联系渠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和银行信贷公司组成的经济机体。就规模而言，财团大大超过工业集团，某些财团甚至包含几个工业集团。

六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学家论述了当时法国经济中活动的四个主要超级财团的形成过程①。在此后的不到二十年内，集中和积聚的经济总过程把这个范围缩小到两极图式，其中心是巴黎—荷兰和苏伊士两大财团。大多数老的财团开始向它们靠拢。

1980年，在国有化前夕，巴黎—荷兰财团和苏伊士财团控制了法国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近20%和几乎在所有经济部门分别控制了2,655家和1,684家公司和金融机构。在这两个财团所属公司的企业中工作的人数大约分别为70万和55万人。② 巴黎—荷兰财团的组成包括法国石油公司、汤姆逊—布兰特电子和电气集团、波立埃·绍松建筑集团、西非贸易公司等垄断组织。此外，向这个财团靠拢的还有丹尼—诺尔斯特—隆尼集团、贝西纳—犹齐纳—库尔曼集团、罗尼—普朗克集团、布斯瓦—热米斯—丹农集团以及许多其他工业集团。在巴黎—荷兰财团中包括了法国最大银行之一的巴黎—荷兰银行（该财团正是围绕这个银行开始形成的）和全国规模最大的实业银行银行家公司。属苏伊士财团的有圣哥班—穆松集团、里昂自来水与电力公司、液化气公司、贝英塞公司、电气总公司、沃尔沃公司、旺德尔公司等。在银行业方

① ［苏］格·普·契尔尼科夫：《法国金融寡头》，莫斯科，1966年版，第300页。

② ［法］普·阿拉尔、姆·博德：《法国金融与工业集团辞典》，巴黎，1978年版，第10页。

面，属于这家财团的有最大的私人存款银行工商信贷银行和居银行家公司之后占第二位的东方汇理苏伊士银行。

各个财团牢固地渗入到保险业、服务业和商业中。它们占有大量地产（例如苏伊士财团拥有4万公顷葡萄园）①。

经过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一系列合理化和改组以后，财团的组织结构开始象工业集团的结构，但较为复杂一些。领导财团的是中央执股公司—拥有对第二梯队执股公司的直接股份参与的金融公司，而后者中的每一个又分别集中了财团在工业、银行业、国外分公司方面的股份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财团的核心是非常固定的。由于实行了幅射式环形参与制，中央执股公司对主要职能部门的控制几乎达到100%的程度。可以把财团的团结，特别是它的核心看作是使巨大经济综合体保持一致的方法以及打入竞争资本集团的一种保证。

财团外围的控制体系基本上是幅射式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公司从一个财团的势力范围转向另一个财团的结构改组。但是，从总的说，苏伊士和巴黎—荷兰财团的结构，经过了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搏斗之后，已经稳定下来。

资本参与还用个人联合加以巩固。财团理事会成员参加许多公司和银行的理事会。个人联合还使财团同国家机构连结起来，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在大财团任职，或者相反。财团及其下属单位的大多数管理人员都是在高等理工学校、高等行政学校或其它某个大学毕业，这些学校的毕业生通常都担

① ［法］普·阿拉尔、姆·博德：《法国金融与工业集团辞典》，巴黎，1978年版，第5页。

任高级国家职务或私人公司管理职务*。

财团并不是象跨行业公司那样的松散的经济联合体，而是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对经济起决定性影响的非常有效的经济结构。它们是法国资本进行国际扩张的中心。尽管规模巨大并有“国中之国”之称，但财团的实力仍在继续增加。1981年2月巴黎—荷兰财团购买了昂班财团35%的股票，可以看作是一个证明。该财团位于巴黎—荷兰财团和苏伊士财团之后居第三位，拥有近150家公司和银行，13.2万职工①。金融资本在组织上进一步合并扩大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法国垄断资本力图在国内外进行更积极和更广泛的扩张。

* * *

1981年夏季，左派力量的代表执政，对法国大工业集团和银行的所有制地位作了重大改变。1982年初，实际上把所有银行机构、一些工业集团和巴黎—荷兰和苏伊士这两个最大的财团实行了国有化。颁布的国有化法令看来将导至财团组织结构的改组，至少将改变它们的性质，把它们由私人资本主义财团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财团。下面我们将对莫鲁瓦政府采取的有关措施的特点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

* 1975年接受调查的大公司管理委员会的2/3成员都有大学文凭，其中的半数在理工学校毕业。此外，500家大公司的50%以上的总经理毕业于名牌大学，而且33%有理工学校的文凭（见［苏］伊·姆·布宁著《现代法国社会的资产阶级》，莫斯科，1978年版，第122页）。

① ［法］《新经济学家》，1981年，第276期，第60、64页。

·第四章·

国家垄断经济调节

随着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整个国家垄断经济调节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七十年代的危机大大加速了这种变化。危机表明了这种调节制度诸原则的不统一性和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危机冲击缺乏“免疫力”。

第一节　调节制度的危机

七十年代，在决定必须改变法国国家垄断调节机制的因素中，有四个因素具有最重要意义：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增加，垄断化，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和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紧张化。

整个战后时期，法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及世界市场的变化过程的依赖性不断增加（见第六章）。但是，对这种依赖的增加按另外方式对法国本身提出经济发展问题这一事实，法国统治集团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才有所认识。

确实，在比较顺利的六十年代，外部因素主要被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费用的因素。从七十年代中期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

石油提价、基本原料和食品市场不稳定，使法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逆差，迫使它为稳定法郎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汇价而进行代价高昂的斗争。在1979年4月给政府提出的和在社会政治委员会闭幕会上所作的关于第八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基本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对于法国来说，这些经济变化的意义可以同非殖民主义化和加入共同市场的影响相比拟。为了理解石油危机后法国执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目标和结果并对其作出正确评价，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①。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加剧，向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了用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调节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任务。

破坏七十年代国家垄断调节制度效率的第二个因素是资本集中化的大大加速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跨国性质的大垄断集团。

一般的垄断组织已是国家难于调节的对象。它全部或部分地控制着价格和供给，从而可以用预见不到的方式对六十年代典型的国家调节流通领域的措施作出反应。特别是它可以成功地用增加供给或提高单价来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作出响应。垄断组织对货币资本和设备市场形成的条件反应很差，因为它所属生产的规模很大，使得有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市场的行情，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发展计划。至于跨国垄断组织，还可以在各国的立法之间搞随机应变，把资本和收入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并为此目的而利用内部结算价格，等等。因此，它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当地政府的监督。

---

①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第11页。

1974—1975年的危机也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国家垄断调节方法的效率起了破坏作用。危机中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结合，导致失业增加、生产下降、投资减少，同通货膨胀过程和外贸逆差增加并发。在经济的部门结构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调，使通过流通领域影响生产的方法变得无效。《世界报》观察家菲利普·拉巴尔写道："震荡导致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变革"①。

最后，七十年代国内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状况的不稳定，对国家垄断调节的方向和形式也有很大影响。左派力量的加强，它们在立法机构和地方管理机构选举中的胜利，迫使统治阶级放弃向劳动群众生活水平施加压力的最粗暴的形式，采取比资本主义合理化标准的要求更为"社会性的"政策（见第七章和第八章）。

以上所述，决定了法国国家垄断调节制度的危机，这种调节制度是在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下产生的，并适于在经济发展比较顺利和迅速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这个危机的意义和实质在于用新的、更加适合于变化了的发展条件的方法，去取代宏观经济调节方法和形式。

危机触及到了国家干预生产过程的间接方法和直接方法。强调对社会生产动态和比例的间接调节方法，是战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调节制度的突出特点。法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它利用流通领域—包括改变利率和有价证券公开市场的交易，限制信贷，改变银行的义务储备和税率，实行各种优惠等——来调节总需求的措施比较晚。事实上，只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法国的信贷和预算调节制

① 〔法〕《世界报》，1979年9月4日。

度才接近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制度。

与增加间接调节方法数量同时，逐渐取消了统制型的干预方法。在法国，所谓的统制经济是指对经济的行政调节和严格监督的制度，它接近于指令性管理。除了战争时期外，在法国从来没有坚定地实行过统制经济。但是，各种各样的行政限制形式，对价格的控制，挑剔和干预企业的全部事务等情况，比其它国家都严重。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开始放弃统制型调节方法，到了六十年代垄断集团的力量迅速增强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

七十年代新的发展条件对从国家垄断调节实践中排挤统制方法的过程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条件加速了这个过程，因为指令性措施无力影响世界经济因素；另一方面，矛盾的加剧又必须加强对经济系统薄弱环节的干预。

这种变化过程相应地波及到了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法国的经济战略、国有化部门、国家财政、日常的和结构性的调节等方面的变化。

第二节　新条件下的经济战略

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形式与其历史上的早期形式不同，它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意识到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并依靠国家政权以集中的形式促使其实现。资本积累从全国范围的自发形式变为越来越自觉地加以调节的过程。按照列宁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整个经济生活第一次“由一个中央机关”加以调节①。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卷，第276页。

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权机关，当然要努力巩固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经济方面的阶级政策的具体目标，可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法国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基本方向的这种更替发生了不止一次。在战后法国经济史中，至少可以指出有三次转折性的变化，即政治上层建筑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新原则。这三次变化是由于必须：1.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2.适应1958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开放经济”条件；3.适应1973年后的世界经济的新的现实条件。

在第一种情况下，提出的新任务完成得较快，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浮在表面。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上层建筑为了认识问题和它的后果的性质，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考虑到常常被忽视的一个情况，即在签订关于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协定的日期和最后取消海关限制（限额和税率）之间相隔十年之久。因此，法国经济的开放过程与其说同法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不如说是同逐渐扩大和加深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提高对外部经济发展因素的依赖程度有关。因此，法国政府不是在五十年代末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而是在六十年代末的第六个计划（1971—1975年）文本中才提出适应“开放经济”的广泛任务的。在第四个（1961—1965年）和第五个（1966—1970年）计划文件中只能看到这种被称为“工业至上”的战略方针的个别因素。至于对1974—1975年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根本变化的不可逆转性的承认，则不仅是第八个计划（1981—1985年）的基本方针和新政府两年过渡计划（1982—1983年）的出发点，而且也是第七个计划（1976—1980年）的出发点。

六十年代经济战略基本目标是，沿着经济进步的道路阔

步前进，建立强大的先进工业，从而保证巩固的对外经济地位。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专业化问题只是以最一般的形式提出。曾经设想，法国经济将成为一种独特的小宇宙，成为世界经济的缩影：在其中将保留一切非常重要的生产领域、部门和甚至生产种类，只是与世界经济具有不同的比例。曾经设想，发展许多部门，首先是科学技术先进的部门，主要不仅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建立大量出口能力。所有传统部门都要保留，尽管比重会小一些。“工业至上”这种思想本身，与其说是出自在世界市场范围内使国家专业化的意图，不如说是产生于想纠正历史上形成的比例失调——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部门薄弱——增加国家的工业实力，拥有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核能、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宇航工业等）这样一种愿望。

这个思想明显地出现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交替时期的所有文件中。例如，原总理皮·梅斯梅尔在议会选举前夕（1973年）发表的纲领性演说中指出：“第六个计划的重点放在了法国的工业化上。因此，我们采取了增加工业投资、帮助公司改组的目的明确的政策。我们奠定了我们的工业未来获得成功的基础。我们在那些存在着把我们排挤掉的危险的部业（信息技术、宇宙空间、原子能工业、飞机制造及其他许多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我国不拥有所有专家们认为构成经济实力的各种部门，能想象它是个什么样子吗？这不是自尊心的问题，而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①。

六十年代经济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只考虑了在超过其

① ［法］《法国的年度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巴黎，1973年版，第385页。

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的高速发展条件下实现这个战略。似乎实践证实了这种方针的现实性：1969—1973年法国夺得了按当时流行说法称为西欧各个竞争国家中领袖地位的“蓝绶带”。在经济高涨浪潮中，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图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从提高效率到保证稳定的高竞争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交替时期的战略，是当时法国金融寡头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无限乐观的战略。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到1985年克服落后于联邦德国状况的口号（见第一章）。

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战略方针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声调。初看起来，这些方针变化不大：同样是寻求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效率和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与前五年所设想的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别。

在第八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基本方针中提出了不安的问题：“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将发生什么事？”报告的作者断言，“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即事物的变化使得对未来的思考变成象今天就要解决的问题那样迫切的事情。须知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远远超过简单的转折，这是世界经济地理的大转折，而长时期以来它对法国是有利的。到二十世纪末的我们国家的未来是这种赌博的赌注”。世界经济实力对比的这种“基本变化”，特别严重地“触及法国和欧洲，并使它们面临对其经济和社会政策有决定意义的选择：适应或是倒退”①。

报告作者把“世界经济地理大转折”理解为到2000年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主要发展指标上的比重下降。根据作为这种论断基础的经合组织预测中的计算，1970—2000年

①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版，第5页。

期间，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在世界范围内的下降幅度是：人口比重将由占世界总数的20%降为15%；国民生产总值将由66%降为50%；工业产值将由69%降为50%；加工工业产品贸易将由83%降为63%①。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将相应地大大减慢，从五十—六十年代的5—6%降为八十—九十年代的3—4%。正如法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所表明的，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改革”政策的内容。在第八个计划的文本中写道：“现在根本谈不上保留所有经济部门，只能改变向有利于最新部门方向发展的比例。‘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工业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这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它迫使我们革新我们的工业，如果我们不希望使我们的民族独立、我们的生活水平和就业遭受打击的话。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和以前一样生产和提供同样的商品和劳务。此外，为了使我们的强点更强，我们的生产机器不应当企图囊括全部可能的活动领域。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迅速前进它必须放弃某些阵地”②。

关于使本国经济变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论点，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战略的新因素。这意味着，保持经济的无所不包性是法国这样的中等规模国家力所不及的。资产阶级大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完全的经济独立，不依赖其他国家——也最终成为历史。

法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激化，对七十年代的经济战略的表述增加了强烈的“社会”情调，要求使旨在加速狭义上的资本积累的经济措施同旨在保证更有利的资本再生产

①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版，第6页。
②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版，第16、18页。

条件的措施更密切地协调一致。促使法国统治阶级这样做的因素是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加剧（失业增加、法国人中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高度不平等、生态环境和所谓的生活质量恶化）。统治集团的多数和反对派的各种代表人物要求采取更加灵活的社会政策，他们担心以中小资产阶级、忠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保守的农民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基础将会消失。

这一切促使法国在第七和第八个计划中列入一系列旨在增加就业、减少收入不平等、改善社会保障和居住条件的措施①。在保护劳动者利益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只是始终遵循另一些动机，因此1981年5—6月成立的左翼多数派政府打算做更多的改进。

可见，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条件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国内资本再生产长期以来所呈现的转折趋势，促使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战略的改变。由于同样的原因，使法国国家垄断调节制度的形式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第三节　国有化部门

历史上，法国在经济范围内建立较为广泛的国营企业部门，是在人民统一战线年代和战后初期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结果。持有反垄断观点的左派政治联盟的代表人物是国有化的创始人。国内进步社会人士总是把国有化部门看作是有意识地影响社会再生产进程的潜在的最有效工具。1981

① ［法］《1981—1985年社会与经济发展第八个计划》（政府根据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见提出的方案），巴黎，1980年版，第9页。

年的事件证实了总的历史规律。

在五十—六十年代，法国统治阶级尽一切努力把这方面的成果缩小到最低限度，把国家所有制变为国家垄断关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十分清楚，“对大企业进行系统地实行国有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选择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竞争让位于集中化的组织”①。

1976年法国国有化部门共有职工近160万人（不包括国家机构的官员），他们占自立人口的10%。国有化部门占全国新增产值的12.7%，占所支付工资总额的14 9%，占全部投资的26.4%②。战前和战后国有化的主要部门和企业仍然受国家支配，它们是：货币发行银行和大部分信贷和保险系统、军事工业、一部分飞机和汽车制造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天然气工业和一部分化学工业、铁路、海上和空中运输。

1981年5—6月成立的左翼政党联合政府确认了扩大国有化部门的意图（见前言）③。在近几年内将要逐步实行的国有化的后果，现在还难于作出评价。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国有化部门的演变和结构，以及它在七十年代对经济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国有化企业的经营原则都经历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化部门的结构是通过把同类企业合并成由许

① [法] 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的民主》，巴黎，1976年，第101页。

② [法] 弗·谢瓦利埃：《国营企业》(文件研究汇编)，1979年3月9日，第34—36、39页。

③ [法]《回声报》，1981年4月22日。

多公司组成的大集团的办法改组而成。从1957年至1973年间，母公司的数量由170家减少到118家，而它们持有30%以上股票的子公司的数量由276家增加到527家①。1981年年中，在30家法国最大的公司中有8至12家（由于分类标准不同）是国有化公司②。

第二，与战后初期不同，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多数老的国有化公司和几乎所有新的分公司已经不是全部国家所有制，它们成了混合公司，国家在其中只拥有一部分股本。如果说在主要国有化公司中国家一般保留了控股额，那么在子公司中它已不拥有绝对控制权。

第三，国营企业同私营企业在“均等的原则”上逐渐卷入跨公司经济关系体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改变公司的管理原则，以及赋予它们独立于国家行政当局的更大自主权问题。

国营企业在国家垄断体制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政府（和理论家）把国有化部门看作是调节宏观经济比例的工具，在衰退和危机时期把它广泛用于维持高水平的投资，而在价格迅速上涨的时期则用于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对价格和投资实行严格控制，仍然向国有化企业领导人提出必须保证赢利率要达到同类私营企业水平的要求。

国有化部门在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双重作用，使它自治化过程的发展非常矛盾和不连贯。六十年代末决定加速这一过程的企图，给国有化企业带来了许多非常消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5年，第65期，第30—32页。
② ［法］《国营企业》，巴黎，1975年，第26页。

极的后果：投资和科研费用减少；职工工资受抑制，因而开始落后于私营部门工资的增长；外债增加，其中包括外国银行的债务。

国有化部门活动的所有这些消极方面，从逻辑上讲均产生于对待自治化的形式主义。国家拒绝借助预算资金把投资保持在必要水平上，同时却保持了对价格的实际控制，与私营企业产品价格相比，国营企业产品价格压低到了没有根据的地步*。而这人为地降低了国营公司的赢利率，迫使它们减少投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4—1975年的危机时期。在危机中和危机后的年代，私营企业的投资活动急剧减少，政府不得不违背自己原先的意图，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样，积极利用国有化公司作为反危机政策的工具（见第五章）。

可见，七十年代从整个来说证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一趋势的内容是寻求更加完整的经济机制，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型的没有矛盾的关系体系前进，在这种关系体系中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最密切地和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国有化部门最初是作为解决战后经济矛盾的政治手段而产生的异己因素，经过发展变化它已逐渐成为法国国家垄断综合体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

* 国有化企业的许多税率和价格从1949年以来没有变化。例如，每吨/公里的石油铁路运费到1972年一直是0.33生丁。与此同时国营铁路公司由于通货膨胀性的价格上涨，支付给自己的供货人的费用则多4—5倍（《国营企业》，第161页）。

第四节　国家财政

除了生产领域的国有化成分外，通过税收和各种提成进入各种国家预算和基金的一部分国民收入也是国家活动的物质基础。战后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权机构、有独立预算的行政主管单位和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消费和再分配的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

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五十年代比较快，六十年代大大减慢，而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初甚至出现稳定趋势。在1974—1975年的危机以后，再分配的收入比重出现再次上升趋势。从1973—1980年的八年内，义务扣除率增加了6个百分点，达42%。而且增长的大部分属于社会保险基金提成。

有利于社会保险基金缴款的比例变化，反映了由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使法国国家社会职能增加这一事实。社会保险基金缴款不仅反映了法国七十年代的国家再分配的国民收入比重的动态，而且也反映了法国近二十年的国家再分配的国民收入比重的动态。税款本身的比重在五十年代末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23%以后，实际上没有再发生变化。甚至在1973—1980年间，税收的比重只提高了0.8个百分点。在二十五年内，直接税在财政扣除中的比重增加了（由23%增加到38%），间接税的比重相应地下降了。同时，直接税的全部增长额来自自然人的所得税；公司利润税保持在原来水平上，1980年同1960年一样，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预算总收入的不到10%。税收动态的这种差别，是国家政权机关有意识地执行保证生产资本的高利润率、提高公司自筹资

金的比率、增加股票收入的政策的结果。

表13 国家和地方预算、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结构(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税　　收	22.4	22.4	23.2
社会保险基金的缴款和提成	9.0	12.0	16.9
其 他 收 入	4.6	5.0	3.9
总　　计	36.0	39.4	44.0
总计(亿法郎)	1,069	3,080	12,121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法国经济的进展》，1981年，第242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2卷，第155页。

七十年代后半期的突出特点，一方面是有利于国家的扣除额增加，另一方面却使国营业务赤字增加了，国营部门的债务也相应的加大了。国家收支平衡从一直保持到1974年的顺差，变为以后各年的逆差。如果用赤字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赤字的规模，那么1975年这一比重达到了2.6%，1978年和1979年为1.6%，1980年为1.2%①。

可见，国营部门需要的增加，要求增加税收、义务提成和债务。在这个过程中预算收入的哪些项目起了决定性作用？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本身产生了什么影响？

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国家预算的主要支出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实际上保持不变，尽管经济形势发生了各种波动（见表14）。这意味着国家实际上没有把预算当作反危机或反通

① [法]《世界报》，1981年3月10日。

货膨胀调节的工具加以利用。此外，投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大约降低了1/5。与五十一六十年代衰退时的情况不同，甚至没有试图增加社会工程项目的支出，相反，其增长速度放慢了。与经济性支出相反，政府加速了军费开支*。1976年批准的增加1977—1982年军事预算的法案加快了军事增长速度。同时，政府的决定完全不是从经济考虑（刺激需求），而是从军事战略考虑出发。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4年的3.37%提高到1981年的3.85%，计划在1982年增加到3.94%①，这不仅不能对经济起刺激作用，相反，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形势的加剧。

七十年代期间，有形国际汇拨的动态也很少变化**，其增长速度低于整个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73年至1980年，经济性质的国际汇拨（不包括社会性汇拨）由442亿增加到1,061亿法郎（年平均增长13.4%），而国家开支总额由4,080亿增加到12,020亿法郎（年平均增长16.7%）。同时，国际汇拨的资本部分（占汇拨总额的1/7）增长更慢，年平均增长12.6%②。

只是1976年的国家开支统计数字表明了对私人企业的资本资助有所起色。1973年资助总额为27亿法郎，1975年增加到

---

* 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交，在直接军事费用方面，法国在美国（1,427亿美元）、联邦德国（251亿美元）和英国（245亿美元）之后，居第四位（222亿美元）。

① [法]《国防》，1979年12月号，第152页；
[法]《人道道》，1981年3月9日。

** 国际汇拨的有形部分包括援助、贷款、预付款和资本参与，它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或占中央政府支出的18—20%。作为比较，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有形国际汇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荷兰占7—8%（阿·波斯：《资本的损耗》，巴黎，1977年版，第94—95页）。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72—73期C，第2卷，第149、153页；1980年，第86—87期C，第2卷，第153、157页，

表14　国家和地方预算、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结构
（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国家消费	17.3	17.6	17.1
商品和劳务	6.1	5.6	4.5
职员的工资	7.0	7.0	8.0
投　　资	2.8	3.7	2.8
其他支出	1.4	1.3	1.8
再分配	15.9	19.6	25.7
社会性的	13.0	16.6	22.6
其　　他	2.9	3.0	3.1
国外支出	1.9	1.2	0.9
总　　计	35.1	38.4	43.6
总计(亿法郎)	1,041.0	3,008.0	12,018.0

根据以下文献计算：［法］《法国经济的进展》，1981年，第242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94—95期C，第2卷，第155页。

48亿法郎，1976年跃增到115亿法郎。此后的1977年降为56亿法郎，1978年降为55亿法郎。1976年所达到的数字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政府在1975—1976年采取的刺激私人投资措施的影响。这些措施没有涉及国有化企业，对它们的资本资助很少：1975年8亿法郎，1976年9亿法郎，1979年8亿法郎。至于利用国有化部门来达到反危机目的，那么如果法国政府采取这种方法的话，它宁愿不从预算资金中，而是通过向银行和有价证卷市场借债为国营企业日益增长的投资筹款。七十年代八家最大的国有化公司在生产性补贴总额中的比重，

同六十年代中期的趋势一样，继续下降，1973年为49.8%，1980年降为43.2%。同时，绝大部分汇拨（1980年占80%）是用于补偿与国有化企业根据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向私人企业和居民提供优惠劳务有关的直接损失的经营性补贴。

可见，不论法国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来克服1974—1975年的危机及其在生产方面的后果，都没有导致通过国家预算的再分配业务使积累明显增加。国民收入义务扣除部分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必须调节社会领域，因为阶级关系的紧张程度由于失业率的增加和固定收入（退休金、津贴，等等）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而越来越突出。在改善恶化了的经济形势的时候，政府宁可不动用国家预算提供的财政能力，而是把财政负担转嫁给获得了“行动自主权”的国营企业。

第五节　经济形势的调节

国家经济政策危机在与经济过程日常调节有关的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正是日常调节方法和形式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和经过实践检验的。

能够有效调节形势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的，即以凯恩斯理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改进资本主义生产比例失调的药方。甚至在1976年，即在已经燃起迅速克服困难和回到危机前形势的希望的时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自己纲领性的著作中写道：“长期消除失业存在于我们的多元化经济的可能性中。有代表性的是，在这次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所有西欧国家的失业率甚至不到战前危机年代的1/3或1/4；凯恩斯和贝佛里季理论的有效性起了作用，它教会我们通过刺激总需求和影响投资来同失业作斗

争”①。

但是，危机打破了对凯恩斯药方效力的信心。德斯坦对凯恩斯和贝佛里季的崇敬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世界报》观察家莫里斯·杜韦尔写道：七十年代中期，政府中的多数人实现了根本转变。他们放弃了从保罗·雷诺到乔治·蓬皮杜的经济思想中居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信念。杜韦尔指出，“回复到自由主义是同吉斯卡尔主义的基本方针一致的”②。

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正统理论思想的改变是有代表性的和含义不同的事件。一方面，它反映出对在新条件下表现出无能为力的凯恩斯主义的失望；另一方面，它表明了统治集团的某种惊慌，它们企图为自己无力克服所出现的形势和由此而引用呼吁国家把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理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辩护。同时，新自由主义及其变种——货币主义，从意识形态观点看是十分方便的思想体系，用为它确立了一种无条件的信念，即资本主义内在就固有一种不依靠政权而能自力解决任何矛盾的能力*。

货币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不是建立在某些肯定的事实基础上的，而是来自对各种抽象理论正确性的纯粹信念。杜韦尔写道：“作为法国货币主义分支的思想来源的弗里德曼的理论构想为人们所熟悉已有整整三十年了。它同凯恩斯模式一样

---

① [法] 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的民主》，巴黎，1976年版，第121页。

② [法]《世界报》，1979年7月25日。

* “常常可以听到，似乎19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制度终结’以及‘经济学家终结’的反映”——法国货币主义思想家之一帕斯卡尔·萨兰用上述一句话揭开了自己的论文系列《惊慌失措中的欧洲》，并继续写道：“这本书表明，制度很健全，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可说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是没有的”（[法] 埃·克拉桑、普·萨兰，《经济繁荣的波动》，巴黎，1977年版，第1页）。

令人信服，但它的实际应用并没有带来使人们认为货币主义方法比凯恩斯方法好的令人信服的结果”①。

法国统治集团“转向新自由主义信念”，不能不反映在经济形势的国家调节实践中。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七十年代的政策称为纯粹新自由主义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质。只是在价格政策方面从1978年4月起发生了向自由主义化的转折，因为巴尔的第二届政府开始逐步收缩对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所有国家监督形式。1974—1975年经济危机以后，阻碍恢复利润率过程的法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某些特点推动了他走这一步（见第五章）。从整个说，七十年代的经济政策绝不是自由主义的，国家并没有停止寻找更有效的经济调节措施以代替传统调节措施。开始逐步形成解决不寻常形势的不寻常办法。

新方法的实质是：第一，更加谨慎地应用调节总需求的政策，主要是放弃作为五十—六十年代政策特点的无所不包原则。例如，政府在实行信贷限制以抑制公司和居民的需求时，马上规定哪些部门或消费者集团不适用于这一总原则；第二，国家在限制总体调节流通范围的规模的同时，增加了行政当局直接干预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包括私人企业）维持或改组生产过程的次数。这种法国经济学家称为“点状”的行动，同经济自由主义的所有前提发生矛盾。从总的说，经济政策的重点发生了从调节形式到调节结构参数的明显变化。

在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法国于1976年9月通过了巴尔计划，巴尔计划的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折衷主义性

① ［法］《世界报》，1979年7月25日。

质。这个被公开宣布为反通货膨胀的计划，以某种变形（法国政府和议会每年两次——3—4月和8—9月——对经济政策进行总结，并制定新措施以提高其效能）一直被执行到1981年春。

1976年9月的巴尔计划所提出的措施包括：1.临时冻结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的产品价格以及商品价格中的商业利润比重；2.降低增加价值的税率，由20%降为17.6%，并从1977年1月1日起允许积极进行国外竞争的部门自由规定价格；3.规定1977年商品和劳务提价的最高幅度为6.5%；4.坚决建议企业家在1976年底以前不要提高职工的工资和其他收入，1977年把增长率限制在6.5%以内；5.增加石油税、汽车登记税、收入最高的居民所得税（约300万纳税人）、财富外部象征（高级汽车、游艇等）税；6.提高设备的折旧率以保证节约能源；7.按收入规模和财产种类实行级差税，1977年按工资规模实行有差别的提高工资比率①。

在1977年3月和8月的补充措施中，重点放在通过免除企业家向社会保险基金交款的办法增加青年人的就业（第一个“全国就业条约”，见第八章），提高低收入家庭和退休金领取者的购买力，支持为出口生产的中小企业经营活动，解除行情活动基金的限制使其有利于建筑部门（约30亿法郎），给企业家提供125亿法郎优惠贷款，降低银行贷款的基本利率②。

在关于法国国家帐目的报告中指出：“1978年的形势政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7年，第52-53期C，第1卷，第29-39页。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8年，第62-63期C，第1卷，第27-28页。

策保持了1976年9月以来政府奉行的目标和指令性原则。但是，从1978年第一季度末起，它的具体执行则进入了新阶段”①。所谓形势政策“具体执行的新阶段”，报告指的是1978年6—8月取消工业品价格的行政监督和提高国营企业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后一种做法是为了减少预算补贴和弥补赤字的津贴。与价格自由化的同时，采取了加强反托拉斯法的措施。建议企业家不要以超过日用品价格增长的速度提高工资，也就是说要奉行不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转移使雇佣职工的实际购买力保持在低水平上的原则。1978年第二个“全国就业条约”生效。尽管青年失业人数继续增加，这个条约的意义不如第一个条约的影响深远。根据1978年的经济政策，向社会保险基金的缴款提高了170亿法郎，其中的2/3是雇佣劳动者的缴款。

1978年对企业的援助和对货币资本积累的鼓励，是从很多措施当中经过筛选而提出的。这些措施包括：对股票购买者提供税款优惠；对投资者提供优惠，如果投资能增加就业或产品出口；建立30亿法郎的工业适应专用基金，向诺尔—巴卡尔、洛林、马赛和圣纳泽尔地区由于黑色冶金工业和造船业危机而产生困难的企业提供补助；对黑色冶金企业采取预防破产措施（把它们欠国有化银行的债务变为国家的资本参与）。

1979年的政策是上述方针的继续。价格自由化扩大到了劳务和商业部门，再次提高了国营企业税率。同时加强了刺激投资措施：企业获得了从纳税利润中扣除1979—1980年投资增长额的10%的权利；对在专门地区、在农业和手工业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8年，第72-73期C，第1卷，第31页。

计划范围内投资的企业提供一系列优惠；规定在就业人数2,000人以下的所有企业中科研设备新投资的折扣率第一年为50%。第三个“全国就业条约”略有变形和扩大，其数额估计为45亿法郎，期限为3年。为了减少石油进口，通过了一项专门计划。它规定民用重油供应计划化，在超过供应限额的情况下提高电力和煤气的价格，对实现节能措施的企业提供优惠①。

在1980—1981年间，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措施，向农民提供了补充贷款，通过了青年职业培训的五年计划，由于总统选举的临近，增加了对寡妇和多子女家庭的津贴，并取消了1978年规定的提高保险金的数额。②

对巴尔计划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可以很容易发现它们缺乏任何理论上的完整性。这些计划不过是各类措施的总和，其中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解决某项具体任务。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它们的总体作用归结为刺激或限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归结为向某个方向影响供给。这是一种实用政策，它符合其创始人的深刻的信念。还在1955年他就这样叙述了自己的信条：“对经济政策类型进行具体的研究，导致折衷主义理论，当然对于忠于自己偏好的理论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③。

确实，在同时起作用的措施中，有增加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措施（降低某些所得税、增加国家预算赤字）和减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措施（鼓励储蓄、增加税收、增加社会保险基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C，第1卷，第15-18页。

② [法]《世界报》，1981年3月11日。

③ [法]《经济评论》，1955年11月，第882页。

金缴款、冻结工资、规定年信贷增长额）；还有鼓励许多部门和企业投资、但不涉及其他部门投资过程的措施，以及一般支持货币资本积累过程的措施；旨在调节流通领域的措施和直接干预生产过程的措施（改组能源、黑色冶金、造船业的生产结构）。

可见，法国的国家政权作了巨大的、尽管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努力来试图保持对经济过程的监督。寻求新的调节方法和形式，造成出现一大堆彼此协调很差的日常调节方法，经济形势调节政策的折衷化。

法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苏共二十六大所作出的结论："资产阶级政府在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时，也促进了生产停滞和失业增加；它们力求阻止危机性生产下降，却更加加剧了通货膨胀"①。

形势政策的无效，常常是由于它的方法不适合于七十年代经济碰到的问题，这迫使法国统治集团更加注意制订和实行结构政策。

第六节　结构政策

经济结构调节与把消除或缓和市场消极后果为目标的日常调节不同，它在确定生产比例时（消费与积累的比例、部门比例）以有意识的先验行动代替或补充市场。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结构政策的主要工具是中期或长期计划，在计划中要提出国家政策目标和制定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

法国的计划工作（1946年就已经奠定了它的基础）自有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页。

史以来经历了重大变化。原来设想作为确定社会生产比例方法的计划，很快就成为分析性的和预测性的文件。计划机构（计划部和财政部预测司）逐渐承认竞争在形成经济比例上占有优先地位。在第六个计划文本中写道："尽管市场有其固有的某些问题和缺点，但它仍然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最有效方法"①。

采取加强作为主要经济主体的资本主义公司实力的方针，是这种承认和"计划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相应地自动放弃计划比例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促进集中化的广泛措施服从于在每一个部门建立1—2个有竞争能力的公司，然后则建立国际规模的集团的活动（见第三章）。从保证事先规定的实际积累结构向刺激一般货币资本的积累和企业有相当高的自筹资金比率的转变，同样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法国计划的制订者们开始断言，拥有巨额资金的工业和银行联合体更清楚应该向社会活动的哪些部门投资。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国家"破产了"，它保留了决对经济战略的基本方针和方向的权力。提高法国经济竞争能力、优先发展工业或出口部门（"工业至上"、"工业改革"政策）的方针，要求有具体措施和现实资源的保证，否则所有号召和口号都有停留在纸上的危险。

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的理论的害处，自1973年以后表现特别明显，当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构问题：必须改变能源部门的方向，防止环境污染，改组旧的部门和建立新的部门。显然，任何竞争和任何市场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七十年代在执行大吹大擂的

① ［法］《法兰西公报》，1970年7月10日，第10页。

“恢复竞争”方针的同时，平行地实行了国家积极参与纠正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方针。正是这个方针要求：第一，改组计划机构，第二，采用结构调节的新方法——目标纲要法，这是集中改革经济比例的更有效方法。

至于机构的改革，那么它是在1974年春分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为了更有效地干预经济活动，建立了中央计划委员会。它是一种由法国总统主持经常（每年2—3次）召开的由负责经济和财政问题的部长、计划委员和总理参加的会议。在会上讨论实现计划任务的进程和一些关键问题。按照改革者们的意图，建立如此高级的机构，应当把计划从每五年通过一次和以后便再也没有人理会的文件变为经常有效的规划。

考虑到国家行政部门在解决法国经济结构问题时的日益增长的意义，1979年，即在制定第八个计划基本方针时，提出了进一步改组计划机构和改进长期计划监督方法的思想。在第八个计划的基本方针中写道：“在不得不执行日益复杂和重要职能的国家机构中，应当有一个摆脱了日常管理责任并能对各部和国营企业提供帮助，协调它们的日常活动和长远目标的机构”①。在莫鲁瓦政府中于1981年5月成立计划和领土整治部，可以认为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1974年的机构改革，对计划体制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使计划接近于执行机构，为使结构性决策具有更大的效能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它剥夺了计划委员部自建立以来残存的即使是虚幻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法国著名的记者罗歇·普里厄写道：“计划委员成为一个下属，是一个重要

①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版，第24页。

的、被邀请的、被听取意见的、但可以被纠正的下属”①。

从1976年起每年讨论的国家预算要同计划纲要的完成进度更密切地协调一致，这一改变是实现计划目标监督程序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从前在计划和预算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在每年秋天讨论预算法案时，国会都要重新讨论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国会根据当前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继续或停止以前制定的计划和下一年度的拨款额问题。从1976年起，除了预算草案外，提交国会讨论的还有关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要说明计划的拨款情况和进度。现在，从原则上讲，国会已不能象从前那样不修改整个计划就停止或削减为完成计划法案规定的项目所必须的拨款。

目标纲要拨款法的改变，反映了它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法国计划工作中的特殊作用。

目标纲要代替了详细的指导性部门任务。这些任务实质上是对生产的预测，它的执行没有任何国家义务的保障。相反，目标纲要包含着它的费用估算和国家应承担的比重。

1976—1980年的第七个计划，包括25个纲要，根据目标将它们分成几类。目标的提法是：1.加速经济发展，即保证生产高速增长；2.通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证法国的决策自由；3.保证充分就业；4.减少收入不平等；5.改进“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6.发展科学研究②。规定在五年内用于实现纲要的资金共计为2,000亿法郎以上（1975年价格）。

尽管1977—1980年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了和因此而出现了筹集资金的困难，但还是找到了所需资金。在这方面新的计划方法比原来的方法表现得更加可靠。然而，一个纲要目

① [法]《新观察家》，1979年，第764期，第22页。

② [法]《法兰西公报》，1976年7月23日，第4396页。

标都没有达到：经济发展速度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国际收支逆差增加了；到八十年代初国家面临的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大量失业。

第七个计划的一部分纲要，目的在于发展各个部门（农业、食品工业、建筑业、电话通讯、能源、出口部门、小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经验表明，在七十年代加紧结构改革的情况下，国家不能不最坚决地和直接地干预部门层次上的生产。黑色冶金业、造船业、纺织和制鞋工业的危机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国家提供积极的财政援助的情况下企业仍然不能克服困难。在法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集中了冶金厂、纺织厂和造船厂，因而成了大量失业的发源地。出现了反对缩减法国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广泛运动。政府不得不制订部门改组的具体计划。在黑色冶金业方面，它把主要企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造船业方面保证长期补贴一部分费用。

对七十年代和更早时期法国经济发展计划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实现宏观经济调节、规定全国发展速度和主要生产比例的希望破灭了。七十年代法国结构政策的期望变得更为谨慎和不连贯。1979年起草的关于第八个计划基本方针的报告中写道："新的问题要求新的方法：今天，当世界已经与十五或三十年前完全不同的时候，计划工作也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除了一般职能——信息职能、协调职能外，计划应当适应多变的世界形势，成为更加战略性的和创造性的计划"①。报告的作者声明，"在当今的条件下，要求计划在几年以前规定发展速度，这意味着不是严肃地制定计划"②。

德斯坦总统和巴尔总理的政府在减少结构政策的任务和

①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版，第20页。
② ［法］《关于第八个计划主要目标的报告》，巴黎，1979年版，第23页。

有效范围时，同生活的要求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戴高乐党的领袖雅克·希拉克是对的，他声称："第八个计划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不过是计划工作的倒退"①。正是第八个计划的目标不够明确、政府在法国生产中的地位明显削弱时自动放弃承担具体义务、财政基础不适应所制定的计划、优先强调私人部门，促使密特朗总统和莫鲁瓦总理的新政府在1981年秋向议会提交了关于制订1984—1988年的新五年计划和1982—1983年两年过渡计划的建议。

可见，七十年代法国的结构政策同当前政策一样，把削弱总体上的和全国范围的调节因素同加强国家对经济"敏感"部门的生产过程的干预因素结合起来了。正如上面指出的，整个国家调节活动的演变过程和方向，没有提供说明回到了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构上去的根据。只是发生了由一些已经过时的无效的国家垄断调节方法向另一些更加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发展条件的方法的简单转变。

第七节　法国与国际经济调节形式

国家调节传统方法效率下降，推动了把有意识地影响经济过程的范围向国外扩大。随着资本的国际化，开始了国家垄断调节形式的国际化。

法国积极参加了这一过程。它的活动从三个主要方面开展：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建立超国家调节成分；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转向积极协调经济政策；寻求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形式。

---

① ［法］《新观察家》，1979年，第757期，第50页。

七十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内一体化过程的演变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是，1973年后很快表明各国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建立经济和货币同盟，统一国库、金融和经济政策）不能如期实现。不仅关于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维尔纳计划已被遗忘，甚至共同市场的原则也受到了威胁，因为许多国家（意大利、英国、法国）在个别商品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机制面临的威胁，迫使各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采取非常措施。1974年加强了最高一级的政策协调机制：根据法国的倡议，从这一年10月起十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晤成为一种定期的（每年三次）制度。在会晤中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也扩大了，其中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同第三国的政治关系问题，而决策机制则由于部分地放弃了讨论次要问题时一致通过的原则而变得更加灵活了。此外，这些会议的保密性质看来也有助于提高其效能。可见，受到削弱的经济一体化基础因政治意志而得到加强。1979年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议会选举证实了这种趋势（见第十章）。

经过几年等待以后，法国和联邦德国同意了采取步骤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超国家经济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1978年制定并通过了比维尔纳计划有所缩减的欧洲货币体系原则。1979年3月，在农业政策方面的一些争论问题得到调节以后，欧洲货币体系条约开始生效。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调节十国同第三国经济贸易关系方面的活动也加强了。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部门即结构调节方面的权力也扩大了。由埃·戴维尼翁领导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工业署在制订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部门（黑色冶金、化工、造船、纺织）改组计划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其中一些计划得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财政支持，并已开始付诸实施。

法国是从1975年以来定期召开的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倡导国。众所周知，第一次会议是在朗布依埃的法国总统郊区别墅举行的。这些每年举行的会议实质上是共同研究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七十年代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尝试。在会上就这样一些问题如同通货膨胀、失业、能源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等进行斗争的方法交换意见。即使所提出的建议和决定不要求谁承担义务，但定期修正共同经济战略就是随后各国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促进各国政府经济活动一体化的因素。

法国在同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上采取比较灵活的、尽管并不总是始终如一的立场。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七十年代初矿物原料和农业原料价格急剧波动之后，重新调整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势在必行。法国认为由美国倡议建立、有19个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能源机构是同石油生产国进行不妥协对抗的工具，因而拒绝参加这个机构，并且提出扩大同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建议。1975—1977年间在巴黎断断续续地举行的南北会议，法国认为是达成关于两类国家经济关系友好协议的一种方法。但是，立场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以致无法在谈判桌上加以克服。

法国在制订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发展中国家联系国的共同政策上起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的洛美协定奠定了这种政策的基础，1979年对其作了进一步具体化。在整个七十年代，法国的总路线是寻求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联成一体的途径。

* * *

七十年代法国在国家垄断经济调节方面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完全保留下来了，尽

管发生了国家调节传统方法和形式的危机，尽管掀起了恢复“进步自由主义”的喧嚣一时的思想运动，但还是保留下来了。那些断言“共和国总统扼杀了法国真正的计划制度”的人① 却是错误的。确实，七十年代后半期的调节方法同大多数关于“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同十年前存在的做法，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表明法国企业家阶级没有得到国家政权方面的支持。支持的方法和形式改变了，但目的却没有改变——保持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

① [法]《新观察家》，1979年，第764期，第22页。

·第 五 章·

再生产矛盾的激化

七十年代的周期，与经济增长速度较均衡并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战后时期相比，具有重大区别。1974—1975年的危机是一个转折，尔后，法国经济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一道，增长速度进入一个缓慢和不稳定的时期。在这一章，我们将探讨这一周期动态变化的原因和社会经济后果。

第一节　七十年代事变的前提

1974—1975年危机，堪称是一次“大”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月指数达15.5%，且持续了十个月之久。1964—1965年、1958—1959年、1952—1953年的生产下降（分别为3.3%、4.5%和8.0%①），都不能与之相比。就是在1930—1932年的“特大危机”过程中，头十个月的生产下降平均速度也仅为11.2%。诚然，当时生产下降并未终业，“特大危机”持续了二十六个月之久，生产下降总共达36.3%②。

① 资料来源：［苏］《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1975年和1976年初的述评》，莫斯科，1976年版，第93页；［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7年，第1期，第156页、第7期，第156页。

② ［法］罗·布瓦耶：《当今的危机，一种历史性的展望》，巴黎，1979年5月版，第36页。

一些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解释所谓“大危机”产生的原因时，把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提高石油价格放在了第一位。后面，我们将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先看一看另一方面的证据，它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和说明1974—1975年危机的周期性质。我们赞同苏联和西方经济学家的如下观点，他们认为：七十年代前半期的生产下降，是资本明显过度积累的结果；而资本过度积累的初兆，早在石油和其他原料涨价之前就已显现出来。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劳动和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已开始下降，单位产品的费用开始增加，尽管加强了有利于企业主的再分配措施，但利润率降低的趋势已经形成（见表15）。

为了证明资本过度积累这一命题，我们仿照法国经济学家尔·杜布瓦的作法，将主要效率指标（劳动生产率、资本耗量、材料耗量）按如下三个时期进行比较：1963—1969年（过度积累尚未出现）、1969—1973年（出现了过度积累的明显征兆）、1973—1979年（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困难条件下克服过度积累）①。

如果从决定经济增长的诸因素的角度考察1963—1968年（第一时期）和1969—1973年（第二时期）的生产过程，就会发现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了1/5（从7.3%降为5.7%）；加工部门下降了1/4（从7.2%降为5.4%）。随着劳动生产率下降，所有经济领域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行业的资本产出率下降了。只有工业部门1964年曾出现过转机，它的资本产出率增长一直持续到1971年。但是，当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4期。

表15 生产效率指标动态 （实物量平均增长速度：%）

	1969年同1963年比	1973年同1969年比	1979年同1973年比
市场国内生产总值	5.7	5.9	3.1
劳动力	0.5	0.7	0.0
固定资本	4.9	6.0	4.6
流动资本	5.10	6.2	2.4
劳动生产率(1：2)	5.2	5.2	3.1
资本产出率(1：3)	0.8	−0.1	−1.5
材料产出率(1：4)	0.6	−0.3	0.7

资料来源：[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69期 E；
[法]《财政统计和研究》(SEEF)，橙皮书，1980年；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见与报告版)1981年3月25日；
相应年代的进出口统计表。

时工业部门的数据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即1963—1974年间劳动轮班系数大约提高了25%①。如果剔除这一因素，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率也会下降。对法国生产中的材料消耗动态的考核也能证明效率降低的总趋势。因为它表明了已从1963—1969年期间有代表性的节约材料型发展，向1969—1973年期间材料消耗形发展转化。

“大危机”的前四年，社会资本利用效率的降低给生产费用也带来不良影响。因为生产费用不仅取决于效率（生产资料同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实物量对比），而且也取决于价格。下面我们较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7期，第12页；
[法]《财政统计和研究》，橙皮书，1980年，第42期，第49页。

计算表明，1963—1973年间生产费用中材料这一要素的价格，整个说来同效率系数一样，也向着不利方向变化（见表16）。同时，生产费用中的价格，从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不是简单地快速上涨，而是其上涨速度超过了制成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就是说，销售最终产品的市场弹性越来越小了，它的吸收能力不象过去那么容易加强了。产品价格对材料费用价格弹性的降低，说明了这一点。1963—1969年间，主要商品的价格弹性为1.24，1969—1973年为1.11；而原料和半成品相应为1.44和1.08。这些数字表明，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末，制成品的销售越来越困难了。

社会生产效率的降低和单位产品费用的提高，意味着在危机发生前的年代里资本再生产过程失调的加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就表明投资过度。但是，过度投资长期以来并没有表现为利润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企业主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得以对新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比例进行重大修改，以对自己有利，从而暂时阻止了利润水平不利趋向的发展。

表16　产品的材料费用价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动态
（年平均增长速度；%）

	1969年同1963年比	1973年同1969年比	1979年同1973年比
投资商品	2.9	6.1	11.0
原料和半成品	2.5	6.3	11.1
国内生产总值	2.9	6.4	10.6

资料来源：根据表15的资料计算。

下面，我们说明一下表17。该表比较庞杂，但颇能说明问题，它清楚地表现出1974—1975年危机期间所形成的状况。特别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随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经济繁荣，在公司所实现的价值中工资基金的比重虽然提高不大，但毕竟还是有所提高。一般说来，这很容易用战后时期法国人口状况的特殊性做出解释：出生率低；战争造成的人员损失；劳动起始年龄的提高和退休起始年龄的提前，使得投入劳动市场的新劳动力数量下降。所有这些为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创造了条件。

但是，1963—1969年间公司支付的间接税相对值急剧缩减，直到1969—1973年间，它仍在下降。《世界报》经济评论员乔·马其耶写道："一切都是这样发生的：国家减少公司的税收似乎是为了帮助它们保住利润率"①。的确，一直到1973年，公司都保住了利润总额（剥削收入）在所实现的价值中的高比重。但是，在进行分配活动（支付股息、利润税、债务利息等）之后，留归企业支配的利润状况并不好。大体说来，由于借款开支的增加，分掉的利润总规模迅速扩大了（从1963年的14.5%增加到1969年的16.6%，1973年又增加到18.4%），结果未分掉的利润在1969—1973年间迅速下降。

至此，企业主陷入困境。他们竭力弥补日益降低的生产效率对增长速度的消极影响，不想放弃容量似乎尚未超过界限的销售市场。继续把资本积累率保持在高水平上，而不顾利润额增长的滞缓。结果，公司资金自筹率从1969年的67.5%下降到1973年的59.7%。这实际意味着，财政债务进一步增

① 〔法〕《世界报》，1975年4月9日。

表17　股份公司收入的分配结构(%)

	1963年	1969年	1973年	1979年
附 加 值	91.8	91.3	91.7	89.3
补贴,有价证券及其它收入	8.2	8.7	8.3	10.7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工资和社会保险基金提成	57.3	58.6	59.8	61.6
间 接 税	12.9	8.8	8.4	8.1
利 润 总 额	29.8	32.6	31.8	30.3
分配出的利润	14.5	16.6	18.4	18.3
其中借款利息	3.6	5.5	6.7	6.9
未分配的利润总额	15.3	16.0	13.4	12.0
其中折旧费			10.7	12.1
投 资	23.4	23.6	22.4	18.9
其中固定资本投资	21.0	19.7	18.6	16.3
债务增长额	−8.1	−7.7	−9.0	−6.9

根据下述资料计算：［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67—68期，第112—113页，124—125页；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20—21页，32—33页。

加，从而加重了财政开支。这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又大大缩小了自身的积累资源。财政状况的恶化同已开始感觉到的产品销售困难相结合，最终迫使公司抑制积累过程。

1969—1973年间，尽管劳动对象储备继续保持在不寻常的高水平上（1973年实现的价值为3.4%，1969年为3.6%，1963年为1.9%），但投资速度的降低不仅涉及到固定资本，而且波及到流动资本。

效率的降低导致了生产利润率的下降，而生产利润的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又加剧了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当

然，企业主也并非无所作为。在六十年代末维持利润和其他收入形式之间的分配比例的诸过程当中，早在1973年10月“石油风暴”出现之前就已采取的通货膨胀又渐渐推到了首要地位，而通货膨胀首先应在垄断性价格形成政策中寻其根源。到六十年代末，法国财政资本的援助明显增加了（见第三章），这就使之能够对许多商品的市场进行可靠的监督。垄断资本也试图通过提高制成品价格来“蒙混”利润率降低的趋势。1969—1973年间，国内总产品价格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了一倍，从2.9%提高6.1%；而加工部门产品价格增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加了两倍，从1.9%增至6.1%。在可比范围内，这甚至比1973年后的通货膨胀速度还要快（1973—1979年间，国内总产品价格上涨率为10.6%，加工部门为11%）。

生产效率的降低，生产费用的提高，分配结构的改变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迅速提高——所有这些最终对利润率的影响如何呢？在危机到来之前四年，即1969年，利润率已达到了自己的顶点。此后，非分配性利润率总的来说是相当明显地下降了（1972年稍有减缓）。危机前（1970—1973年）与危机期间变化的区别仅仅在于下降的速度。在经过1970年一个小的阻滞之后，分配前的总利润率重新上升，一直到1973年。但这次利润率的上升，并不是象1963—1969年那样造成了现实资本的积累，而是造成了再分配活动，首先是支付财政债务的利息。

这样，在1974年秋工业生产开始危机性地缩减之前，以利润率降低形式表现的资本过度积累的明显特征在法国已表现出来了。在某些时候，可以通过扩大有利于生产部门的再分配活动人为地把上述现象压制或隐蔽起来。但很明显，正如法国某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早在六十年代末，就已出

现严重的比例失调”①。至于外部因素（石油涨价，货币体系危机，世界商品市场扩大速度的减缓等等），它们只不过起了加强危机到来并使之特别深刻和具有特殊形式的摧化济作用。

第二节　危机的特点

我们在考察1974—1975年危机的特点时，将要涉及自此开始的1974—1980年周期整个过程所存在的两个迫切课题，即：销售市场资本再生产过程破坏的作用和原料及石油价格上涨的作用问题。

法国一位最受欢迎的年青经济学家罗伯尔·布瓦耶写道：“在法国，1974—1975年危机的根源，不应从全球性的需求降低中去寻找，而应从由于利润率降低（实际上的或预料中的）资本家采取缩减生产的决策中寻找。”②正如前面引用的计算数据所证实的那样，这种看法实质上是正确的。但作者却不公正地忽视了从高涨向危机转化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实际上，七十年代产品销售比例的急剧破坏，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性机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全球性的需求结构，在危机之前以及危机过程中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既有内部原因——消费和积累关系的变化，也有外部原因——在世界性危机和通常由帝国主义国家确定的世界经济关系原则破坏影响下，世界资本主义贸易的停滞。

---

① 尔·杜布瓦：《1974年的争端》，见［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4期，第19页。

② ［法］罗·布瓦耶：《当今的危机：一种历史性的展望》巴黎，1979年5月版，第78页。

至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按现行价），由于1974年第三季度和1975年第一季度之间把投资缩减9％，特别是对流动资本诸要素需求同时急速缩减，它已遭到破坏。按百分比计算的对国内资源增长额（国内生产总值加进口值）的投资“存款”，1974年为3.5，1975年总共为1.7。而储备“存款”（流动资本增长额）则分别为0.3和－2.2①。一句话，投资商品市场（包括贸易形式的流动资本）直接助长了生产的缩减。同时，1975年消费需求“存款”大约增加到危机前的水平（前者为9.7*，后者为10.7）。结果，消费商品价值同生产性投资之比，从1974年的5.7:1增至1975年的6.2:1。在以后的年代里，它继续按同一方向运动，到1979年前，上述比例达到6.6:1②。

1974—1975年，对外经济领域对产品销售有更加剧烈的消极作用。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计算，1975年世界进口的实物总额减少了6％左右③。世界行情的震荡对法国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974年对生产增长的外部需求“存款”（按现行价格）达5.4％（资源增长27％），1975年缩减到0.5％（资源为5％）。

石油和原料的价格，在“大危机”及此后的经济周期方面占有特殊地位。西方国家发表的见解断定：“石油风暴”是七十年代所有经济困难的唯一原因，几乎完全忽视了影响再

① 资料来源：[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67页。

* 按实际计算，消费需求的影响总计只占2.0％，其余7.7％反映了价格上涨。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6—7页。

③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6年，第49期，第1卷，第20页。

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对石油价格影响资本再生产实际程度的估价，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现代条件下，进口原料价格上涨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至少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国内生产费用；二是扣除已生产的国民产品的附加（同涨价前时期相比）部分以有利于原料生产者。

如前所述，增加生产费用，会使销售产品价值中利润的比重降低（或者降低工资的比重），或使该产品价格提高，而更多的情况是二者兼而有之。应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两种影响："机械"型影响和积蓄型影响。

"机械"型影响，是指提高用涨价原料生产的产品价格，这就使得尽管提高了材料费用，但在实际出售商品时，还是能够实现新创价值的先前的标准价值量。从数量上来看，这种影响并不大。在法国（仅适用于石油），1974年价格总共上涨了11.6%，其中这一因素占2.3%，1980年相应提高为14%和4.0%左右①。在某些耗能大的部门，这一因素能够达到很大的比重，但整个说来它只占通货膨胀的一小部分。

问题就在于，通货膨胀机制实际上绝不是"机械"性的。它的动因也不在于价格核算方面，而是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货膨胀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实现单位商品先前的名义利润就意味着降低实际利润（由于提高投资商品的价格，而利润最终是要变为这种投资产品）。资本家利用自己对市场的垄断权，力图把自己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可以实现过去的利润额的水平（在生产规模相同的情况下）。在这

① ［法］《快报》，1980年，第1532期，第46页。

种情况下，新创造价值的分配比例就变得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因为实际计算的单位产品的工资费将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通常要为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使其达到自己的价值标准而奋起斗争。如果劳动者的阶级地位相当强，并且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很好组织起来，如果国内还存在工资按消费品价格指数化的制度（联系制），那么他们就能够取得成功。这时，在已销售的产品价值中，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就恢复到初始水平。如果在这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实际计算的利润量同样也要降低到初始的水平（无论在提高原料价格之后它受到的影响如何）。初始和最终状态的唯一（虽然是相当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在这一期间提高了价格的总水平。以这种形式产生的积蓄式的通货膨胀过程将逐渐减弱，它减弱得愈慢，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愈低，劳动人民对提高剥削率的抵抗就愈强。

总之，1973年后法国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见表16）可以这样来理解：国家垄断资本对石油涨价之所以反应强烈是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能够补偿利润率降低的办法，如税务优惠、国家补贴、紧缩工资等已经用尽。毫不奇怪，价格步步上涨，这就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推动力。到1974年，工业品价格平均上涨了21.9%，建筑业上涨了17.2%，运输和邮电服务上涨了18.7%①，这些不能不破坏对消费品和生产用品市场的需求*。我们认为，正是这无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6年，第49期，第2卷，第89页。

* 1974年，某些部门特别是能耗大的部门的产品，其价格年平均上涨了40%至50%，黑色和有色金属上涨了35.4%，主要化工产品和合成纤维上涨了51.8%，纸和纸板上涨了47.7%，1973年整个工业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8.5%。

节制的通货膨胀，成为1974年秋开始缩减生产的直接原因。

可见，在解释周期的特点时，如果不考虑石油涨价对生产费用从而对经济周期进程的影响，那是不谨慎的。石油价格影响法国经济的第二个途径——所生产的国内产品的附加部分向有利于石油开采国的方向转移，其情况有某些不同。在西方包括法国的一些著作中，对能源进口国国民收入中的“扣除”规模总是竭力喧染，把七十年代的经济困难首先同这种“扣除”联系起来。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布瓦耶就曾指出：原料和能源涨价会引起费用的提高，“如果这导致全面危机那是因为：当整个体系随着价格的上涨遇到困难时，石油地租的上涨要从剩余价值中扣除”①。大约在1980年，《快报》杂志的一位经济评论员欧尔日·巴兰斯也重复了这个观点，他说：“在第二次‘石油风暴’额外扣除2.4%的国内产品的情况下，自由放任（指工资方面——弗·库兹涅佐夫）是不可能的”②。实际上，“扣除”的实际规模远非如此之大。在法国，这种论调之所以能广泛传播，首先是在思想界有着特殊的市场。

石油涨价导致国际汇拨，汇拨数量同涨价的规模成正比。但在初期，汇拨的不是产品和收入而是支付手段。结果形成了能够长期储蓄起来的潜在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支付手段的实际购买力会逐渐降低，或者被某种方式所中和。这方面首先采用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此外，石油赚取的货币资金相当大一部分一般不去购买商品，而是作为货币资本用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① ［法］罗·布瓦耶：《当今的危机：一种历史性的展望》，巴黎，1979年5月版，第77页。

② ［法］《快报》，1980年，第1532期，第46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各国当事人之间对于资本所有权的再分配，一般说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真正的国际汇拨。石油美元再循环理论本能地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基础上，即：当石油生产国货币存入工业发达国家时，它们就不再是在这些国家创造的实际收入的“扣除”手段*。

法国就是一个经历了“石油风暴”而损失较少的实例。1974—1975年，法国出口价格提高了+28.6%，低偿了进口涨价（42.2%）的2/3**①。在整个1973—1979年间，进口涨价额仅比出口涨价额高1.4%。这就是说，六年时间里，法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和劳务总额达21,620亿法郎，而进出口差价的损失总共才300亿法郎，或者说仅损失了在此时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0.28%***。

总之，如果说1974—1975年间资本投资利润率确有降低，从而使得资本积累减少和生产下降，那么这不是石油生产国对法国的“剥夺”所致，而恰恰是国内原因造成的。

危机年代利润率的急剧降低，是生产效率降低，国内外市场销售过程遭到破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最主要后果。据某些方面的计算，1973—1975年间，工业利润率降低了一

---

* 货币转到国外，不计资本的利息和收入。

** 这里指所进出口商品的价格。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217页。

*** 上述数据估计的是法国由于全部进口商品比全部出口商品价格涨得更快而受到的损失。因此决不能认为，石油出口商由于提价六年内在法国仅赚了300亿法郎，他们的收益要大得多，达2,500—3,000亿法郎左右（石油和石油产品进口总值为3,650亿法郎）。但是，法国由于自己的价格政策和利用它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几乎把“石油账单”的全部重担都转嫁于他人。但第二次“石油风暴”却严重得多。这特别是因为：在八十年代变化了的情况下，再用类似办法已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比根据法国偿付的“石油账单”计算的“扣除”额少9/10。

半，从10.5%降到4.9%。一些工业部门的失调达到如此地步，致使一些基础工业部门组织的利润率大幅度跌落（见表18）。整个生产和工业部门的纯利润率（扣除折旧）跌到零以下。

表18　工业利润率*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整个工业	12.3	10.5	8.4	4.9	5.0
劳动对象的生产	8.3	7.8	11.9	1.4	2.0
设备的生产	16.8	13.2	3.8	9.6	9.8
日用品的生产	15.8	13.0	6.7	6.6	5.7

资料来源：［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67号E，第82-83页。

* 支付了间接税和加上获得补贴之后的利润总额与固定资本净值之比。

在1974—1975年危机过程中，异常深刻的同时也是符合规律的、由前一发展阶段整个过程准备好了的利润率下降，决定了1974—1980年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在招致这种下降的诸因素中，不仅有周期性的和内在的因素，而且有外部和所谓结构性的因素，——这一情况就使得资本过度积累的后果难以克服。在七十年代整个周期中，利润率低于六十年代的水平。

第三节　1974—1980年周期

在1974—1980年新的经济周期中，再生产价值构成方面所发生的过程的实质，可以通过与下述三个有代表性的数值

的比较来说明：利润在新生产（附加）价值中的比重；积累率（投资在附加价值中的比重）；资金自筹率（非分配性利润在所有投资拨款来源中的比重）。对这些数值的动态研究表明，利润比重是投资率的决定性指标。后者的变化只能在较小范围内不依利润率为转移，其范围取决于自筹资金的波动：自筹资金增长，投资率则下降；反之亦然。

正如有关法国生产部门的资料所证实的那样，利润比重的显著特点是：年度变化稳定。这既是危机前1963—1972年的特点，世界危机后1975—1979年的特点。但是，利润比重的年平均指标，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有很大差别：它们分别为14.9%和10.4%。由高水平向低水平的转化是很快的，通共只用了两年时间——1973年和1974年。随着利润比重的迅速降低，在投资率相对下降不多的情况下，资金自筹率急剧下降。在以后资本再生产独立周期的整个时期内，企业主力图用减少投资的办法把资金自筹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同时减少借贷资金）。投资率已从1972年的19.6%、1974年的18.2%，下降到1979年的14.6%。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即尽管在七十年代末资金自筹率已得到恢复，但企业主仍在继续压缩投资率。因此，危机以后时期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是较低的，这主要是（几乎毫无例外地）同生产利润率降低有关。

如果说低利润率反映了1974—1980年周期的本质，那么，企业主本人和国家为克服利润率的不利动向以恢复危机前新创价值的分配比例所做的顽强努力则决定了这一周期的内容。他们努力的具体形式和方向，就是抵销引起利润率降低以及使它保持在低水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分配领域都在起作用，

至于1974—1980年期间的生产状况，那么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缓慢、生产能力负荷率降低* 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滞缓，都对其效率有不利影响(见表15)。

在某些时候，提高生产速度的主要障碍似乎在于产品销售困难。因此，国家力图同时解决若干课题（提高生产、在石油开采国市场上加强自己的地位、减少外贸赤字、防止国家外汇不足）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了加强出口方面，企图用国外市场来替代或补充国内市场。七十年代所有的官方文件都谈到了加速和完善出口机构、加强出口基地、给出口商品以资助的必要性。1976年国会通过的第七个计划，要求“占领新市场”、“促使工业结构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①。在该计划起决定作用的二十五项纲要中，至少有八项包括有促使达到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1980年政府通过的第八个计划，包括了十二项纲要。其中有五项同样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同国外经济联系领域的问题②。

但是，法国扩大出口的措施，并没使其出口业务起到显著的效果，若按实物量计算，它出口的增长额与其进口的增长额大体相等。当然，1974—1979年间同1969—1973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出口弹性系数，无论是实物量指标还是（特别是）价值指标，都有某些提高。按实物量指标计算的弹性系数，危机前为0.421（5.6%：13.3%），危机后为0.429

---

* 工业负荷率从1970—1973年平均的83—86%，降低到1976—1979年的80—82%，而1975年仅为69%。

① [法]《一种发展战略：第七个计划》，巴黎，1977年版，第33页。

② [法]《1981—1985年社会与经济发展第八个计划》，巴黎，1980年版，第217页。

（3.0%：7.0%）；按价值指标计算的弹性系数相应为0.645和0.800①。在其它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它表明：国外市场在法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高了；但实际上，由于出口增长速度本身降低了一倍，因而它的作用大大减弱了。

1974—1980年间，在生产的物质基础方面出现了有助于提高效率的积极过程。它们由五种不同的因素所组成：因破产而取消的企业数量增多；无形贬值或多余设备的加速注销；在投资总额中，用于补偿因无形或有形陈旧而注销的资产的“替代投资”数量增加；与此相联系的是，投资总额中设备的比重增加，建筑工程的比重下降；国营企业投资的加速。

关于上述过程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只能近似地在数量上予以估价。1978—1979年对企业主所进行的质询表明，1976—1978年同1970—1974年危机以前的时期相比，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有明显下降（前者为1.5—2.2%，后者为5.3—6.0%）。国家簿记的作者们，力图用资本的加速注销和造成企业关闭的破产数量增加来解释增长额的缩减*。超标准注销的设备数量，估计每年有2—2.5%（在1977—1978年），这是对于陈旧设备惯常注销率（3.5%）的附加②。如果上述情况是真实的，如果积累资本的贬值加速，那么表15（其指数是按六十年代实际报废率计算的）所反映的资本产出率发展趋向的不利转变就不太实际了。

---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217页。

* 从1974到1980年，破产数量增加了70%。[法]《世界报》，1981年3月10日。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72-73期，第1卷，第99页、101页；1980年，第86-87期，第1卷，第85页。

私人和国家投资动态中的根本区别，对于说明1974—1980年经济周期的特点或许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说明法国政府的七十年代经济政策时采用新自由主义术语，但国家投资在资本积累方面的实际作用，基本上是指令性质的。事实上，如果说1973—1979年私人生产性投资额降低了6.9%，那么，国家生产性投资额在同一时期则提高了82.5%* ①。1963—1973年间，此项比例正好相反，那时它有利于私营成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私人投资的变化，既同资金自筹率有关，又同销售产品价值中的利润比重有关。国家投资则不同，它受另外的规律支配。不管是缩减附加值中的总利润额的比重，还是降低资金自筹率，都不影响国营成分投资额的增长。虽然国家未能明显地改善国内投资气候，然而，仅仅由于国营企业的投资，国家的投资总量在高涨末期也没有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其主要的推动因素是向原子能和航天工业方面的投资。

尽管各项投资的绝对额（私人的和国营的合在一起）实际上仍停留在1973—1974年的水平上，但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明显地降低了。在1974—1980年周期中，单位新投资的效率同1973—1974年周期相比有某些提高。下列增长系数的增值可以说明这一点：产品资本增长系数从1963—1973年的0.95增加到1973—1979年的1.15；生产性投资的积

---

* 在国家簿记中，仅列出国营成分的生产部分（是指八个特大企业，它们的生产能力约占该部门的60%），其余部分则被假定性地视为私有企业，计入“其它企业”项下。（《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2年，第15期，第1卷，第40页；1978年第60号第68-69页）。

① [法] 日·姆·施瓦里叶：《工业棋盘》，1980年版，第96页；《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2卷，第103页。

极部分——设备，从1973年的64.6%增加到1979年的70.6%；由于加强了投资的目的性，在六年时间里产品的材料和能源耗量降低了3%左右(见表15)。但是，投资“质量”的改善，也同出口一样，未能抵销整个积累过程停滞的消极影响。总之，1974—1980年周期的轮廓，是由私人资本的增长缓慢决定的。获得利润的前景暗淡、技术进步和生产专业化方向的不确定、国家社会政治状况的复杂性，迫使私人资本缩减投资。

如果1974—1980年间法国在改进生产的物质基础方面表现得不是特别稳定的话，那么相反，在节约劳动费用的经济政策方面，尽管并非一帆风顺，却表现得非常活跃。缩减劳动力费用比重的企图，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根据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安排就业和压缩工资。更加广泛地说是压缩全部劳动收入，以便阻止劳动群众实际购买力和消费的增长。1974—1979年，食品生产各部门的就业人数减少了9.3%，其中非农业部门减少了7.8%，就是说缩减了6.3万人。此外，在劳动市场上还补充投入了大约150万人（基本上是青年）。因此，虽然在交通、服务、贸易和国家机关共增加了110万人，但在后六年，失业人数几乎增加了100万，到1981年中期增加到170万。在同一时期，工业部门每周劳动时间缩减了约2小时，而建筑业减少了约4.5小时①。

在劳动资源利用方面，资本主义式的“合理化”在社会生产效率方面发生了互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尽管降低了生产速度，但在经济领域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它有助于保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2卷，第67页；第3卷，第207页；
[法]《世界报》，1980年6月18日。

持劳动生产率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法国工业部门1973—1979年间，在附加值年平均增长2.8%的条件下，每个就业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而个人一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提高了5.0%①。另一方面，从社会观点看，失业和半失业，不仅是不合理地处理潜在生产力，而且还增加了社会的“附加费用”。从1973年到1979年，对失业者支付的补助金，从4.4亿法郎增加到341亿法郎（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上升到1.4%②）。国家为了帮助企业主人为地把就业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每年花费约200亿法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8%③）。此外，失业率从2.6%增加到5.9%，这可说明：同1973年相比，仅1979年一年“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就少生产了”3.3%④。这样，由失业造成的全部损失构成了所生产的社会产品的相当部分，从而削弱了在各个企业范围内生产合理化的效果。

法国企业主阶级在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合理化”路途上遇到的障碍越大，“合理化”的后果越是矛盾，他们旨在改变价值分配比例来增加利润的努力就更加坚定。应该说，法国资产阶级在“合理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众所周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补偿有两种形式：工资和社会保险基金中的各种津贴。在法国，津贴的3/4来源于企业主的缴款，1/4来源于雇佣劳动者本身。在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得到的全部收入中，

① 见本书表15。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1卷，第92页、217页。

③ [法]《扩展》，1981年，第162期，第6页。

④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91页。

津贴在1973年占23.5%，1979年占26.9%①。可见它的比重在战后趋向稳定的过程中也有某些提高。

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津贴比重上升，相应地工资比重下降，这反映了劳动力费用两种基本形式——工资和社会保险基金提成之间对比关系的改变。企业家极力压低工资水平，以致在1975—1979年间股份公司总的财政资金（剩余价值加各种再分配资金）中工资的比重从47.1%降至45%。同时，社会保险基金提成从15.8%增至16.6%。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提成增加了，但用于劳动力方面的各种形式的企业劳动费用却相对减少了，从62.9%降为61.6%；而全部利润额（包括生产税）却从37.1%增至38.4%（见表19）。

表19　股份公司资金中劳动力费用(占总数的%)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工　　资	45.8	47.9	47.1	46.7	46.2	45.8	45.0
公司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提成	14.1	14.5	15.8	15.9	16.2	16.2	16.6
其它（利润、利息、税收）	40.1	38.6	37.1	37.4	37.6	38.0	38.4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号，第3卷，第36—37页资料计算。

对劳动费用成功地实现节约的结果，是雇佣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例如，工人每月纯实际工资的变化情况是：1976年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36-37页。

+3.1%，1977年+2.5%，1978年+1.6%，1979年+1.4%。其他类型的劳动者——职员、工程技术人员的薪金的变化与此类似①。五年来，股份公司的领导人把公司资金中工资的比重压缩到比危机前还要低的水平上。

劳动者对压缩其生活水准的积极抵抗，1978年3月国民议会选举和1981年4、5月总统选举前夕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扼制了企业主的奢望，迫使统治阶层采用各种社会手段，提高贫苦家庭的补贴，优先增加最低工资，给失业者规定较高（例如同联邦德国相比）的津贴。这些特别说明了，为什么劳动报酬的直接和间接形式的变化存在着差别。这也说明了为什么1978年春巴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从相当严格地控制物价（以促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到定价完全自由化（先是在工业部门，继之在商业和服务行业）。它还说明了1976年秋宣传的"反通货膨胀"行动纲领范围内的变革。由于方针变换，通货膨胀加剧了。这自然就导致了1979年票面收入的贬值。工业部门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在劳动生产率增长6%，以致能够提高利润在销售产值中的比重和资金自筹率的情况下（参见表17），反而停留在1978年的水平上。1980年，工业生产缩减了，而价格比1979年还要高。正如《新观察家》周刊评论员尔·普里列所指出的，这是为了"保住利润"②。1974—1980年整个经济周期内，通货膨胀在法国一直是解决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的主要方式，而这一矛盾则是1969—1973年危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1卷，第32页。
[法]《人道报》，1981年2月20日。

② [法]《新观察家》，1980年，第836期，第26页。

机以前趋势的直接继续。

让我们总结一下：数字表明，七十年代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同样未能恢复前五年被破坏了的再生产价值比例。无论是对过去积累的资本实行贬值，还是在新投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论是根据变化了的世界要求改变生产结构，还是压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过程都没有充分的实现，因而就不能使预付资本的利润率提高到足以使在法国经济中占关键地位的私人企业主重新相信在国内扩大积累的有利前景和甘愿以自己的资本冒险的程度。

不仅仅低利润率是1974至1980年整个周期生产资本积累过程不景气的基础。正如前边指出的，七十年代末期，资金自筹率曾提高到危机前的水平，这表明生产部门公司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财政的好转并没引起私人企业主投资活动的明显振兴。企业主仍然十分谨慎，这是因为：销售市场态势不稳定；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景不明朗；由于高速的通货膨胀，对新投资利润率的预先估计失去了可靠性。然而，法国对私营成分的全部政策，长期以来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借助税收优惠和价格政策来提高利润率，那么就必然会引起投资的振兴。

政府提高利润率本来是指望企业主能利用货币资本提高实际积累，但这个预想在短期内就落空了，因为法国资本家宁愿把他们的闲置货币资金拿去偿还财政欠款，提高自筹资金率和扩大资本输出。

第四节　1980—1981年危机

从1979年末开始，工业生产滞缓、动摇不定的高涨也出

现了中断。在经过每隔二到三个月就有一次非正常（非季节因素）的跌落和高涨之后，到1981年4月，产量比1979年同期降低了8.1%。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了1.1%，而1978年为3.1%。经济评论家一致确认已外于经济危机状态。尽管工业生产下降幅度不大，但谁都不否认已形成的经济态势的严重性。

1980至1981年危机的主要特点是：它与固定资本的积累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就问题的实质而言，1974至1980年法国经济同样没有经过投资活动振兴的阶段。工业投资指数（1973年为100）的变化情况是：1974年为96.1，1975年为85.3，1976年为93.2，1977年为88.2，1978年为86.6，1979年为86.2，1980年为87.0①。与六十年代不同的是，在1974—1980年整个周期里，投资对改变利润率和资金自筹率的反应淡漠，“但却对需求变化垂青”②。

工业生产危机性的缩减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个人消费增长缓慢和极端不稳；世界市场需求的滞缓；石油及石油产品价格的提高。

在1978年停业对工业品价格的控制之后，通货膨胀加剧了。人均实际收入1978年提高了4.8%（扣除税收后），1979年仅提高了1.7%，1980年仅为0.3%③。虽然居民总收入中的存款比重下降了，但1979年和1980年居民消费的增长是缓慢的（1978年为4.4%，1979年为3.1%，1980年仅为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7期，第23页；GAMA，《1980-1981年法国经济展望》，1980年10月，第18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7期，第33页。

③ [法]《扩展》，1980年，第161期，第54页。

1.7%)。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水平也出现了下降①。这样，靠压缩劳动者的收入来提高利润率的企图，在国民收入低速增长的条件下，就导致了消费需求增长的滞缓。这一过程同世界商品市场销售困难的加剧是同时发生的。

1980年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所有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用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的办法来克服困难。这自然加剧了竞争。在竞争过程中，法国不得不在国外市场上有所让步。在同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的贸易中赤字急剧增长，消费品的逆差加大（1973年为120%，1979年为88%，1980年为83%②），出口增长率从1979年的6.5%下降到1980年的3.4%，而进口增长率却保持了高速度（1980年为+5.5%③）：——所有这些都说明法国经济竞争能力下降了。实际上，由法国经济部计算的竞争能力指数，1979年下降了2.8%，1980年又下降了1.2%。三年内，同美国相比法国的竞争能力下降了8%，同联邦德国相比下降了20%④。

石油价格的提高，也同样对法国资本再生产有不利影响。平均计算，每一桶石油输入价格，从1978年的12.7美元分别提高到1979年的18.65美元和1980年的32美元⑤。1979年和1980年间“石油账款”增加了一倍，1980年同1978年相比增加了二倍，达1,120亿法朗或国内生产总值的4.1%

---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91页；
[法]《回声报》，1981年4月8日。
② [法]《回声报》，1980年10月30日。
③ [法]《扩展》，1981年，第162期，第42-43页。
④ [法]《回声报》，1980年10月30日。
⑤ [法]《新观察家》，1980年，第836期，第37页。

（1974年为3.5%①）。同1974至1975年一样，经过垄断价格形成机制提高石油价格，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加速。通货膨胀破坏了需求关系，引起进口商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从而恶化了法国出口商的竞争地位。而出口商又致力于提高国内市场的价格：为了避免恶化自己在国外市场的地位，他们降低出口商品的利润率，而提高在国内市场出售商品的利润率。

1980年国内外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断了1978—1979年基于投资过程缓慢复苏的不稳定高涨。再生产比例（包括消费与积累之间比例）的破坏，牵涉到需求关系的破坏。这表现为价值结构比例失调，后者直到1974—1980年周期末期尚未完全克服，现在又进一步加深了。1980—1981年形成的形势的严重性首先在于，似乎一切必须从新开始，恢复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被破坏的剩余价值再生产迅速扩大的条件。这一点也决定了对于八十年代法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估计。

1980年公布的第八个计划方案，使用了这样阴郁的语句："在大多数法国人一生中，头一次认为，以后的年代将比过去更加艰难。在这方面，他们是正确的②"。计划作者的这个结论，主要是想说明已出现的对于在世界舞台上配置力量的工业发达国家的不利变化。但是，法国本身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在这个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1974—1975年的危机以后，下述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了，即法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应该是通过部门结构的根本改组，通过在国际分工范围内国家经济的坚定不移的专业化，而这种

① ［法］《人道报》，1981年2月5日。

② ［法］《1981-1985年社会与经济发展第八个计划》，巴黎，1980年版，第9页。

专业化的效果首先取决于法国再生产机制在技术和工艺上的深刻改组。在这方面，主要障碍来自私人资本积累规律及其限制，这表现为必须保证私人资本生产有足够的利润率才能进行社会产品的生产。

在克服所产生的困难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拥有一定经济权力的政治上层建筑，似乎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但一直到1981年中，行政机构的作用还明显地软弱无力，因为它们首先屈从于私人资本的利益。国家的努力方向首先是为生产的高利率创造条件，而不是组织最有效、最合理的经济活动。日·姆·施瓦里叶指出："在法国，国家政权试图采取某些有利于工业的措施，但它们仍旧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遇到了强有力的惰性。同时，他的行动也不是基于对危机进行某种总体分析"①。

事实上，七十年代后半期法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特点是，新自由主义的言词和措施与对各领域和部门的统制行动的奇妙结合。这既无助于政策的完整性，也无助于政策的连贯性。八十年代，法国经济面临的任务，首先是要求具有私人资本不能加以充分保证的连续性和确定性。法国左翼力量尖锐地批评了右翼多数派整个七十年代的政策。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经济政治方针。这一方针旨在：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购买力；增加国营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国营企业的数量由于最大的工业企业国有化而应有所增加）；刺激中小企业投资；发展那些至今仍在进口的有竞争能力的产品的生产。在本国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强宏观经济计划的作用。所有这些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加速，消除比例失调，使生产周期性波动得到缓

① ［法］日·姆·施瓦里耶：《工业棋盘》，巴黎，1980年版，第284页。

和，克服外贸和支付平衡方面的逆差。1981年5—6月，左派力量由于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和在新议会中占据多数，取得了实现自己意图的可能性。

·第六章·

对外经济联系

评价对外经济联系的地位和作用，要以考察下列因素为基础：总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结构；国内市场的容量；自然资源状况；自然和气候条件；劳动生产率；熟练劳动力的存在；生产集中程度等。上述因素中的许多因素，在前一章已经作了考察。根据所作的分析，本章我们将考察下列范围的问题：1.法国在七十年代世界经济联系体系中的地位，世界市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新因素；2.外贸结构的变动；3.资本运动中的新现象；4.财政货币问题和收支平衡状况；5.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互利合作范例的法、苏经济关系。

第一节　对外经济扩张的战略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国际分工的深化，生产的国际化，对外贸易和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卷，第255页。

本输出的扩大，——这些就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趋向。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趋向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法国，这一趋向表现得特别矛盾。由于具体的历史发展条件，决定了法国工业资本这一环节的薄弱，这就使得法国长期奉行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工农业免受外国的竞争。只是在五十年代末，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上签字以后，法国领导人才最终决定放弃保护主义方针。

渐渐地，法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分工的深化过程。各界企业主，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大资产阶级，以怀疑、戒备的心情接受向“经济开放”原则的转变。在整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是如此），经济实践逐渐“教育”了他们，使之在社会—心理及经济上理解了上述过程的必然性。

1969年9月22日，蓬皮杜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十分坚定地表达了这种意向，他说：“只是在经营积极性受挫，召致大量失业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才重新关闭自己的国界，重新闭关自守，因此必须沿着发展我们的对外联系的道路继续前进，为了迎接日趋严峻国际竞争而相应地武装自己。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多地生产，而且是按照能够经得起竞争的价格生产。为此，应该发展我们的工业，并使之现代化”①。总统的演说，包涵了至今尚远未完成的行动纲领。1974—1975年危机之后，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纲领的具体内容，七十年代就是在这一纲领的“旗帜”下渡过的。

早在“共同市场”建立后的前十年末，法国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巩固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从1972年开始，它成

① [法]《1969年：经济、社会、政治、外交之年》，1970年版，第409页。

了世界上第四出口大国，超过了象英国这样老牌的贸易大国。按人均对外贸易流转额计算，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居第二位，仅次于联邦德国。按农业出口额计算，七十年代法国仅次于美国，进入世界市场小麦主要供应者行列。汽车出口，仅次于美国、日本。法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军事装备和技术的第二出口大国。

七十年代初，法国出口的专业化主要是在“共同市场”保护性对外壁垒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建立在利用国民经济中已有的相对优势的基础上的（农产品、消费品、装备、起重运输设备等等）。

经过不长的时期，法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明显地增强了。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60年为8.8%，1973年为15.6%，而八十年代初已达20%①。法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工业，在参加对外经济活动方面最为积极。计算表明，工业中出口产品达40%，而农产品只为1/3强。

这样，早在七十年代初，对外贸易已成为法国经济发展中的独立和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头五年，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中的比重从20%增至40%。与此同时，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对外经济领域积累了许多比例失调和其它未解决的问题，它们在1974—1975年危机过程中发生了作用。特别是进口廉价能源和原料的欲望，导致了对国外供应依赖性的急剧增强，法国与意大利在能源的对外依赖的程度上，在共同市场和整个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七十年代头五年，进口保证了国家75%的能源消费，而1960年只为39%。在西

① 资料来源：[法]《全国帐户进出口表格》，见《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7年第59期C、1978年67—68期C、1979年第72—73期C、1980年第86—87期C、1981年第94—95期C。

欧，该指标平均为63.3%①。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这种依赖性仍保持在同一水平上。随着法国参加国际分工范围的扩大，其经济对进口的依赖性总的来说也有了提高。最近几年，进口保证了40%的国内市场的需求，而1970年为33%，1962年只为23%②。

法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积极活动，使得它的对外经济关系在七十年代初主要集中在“共同市场”内部。1973年，共同体占法国贸易总额的55%以上。这就使得法国的销售强烈依赖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行情的变动。

这个时期，法国逐渐丧失了自己几十年来决定其出口专业化的那些消费品市场的地位。在这方面，下述情况起了一定作用，这就是除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传统竞争者之外，在这种市场上又出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竞争者，在这些国家，跨国公司组织了日用和耐用消费品以及某些投资商品的生产。

这样，在七十年代中期，法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进行紧张的竞争。一方面，它要同拥有强大财政、技术资源以资本和科学密集型产品为专业化方向、利用高度熟练劳动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同开始以劳动、材料、能源密集型产品为专业化方向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等）进行竞争。

1974年以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从1960—1973年间的年平均8%下降到4%，迫使法国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了。由于

---

① [法]《塞克菲（secofi）》，1976年，第1721期。

② [法]《法国手册》，1979年，第191期增刊，第5条注释；
[法]《回声报》，1978年4月5日。

危机的震荡和石油涨价，法国贸易平衡出现巨大赤字（见表20）。同时，国家整个国际清算体系遭到破坏，因为贸易平衡状况对它有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对法郎的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对外经济指标的恶化，引起国内当权集团的忧虑。1977年，吉斯卡尔·德斯坦连篇累牍地引证1969年乔·蓬皮杜的讲话，借以说明已形成的形势，他说："我国必须努力适应新的条件，必须指出我们的能源和原料资源不足，因为我们的工业有2/5的产品要到国外出售。法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出口大国，现在它不能自我封闭……"①。

这样，对外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仍同原来一样。与此同时，在解决这个课题的战略方面，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新的因素。根据七十年代中期拟定的称之为工业改造政策的构想（主要适用于对外经济领域，见第二章），也就是所谓"壁龛"政策或"轮齿"政策，法国应当集中力量发展那些既能经受住国际尖锐的竞争，又能打进国外市场的生产。属于这种"轮齿"的首先是：起重运输设备，道路建筑设备，电子技术和无线电设备（无论是军用的，还是生产用途的），能源机械制造（特别是原子能）、采掘、黑色冶金、食品、化学、纸浆、水泥、橡胶工业用工艺设备以及为能源生产、飞机制造、特殊船舶制造需要服务的工艺设备、环境保护设备和成药等。这些部门的某些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已具有强有力的地位，反映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形成的出口专业化。

"轮齿政策"的特点就在于，在加速生产和出口上述商

①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意见与报告版），1978年2月22日，第369页。

品的同时，缩减一系列材料和能源消耗大的生产项目，而许多这样的项目不久以前还决定着法国的出口专业化（如轻纺工业、制革制鞋业、日用器械、黑色冶金、化肥生产等）。同时，国家资本也不完全放弃这些部门，在它们当中仍保留有盈利商品的生产。如，在黑色冶金业，这样的生产有马口铁（法国垄断组织的出口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第二位）、钢管（占第三位）、薄钢版（占第四位）等。这样，就要求由广泛的部门专业化向较狭窄的部门甚至产品专业化方向转变。这是一般的原则。这一原则甚至还运用到在世界市场上最有成效的部门以及主要为出口生产的那些部门。近些年来，这些部门产品的进口订货也增加了。譬如，国内需要的35—40%的道路建筑和起重运输设备要靠从美国、联邦德国、奥地利和日本进口。在出口限额占产量35%以上的化学工业、化学制品的进口约占国内消费的1/4。

因此，“轮齿政策”的实质是在国际范围内向部门内部专业化转移。关于估价经济专业化过程的问题，列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论述。他写道：“这种专业化，按其实质来说，正象技术的发展一样没有止境”①。他还说：“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②。现在，法国的工商界把自己的指望放在了高度专门化的、具有竞争能力的生产上，将其视为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法国公司同国外首先是同“共同市场”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按商品和“商品内”（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的。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国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航空设备、电子计算机技术、各种电子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卷，第84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卷，第161页。

元件、原子能设备、汽车制造等市场上，竞争尤为激烈。因此，与日本那种主要是以纵向联系（以成品换取原料产品，即在跨部门水平上的交换）的方式参加国际分工的类型不同，法国模式可以称之为以横向为主的方式参加国际经济联系的类型，因为它是建立在以部门内分工的基础上的。

除了商业—产品原则之外，新的对外经济政策还包含改变地区方向原则。法国选择了如下一些国家作为对外经济联系的地区变换的主要目标：石油输出国、原料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容量大的北美和远东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法国把希望放在了签定能在若干年内保证本国工业部门的负荷、促使生产结构的改造、提高本国工业威信的合同上。在这些合同中有：在世界许多城市（特别是在加拉加斯）建设地下铁道、建造巨大的建筑群（沙特阿拉伯和象牙海岸），道路建筑（尼日利亚和阿曼）、拦河坝（巴基斯坦）、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卡塔尔）、冶金联合企业（伊拉克）和机场（阿布扎比）等等。结果，随建设工厂而出口的机器设备在法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从1973年的4.6%增加到七十年代末期的25%以上①。

对外经济战略的革新方案，要求重新审查实现既定目标方针。首先，在国家积极影响下，法国垄断组织改变了对于资本输出的态度，它已被视为顺利发展商品输出的必要条件。社会—经济协会的一份报告强调："法国企业在国外工业和贸易方面的积极渗透，是出口方面取得成功的条件"②。

1974年，为继续执行法国在更大范围内参加国际分工的

① [法]《扩展》，1978年，第123期，第104页。

② 《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见报告版），1977年5月3日，第453页。

方针，建立了对外贸易国务秘书处，一年之后又改组为对外贸易部。1974—1981年，法国采取了如下措施：简化了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手续；加强了有关国外市场以及给扩大出口的公司给以优惠的信息体系；重新审查了对外经济关系领域工作干部的培训制度等等。

法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是国家支持本国公司在国外的活动（信贷、补贴和业务保险）。据“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资料称，近几年国家提供的保险补偿了25%以上的国内出口额，而1957年只为4.7%。仅在1974—1977年间，短期业务保险额提高了一倍，而依靠国家的长期业务保险提高了两倍①。出口信贷额占企业所得到的全部信贷额的15%。通过财政信贷和组织手段积极刺激出口业务的专门规划，被列入第七个计划（1976至1980年）之中。

支持出口生产，加强其竞争地位，是七十年代法国调节对外经济联系的显著特点之一。从1974年3月份开始，出口企业支配的国家专门基金为40亿法郎，一年之后增加到70亿法郎，后来又不断增加。从这部分基金中，向企业提供扩大出口业务贷款。虽然最初这些钱主要用于中小企业，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占法国出口大部分的巨大公司的财产。七十年代末，2,000家公司保证了80%的法国出口额，其中500家主要公司占了60%以上②。

为了鼓励部门企业主联盟在国家间接参加下的出口业

① [法]《国际商业官方通报》，1978年，第316期，第10页。

② [法]《观点》，1978年，第323期，第149页；
[法]《扩展》，1979年，第129期，第191页；
《计划总署：1981—1985年第八个计划的筹备（国际经济与对外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巴黎，1980年版，第11页。

务，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制定刺激对外经济活动的规划。特别是这些规划已在机床制造、电力和电子设备、黑色冶金、纺织业、服装生产、牛奶制品、蔬菜、水果生产等行业实现。每年进行的出口企业悬奖比赛，是一种新的刺激形式。从国外销售市场上获取了大量外汇收入的公司成为比赛的胜利者。

总之，法国对外经济刺激政策与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比较表明，就国家支持措施的多样性和数量来看，法国占明显的优势。尽管到处宣扬“经济自由化”和鼓吹竞争的价值，但七十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仍然说明，对外经济领域的国家垄断调节形式却在加强。

在七十年代危机的形势下，法国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免受竞争的损害，采取了极为谨慎的立场。当时国际竞争的尖锐化给它提出了抉择：或者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加强保护性措施，这自然会招致其它国家的反对；或者寻求同未加入“共同市场”的国家相互妥协的途径。当时的法国领导人在1977年5月伦敦“高级”会晤中，选择了更加隐蔽的保护主义方案。他们的意图是，建立所谓“有组织的自由化”，在国际协调的基础上“调节外贸交换的发展”，以抵制许多国家实行的“倾销和压价”政策以及“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破坏本国工业”① 的政策。法国的这种立场极为明显地表现出对外贸易政策中所固有的实用主义。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即：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法国曾是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提供全部特惠而辩护的西方大国之一；七十年代后期，它又成为所谓重点约束从这些国家进口制成品的相

① [法]《扩展》，1978年，第115期，第60页。

当积极的拥护者。

在必要时，法国也不拒绝直接的保护主义行为：除了赞同在它支持或直接倡导下“共同市场”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在这类措施中主要包括：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磁带录音机、肉、各类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实行数量限额；对日本的滚珠轴承、黑色冶金产品的进口实行附加税；实行必须提供产品产地证书的制度；借口制品的标准化或“保护消费者利益“对许多进口商品规定最低价格）外，它还直接破坏了1957年罗马协定，禁止共同体伙伴国的某种商品的进口。在七十年代中叶和八十年代初，法国为限制意大利向法国出口酒而同意大利展开的激烈“酒战”就是例证。七十年代末，法国又对英国的某些畜产品的进口规定了限额。与此同时，法国领导人还把这种措施视为由特殊形势以及“国家生产机构为适应国际竞争新条件”① 的必要性所造成的例外。法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指出：“一个在出口方面占世界第四位的强国不能去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国的危险”②。

与此同时，法国统治集团还利用国家股票，在各式各样的区域和跨国企业中，开展广泛而紧张的活动，不放弃任何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机会。法国赞同建立支持发展中国家主要原料产品出口收入稳定基金（出口收入稳定基金体系），主张扩大对新兴国家的“援助”，1976年6月，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第四次会议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建议，要研究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有关组织联合体合同的可能性，以便在近期内为它们的发展建立起“真正”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8年，第106期，第35页。
② ［法］《扩展》，1977年，第110期，第49—50页。

的推动力，“切实地向它们提供工艺”①。与这些建议紧密相联，法国还提出了“欧洲—阿拉伯—非洲关系”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是：西欧提供工艺和专家，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资金，而非洲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适于开发的自然财富。

为了在实践中实行自己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平衡”关系的政策，法国在1974年初拒绝参加被视为“美国政策工具”的国际能源机构②。很明显，它企图充当两个阵营中间人的角色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按照法国资产阶级集团的观点，这种立场可以因经济和贸易利益而改变。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同帝国主义阵营的伙伴团结起来。譬如，1979年在关于缔结第二个洛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法国相当冷淡地对待了关于增加原料商品数量的提案，而这些原料商品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保证一定收入水平的。

七十年代，法国领导人对西欧一体化问题予以特别的注意。法国是协同工业政策的一贯辩护者，协同工业政策的基础，是在1974—1975年危机之后奠定的（所谓黑色冶金、船舶制造和纺织业的“戴维尼翁计划”，其目的是改变西欧经济中这些巨大部门的结构）。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法国表示赞同逐渐扩大“共同市场”成员国的范围，以便：第一，利用正在展现的渗入到新成员国经济中去的可能性，以有利于本国垄断组织；第二，用以抵制联邦德国在共同体中日益增长的财政经济实力。在货币一体化方面也采取了步骤：1979年3月，欧洲货币体系开始活动。

---

①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见与报告版），1977年5月3日，第452页。

② ［法］《经济问题》，1978年，第1559期，第21页。

苏共中央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总结报告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尖锐化，“争夺市场、原料和能源产地的斗争在加剧”①。在1973—1979年由尖锐及贸易总协定庇护下进行的“东京回合”谈判中，法国所持的立场反映了这一日益尖锐的矛盾。在谈判过程中，法国态度十分坚决，号召“共同市场”伙伴反对美、日复活保护主义的倾向。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特别是因为：在七十年代，法国主要垄断组织的利益同美、日集团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对抗。美、日代表的下述意图引起了法国方面的不满：美、日力图保持比欧洲经济共同体更高的关税壁垒；美国方面要求完全废止出口补贴，统统限制出口业务刺激办法，要求改变共同市场对第三国实行的统一农业政策。法国反对美国用自动实行补偿税来对抗出口津贴的作法，反对美国继续实行关税计价的保护主义方法。1979年，“东京回合”的谈判，达成了妥协性协议。其中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法国提出的要求。事后，密特朗总统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

这样，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特点是：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内广泛地发挥了作用，以促使本国经济适应七十年代后半期建立起的新国际形势。通过考察法国对外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就能够对上述作用的效果做出估价。

第二节　外贸结构的变动

1974—1975年危机的震荡，未能改变法国外贸业务比总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第20页。

的经济发展有超速增长的趋势，尽管增长的绝对指标不太大。如果1959—1973年间出口和进口年平均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为10.3%和11.7%，那么在1973—1980年间仅分别为6.4%和6.5%。但是，危机以后时期外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表现出提高的趋势：1959—1973年间，进口增长额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之比（按不变价格计算）为2.05，1973—1980年间为－2.28；而出口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之比在两个时期分别为1.81和2.25①。石油价格提高以后，法国积极用加速出口和节制进口的办法来清偿外贸平衡中出现的赤字。（见表20）

如上所述，商品出口是法国七十年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七十年代后五年它的作用有了更大提高。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计算，1970—1973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8%，其中有2.9%是由出口保证的；而1973年以后，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8%，其中2.1%是由出口保证的。换言之，危机以后，出口部分地补偿了国内市场的缩小②。

七十年代的特点是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战后长期以来，法国出口结构一直比较落后。譬如，1960年，机器设备比重占17.7%，而整个西欧占30.8%。法国的制成品比重也明显落后，只为45—46%，而整个西欧为65—70%③。1974年，它是西欧国家在“机器设备”项目上唯一有入超的国家。由于制成品比重低，法国出口一吨货物得到的收入要

① 资料来源：[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72—73期，第3卷，第208—209页，1980年，第86—87期，第3卷，第216—217页，1981年，第94—95期，第3卷，第218—219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108期，第8页。

③ [苏]《现代世界中的西欧》，莫斯科，1979年版，第2卷，第40页。

表20　法国对外贸易动态

年　分	1960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流转额10亿法郎												
出　口	33.9	99.6	115.2	133.4	162.5	222.7	227.2	272.6	319.2	357.1	428.0	490.6
进　口	31.0	106.2	109.8	127.4	155.8	242.7	230.4	295.4	332.7	354.4	438.1	551.0
差　额	+2.9	−6.6	+5.4	+6.0	+6.7	−20.0	+6.8	−22.8	−13.5	+2.7	−10.1	−60.4
数量指数（按1970年价格）												
出　口	42.5	100	111.2	126.1	141.9	157.1	154.3	171.3	185.7	197.7	211.5	218.7
进　口	35.2	100	107.7	125.7	145.1	154.9	142.6	172.2	175.7	186.7	207.8	225.3
比上一年增长的%												
出　口	18.0	16.3	11.2	13.4	12.5	10.8	−1.5	10.0	8.4	6.5	7.0	3.4
进　口	13.9	7.4	7.7	16.7	11.5	6.3	−7.5	20.8	2.0	6.3	11.3	8.4

计算根据：［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72—73期，第2卷，第181、195页、第3卷，第208—209页、1980年，第86—87期，第1卷，第56页、第3卷，第216—217页、1981年，第94—95期，第3卷，第218—219页；［法］《新经济学家》，1981年，291期，第47页。

低于联邦德国（130:140美元）和许多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①。七十年代末，法国出口中制成品的比重增加到52—54%，这首先是由于机器和设备的比重扩大到25—27%（见表21）。

但必须指出，“机器和设备”的地位部分地改善有虚假性，因为在这个统计项目中存在武器的出口（火箭、军用飞机、直升飞机、雷达和航空设备、坦克、舰艇等）。在1970—1980年间，法国出口总额增加不到4倍，而武器出口在这一时期却增加了11倍，从20亿法郎增至240亿法郎，相当于总出口额的5%左右。七十年代法国基于自己“全方位”销售原则的出口政策，它出口的武器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譬如，法国垄断组织多年以来在南非、智利和许多其它反动国家有出售武器和生产武器的许可证②。甚至世界市场上最大的武器生产者和军火商美国，在七十年代也经常向法国购置某种武器。近几年来，法国出口的武器有3/4卖给了阿拉伯国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卡塔尔、埃及、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苏丹等。同时，从这些国家进口的石油占法国进口总量的2/3。法国新闻界在评论这种状况时强调指出，“法国的目的，除了使商品进出口取得平衡外，恰恰是为了同自己的石油供货人建立长期、特殊的关系③。

然而，法国机械制造产品的专业化方向到八十年代初还未确定。如果用出口专业化系数（世界机械设备出口中的法国比重同世界总出口中的法国的比重对比）衡量，那么它不

① [法]《回声报》,1975年2月3日、4月22日。
② [法]《经济与政治》，1977年，第278期，第49—50页。
③ [法]《晨报》,1979年7月5日；[法]《费加罗报》,1979年7月31日。

算高。1972年这个系统为0.8，1977—1979年为0.9，而日本约为1.5，联邦德国为1.3，美国为1.13。法国的这个指标处于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水平线上。同时，它出口的产品在技术上往往不那么复杂，发展中国家在这些产品的市场上成为越来越积极的新竞争者。

法国出口的独特之处，是半成品占有相当稳定的高比重。七十年代，法国大力改善了投入外贸流通的生产用制品的构成，并创造它的“改良品种”。在过去的十年里，法国出口的另一个特点是减少了多年以来决定国家出口专业化的消费品（如纺织品、皮革制品、服装生产、化妆品、家具等等）的比重。时令消费品已成为最易“受损害”者，它的销售额相对地而在许多情况下绝对地缩减了。1960年它共占法国出口的26%，七十年代末降为13—14%，出现了有利于耐用消费品（汽车、电机、电子和无线电工业产品）的变化。例如，最近十年来，汽车出口有了迅速而稳定的发展，汽车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1979年达到195亿法郎。

法国出口的另一个特点是农产品和食品比重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出口的这类产品中，法国占13%以上。在现代条件下，粮食的高度自给和大量出口的可能性，将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激烈竞争的重要武器。但是，法国农业出口结构比较落后，其中“大众化产品”（小麦、大麦、玉米、奶制品、糖等）占优势，糖果点心、肉制品、巧克力、干酪、罐头、油类及其他深加工产品的比重不大，平均占18%。而在英国出口中，约占40%，联邦德国占35%，意大利占25%。这就使得法国农产品的贸易不稳定和急剧波动。譬如，由于两年歉收（1976—1977年）法国一度成了农产品的净进口国。

在国际范围内向部门内专业化的逐步过渡（法国以横向形式参加国际分工），使得进出口结构接近。这表现为在进口中机器设备和半成品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机器产品在1975—1980年间占进口额的18—21%，而1950年仅为10%。同时，正是那些出口潜力有所增加的部门（汽车、船舶、飞机制造、机床等设备）进口额增长最快，类似的趋向在半成品贸易中也可看到。半成品在进口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0%增加到1979年的22.5%，1980年已达23.9%。应该指出，法国许多最重要的工业品仍旧依赖于从国外订货。它实际上完全放弃了计算机、航空发动机和某些型号机床，特别是专用机床的生产，因为这些产品主要可从日本和联邦德国进口。由于国家机床制造业薄弱和不发达，机床进口比重占国内消费量的52—54%*。电子设备和精密仪器占56%，农业机械占33%①。总的来说，法国在通用机器制造和电机产品方面是纯进口国。

消费品进口比重也从1950年的5%增加到1979—1980年间的18—20%。在七十年代的法国市场上，此美国外商品的渗透明显地加速了。某些产品，外国公司在法国市场上占据了有力的地位，如：电视机、无线电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家用电器、冰箱、纸张和家具、合成纤维和棉布、针织品、地毯等。这些涌入法国的商品，主要不是来自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借以投机的发展中国家，而是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联邦德国和美国这些工业发达的国家。

---

* 相比之下，日本为10.2%，美国为17.7%，联邦德国为23.2%，意大利为34.1%，英国为43.9%（[法]《经济与统计》，1976年，第67期，第107页）。后来，法国成了西欧金属加工设备进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英国和联邦德国。

① [法]《快报》，1977年，第1342期，第33页。

生产中材料和能源单位消耗的降低，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这也是进口中原料、燃料的比重降低以及这些产品贸易赤字缩小的原因*。石油涨价后的初期，原料、载能体在进口价值总额中的比重，从1973年的24.7%提高到1975年的31.6%。在以后的年代里，价格因素对进口构成的影响逐渐“消散”。但以后的石油价格可能进一步增长，这将重新导致进口价值中能源比重的提高。同时还应考虑到法国商品流转绝对额的增长。在七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完全不同的价值的指标会构成大体相同的比重指标。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能源贸易赤字由1973年的130亿法郎增到1980年的1,300亿法郎①。

法国对非能源进口的依赖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要相对少些。非能源进口在国内消费的比重，八十年代初为55%，而共同体国家平均为75%，日本为90%。但是，个别原料对进口依赖性较强：铜、白金、铅和钨的上述比重约为60%；钴、铬、锡、钼、锌、磷约为70—90%；锑、银、钛、石棉、盐、硼酸、锆、金刚石则为100%。有些原料商品（铁矿石、铁钒土）法国一般还能依靠国内资源满足消费。但一些含铁量高的矿石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进口增加了，它们通过海上运输从巴西、毛里塔尼亚、利比里亚和瑞典运往分布在沿海一带的国家新冶金联合企业。

七十年代，那些出口大大超过进口的商品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这主要是指消费品，其次是农产品和武器。在机器和设备的贸易中持续出现赤字。七

---

* 1831—1850年非能源贸易赤字为出口额的65%，1938年为40%，七十年代后五年只相当于4%（[法]《世界报》，1977年12月7日）。

① [法]《世界报》，1981年3月10、13日。

表21　外贸商品结构(按现行价格；%)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73年	1975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出　　口								
粮食、饲料								
食品	10.8	13.2	15.1	18.7	15.4	15.0	14.4	17.1
原料、燃料	16.2	12.2	7.8	9.4	8.9	7.0	8.0	7.0
半成品	26.5	29.3	26.1	20.5	21.2	24.7	25.1	25.9
制成品	46.5	45.3	51.0	51.4	54.5	53.3	52.7	50.0
其中包括：								
机器、设备	12.4	17.7	23.0	23.6	27.4	24.8	25.0	23.0
消费品	28.3	27.5	26.9	24.9	24.2	28.0	27.4	27.0
进　　口								
粮食、饲料	27.7	20.3	12.8	14.3	13.2	12.6	10.7	12.0
食品								
原料、燃料	46.7	41.2	23.6	24.7	31.6	26.8	28.8	27.8
半成品	9.6	19.1	25.0	18.1	16.5	21.9	22.5	23.9
制成品	16.0	19.4	37.6	42.9	38.7	38.7	38.0	36.3
其中包括：								
机器、设备	10.0	13.9	21.6	24.0	21.0	18.1	17.6	17.9
消费品	4.7	5.4	16.0	17.7	16.4	20.0	20.1	18.4

计算根据：[法]《展望》，1979年6月28日增刊、1980年6月26日增刊第30页；
[法]《统计月报》，1981年，第7期第30—31页；
相应年分的《法国外贸统计》。

十年代末，情况开始变化：机器、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制造业产品和武器在出口中占了首位。“贸易条件”（进出口价格对比）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改善除了能源和农产品之外，其他所有外贸项目对法国都是有利的。

在评价七十年代法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变化时，必须强

调指出：八十年代初，法国成功地改善了出口结构。但是尽管如此，工业产品出口抵偿进口的百分比（122）依旧低于它的主要竞争者：联邦德国（179），意大利（174）和英国（127）①。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动，同贸易的地区配置变化紧密相联。如果把五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法国对外贸易的区域作一比较，就能看到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崩溃以及材料—能源节约型生产的发展，引起象法郎区这种特惠市场作用的降低和“共同市场”国家作用的提高（参见表22）。从六十年代初起，法国力图批准和确定的恰恰是本国经济在共同体市场上的出口专业化新方向。

工农业结构的改造，首先是考虑到共同市场的要求。与此相联系，法国经济对“共同市场”国家供应的依赖也加强了。到七十年初，这种依赖性已超过任何其它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首先是与经济共同体贸易立法的特点相联系，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下述因素决定，即：在1957—1973年这一时期内，与“共同市场”范围内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流转额的比重一直是稳定的。

法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结构性弱点就在于，赤字的主要部分出现在同“共同市场”国家、美国和日本的业务上。1980年，法国同美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荷兰四国的贸易逆差几乎相当于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逆差的总和。在机器和设备的贸易中，不仅同联邦德国、美国、日本有赤字，而且同意大利、瑞典、瑞士、英国、丹麦、荷兰都有赤字。同这些国家的机器和设备贸易状况在七十年代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

① ［法］《法国手册》，1979年版，第191期，第45页，

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出口抵偿进口的比率在七十年代末为70—75%，这同七十年代初的水平一样。与联邦德国的贸易

表22　法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

（按现行价格计算：3%）

		1950年	1957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	进口	21.2	26.0	54.6	47.7	49.0	49.6	49.4	51.5	50.1	45.8
	出口	30.2	31.0	55.6	53.2	49.2	50.7	50.4	52.5	53.1	50.9
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进口	25.0	26.0	21.1	20.1	20.3	20.2	19.7	20.5	20.6	21.0
	出口	17.5	20.2	21.1	22.0	19.4	19.2	19.7	19.2	19.4	19.7
发展中国家	进口	52.5	45.5	21.2	29.3	27.1	26.6	27.5	24.6	25.9	28.9
	出口	51.0	46.0	19.2	30.7	25.6	24.5	25.3	24.1	22.9	24.9
石油输出国组织	进口	12.5	10.1	10.3	18.8	17.2	17.1	16.0	13.8	15.1	18.1
	出口	1.6	1.5	4.7	5.9	8.6	8.1	8.5	8.0	7.2	8.3
法郎区	进口	26.0	23.7	3.5	3.6	3.5	3.2	3.6	3.0	2.8	2.5
	出口	36.0	34.7	5.1	4.7	5.3	5.4	5.5	5.3	5.1	5.4
社会主义国家	进口	1.3	2.5	3.1	2.9	3.6	3.5	3.4	3.4	3.4	4.3
	出口	1.1	2.8	4.1	4.1	5.3	5.6	4.6	4.2	4.6	4.5
苏联	进口	—	1.1	1.2	1.1	1.4	1.4	1.6	1.5	1.7	2.6
	出口	—	0.9	1.6	1.4	2.2	2.0	2.3	1.9	2.0	2.2

计算根据：[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版，第72—73期，第2卷，第181—185页；1980年第86—87期，第2卷，第189页；第3卷，第172—173页；1981年，第94—95期，第2卷，第193页；第3卷，第172—173页。

逆差最大，其逆差项目除机器设备外，还有黑色金属和电子产品。

七十年代中期的危机，是法国对外贸易地区分布演变的转折点，但是，贸易关系方向的转换过程过去和现在都充满了矛盾。法国进入了一个从主要面向西欧市场转向世界扩张的过渡时期。1973年以后，开始缩小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贸易比重，相应提高了同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产油国的贸易比重，并优先转向那些拥有自然财富和具有财政货币能力购买西方技术和工艺的国家。

随着冷静估价世界发展的前景，承认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必要性这种趋向在法国占据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国进出口中的比重逐渐提高了。

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成了法国能源经济、铁路运输、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方面所需的机器、设备的主要购买者。法国在农产品销售计划中，也对这两类国家寄予一定的希望。共同市场对法国农产品的需求，由于其成员国自给能力的加强而缩小。

法国经济结构的弱点阻碍了出口的扩大。尽管它在世界出口额方面占据主要地位，但它在日本的进口中仅占21位，在美国市场上仅占12位，相应只占这两国进口额的0.8%和2%。在制成品方面，法国在美国的进口额中占2.5—3%，而联邦德国占5.5%，日本占12%①。生产用和生活用机器制造系列产品的出口未得到很好发展，是法国对外贸易最薄弱的环节之一。设备的出口主要是输往发展中国家，并且主要是以建造大型（常常是通用的）工业和经济项目时附带供

① ［法］《回声报》，1980年5月9日。

应设备的形式实现的。因此，法国工业对诸如石油开采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这种至关重要的市场的供给，就不够灵活和机动。在这方面，法国出口设备、机器就远不如联邦德国和日本有利。

七十年代，在法国对外经济联系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的“无形贸易”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现在，无形贸易总额已占外贸流转额的30%以上。法国提供的劳务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总的来说，劳务业务进出口经常是顺差（见表23）。但是，在这个行业内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货运总的来说是顺差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铁路和航空运输为国家提供了净收入（1980年为54亿法郎），而“海运”项下的收入还不能抵偿外国舰队的费用（1980年的逆差为32亿法郎）。在对外贸易保险领域也有类似情况。相反，七十年代旅游业务一直保持顺差（1978—1980年为70—90亿法郎）。按其规模，法国在资本主义大国中居美国和意大利之后占第三位①。

在整个七十年代收入动态平衡表中，“私人汇款”一项一直是赤字（近几年为140—170亿法郎），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法国大量使用外国工人所致。1974—1975年危机以后限制雇用外国工人和逐渐减少其数量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私人汇款”项下赤字的增长。同一时期，法国国外财产和经营收入项下的顺差迅速增加（它从1973年的39亿法郎增加到1980年的220亿法郎）。这反映了一个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在国外作业（道路、石油管道、长途通讯体系、医

① ［法］《回声报》，1980年1月17日。

院、港口的建设）的生产收入，股息和贷款利息增加了；另一方面，许可证和专利贸易持续赤字（1980年约为20亿法郎）。如果说六十年代许可证和专利出口抵偿进口的比重有所提高的话（从1959年的70.8%提高到1967年的84.8%），那么以后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2—1973年为43%，1977年为47.9%，1979年为52%①。用于下列项目的开支最大：电子计算机、通用机械产品、药品、石油化工产品、有机化学制品。许可证和专利出口收入的最大部分（68%）是由如下项目保证的：药品、玻璃工业产品、汽车、有机化学产品、通用机械产品（不包括机床和农业设备）、香料和化妆品以及纺织品等。法国许可证和专利贸易支付的主要部分是付给美国（占利用国外工艺费用总额的49%），其次是瑞典和英国。

第三节　资本运动中的新现象

七十年代，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扩大本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和进一步吸收外国资本上。由于法国公司的国外投资成了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它得到国家无条件的支持。国家税务优惠，在国有化的情况下提供国家津贴，财政信贷，这些成了刺激机制的基础。1970年末，对法郎实行了国家政治风险保险。1971—1973年，这种保险扩大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后来又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对国外企业活动提供投资保险和再投资利润保险的部门数量也增多了，这包括石油开采工业，农业等。法国

① [法]《经济与政治》，1978年，第18期，第27页；
[法]《财政统计与研究》，橙皮书，1981年，第376期，第44页。

逐渐把自己的保险制度提高到同联邦德国和美国相当的水平上。1972年，法国首次建立了对本国公司国外投资予以专门财政优惠的机制。

七十年代，法国政府实际上废除了对资本输出的全部限制，因为禁止是无效的。企业主千方百计逃避禁令，把自己的资金转变成股票和证券。从而使增加的主要是证券投资，而不是直接投资。这对资本的运动有不良影响，阻碍了法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

在加速资本输出的同时，法国国外投资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五十—六十年代证券投资占优势的话，那么到七十年代末优势则转到直接投资方面。1970—1979年间，直接投资额从3.74亿美元增加到20.3亿美元①，这就是说，只是在近十年法国的直接投资才达到了比较令人注目的规模。六十年代，直接投资的价值每年很少超过4亿美元。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法国在八个主要资本输出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3.2%提高到4.5%。应该指出，有关法国国外资本数量的资料很不准确并且矛盾很多。据联合国估计，法国直接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初将近200亿美元，而1971年为95亿美元，1967年为60亿美元，1960年只有35亿美元②。

弗·伊·列宁写道："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③。法国当权阶级当时还不能马上理解这一事实。只是

---

① [美]《国际经济指南》，1979年6月号，第76页；1980年9月号，第54页。

② [联合国]《发展中世界的跨国公司：一次新的考验》，纽约，1978年，第236页；
[美]《法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和趋向》，纽约，1980年版，第29页；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见与报告版），1981年2月25日，第93页。

③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786页。

到了七十年代，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哲学”才出现明显的变化。按照官方和工商界的观点，当前扩大商品销售斗争的尖锐性，要求国家的主要公司在巨大市场上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仅仅建立贸易和销售分公司是不够的（顺便指出，这些分公司对法国出口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特别在六十年代），还应当在出卖带有法国商标商品的地方组织自己的生产，“只需用地方色彩稍加掩盖”①。近几年来，社会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也强调指出：“在国外安排生产开辟了出口途径”②。计算表明，法国公司在国外的分号不仅在本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而且还在东道国购买和进口本国的商品和劳务。

七十年代的投资结构，总的来说反映了法国企业主对于控制原料产地、巩固在国外市场上的贸易和财政地位的关心。从1972年开始，1/3以上的国外直接投资用于石油开采和石油加工，1/4以上用于服务行业、贸易，特别是建立信贷、保险和控股公司。同时，七十年代末，重点逐渐转移到在国外设置新的和最新的部门：信息保证和通讯手段、新型能源、环境保护设备的生产等。现在，1/3以上法国直接投资用于加工工业。

法国国外投资的地理配置是随着（在许多场合下是预告）对外贸易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说在六十年代初，几乎有一半直接投资和借款是投在法郎区，那么从六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从七十年代起，工业发达国家成了法国资本的主要投放区。它在法国国外投资中的比重从1968年的1/2，提高到

① [法]《团结报》，1978年4月28日。

② [法]《法兰西公报》(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见与报告版)，1978年7月19日，第781页、1980年2月15日，第183页。

七十年代末的2/3以上。法国投资很大一部分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其比重从1968—1970年的21%提高到1973—1978年33%①。法国在“共同市场”国家及其它西欧国家投资的主要项目是：化学、机器制造、冶金、电子技术和无线电工业、汽车制造业等。法国国外投资的最大部分，集中在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国，也就是法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

七十年代，北美市场引起法国资本的巨大兴趣。在1968—1970年，法国仅有4%的国外新投资投在美国，而1973—1978年已达13-14%，尽管按投资到美国经济中的资金总额（20亿美元）法国还明显地落后于其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伙伴，特别是落后于英国和荷兰，在各投资国中只占第七位②。法国公司极力向美国石油、天然气、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等具有先进工艺的部门渗透。

法国主要投资公司，加紧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不仅仅是为了业务和商业目的；在那些决定其政策基础的动机当中，还有害怕左派掌权以后实行财产国有化这一考虑。还在1974年，巴黎荷兰大财团的首脑解释资本输出时指出：“国际化，就意味着使法国实行国有化在心理上是不可思义的，在技术上是复杂的，……因此，最大程度地国际化，就成为迫切的需要③。

---

① [法]《1971——1975年外国在法国及法国在外国投资的变化》，巴黎，1977年版，第8页；
[法]《1973——1977年外国在法国及法国在外国投资的变化》，巴黎，1979年版，第6页；
[法]《1978年外国在法国及法国在外国投资的变化》，巴黎，1980年版，第6页。

② [法]赫、科芬：《美国市场上的法国企业》，巴黎，1977年版。

③ [法]《团结报》，1978年4月28日。

法国利用新兴国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在历史上形成的与这些国家特权阶级的联系，继续在它的许多原殖民地，首先是在非洲保持了较稳定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主要部分恰恰是投到这里①。法国提供的国家“援助”总额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第二位（1978年为27亿美元，1979年为3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这两年分别为49亿美元和46亿美元），超过了西德（分别为23亿和34亿美元）和日本（分别为22亿和26亿美元）②。六十—七十年代，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法国的“援助”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1962年占1.09%，1970年占0.66%，1979年占0.59%。虽然这个指标和美国（2—0.25%）、联邦德国（0.27—0.44%）、日本（0.2—0.25%）相比保持了较高水平，但它低于荷兰（0.82%）、瑞典（0.88%）、挪威（0.90%）。此外，在法国“援助”的构成方面，主要目的在于刺激法国商品出口的出口信贷有了很大的增长（占国家“援助”的40%以上）。“援助”的这个特点，导致年轻国家的债务增加，七十年代，撒哈拉以南13个法语非洲国家的外债，每三年增加一倍。

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国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经济领域：农业、基础设施和采掘工业。基础设施（公路网、邮电、港口等）的发展，是继国家资本之后的私人资本有赢地开发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必要条件。在法国资本的农业和工业投资方案中，占优势的是出口原料的生

① 详见［苏］Ю·Н·尤达诺夫：《西欧的资本输出》，莫斯科，1980年版，第231—235页。

② ［法］《热带与地中海地区的市场》，1977年，第1755期，第1707—1708页；
［英］《发展与合作》，1979年，第5期，第34页；
［苏］《国外商情公报》，1981年4月2日，

产部门：有色和黑色金属矿、石油、铁矾土、咖啡、可可、棉花，以及建立其产品（配件和部件）能在大跨国公司内部周转的企业。《今日非洲》杂志写道："法国政权在保持传统性的殖民地劳动分工的同时，力图发展与跨国公司现实利益相一致的新分工形式"①。

为了保持在非洲国家中的地位，法国除运用经济杠杆外，还积极利用军事手段。典型的是，在非洲的法语国家中，"某一国家军事潜力的加强，都是和法国"援助"的地域配置分不开的"②。《费加罗》报公开说："我们不能对向我们提供100%铀、100%的钴、72%的锰、55%的铬、33%的铁矿石、25%的铝的大陆的命运漠不关心，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是很天真的"③。

七十年代，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外国资本在本国投资的政策，是以两项官方原则为基础的，这就是"鼓励和控制"。国家千方百计地刺激那种能通过技术工艺改造而加强法国公司竞争地位，促使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和改善国家支付平衡的投资。除此之外，法国还把建立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视为扩大商品出口的手段。在解决地区性的问题方面，也对外国资本寄于一定希望。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对以国家落后的南部和西南地区为基础的外国投资，实行了最优惠的投资制度，向外国资本提供占投资20%的津贴，同时五年内免于征税。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对处于危机状态的法国经济部门（黑色冶金、轻纺和家具工业）和需要优先发展这些部门的

---

① ［法］《今日非洲》，1977年，第8期，第8页。
② ［法］《今日非洲》，1977年，第8期，第7页。
③ 数字根据：［美］《非洲报告》，华盛顿，1977年，第8期，第8页。

企业的地区（特别是北方和东北）的外国投资，实行优惠的制度。为了取得良好的社会舆论，在这些年里，广泛地开展了为外国资本向法国投资的辩护活动。

刺激外国在本国投资，是法国国家政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国外的资金流入有选择地予以控制，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经济与政治》指出："实际上，允许或拒绝外国资本的存在，取决于法国垄断组织在国内外市场的利益和地位……。但是，这一原则不是绝对的。这里，根据不同国家垄断组织之间力量的对比，有可能出现各种妥协"①。

外国资本在法国经济中占据强有力的地位。1977年，75个国家的5,689家公司在法国直接投资②。1965—1975年间，外国投资年平均额增加了两倍，到1978年其累计额（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左右，而1973年只有58亿美元，1967年为30亿美元。据某些人估计，由外国控制的企业生产和进口的商品占国内市场销售商品的1/4以上。这些企业占国内经济全部投资的20—25%③。

在机器制造、汽车制造、电子、石油化工、制药工业等先进经济部门，外国资本具有很大代表性。1967—1968年，在贸易和服务领域也开始加紧采用外国资本，如旅馆、旅游、居民服务行业等。现在，实际上法国没有任何高度发达的经济部门没有外国资本。据工业部的资料，有50%以上的石油

---

① ［法］《经济与政治》，1975年，第250期，第66页。

② ［苏］《国外商情公报》，1978年5月30日。

③ ［美］《法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及趋向》（ST/CTC/14），纽约，1980年版，第29页；
［法］《经济与统计》，1975年，第251—253期，第233页。

和农机生产，约40%的药品生产，30%以上的电子和电气工业，25%以上的有色金属和油脂生产，20%以上的仪表、运输设备和食品工业在外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形成法国和国外资本划分利益范围的某种模式。在国家援助下，总的说来法国垄断组织掌握了有色冶金、金属初次加工、航空、玻璃、纺织、印刷、电力工业以及天然气的生产和分配。西欧资本在黑色冶金、铸件、电子、电机、化工、肉乳制品及糖果点心等工业部门较广泛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美国垄断组织现在控制了30%有国外资本参加的法国企业。它们在农机、运输工具、信息手段及电子设备、计量仪器、药品、石油加工工业方面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

近十年来，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外国投资者的行动有显著的影响。在1975—1978年乃至1981年，国外流入的新投资呈现缩减，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抽回资本。看来，害怕左派力量夺权以及与此相联的国内经济政策的改变，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基础。

整个说来，外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扩大了国家出口的潜力；与此同时，也加重了法国对国际垄断组织的战略和外国技术经验的依赖。正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杂志《经济与政治》强调指出的："法国经济发展方向转移到注重扩大吸收外国资本的价值，指望接近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地位，这最终将导至法国帝国主义的衰落"①。

① ［法］《经济与政治》，1976年，第269期，第74页。

第四节　财政货币问题和收支平衡状况

七十年代，法国为保持法郎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地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尤其在世界货币体系危机的条件下，斗争更为尖锐。由于行情变化多端，可以说，七十年代末同七十年代初相比，法郎同其它一系列主要货币的比值表现出杂乱不一：它同英国的英镑和意大利的里拉的比值有所改善；而同美国的美元、联邦德国的马克和日本的日元的比值有所恶化。1979年末法郎汇价同所有资本主义货币的平均汇价比值比1970年约低10％，比1962—1966年期间平均汇价低近20％。因此，从长期看，法郎汇价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对来说（虽然还不是强烈的）还不稳定这一事实。总之，如我们在前几章所看到的那样，它同其它经济指标的运动是相适应的。

七十年代，以1969年8月法郎贬值为转机，在某些时期，法国商品在一些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提高。终止美元兑换黄金（这宣告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结束）之后，法国在某些时期曾反对自己的货币实行浮动汇价。从1971年8月到1974年3月，为了防止法郎出现不适宜的升值及保持出口的优惠条件，法国开辟了双重外汇市场。对于货币买卖、外贸业务以及国家结算保留了固定汇价，称为“商业法郎”；对于其他所有业务，实行自由浮动汇价，即所谓“财政法郎”。为了维持“商业法郎”的汇价，法国银行不断对外汇市场予以干涉。同时在“财政法郎”剧烈波动时，国家政权也对其变动施加影响。这就表明，国家实际上力图控制所有

外汇业务。上述政策，使1971—1973年两种汇价间的差额缩减到3—4.5%。总之，通过双重市场机制调节外汇领域，有可能扼制投机资本大量涌集，制止“输入”通货膨胀，保持出口者的竞争能力以及改善支付平衡状况。

能源危机、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危机的加深，规定在固定汇率和统一货币—信贷、预算—税收基础上组织欧洲货币同盟的“维尔纳”计划的停止实现，迫使法国放弃法郎双重汇率并向自由“浮动”汇率过渡。第一阶段从1973年3月开始，法国参加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五种货币汇价协同浮动体系。这五种货币是法国法郎、比利时法郎、联邦德国马克、荷兰盾和丹麦克朗。在这些货币之间确定了固定比价，偏离幅度不得超过2.25%。这个旨在调整共同市场国家相互贸易关系的体系被称为“蛇形”浮动。结果，法国双重货币市场的活动条件复杂化了，明显地表现出它在新形势下的低效能，以至到1974年3月底最终被取消。

法国参加“蛇形”浮动不久，很快发现所建立的货币汇价调节机制存在缺点。法郎同未加入“蛇形”浮动国家的货币比值地位迅速改变，损害了法国出口者的利益。1969年由货币贬值带来的积极效果很快烟消云散。此外，法国为了支撑法郎同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等国货币确定的比价，不得不在货币市场上进行积极的业务。1973年底至1974年初，法国银行每天为这种业务损失4,500—5,000万美元，使得国家黄金外汇储备明显减少。1974年1月，法国退出了“蛇形”浮动体系，国家货币实行“自由浮动”。

法郎“自由浮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到1975年7月）产生了货币实际贬值的后果。在汇价普遍波动的条件下，它对贸易和支付平衡状况并没产生明显的影响。尤其是

法郎汇价的降低，在进口能源和其他商品方面增加了用美元和其他外币结算的数额（在法国进口额中，25—30%按美元结算，15—16%按联邦德国马克结算，25%按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比利时和瑞典法郎、荷兰盾结算<各自的比重大致相同>。相反，法国出口额的70%是按法郎结算<(《回声报》，1978年2月6日；《费加罗报》，1979年8月9日)>。因此，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刊《回声报》指出，在汇价浮动的条件下，支持降低了的本国货币汇价，最终会损害本国竞争地位，导致人为地支撑那些法国经济中没有生气的部门，使本国经济所消耗的劳动贬值①。据法国专家估计，法郎汇价每降低1%，就要增加10亿多法郎的外贸赤字。

考虑到出现的新形势，七十年代中期法国金融界重新估计了贬值措施的作用。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它被认为是提高出口竞争能力和限制进口的主要措施之一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正式对法郎进行了九次贬值），那么在七十年代，随着“石油账单”的增加，综合地利用货币和其他调节手段则成了维持出口的“氧气瓶”。

1975年7月，法国曾回到以联邦德国为首的“蛇形”浮动体系；但1976年3月，它又被迫再次退出。无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货币调节机制本身，还是联邦德国在欧洲共同体中的财政、经济、统治，都使得法国领导者作出否定反应。例如在七十年代初，法国再次提出退出联邦德国经济优势不断加强的货币自由浮动体系。前总理巴尔曾强调指出：“货币汇价浮动体系，不能解决经济自由主义者心灵中的问题。它很快证实，许多国家的经济领导者无力维持深深破坏了的平

① [法]《回声报》，1978年9月26日。

衡。我是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固定汇价的坚定拥护者。”①

为了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货币理论，法国政府越来越坚定地建议加速实现共同市场货币—经济联盟，建立新的、同曾使法国威信扫地的“蛇形浮动”根本不同的调节手段。在1978年进行的几次谈判中，法国和联邦德国拟定了共同纲领，并倡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1979年3月13日，欧洲货币体系进入了逐步实施阶段。

欧洲货币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环节，是数量相当于参加国黄金—外汇储备20%的250亿美元货币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抵制参加欧洲货币体系的某一货币受到的投机冲击。同时还规定，在参加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分阶段地采用欧洲货币体系的核算和储备单位——欧洲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

按照法国金融界的观点，这种新体系有可能在西欧范围内稳定货币汇价，尔后，还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把欧洲货币单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此外，法国企业家们也认为，欧洲货币体系为法国的对外经济地位的巩固建立了前提，因为它使法国在该体系参加国当中实现的外贸总额40—45%的结算转到了更加稳定的基础上。上述乐天派还认为，欧洲货币体系一建立，法国就能够改善法郎在货币市场上的地位。

七十年代法国货币形势的特点，是国家黄金—外汇储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额居美国和联邦德国之后，占第三位，它支配着大约1/4的作为“共同市场”国家集中汇兑资金的黄金。

国家外债的结构变化，是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财

① [法]《扩展》，1978年，第121期，第157页。

政——货币政策中的新现象。到1971年，法国实际上已全部偿还了自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短期和中期欠款。它本身不仅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向工业发达国家提供贷款。

能源结算问题的尖锐化、寻找国内长期拨款来源的复杂性，迫使法国企业首先是国有化的企业，必须从国际来源中广泛筹措借贷资金。在这种条件下，法国政府所指望的不是国际机构，而是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某些采油国的资金。

法国政策的改变，是致力于两个目的：一方面，使法国不背上在美国庇护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沉重的债务；另一方面，为了给企业筹款，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即这里的贷款利率往往低于国际财政机构或国内市场。通常，法国国库本身并不借贷，而只是为长期借款担保（达80%）。

国外货币借贷优惠制度，使法国外债（中期的和长期的）从1973年的170亿法郎增至1980年的1,240亿法郎（合250亿美元）①。如此规模的外债，使法国加入了世界最大债务国行列。这样，法国领导集团避免了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导致了一种崭新的依赖形式，即对国际资本市场自发演变的依赖。

与法国外债相对应，其它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对法国尚有数目大致相同的债务（1,000亿法郎以上）。这些资金，是法国银行和国库以出口信贷和所谓“援助”的形式提供给上述国家的，它主要是用于购买法国的机器和设

① [法]《快报》，1978年，第1391期，第44页；
[法]《世界报》，1981年4月10日、11日。

备。然而，如果说法国自身的债务主要是中期的（五年），那么它旨在鼓励大规模出口业务的贷款，则是较长时期的。而且，法国引进的资金主要是外汇，而它的债户得到和偿还的都是法郎。最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困难，使之不能完全和按时偿还自己的债务。近年来，法国不得不勾销经济上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债务。

法国货币状况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改革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问题上的立场。七十年代的法国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它竭力维护本国垄断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同自己的主要伙伴，首先是美国、联邦德国寻求妥协。同六十年代所持的立场相比，法国政府在七十年代对美国方面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

一个最明显的让步，涉及到黄金在国际清算中的作用。1971年，当时的经济和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说明法国六十年代整个时期所遵循的立场时指出："黄金应当在改革后的货币体系中保持中心作用，黄金非货币化的企图失败了"①。但是，1972—1973年官方反映的观点，实质上承认了黄金应逐渐非货币化，使它变为普通商品。同一个吉斯卡尔·德斯坦又这样表述了他的新立场："我们不想为了法国的利益停留在金本位制的思想上，抱住除专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大同意的思想不放，黄金非货币化这一历史趋势是现实存在的，是合理的。"② 按照法国人的意见，"合理"的态度是建立货币的"标准单位"。1972—1978年（欧洲货币体系活动的基本原则制定之前）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被认为是这样的货币单位。

① ［法］《世界报》，1971年12月23日。

② ［法］《世界报》，1973年10月4日。

与此同时，法国从未完全赞同过美国关于改革货币体系问题的立场。特别是法国仍旧主张保持固定的（通过平衡机制加以修改的）平价，主张保持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1975年它单方面决定，按照市场价格定期（一年两次）对本国黄金储备重新估价，从而使它的黄金—外汇储备的票面价值明显提高（从1974年末的370亿法郎增至1975年末的964亿法郎）。其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效仿法国的作法。法国还在1976年牙买加谈判中得到美国的允诺，让中央银行按照自由市场价格买卖黄金，以通过这种途径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销售的黄金。

法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在数量上最充分地反映了它参加世界经济关系的特点。七十年代，它对于本国和世界经济中的变化表现出很大的敏感性。七十年代初，法国对外经济地位有所加强，它的国际收支平衡就表现为顺差；相反，七十年代中期经济遇到困难，国际收支平衡就出现了紊乱（见表23）。

各种项目所形成的状况远非一致。譬如，经常项目收支出现逆差的情况比整个国际收支平衡要更为经常。正如上面已指出的，在七十年代这方面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贸易业务周期性逆差和“国际汇拨”项下的经常性逆差，后者主要是由外国工人从法国汇出的款项。至于反映长期资本运动的项目，那末它的差额所表现的是法国资本输出的强化。1970—1978年共向国外输出了200亿法郎，而输入的外国资本只为144亿法郎，总计逆差达56亿法郎。

在法国国际收支平衡中，“短期资本运动”、“非分配业务”和“错误和遗漏”等项目占特殊地位。短期资本的转移具有杂乱无章和投机性质，它不能视为收支业务平衡的稳

表23　国际收支平衡

（10亿法郎）

	1973年	1975年	1979年	1980年
经常项目	−3.1	−0.3	+4.9	−33.1
商品	+1.5	+5.6	−6.0	−52.3
劳务	+3.1	+5.3	+28.0	+35.3
汇拨	−7.7	−11.2	−17.1	−16.1
长期资本	−5.8	0.0	−21.8	−4.5
其中包括：				
商业信贷	−3.3	−10.0	−16.4	−15.5
直接投资	+0.8	+0.1	+3.2	+1.4
法国在国外的	(−4.2)	(−6.1)	(−8.4)	(−10.7)
外国在法国的	(+5.0)	(+6.2)	(+11.6)	(+12.1)
借款	−0.3	+6.2	−0.5	+17.5
借给别国的	(−1.5)	(−1.5)	(−17.2)	
从别国借来的	(+1.2)	(+7.7)	(+16.7)	
有价证券投资	−2.5	+3.9	−7.0	−6.9
外侨的	(−3.4)	(−2.5)	(−8.1)	
非外侨的	(+0.5)	(+6.4)	(+1.1)	
国家投资	−0.1	−0.2	−1.1	−1.0
短期资本	+7.4	−18.3	+7.2	+15.5
非银行的私人资本	+8.6	+3.5	+8.1	
银行资本	−8.6	−5.2	+7.1	
国家资本	+7.4	−16.6	−8.0	
非分配业务	+2.5	+10.6	+7.3	
错误和遗漏	−1.0	+7.7	+2.4	+22.4

注：十号表示资本输入、债务增加或贷款减少；一号表示资本输出、债务减少或贷款增加。

计算和编制根据：[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19期第66页；
《财政统计与研究》1981年，第376期，第44—45页，55页；
《经济问题》，1981年1719期，第29页；
[苏]《国外商情公报》，1981年9月8日。

定资源。法国领导人主张对短期资本运动实行国际控制，因为各国的保护措施效果不大。政治事件对货币自发地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有强烈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对于国内发生的不利事件的反应，通常是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国外。譬如，在1978年2—3月法国议会选举前夕，资本就开始“外逃”。为了支撑法郎的汇价，不得不动用大量国家外汇储备。1981年总统选举，社会党的领袖取得了胜利。此后在5月的一周内，据证券交易界计算，外逃资本总额达50—60亿美元①。根据某些方面提供的资料，七十年代末法国公民仅在瑞典银行账户上，就存入了4,000亿法郎，这大约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家预算。

为了制止这些不良倾向，法国领导人加强了对货币金融业务的控制。整个说来，到1981年夏秋之间，资本大量外逃及法郎换外币现象，大体上停了下来。

第五节　同苏联的经济合作

七十年代，法、苏贸易经济关系有了明显扩大和加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是法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法、苏贸易额占法国外贸流转额的1.5—2%。法、苏双边关系，对于两国具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互利关系的范例。它们的联系很广泛，不仅包括贸易，而且还包括重要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

早在1922年，列宁就曾指出：“同法国接近，不论接近的程度如何，都是我们非常希望的。特别是因为俄国的贸易

① 《真理报》，1981年5月24日。

利益迫切要求同这个最强大的大陆国家接近”①。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指出：“我们同法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体系……苏、法贸易额增加了两倍。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相互关系，已包括了300多个专题和研究方向”②。

苏联和法国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下述协议和文件：一整套有关政府间经济合作的文件、协议（后者是1980—1985年间签订的）；加强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的长期规划（截止1990年）；议定书及其他一些文件③。

1953—1980年间，苏、法贸易流转额从0.35亿卢布增加到37.527亿卢布，或者说增加了107倍，其中1969年以后增长了.6倍。1975—1979年间，完成了把相互之间商品流转额增加两倍的任务，五年内共计达到90多亿卢布(630多亿法郎)④。尽管近几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受了困难，但双方商品交换额明显地表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1979年4月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见时，达成了1980—1985年间在平衡基础上全力保证进一步增加商品交换的协议（有可能再增长两倍)⑤。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卷，第345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页。

③ [苏]《1965至1976年的苏法关系：文件及资料》，莫斯科，1976年；
[苏] Ю·В·杜比宁、В·Н·甄林：《苏法合作经验(六十—七十年代)》，莫斯科，1979年，第244—249页；
[苏]《真理报》，1980年12月12、14日。

④ 计算根据：[苏]《苏联对外贸易统计汇编（1918—1966）》，莫斯科，1976年版，第66页；
[苏]《1970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年鉴》，莫斯科，1971年版，第12页；
《1980年苏联对外贸易统计年鉴》，莫斯科，1981年版，第10页。

⑤ [苏]《为缓和的物质化而斗争》，莫斯科，1980年版，第118页；
[苏]《对外贸易》，1981年，第2期，第17页、第8期，第3页。

苏联提供的物资，对于满足法国经济方面的稀缺燃料和原料的消费需要，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石油产品，占法国进口的20—30%；硬煤占20%；铬矿石占40%；锰矿石占10%；锯材占15%。苏联成了法国棉花、天然气和许多化工产品的巨大供应者。此外，苏联还向法国出口大量纸浆、有色金属和制成品。七十年代，苏联外贸联合公司同法国公司签订了向法国黑色和有色冶金、石油加工、纺织及其他一些工业部门企业提供机器和设备的合同。在法国市场上，还销售苏联的小汽车、拖拉机、钟表和照相机。

法国向苏联出口的构成中，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占主要地位（40—50%），粮食和原料占10—15%。在机器和设备方面，主要是提供用于装备苏联下列部门企业的成套设备：化学和石油加工工业（近几年来，苏联从法国进口的设备总量中，它们分别占20—25%和15—20%）、汽车制造业（占30%）、造船业（占25%）、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占20—30%）以及其它部门。

七十年代初，为了进一步发展苏联同法国的经济关系，开创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和综合合作的新形式。例如，在工业、科学技术方面开展协作，扩大专利和许可证贸易，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等。仅七十年代，苏联在法国公司参加下就建成了各种工业项目120多个①。

许多项目（其中包括在补偿基础上实现的项目）价值达数十亿法郎。例如，法国公司参加建设的有：布拉茨克的巨大炼铝综合体，卡马大型载重汽车厂；法国公司还向奥伦堡化学天然气联合体第三期工程和世界上最大的乌斯特—伊里姆

① ［苏］《对外贸易》，1980年，第12期，第49页。

纸浆联合厂提供成套设备和转让工艺。上述合同数额之大，是法国外贸实践中前所未有的，法国报刊称之为“世纪交易”。

共同实现的项目，主要在采掘、石油化工、电子技术、日用仪表和其他加工工业部门以及生产广泛消费品的轻工业部门。从长远看，有可能扩大苏联由苏、法两国合作建成的企业所生产的设备和制品（自动电话装置、空气压缩机、集装箱、载重和轻型汽车、印刷设备、日用煤气炉等）的出口能力。

苏联的一些单位也参加了（虽然规模还不大）法国工业企业（黑色冶金、石油加工企业、针织厂设备）的建设。应该指出：法国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一般说来，苏联的机械和动力设备、焊接装置、自动锻压设备、浮式起重机和冶金联动机组、卫星通讯、激光器、量子发生器、气象装置、原子能设备、水翼船舶及其他最新技术产品等进入法国市场有着良好的前景。在西欧，法国已是苏联拖拉机的最大买主。

协作关系也得到逐步发展。下列设备研制的协作特别重要：机床制造业（金属切削和木材加工机床）、电子产品、原子能（特别是两国共同生产原子反应堆的某些部件）、彩色电视机设备（其中包括聚焦栅极显象管）、航空和柴油发动机等。设计和生产新型汽车和拖拉机，是长期合作的重要方面。另外，在钻头、载重运输工具、大功率建筑起重机、水压挖掘机的生产方面，也存在着协作的可能性。

对两国来说最富有成效的经济联系形式，是七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合作。在这个领域，明显地表现出两国科学技术潜力的相辅相成。特别是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期望在所有科学技术进步方面都领先。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根据协商共同研究、与其他公司和科学中心合

作以及共同利用研究成果的性质。优先发展的共同研究方向是：原子能、飞机制造、为了和平目的研究和掌握宇宙空间、环境保护、彩色电视机、信息保证手段、化学、医疗保健、农业、城市建设、运输、半导体和科研仪表制造等。

财政信贷关系，在整个法、苏经济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早在六十年代前半期，法国就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中第一批向苏联出口、提供国家信贷和保险的国家。七十年代，苏联利用的法国信贷总额在200亿法郎以上（30多亿卢布），这就有可能用这些信贷购买法国所提供的设备的2/3。这种业务的拨款条件是有利的：贷款利率在7.2—7.55%之间；苏联方面也按同样的条件规定向法国出口苏联设备的贷款利率①。

有650多家法国公司同苏联各种组织签订了商业合同，其中有下列大公司：贝西纳—犹齐纳—库尔曼公司、克雷兹—鲁阿尔公司、圣哥班—穆公司、拉特—史奈德公司、阿里斯东公司、法国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埃尔弗—埃拉普石油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天然气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其中许多公司有十五至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同苏联当事人进行业务交往的经验。譬如，苏联在机床制造方面的订货量，在七十年代末达到法国机床总产量的20%。1976—1979年间，法国为苏联生产了价值约150亿法郎的工业设备。在法国商业积极性低落和销售市场问题尖锐化的条件下，苏联的订货对改善法国劳动人民的状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法国工商界和政治界的代表，不只一次地强调了苏、法经济关系的这一方面。例如，法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董事长讲道："苏

① [苏]《缓和的物质化：经济方面》，莫斯科，1978年版，第47、49—50、53页。

联的订货可以缓和失业灾祸，因为它能保持象巴黎、南特、埃里萨斯、里昂这些经常遭受危机的工业区的工人就业”①。双方交易和联系的方案大都具有综合性质，它常常包括几百甚至上千个法国公司和企业。总的来说，苏联外贸机构的订货几乎可保证近25万法国劳动者就业②。

苏、法合作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未解决的问题。许多苏联工业品的进口受到数量限制，如某些型号的金属切削机床、拖拉机、直升飞机、电动机、轴承、闹钟等。原则上讲，法国根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协定对苏联商品征收关税的作法，同1951年9月3日协定——法国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相抵触。法国基本上坚持对苏联禁运所谓战略商品。这类商品的种类是根据1949年所建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开列的。所有这些歧视性措施，都是法国参加帝国主义国家闭锁式集团（大西洋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结果。

应该指出，法国企业家和国家行政当局在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方面并不总是追随美国的反苏行径。譬如，1978年，法国拒绝美国当局要法国从政治上考虑不向苏联出售电子及其他现代化设备（特别是向塔斯社提供信息处理自动化系统）的要求。法国工商界机关刊物《回声报》在评述这一问题时写道：“对巴黎来说，苏联市场太重要了，政府可以不理采它（指美国——译者）”③。1980年，在美国急剧恶化同苏联的贸

① 转引自［苏］《伙伴与对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莫斯科，1976年版，第148页。

② ［苏］《国际生活》，1981年，第2期，第140页。

③ ［法］《回声报》，1978年7月16日。

易一经济关系时，法国领导却保持了比较冷静的态度。《新经济学家》周刊在揭示法国立场的内容时指出："准备自我牺牲的法国企业主比美国农场主还要少……。法国经济不具备禁运的本钱"①。

在估价七十年代法、苏合作的成果时必须强调指出：整

表24　苏联与法国的贸易结构（占总数的%）

主要商品	苏联出口				苏联进口			
类别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0年同1970年相比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0年同1970年相比
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	4.9	3.8	1.2	439	54.4	53.1	41.8	405
动力商品	42.1	50.3	84.4	3568	—	—	—	—
其中：								
油和石油制品	24.0	38.9	69.4	5158	—	—	—	—
工业用原料及半成品	35.1	26.6	8.0	422	27.2	28.1	19.1	391
粮食（包括饲料玉米）	10.1	11.5	1.1	162	2.5	8.7	4.7	622
工业消费品	1.9	2.3	0.5	421	10.2	3.7	2.9	151
总计（百万卢布）	126.0	495.7	2242.4	1780	286.8	800.8	1510.3	527

计算根据：［苏］《1970年苏联对外贸易年鉴》，莫斯科，1971年版，第192—196页；
《1975年苏联对外贸易年鉴》，莫斯科，1976年版，第195—199页；
《1980年苏联对外贸易年鉴》，莫斯科，1981年版，第175—179页。

① ［法］《新经济学家》，1980年，第219期，第24—25页。

个看来，它是朝着保证实现两国间国际分工利益的方向发展。1975—1978年，进口额是平衡的，而到1979—1980年间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顺差，并产生了诸如补偿贸易，共同进行工程技术研究等新合作形式。

*　　*　　*

七十年代法国进一步参加国际分工的结果是极其矛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十年内，法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有利的趋向，其商品的输出量超过了英国，牢固地占居了第四位。法国的贸易平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商品结构和对外经济联系的地区多元化得到了改善。自五十年代末以来，法国积极参加国际分工体系的结果，恰恰在最近十年内才开始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它的资本输出明显加强了，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法郎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在有关经济问题的各种国际谈判中，法国不止一次地采取独立态度，这证明在法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仍保持了戴高乐方针的因素。

与此同时，七十年代，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影响法国经济的消极因素。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匀称"①。对外经济联系对本国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增加，没有能解决稳定法国经济的问题。法国没有能长期保持外贸进出口业务的平衡。这一切说明：执行"一切为了出口"的政策（它常常是靠损害国内消费来实现的），本身并不能解决法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下述见解在法国得到广泛流行不是偶然的，即法国生产机体的许多弱点是由国内市场不够发达造成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卷，第276页。

的。人们还提出这样一种意见，法国公司应该把本国市场变为“第一出口市场”，将其从外国竞争者手中夺过来。法国左翼力量，在整个七十年代恰恰坚持了这一思想。

·第七章·

社会阶级结构

第一节　一般趋势

现阶段法国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尖锐程度以及为解决这些社会经济问题而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和规模等问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由战后时期的法国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加以说明。

法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决定了法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不同于其它工业国家的独特性。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九世纪后半期，晚于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它进行得极不平衡，没有触及到许多地理区域和工业部门。统治阶级在价格形成、工资、税收以及对外贸易等诸领域内的政策使城乡小私有者阶层保留了很大的比重。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即在三十年代，法国农业中的就业人数占全部自立人口的36.4%，而英国是5.7%，比利时是17%，德国是29%①。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阿·西格弗里德写道："甚至就是在工业进步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法国按其社会结构来说，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农民、手

① ［英］思·泽尔丹：《1845—1945年的法国》，伦敦，1973年版，第1卷，第171页。

工业者和资产者的国家”①。小资产阶级仿佛是缓和两个主要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中间层。它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后备军。

法国战后时期经济中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法国自立人口成分的急剧变化（见第二章），也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变化。人口增长速度的加快、没有劳动能力年龄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比重的加大，对社会阶级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诸如毕业后青年人的就业、老年人社会保证不够这样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尖锐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人口发展过程有关，尽管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另一个领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雇佣劳动者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急剧增大*乃是战后时期法国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明显特点。1954年他们大约是1,300万人（占自立人口的66%），而1980年则达到1,800万人（占自立人口的84%）②。

大垄断资本对小生产阵地日益加剧的进攻，以及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作用，这些中间阶层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小店主、商人、手工业者、服务行业的小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相反，这些过程却使得一些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

---

① [法] 阿·西格弗里德：《法国政党概况》，巴黎，1930年版，第84页。

* 根据1954年、1962年、1968年、1975年的人口统计调查材料，以及可与上述材料相比的1980年的资料加以考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目前，法国准备进行一次新的人口统计调查，其调查的完整材料将于1983年后公布。

② [法] 日·日·卡里、普·杜布瓦、埃·马兰沃：《法国的发展》，巴黎，1972年版，第77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81期D，第49页。

急剧增长，这些新的中间阶层是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雇佣劳动者阶层，如工程技术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官吏，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教员，等等。

在战后时期，法国农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1954年农业自立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5%，而1980年则仅占8.2%。直到1975年，“离开”农村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家庭辅助成员人数的减少尤为迅速①。在这方面，1962年至1975年这一时期是“创纪录的”——平均减少了10%（见表25、26）。尽管有许多乐观的预测，但农业人口的人数还是没有稳定下来。从1975年到1980年农业工作岗位的数量还是减少到了25万人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离开”农村的速度才有所放慢。1976—1978年，这种“离开”农村的速度的年平均指数对农业工人来说是4.6%，对自立农户来说是3.2%③。

背井离乡的破产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与那些寻求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青年人构成了大批移民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说在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大量腾出来的劳动力被工业和国内工业地区的服务行业所吸收，那么，在七十年代，“离开”农村的速度的加快和失业问题的尖锐化则为居民从农业地区进一步流向工业地区制造了障碍。

排挤城市小私有者阶层的速度要缓慢得多，而且从七十年代末起，一些早先人数减少了的阶层，如手工业者开始有了不大的增长。结果，在从1975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内，城市小私有者的总数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见表26）。

除了无产阶级化的城乡小私有者之外，越来越多的妇女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5页。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81期D，第49页。

③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79年，第72—73期C，第3卷，第200页。

参加生产劳动已成为补充雇佣劳动大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从1968年至1980年，在自立人口增长中妇女占居了3/4；她们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34.9%增长到了39.5%。1968年受雇的男工和女工的总数分别占自立人口的77%和75%，而1980年则分别是82%和85%①。

与六十年代相比，七十年代雇佣劳动力在部门间和地区间的迁徙更加加强了，但发展得十分不平衡。在这里，从各类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及其在自立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各种差别。实际上，在雇佣工作者占自立人口绝大部分的所有工业地区（巴黎和巴黎地区、北方和东南方各省），由于其他阶层——职员、教员、工程师、行政工作者人数的增长，产业无产阶级的比重有所下降。

在战后年代，法国这个昔日的传统的小私有者国家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面貌。1954年国内共有600万以上的城乡小私有者，到1975年，他们的数量减少到了330万人，而到1980年则不到300万人了。在从1954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内，他们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减少了2/3以上②。相反，在这一时期内，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在自立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却明显地增长了（见表26）。

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实质上同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国的类似过程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大大地晚于它们而已。例如，在农业就业人数方面，在三十年代法国几乎落后英国100年。甚至在五十年代，法国的社会结构仍然与意大利和日本的社会结构很相似，意大利和日本保留着比美国和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81期D，第48—49页。

②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76期D，第49页，

英国高得多的农业人口比重，而在美国和英国，劳动力是集中在工业和服务行业。只是在七十年代，在科学技术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就一些基本指标：城乡居民的比例、服务行业的比重、雇佣劳动者和私有者的比重——来看，法国的社会结构才接近于其他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从这些指标来看，法国现在只是稍稍落后于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而超过了意大利和日本。

在考察法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各阶级和各阶层状况的变化以及它们的意识和行为的变化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左派激进主义学者制定了一些解释科学技术革命所赋予社会后果的错误理论构想。在思想政治斗争中这些构想被积极地加以运用。

根据其中一种构想（日益增长着的中间阶级），把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员、职员、高度熟练的工人看作是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能够同中间阶级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手工业者、商贩、农场主团结一致。“日益增长着的中间阶级”构想的拥护者们认为“中间阶级”是稳定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因素。

其他一些被资产阶级学者广泛运用的构想（管理人员革命、技术专家体制）是以这样一个论题为出发点的，即经济权力，一般来说也是所有权，都从资本家手中转到了经理的手中。这种观念的作者们宣称，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根本的改造过程：资本主义正在从私有者统治的社会变成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权力日益集中到管理人员的手中，在经理和普通工程技术人员之间正在建立共同的目的和利益。

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在“后工业社会”里的权力的内容和性质都已改变了的论题，对“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使用

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法国左翼社会学家——的著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按照“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意见，“在大型组织内部得到权力的人和失去权力的人之间的冲突，是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冲突的基础。他们断言，今后，阶级斗争不是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进行，而是在权力和知识、在专家统治论者和专家之间进行①。其他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把工程技术工作人员同传统的中间阶层——农民、商贩、手工业者——合并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②。实质上，这后一种构想乃是资产阶级关于“中间阶级”界限扩大论的变种。

在分析法国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时候，法国两个主要的左翼政党——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社会党的理论家断言，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分量正在下降，因此，它在反垄断斗争中不能起先锋队的作用③。在确定自己的“阶级阵线”口号的内容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者认为与其面向工人阶级，不如面向所有雇佣劳动者，他们并不打算划定一条明确的社会界线来把工人同教员、官吏、工程师、管理人员区别开来。

相反，共产党人在论证自己的“法国人民联盟”的策略时，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领导作用为出发点的。正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C·基安指出：“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阶级，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斗争中的决定

① [法] 阿·图雷纳：《社会的生产》，巴黎，1973年版，第263—266页；
[法] F·邦、M·—A·比尔尼埃：《新知识分子》，巴黎，1971年版。

② [法] 什·博德洛、尔·埃斯塔布莱、日·马莱莫尔：《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巴黎，1974年版；
[法] 恩·普兰查斯：《今日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巴黎，1974年版。

③ [法]《世界报》，1977年6月12—13日。

表25　法国工人阶级(人数及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份额)

	1954年		1962年		1968年		1975年		1980年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农业工人	1,161.4	6.0	826.1	4.3	584.2	2.8	375.5	1.7	285.6	1.3
工业工人①	6,683.2	34.8	7,404.7	38.5	8,236.3	40.4	8,966.1	41.2	8,376.8	39.0
其 中：										
技术员	193.2	1.0	344.0	1.8	530.7	2.6	758.9	3.5	828.5	3.9
工 长	3,053.0	15.9	306.1	1.6	363.2	1.8	443.3	2.0	445.3	2.1
熟练工人			2,286.5	11.9	2,630.0	12.9	2,985.9	13.7	2,994.8	13.9
"专业化"工人	1,816.3	9.5	2,394.1	12.5	2,670.3	13.1	2,946.9	13.6	2,626.4	12.2
壮 工	1,125.3	5.9	1,583.4	8.2	1,597.9	7.8	1,612.7	7.4	1,272.7	5.9
矿 工	239.2	1.2	191.6	1.0	144.7	0.7	73.4	0.3	52.5	0.2
海员、渔民②	54.9	0.3	48.0	0.2	43.3	0.2	38.3	0.2	23.7	0.1
学徒工	201.3	1.0	251.0	1.3	256.2	1.3	106.7	0.5	132.9	0.6
服务行业工作者	1,017.8	5.3	1,047.3	5.4	1,166.3	5.7	1,243.5	5.7	1,386.0	6.5

续表

	1954年		1962年		1968年		1975年		1980年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职　员	2,068.1	10.8	2,396.4	12.5	2,995.8	14.7	3,840.7	17.7	3,682.0	17.1
其　中：										
办公室职员	1,627.5	8.5	1,885.5	9.8	2,371.1	11.6	3,104.1	14.3	2,902.7	13.5
商业职员	440.6	2.3	510.9	2.7	624.7	3.1	736.6	3.4	779.3	3.6
医疗和社会服务业的低级工作人员	100.1③	0.5	110.1	0.6	172.7	0.8	298.5	1.4	403.8	1.9
总　计	11,030.6	57.4	11,784.6	61.3	13,155.3	64.4	14,724.3	67.7	14,134.2	65.8

资料来源：［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5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81期D，第49页。

① 包括运输工人和建筑工人。

② 法国国情调查统计没有将其列入三类主要熟练人员中的任何一类。

③ 在1954年的统计调查中是与教员列为一组计算的；按照1962年统计调查的比例计算。

表26　法国中间阶层(人数及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份额)

	1954年		1962年		1968年		1975年		1980年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新的中间阶层	1,252.7	6.5	1,688.1	8.8	2,156.4	10.6	2,994.9	13.6	3,510.7	16.3
其　中：										
工　程　师	75.8	0.4	138.1	0.7	186.2	0.9	256.3	1.2	308.5	1.4
高级行政人员①	277.2	1.5	377.7	2.0	454.5	2.2	653.8	3.0	801.1	3.7
中间环节的行政人员	534.4	2.8	626.0	3.2	740.2	3.6	970.2	4.4	1,207.8	5.6
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员、科学工作者	80.4	0.4	125.1	0.7	213.4	1.1	377.2	1.7	453.6	2.1
小学教师、辅助职业工作者②	284.9	1.5	421.2	2.2	526.1	2.8	737.4	3.4	739.7	3.4
传统的中间阶层③	6,114.9	31.9	4,961.0	25.8	4,269.2	20.9	3,285.0	15.1	3,135.5	14 6
其　中：										
自由职业者④①	120.3	0.6	125.1	0.6	140.6	0.7	172.0	0.8	199.7	0.9
农　　户①	3,966.0	20.7	3,044.7	15.8	2,464.2	12.1	1,650.9	7.6	1,474.1	6.9
小　商　贩	1,252.5	6.5	1,134.0	5.9	1,026.2	5.1	912.7	4.2	875.2	4.1

续表

	1954年		1962年		1968年		1975年		1980年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手工业者	757.4	4.0	637.9	3.3	619.8	3.0	533.6	2.5	566.7	2.6
小渔业企业主	18.7	0.1	19.3	0.1	18.4	0.1	15.8	①	19.8	0.1
其　他	513.9	2.7	564.0	2.9	525.9	2.6	524.0	2.4	388.2	1.8
其　中：										
军人、警察	297.5	1.6	356.2	1.9	338.5	1.7	348.0	1.6	306.8	1.4
演　　员	45.1	0.2	42.2	0.2	50.2	0.2	59.1	0.3	59.1	0.3
神职人员	171.4	0.9	165.6	0.8	137.1	0.7	116.9	0.5	22.3	0.1
总　　计	7,881.5	41.1	7,213.1	37.5	6,951.5	34.1	6,803.9	31.1	7,034.4	32.8

资料来源：［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5页；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81期D，第49页。

① 包括一小部分属于资产阶级的人。

② 在1954年的统计调查中是与低级医疗和社会服务人员一起计算的；根据1962年统计调查的比例计算得出。

③ 与家庭辅助成员一起计算。

性的社会力量”①。

在社会阶级结构问题和工人阶级在其中的作用的问题上，理论和思想政治分歧的尖锐性，证明在今天正确的分析工人阶级的人数和结构以及正确的分析它同其它阶层的社会联系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迫切意义。

第二节　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

法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导致了它的成分的扩大和复杂化，导致了它的各支基本队伍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化，有大量的职员阶层加入到工人阶级当中来（或者说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

农业无产阶级的人数急剧减少（见表25）。仅1975——1980年时期内，它在经济自立人口中的比重就从1.7%减少到1.3%。在农业中外国工人的就业比重增加了：从1954年的10%增长到1975年的19%②。最近五年，由于政府的限制移民政策，农业工人中外国移民的比重下降了，到1980年降为13%③。

工业无产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在1975年以前，它的人数与中间集团*一起增长，但随后就开始减少。它在雇佣劳动者中间和在经济自立人口中的比重都有所下降，这首先涉及的是低等熟练工人——“专业化”工人和壮工（见

① [法] 克·基安：《社会阶级和法国人民联盟》，巴黎，1976年版，第183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页。

③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1年，第81期I），第73页。

*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中间类型（《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28—229页）。

表25）。

科学技术进步、新技术和新工艺使得对工人一般教育水平和职业训练水平的要求急剧提高了，产生了新的工种。工业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员的人数增加了。

在七十年代，与专业化工人这一类别相比较，熟练工人类别的增长速度是空前的，到1980年，熟练工人无论是按绝对人数，还是按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都超过了专业化工人。

从1954年到1980年，技术员的人数增加了2.5倍以上，他们在所有就业人员中的份额增加到4％（见表25）。在七十年代，在生产、管理和信息诸领域内就业的受过中等专门教育的技术专家和首先是程序编制人员的人数，由于日益广泛地运用电子计算技术，而以特别快的速度增长起来。

对资本的依赖、日益恶化的劳动条件、日益增长的失业的威胁，使技术员同工人接近了起来。与中层管理干部不同，技术员基本上不是执行指挥的职能，而是履行生产的、执行的职能。技术员越来越多地从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吸收成员。例如，根据1970年的调查，40％的男技术员出身无产阶级①。

熟练程度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在那些广泛实现机械化的部门（纺织、缝纫、制革部门）中，低熟练程度的和不熟练的劳动力不断增长。相反，在那些已进入自动化时期的最先进的部门（电子技术、石油化学、原子工业等等）中，对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②。但是，

① ［法］《共产主义手册》，1977年第10期，第19页。

② ［苏］《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工人阶级》，莫斯科，1977年版，第186—190页。

随着能够调整和修理设备并受过专门训练的高度熟练劳动力比重的增长，在一部分自动化企业中，开始广泛地使用一些能够完成半熟练工作的操作人员。在这些操作人员的生产活动中，体力的耗费减少了，但是心理因素的意义增加了，神经系统负担过重的情况更加频繁。

工业无产阶级处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他们承担着经济危机的主要负担，在他们中间失业者的比重特别大。落在工业工人身上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上班路途长这样一些重负比其他劳动者阶层都大。

生产力的发展、法国经济自立人口的无产阶级化、阶级分化的加剧，扩大并加深了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队伍的社会联系。

法国工业无产阶级从各种社会范畴中吸收成员：它的50%的成员是世袭的工人，30%是农民和小商贩的子女①。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范围内，来自低等熟练程度类别的人往往补充到具有更高熟练程度的类别（直至技术员和制图员）中来，但是这种流动通常并不超出工人阶级的范围以外——工人的儿子仍旧是工人②。专业化工人和壮工的队伍是靠离开农村的农业工人、破产的农场主以及特别是青年妇女和外国移民来补充。

同从前一样，正是工业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人数、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组织性和社会积极性而成为反垄断运动的

---

① [法] 德·贝尔杜：《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巴黎，1977年版，第249—250页。

② [法]德.贝尔杜，《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巴黎，1977年版，第22—25页；
[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的特点》，莫斯科，1978年版，第110—113页。

主导力量。

外籍工人乃是工人阶级各种庞大队伍中的一支队伍。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外国移民中间，1978年专业化工人占80％以上，而且64％的人是最不熟练的工人① 。劳动条件最艰苦、最危险、同时又不需要高度熟练程度的那些工业职业，乃是使用他们力量的主要场所*。在建筑、运输、冶金、机器制造诸行业，在服务部门的最艰苦最低贱的行业里，最广泛地使用着外国移民的劳动。1978年对54个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3/4的外国移民在那些只需要三个星期训练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劳动② 。

在最近几年里，外籍居民人数的增长比它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份额的增长要快；根据法国社会学家们的定义，迁居入境本身开始具有更大的“家庭性”③ 。与法国人相比，在法国工作的外国移民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失业的威胁，在就业、劳动报酬和订立集体合同等方面受到歧视，遭受社会贫困、生活水平低的痛苦。

外国移民只指望尽快地得到更多的钱，经常害怕失去工作，在法律和企业主的专横面前感到无力自卫，这些往往在他们中间造成消极冷漠的情绪以及竭尽全力生存下去的愿望。但是随着他们对法国生活条件的逐步适应，随着第二代外国移民人数的增加，那些摆在法国劳动者面前的问题也摆

---

① 《1980年法国统计年鉴》，巴黎，1980年版，第67页。

* 虽然外国移民在工人中的比重只占10.3％，但他们在工伤死亡人数中所占份额却达22％（[法]《研究》，1978年3月号，第344页）。

② [法]《研究》，1978年3月号，第346页。

③ 姆·尔·萨尔蒙：《外国移民具有更多的家庭的特点》（[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2期，第55页）。

在了他们的面前。在他们中间，开始关心社会问题了，他们的社会积极性提高了。因而，为把外籍工人吸收到法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来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人数上仅少于体力劳动者的另一支工人阶级队伍是办公室一商业职员*“白领工人”**。他们乃是日益增长的、不断变化的类别。1954年职员占自立人口的10.8%(200万人)，而1980年则是17.1%（370万人）（见表25）。在这里，妇女占全体职员的66%①。

职员人数的急剧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革命，根本改变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同“白领工人”的脑力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办公室劳动和商业劳动的机械化、计算机化，而采用科学的组织和经营方法，使“白领工人”集中起来实行群体协作办公，使普通职员和工人在许多劳动特点上接近了起来。随着机械化的采用，职员的劳动工序变得简单了，他们的劳动成为更单调、更缺乏主动性和独创性。“白领工人”的劳动也更具有从属性了。职员和工人的劳动报酬水平逐渐接近了起来；工资高于职员平均工资的工人的比重迅速增长。

职员内部的分化也在加深：一类“白领工人”的高度熟练的和有独创性的劳动，同另一类“白领工人”的非熟练的、执行的、缺乏主动性的劳动之间的分化。

随着职员人数的增长，他们的社会出身也发生了变化。1970年，在法国职员中有1/3的人是工人的子女②。工人和

---

* 根据法国通用的术语，只有这些类别(而不是所有的非体力劳动者)才被当作是职员（[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5页）。

** 列宁曾经谈到过工厂雇佣工人和商业雇佣工人（《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24页）。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4－5页。

② [法]德·贝尔杜，《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巴黎，1977年版，第20页。

职员的家庭联系的数量增多了：43%的女职员是工人的妻子，而20%的男职员是女工丈夫①。

如果说男职员占据着那些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岗位(组、处、分支机构的主任、商务经理人，等等)，那么，各种类型的办公室劳动和商业劳动中的非熟练工作在绝大多数场合则是由妇女来完成的。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女职员比自己的男同事们要年轻一些，她们得到的工资比较低，她们得到提升的可能性比较小。她们同工人结婚的情况，要比男职员同女工结婚的情况更为常见。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女职员是同工人们、同他们的出身、劳动条件和收入水平相联系的②。

随着职员状况的变化，“白领工人”的传统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左翼工会活动家A·格拉努写道：“各种新的职员阶层大多不把自己看作是‘白领工人’，这种‘白领工人’的一举一动都服从于资产阶级，力图使自己的孩子们‘向上爬’，并且蔑视身穿工作衫、双手肮脏的无产者……这些新的职员阶层失去了资产者们如此喜爱的‘中等法国人’的形象，不再是服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无阶级界’了。今天，他们越来越经常地意识到，他们同工人之间没有多大差别”③。

法国工人阶级中发生的各种过程——它的界线的扩大、传统队伍（农业无产阶级、矿工）的急剧缩减和新的中间阶层（技术员、办事员和商业职员）的出现、妇女和外国移民

① [法]克·基安：《社会阶级和法国人民联盟》，巴黎，1976年版，第151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22页。
③ [法]A·格拉努：《执政的金融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阶级斗争》，巴黎，1977年版，第135—136页。

大量补充到它的队伍中来——造成两种意义不同的后果。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眼界开阔了，它们的要求水平提高了，新的斗争形式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各支新队伍把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处世态度以及另外一种社会经验带到无产阶级中间来。

但是，在激烈的阶级对抗和政治力量两极分化（这在七十年代后半期是很突出的）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围绕着工业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方针、目的和行为准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①。

第三节　小资产阶级

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变革、垄断资本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巩固、国家的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政策，使得大量的中、小农场破产，法国的农民也进一步发生了阶级分化。

据农业统计调查的材料证明，农民从农村涌出的过程日益加剧，证明中、小农场受到了排挤。1955—1977年，拥有耕地5—10/公顷的农场的数量从21%减少到了14%，而拥有耕地10—20公顷的农场的数量从23%减少到了21%。与此同时，拥有土地面积在50公顷以上的农场的比重却从4%增长到11%②。在这一类农场中，广泛使用雇佣劳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9—260页。

② ［法］《1980年法国统计年鉴》，第167页。

一部分最大的农场，特别是那些能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最大的农场，实质上变成了生产和加工农业产品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它们的所有者则变成了大资本家。他们的企业构成了农工综合体的组成部分。苏联学者们把7—8%的法国农场列为资本主义农场①。法国农民的另一极是60%以上的、拥有耕地面积在20公顷以下的农场。根据法国社会学家们的计算结果，农村的贫困正是发生在这部分土地的所有者中间，特别是如果他们以粗放的形式经营农场的话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壮工家庭的平均收入。那些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最艰苦、完全依赖于银行或完全依赖于土地的实际收入者经常受到破产的威胁，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突出的。

小商业和小手工业经济地位的削弱是城市小商品生产者的发展趋势（见表26）。由于大型超级市场网的增加，这个过程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些传统的部门中——食品、纺织品和针织品的贸易中。同时，小商业开始向那些大众化的和高需求的新商品（皮革服饰用品、化妆用品、体育用品、书籍）方面转化。小商业占全部零售贸易周转额的3/4。服务行业中的小企业（小饭店、小加油站等等）的数量增加了。

手工业者人数的迅速减少与工业中日益加快的集中和积聚有关。主要是在手工工艺、小修理和服务行业中保留着手工劳动。很大一部分手工业者集中在建筑业中。然而，与农

---

① ［苏］斯·恩·纳德尔：《现代资本主义和中间阶层》，莫斯科，1978年版，第121页；
［苏］格·勒·法克托尔：《西欧：农工综合体和农村》，莫斯科，1977年版，第147—148页。

② ［法］《1978年社会资料》，巴黎，1978年版，第399页。

民相比，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表现出明显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毫无疑问，小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缩短了（现在大约是七年）①。但是，很大一部分小企业毕竟还是在竞争中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在小商品生产中开设企业比较容易，这对失业者、工人和职员来说成为一种吸引力。

在七十年代末，失业和保障就业问题的急剧尖锐化，导致了小企业主范围的某种程度的扩大，这首先是在手工业和小商业中②。但是，这些“新的”小业主的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训练和经验，导致他们的企业具有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极度的不稳定性仍然是城市小私有者生存的经常背景。

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使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性质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仍然是机械化程度很低的使人疲劳的劳动。为了增加企业收入，企业主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日，取消休息日和休假。就疲劳程度、工作日持续时间和平均收入水平来说，大多数手工业者处在比某些类别的工人更坏的条件下。小商贩的处境最好，但是他们的劳动条件仍然是很艰苦的，由于政府的价格政策和他们税收负担的加重，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具有下降的趋势。

小私有者们遭到破产或由于某些其他原因而关闭“营生”之后，通常会重操旧业。例如，在改换了职业的手工业者当中，70%的人当了工人③。越来越多的小私有者意识到自己对大资本的依赖性，销售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引

---

① [法] 德·贝尔杜：《人的命运和阶级结构》，第32页。

② [法]《新观察家》，1981年，第852期，第38—41页；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8期，第3—9页。

③ [法]《经济与统计》，1972年，第56期，第17页。

起小私有者的担忧和不满日益增长，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地位不稳。

可见，诸如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这样一些传统经济部门的现代化过程，使得一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成分必定遭到社会的淘汰而日趋无产阶级化，而另一部分则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而成为垄断组织的“奴仆”。因而，作为资本权力社会支柱的小资产阶级的意义降低了。

自由职业者构成小资产阶级特有的而又不断增长着的队伍，根据法国的统计学，自由职业者包括80种职业成员①。在过去的1/4世纪中，他们的人数增加了50%，到1980年，增加到近20万人（见表26）。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从事着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至少需要有高等院校的毕业文凭。但是也有一些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例如，“自立的”护士或助产士）。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对各类自由职业者进行划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从事典型的小企业主式的活动，另一部分人则主持着大型门诊所或律师事务所，这部分人按其地位来说属于中等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

同时，自由职业者的特点是具有独特的社会封闭性，在他们当中实际上没有出身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人。对于“新手”来说，从事自由职业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结果，这个集团的增长速度要比同种专业的雇佣工作者的增长速度缓慢得多。例如，从1968年到1976年受雇的医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从2.5万人增加到5万人），而“自立的”医生的人数只从4.4万人增加到5.6万人。

自由职业者是法国拿最高报酬的集团之一。他们当中大

① ［法］《观点》，1979年，第332期，第32页。

约30—40%的人（5—7万人）具有资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因此，他们接近于统治阶级。

第四节　新中间阶层的增长

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见表26）。科学技术革命一方面造就了一些新型的脑力劳动者，把一些智力职业变成大众化的职业，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脑力劳动的“机械化”，使它更加失去个性，划分得更加细小。

新的中间阶层的主要集团之一，就是工程技术工作者和行政人员（按照法国的术语来说是“干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的人数一直在增长，他们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也增大了。1975—1980年，工程师的比重从1.2%增长到1.4%，“高级干部”从3%增长到3.7%，“中级干部”从4.4%增长到5.6%①。在个别部门中（例如，在化学部门中），“干部”占工作人员的1/4以上，而在电子、原子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中则占60—75%。

无疑，工程技术工作者和管理人员仍然是法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在劳动报酬方面，不仅工人和“高级干部”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相差三倍以上），甚至在“中级行政干部”和

---

* “高级干部”是指那些负责分析和执行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政策的雇佣工作者，他们具有高等院校的毕业文凭；“中级行政干部”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在国家机关、工业、银行和商业部门中执行一定的领导职能。他们领导着银行的办事处、科室和小组，领导着商店的各科和各部，他们在国家的部门中从事行政工作。属于这类人员的还有商务代理、会计、销售方面的专家。

①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1980年，第76期D，第49页。

其他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工作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距①。工程技术工作者和管理人员享有一些专门的特权：社会保险方面的优待、失业时增加补助金、提高熟练程度的权利、不那么硬性规定的工作日、较长时间的休假。这些特权随着升迁而增加。

按其收入（和其他标志）来说，工程技术工作者和管理人员是一种内部差异很大的范畴。例如，“高级干部”集团既包括初级工程师，又包括公司的总经理，而他们的收入比例可以是1∶10或甚至是1∶20。

“干部”特别是中级干部社会地位下降趋势的最明显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劳动的从属性日益加强，——集中到大机关中，以及伴随着这种集中而产生的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劳动活动的内容失去个性。结果，“干部”丧失了“近似于”雇主的感觉。法国社会制度的传统的官僚政治、法国企业主特有的专制主义和父道主义，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尖锐起来*。

随着工程技术工作者和管理人员人数的增长，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达到高层官阶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在他们专业活动中的创造性成分正在缩小，他们的智能也越来越得不到充分的运用。例如，40.4%被询问的“高级干部”认为，他们的知识没有完全得到运用。② 所有这些使得他们对企业工作的兴趣淡薄下来，对事业也不那么忠诚了。

准确地计算出包含在法国资产阶级当中的“高级干部”的人数是十分复杂的：从1975年统计调查开始，许多较低级别

---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6年，第80期，第85页；《经济与统计》，1977年，第91期，第23页。

* 详见：[苏]《世界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莫斯科，1980年版，第167—184页。

② [法] 阿·蒂克：《干部们的运气》，图尔，1974年版，第18页。

的经理（例如，科、室的领导人）都被包括在“公司经理”这个范畴中。在我们看来，在列入“公司经理”栏内的人（1975年大约为15万人）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算作是其职能类似资本家的实际职能、并得到类似资本家收入的高级管理人员。

教育工作者是中间阶层中人数最多而又迅速增长着的范畴之一。从1954年到1980年，初等学校的教员的人数增加了1.6倍以上，中等和高等院校的教员的人数增加了4.6倍。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是由战后的人口爆炸、义务教育年龄的增加（从1967年起义务教育年龄改为16岁）以及学生大量涌入高等学校所决定的。但是，最近几年来，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开始消失了。结果，按照法国学者们的预测，在八十年代，教员特别是高年级的教员的人数将会减少①。整个来说，教育工作者人数的增长，导致了教员成分社会分化的加深，导致了他们物质状况的极大的差异。

新的中间阶层的一支重要的队伍，就是官吏、中级和高级国家职员。尽管他们人数的增长速度比私营部门中的工程技术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增长速度缓慢，到1980年他们人数还是达到了50万人（1954年为20万人）。

在法国行政机构中，根据熟练程度、执行的职能和工作人员配备办法，把官吏分为四类，分别用拉丁字母A、B、C、D来表示*。C类和D类的官吏担负着“专门的、简单的执行”职能。实质上，按阶级地位来说，他们属于工人阶级。

① 《十年中有太多的教员》，载［法］《世界报》，1978年2月15日。

* 详见［苏］普·伊·萨维茨基：《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政府机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9年版，第91—92页；
［苏］伊·姆·布宁：《法国国家机构的社会政治分化》——载《世界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莫斯科，1981年版，第146—161页。

A类的官吏们负责制定总的构想并负责管理（主要标准是高等院校的毕业文凭）。致力于实际实现已通过的决定并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官吏属于B类。B类官吏主要是从中小职员（31.1%）、工人阶级（26%）和农民（13.6%）中得到补充。A类官吏的社会来源带有大得多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来自农民的只占7.8%，来自工人的占14.8%①。

然而就是这一类官吏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活动带有形式上的执行者的性质，只有那些负责的国家职员（根据各种不同的计算，他们的人数为3,000—10,000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能够列入这类官吏的人，或是由于他们属于“重大的国家社团”（参议院、财政监督局、预算委员会、外交使团、省长团），或是由于他们的行政职务（例如，各部的司局长等），或是由于这些官吏在各部办公厅中所起的作用。与其余的A类官吏（他们的升迁是以年龄、鉴定书和服务年限为依据的）不同，政府可以例外地委派负责的国家职员担任许多职务。

如果说在普通A级官吏这一级别上吸收法国行政人员的社会范围有所放宽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没有触及到负责的国家职员。例如，与十九世纪末相比，参议院的社会成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1971年该院88%的官吏出身于各资产阶层②。

高级官吏的学识、升迁途径和可能性等方面的特点，形成了一个少数人担任关键性的政治与行政职务的当权者集团。他们来自法国最有威望的高等学校——高等行政学校和理

① [法] 阿·达尔贝尔、恩·施纳佩尔：《行政体制中的官吏》，巴黎，1969年版，第107页。

② [法] 热·樊尚：《法国人（1945—1975年）》，巴黎，1977年版，第353页。

工学校。在“重要的国家团体”里服务几年之后，他们便被派往各部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或中央行政部门的最重要的局里任职。随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便沿着官阶等级迅速地得到提升，其他的人则离开自己的行政部门，进入“大政治”界，进入到国有化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去，进入到私人资本主义公司的经理处中去。这类官吏与国家职员的基本成员是相脱离的，后者没有希望获得一条通往“上层”和决策中心的渠道，他们注定要实施纯粹的执行的、行政的职能。

在中层国家职员中间，捍卫自己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愿望更强烈了，他们更加向往工会运动。可见，在新的中间阶层中，社会分化加强了，在各类管理人员、官吏以及其他补充到统治阶级中来的（或者追随它的）智力职业工作者同失去自己以往特权的新的中间阶层人数众多的队伍之间正在出现“分裂”。

第五节　资产阶级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法国资产阶级的成分进一步复杂化，它丧失了自己过去的同一性，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分化的过程加深了。根据我们的计算，1975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国内自立人口中所占份额大约是3％（约55万人）。资产阶级的组成包括6万名工业企业首脑（1980年为7.9万人），18.6万名大商人（1980年为22.9万人），7万名大土地所有者，5—7万名主要靠剩余价值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大约15万名执行企业主职能的高级经理。还可以把一些最大的官吏和主要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至少有1万人）包括在资产阶级之列。

垄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使中等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

发生动摇。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为了摆脱经济上的不稳定，中小企业主便加入到垄断组织的生产销售机构中去。根据1975年的材料，在法国有40%的中小企业是靠分包合同生存的。①

国家和垄断组织日益加深的结合，使中等资产阶级逐渐失去与国家联系的许多优惠的渠道，过去这些渠道保证了中等资产阶级的某种社会稳定。虽然中等资产阶级至今所保持的地位仍然很重要，但它在决定统治阶级的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下降了。所有这些过程导致中等资产阶级和垄断上层之间利益的离异和矛盾的尖锐化。

与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垄断上层成员的补充具有更大的帮会性质。一些作者把六十年代末在法国经济上层人物代表中间所进行的调查的材料，同关于其它西欧国家——联邦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状况的材料加以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法国是最闭塞的社会"②。法国社会学家们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日益增长的社会流动性的论断带有神话的性质，他们着重指出，法国统治阶级主要不是靠劳动群众的中间阶层来补充的（从1954年的10%到1974年的19%）③。

统治阶级的特殊阶层——高级管理人员的出现，是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分离过程深化的结果。那些以个体方式经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资产阶级传统集团的人数和比重都下降了，而那些以"团体的"、集体的资本家面貌出现的高级

① 详见［苏］弗·阿·鲁贝：《垄断组织统治条件下的中小企业活动（以法国为例）》，莫斯科，1978条版，第91页。

② ［英］德·霍尔：《欧洲的商业上层人物》（《欧洲商业》，1969年，第23期，第52页）。

③ ［法］《法国的领导阶级》，巴黎，1978年版，第105页。

雇佣经理的比重和人数却增长了。从1954年以来，掌管个人所有的工业企业的企业主的人数减少了1/3。同时，那些被统计列入雇佣工作者范畴的资本家的人数却至少增加了一倍。

形式上是雇佣职员的那些人在法国统治阶级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私有者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经理人数的增长在许多场合乃是一种形式上的法律过程的表现，即：资本家由公司的个人占有者变为公司的雇佣职员（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经理），这或是由于该公司被改造为股份公司，或是由于该公司被其他的公司所吞并。此外，很大一部分经理只是暂时充当雇佣劳动者。作为企业主的儿子，他们归根到底是要掌管“家庭事务”的。

“私有者”和经理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一方面，使企业主和大商人在家庭的收入中，薪金所占的比重（31.8%）正在增大①；另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在私营公司的行政委员会里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加大。例如，1974年至少有43%的高级经理（经调查的510名高级经理）盘踞在工业公司的行政委员会里，有13%盘踞在银行的行政委员会里②。尽管就形式上的法律地位而言，他们是雇佣劳动者，但高级经理，特别是担任经理职务的高级经理却拥有很大一部分股本。高级管理人员以高额的薪水、股票收入、红利、代表津贴以及其他一些津贴的形式，获得自己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资产阶级学者们提出关于所有权同控制权相分离的论

---

① ［法］普·布尔迪厄：《差异　对一种观点的社会批判》，巴黎，1979年版，第152页。

② ［法］《法国的领导阶级》，巴黎，1978年版，第171页。

* 1965年进行的调查表明，46%的高级经理的收入依赖于私营公司的利润（《社会科学通报》，1973年10月号，第88页）。

题，并由此得出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已经改变的结论，这一方面忽视了管理人员权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统治阶级属性以及他们的利益同私有者的利益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忽视了传统的私有者本身的社会面貌的变化。企业主私有者在意识到职业训练对于保持自己在管理领域内的地位的重要性之后，更经常地力求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适当的教育。

高等学校的毕业文凭逐渐成为获得大公司总经理职位的必要（但是还不够）条件。例如，在100家最大的法国公司的董事长中间，从1952年到1972年，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从35%下降到了12.5%①。公司愈大，它的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就愈高。同时，所有权的占有可以加快向上升迁的速度，有时还决定着升迁的最高限度。例如，就在私营部门里担任高级职务的年岁来说，资本家阶级出身的人就比例而言，较大官吏的儿子要年轻一些②。

法国最大的公司的领导人所受教育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提供管理和销售方面必要教育的学校的毕业生的比例增长了。毕业于专科大学的高级经理的比例增长了，这些专科大学的毕业生通常同国家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执政的上层教育水平的提高、它的代表人物们变成“职业”管理家，决定着他们在社会活动各个领域间的流动，使政治官僚上层与垄断组织管理机关最高阶层的结合过程得到了加强。在第五共和国时期，从国家机关向实业界的过渡的情况囊括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团体”：从1958年到1974年，58.1%的财政总监官员、54.2%的参议院议员、33.5%的预算司官员、32.5%的离任的国家公务员，都转到了私营部门

① ［法］《社会科学通报》，1973年，10月号，第73页。

② 《法国的领导阶级》，巴黎，1978年版，第171页。

中去①。这种现象对于高级政治官员来说也是很典型的。实质上，对于官僚上层来说，国家机关只是实业界的前厅。

最新的社会学研究使有可能更明确地把超级上层——大资产阶级上层突出出来。例如，法国社会学家P·布尔迪厄和M·德·桑-马丹根据1978年对最大的公司的216名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出身、教育水平和官阶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把经济上层人物分为"国家的"（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垄断的——本章作者注）经济上层人物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上层人物②。根据他们的统计，"国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常是毕业于有威望的中学，取得了法国最好的高等学校——高等行政学校和理工学校的毕业文凭，来自于作为法国高级官僚制度的人格化的"重要的国家团体"。他们主持着全国性的公司，得到最大份额的国家定货并经常得到国家的支持，他们参加制定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所有会议和委员会。相反，属于"私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列的是"资产阶级王朝"的继承人或者"实业的创立者"，他们没有受过那种上流社会的教育，主持着较小规模的公司，并且无法接近国家权力中心。这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实业资本家"，即只为自己公司的事务操心的企业主。结果，他们常常处在制定"重要政策"的人们的圈子之外。

由此可见，执政的上层人物经常游移于企业界、政治界、国家行政当局和国营部门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执政的上层人物的核心，这些上层人物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从

---

① ［法］普·比恩鲍姆：《国家的上层人物　评法国执政的上层人物》，巴黎，1977年版，第143页。

② 普·布尔迪厄、姆·德·桑-马丹：《企业主》——载［法］《社会科学研究学报》，1978年，第20—21期。

一个统治官级上的指挥者转而成为另一个官级上的类似的指挥者，或者同时身兼几个不同领域的几个关键职务。政治上层人物、高级官员和大垄断组织的领导人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圈并具有共同的社会心理。尽管存在着各种内部不一致，但经济利益上的共同性和出身、教养、教育水平上的共同性，使得法国社会的掌权人物紧密地联结了起来。当然，掌权的上层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它具有自己的自我意识并且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

·第八章·

劳动人民的状况和斗争

第一节　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七十年代，特别是在1974—1975年经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影响下，劳动人民各个不同阶层的状况都经受了艰苦的考验。失业率、价格、税收、社会保险基金费的同时上涨加剧了生活水平的不稳定和无保障。

在七十年代，失业成为最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劳动市场的情况开始明显地恶化了，当时日益加快的一般经济结构变化、在节约劳动的最新技术基础上主导工业部门的改造、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的条件下日益加强的生产集中，恰逢各种有劳动能力的适龄青年和妇女大量涌入劳动市场的前锋。同时，不仅劳动力的数量在供求关系上存在着矛盾，而且它们在结构、质量上的彼此不相适应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结果，一面是失业，另一面是符合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所要求的新技术或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则严重不足。1973年，即经济危机的前夕，在有大量空闲岗位需要就业人员的情况下，失业者的总人数却接近于40万人。在经济危机时期，即使根据官方大大缩小了的材料，失业人数也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85万人，并且随后在七十年代后半

期经济行情出现了某种尽管还是不稳定的复苏的情况下，失业人数仍然一直持续增长，表27中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把失业增长仅仅同经济危机的影响相联系是错误的。失业者大军人数保持在200万人左右，这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不仅有行情方面的，而且还有长期性的因素，它们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表27　法国失业情况的变动

年　分	千　人	%①	年　分	千　人	%①
1950	153	0.8	1974	488	2.4②
1955	160	0.8	1975	840	3.9
1960	131	0.7	1976	933	4.3
1965	143	0.7	1977	1,072	4.9
1970	262	1.3	1978	1,167	5.1
1971	338	1.7②	1979	1,350	6.0
1972	384	1.9②	1980	1,451	6.1
1973	394	1.9②	1981	2,016	8.6

资料来源：［联合国］《劳工统计年鉴》，1957年、1966年、1972年、1975年、1977年、表10；
［联合国］《月统计月报》，1979年12月；
［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数》，1982年1月，第116页。

① 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份额。

② 不包括临时解雇的人。

第一，从1974—1975年危机时候起，许多工业部门（黑色冶金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等等）的改造加快了，伴随着这种改造的是许多在垄断组织看来无利可图的企业被关闭，工人和职员被大量地解雇。从1974年到1978

年，他们的人数至少减少了50万人①并且还在继续减少。

第二，法国国内投资的低水平，以及大企业的首先是跨国垄断组织的政策也影响到失业情况的变化，这些垄断组织把“资本逃脱”到政治气候对它们更加合适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节约劳动的技术，包括机器人和微电子技术的运用，以及垄断组织千方百计增加就业人员工作量的做法，减少了即使在危机结束后失业水平下降的前景。如果说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法国是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的话，那么，从经济危机时候起，它便“赶上了”意大利的水平，尽管还落在英国的后面，这一点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证明（见表28）。

表28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在经济自立人口中所占份额(%)

国别	1963—1973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法国	2.2	3.9	4.3	4.9	5.1	7.8	8.4	8.6
意大利	3.5	5.9	6.7	7.2	7.2	7.7	7.6	8.1
联邦德国	0.6	4.7	4.6	4.5	4.3	3.8	3.8	4.8
英国	3.1	4.1	5.7	5.8	5.7	5.4	6.8	10.4
美国	4.6	8.5	7.7	7.1	6.0	5.8	7.1	7.3
日本	1.2	1.9	2.0	2.0	2.2	2.1	2.0	2.3

根据相应年分的［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数》计算得出。

在国内还有几十万由于缩短工作周而造成的不充分就业

① ［法］《经济问题》，1978年，第1603期，第21页。

的人。1975年他们大约30万人。在有所下降——1976年下降到13.3万人——之后，半失业者的人数在1977年又重新增加到20.3万人，而在1981年初达到了近42.2万人①。此外，还有各种经常非全天工作的和临时就业的庞大队伍，关于他们的状况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在法国出现了一些真正的“贫穷地区”，这些贫困地区，失业水平比平均失业水平高得多，而且在实际上没有可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在危机时期，失业一开始就特别明显地涉及到国家西部、西南部和南部的落后地区，在这些地区，在此之前失业率就已经相当高了。随后，巴黎地区便不再从法国的其它地区“吸收”劳动力了，因为巴黎地区本身也变成了产生失业的地区之一。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黑色冶金业、造船业和纺织业等）日益加快的改造，使得失业严重的地区的情况更加严重。在诺尔老工业区，从1975年到1978年，失业率几乎提高了38%，在洛林地区提高了64%，约占经济自立人口的7%强②（全国的平均数为5%）。在其他的一些“贫穷地区”，失业率要稍微低一些③。

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几乎一直在不断地延长：1976年是2.6个月，1977年是9.5个月，1978年是10.4个月，1980年是11.7个月，而且几乎有30%的失业者失业一年以上，12%的失业者失业两年以上④。妇女、老年工人、非熟练工人或那些技术不合用的工人，以及“贫穷地区”的劳动者找工作所

① [法]《工运》，1979年3月22日，第12页；[法]《世界报》，1981年5月30日。

② [法]《新工厂》，1978年11月30日，第92页。

③ [法]《人道报》，1979年5月16日。

④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18期，第23页；1980年第126期，第8页；[法]《人民报》，1980年2月16—29日，第10期。

花费的时间更长。

如果说在1974—1975年经济危机以前遭受到失业的主要是非熟练和半熟练（专业化的）的工人和职员，那么，在危机时期以及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失业则涉及到很大一部分熟练的工人和职员，这正如表29所表明的。

在1973—1980年这一时期内，在所有失业者中间非熟练工人比重的急剧下降，首先标志着在进行工业企业和服务行业改造或建设时保持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实际的需求量。此外，外籍工人涌入人数的减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外籍工人中间主要是非熟练工人。然而，熟练工人和“专业化”工人中间失业人数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生产的深刻改造，反映出自动化、微处理机、程序控制机床、新工艺和新生产规程的采用，这使得许许多多旧的类型的熟练工作被消灭掉。这在更大的程度上关系到职员和行政人员的劳动。管理劳动环节的合理化和减少，把技术运用于办公室，不仅使大量非熟练职员，而且也使大量熟练职员和一部分行政人员成为不需要的人，在他们中间有不少工程师和技术员，特别是专业已过时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就象雇佣劳动者的其他范畴一样，工程技术工作者和行政人员中的失业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失业的工程技术工作者和行政工作者很难找到新的工作，他们找工作花费的时间不少于九个月，即比所有失业者找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长，这是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专业十分狭窄，只适合某些企业的专业需要①。

垄断资本的就业政策最严重地影响到青年，特别是第一次找工作的青年。尽管25岁以下的人占经济自立人口的不到

① [法]《新工厂》，1978年10月30日，第77页。

表29　失业者的职业熟练程度结构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非熟练工人	65.0	16.5	79.3	15.9	119.3	14.2	103.1	11.0	106.3	9.9	104.8	9.0	118.8	8.1	133.3	8.2
专业化工人	74.2	18.8	86.2	17.3	157.3	18.8	177.9	19.1	205.4	19.2	222.2	19.0	269.3	18.3	288.0	17.5
熟练工人	52.2	13.2	68.8	13.8	146.6	17.5	156.4	16.8	184.0	17.2	217.7	18.8	261.5	17.8	335.1	20.5
非熟练职员	67.4	17.1	88.5	17.8	127.5	15.2	143.5	15.4	160.5	15.5	167.7	14.4	232.0	15.8	263.8	16.2
熟练职员	94.8	24.1	125.0	25.2	207.1	24.7	258.5	27.7	309.2	28.7	337.9	29.1	451.8	30.8	477.4	29.3
技工、技术员	15.7	4.0	20.1	4.0	33.7	4.0	37.5	4.0	42.1	4.0	43.9	3.8	50.7	3.5	51.5	3.2
行政工作者	20.6	5.2	25.0	5.0	39.7	4.7	47.2	5.0	53.5	5.0	57.0	4.9	66.7	4.5	63.3	3.9
其　他	4.06	1.0	4.83	1.0	8.63	1.0	9.46	1.0	10.5	1.0	11.2	1.0	18.1	1.2	19.6	1.2
总　计	393.9	100	497.7	100	839.7	100	933.5	100	1071.7	100	1166.9	100	1469	100	1632	100

备注：表中数字都是每年的月平均值。

资料来源：［法］《统计月报》，1975年、1976年、1977年、1981年，第10页。

20%，但是他们当中的失业率达到了40—50%①。然而，每年有60—65万以上的适龄男女青年离开学校参加到劳动生活中来，而且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根本没有受过必要的职业训练②。缺少必要的职业训练注定要遭受失业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获得低薪的非熟练工作，主要是临时性工作。资本主义社会对青年的劳动安置没有准备。在七十年代，青年的失业问题具有如此之大的规模，以致成为法国社会中有产生严重社会政治后果危险的最大丑事③。在这种条件下，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安置青年工作，对青年进行职业训练，扩大企业中就业人员再培训制度。

1977—1979年，政府同法国雇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之间曾缔结了三个“全国就业条约”，这三个条约首先涉及到的是青年以及一些类别的妇女。根据这些条约，规定对为青年提供工作机会和保证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训练承担义务的企业，给予大量的财政援助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从1977年7月1日至1978年2月28日有效的第一个条约包括了50万人，第二个条约（从1978年7月1日至1979年3月31日）包括了25万人，第三个条约（1979年至1981年）包括了45—50万人④。法国工会公正地批评这些条约根本没有保障就业，而是为企业主们提供了优先权，使他们能够进行狭窄的、只符合企业直接需要的职业训练，此外这些条约对

---

① 《经济社会理事会的通告和报告》——载［法］《政府公报》，1977年11月12日。

② ［法］《展望》，1979年3月1日，第9页；
［法］《人道报》，1979年1月10日；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7月，第70页。

③ 《展望》，1979年3月1日，第9页。

④ ［法］《费加罗报》，1979年5月30日。

国家中学训练拨款造成了损害。这三个全国条约的开支为158亿法郎，其中只有62亿法郎是企业主们拨出的①。大多数附带职业训练条件的见习人员和合同雇工，在合同期满之后也加入到失业者的行列中。

企业中学徒工的状况也并不好，这些学徒工的学徒期为一至三年。1976—1979年学徒制度大大地膨胀了起来，学徒制度使企业从国家拨款中得到了不少的好处，使企业能够以极低的工资（占可增长最低工资*的15—45%）使用青年的劳动力②。在这里，与见习一样，学徒也绝不是保证能找到工作。例如，1976年，获得“职业适用”文凭和获得更高的“职业教育”文凭的人，有1/3在毕业后至少失业十个月。许多获得这些文凭的人只得到短期的临时性工作。与中等技术学校（只有40%的学生可以获得毕业文凭）相比，企业职业训练的水平更低一些，这就给受过企业职业训练的青年的工作安置带来了不利的影响③。

数万名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状况也是很困难的。根据法国报刊的资料，七十年代后半期，化学、生物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内各专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中，近28%的人失业，20%的数学家、程序编制员以及电子学和机器制造方面的专家失了业④。

在法国，除了失业以外，就业的普遍不稳定也大大加剧了，这种就业不稳定是以这样一些形式表现出来的：临时性的工作、不充分就业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不保证固定工作的见

① [法]《展望》，1981年2月19日，第1页。

* 可增长最低工资，即最低工资额。

② [法]《新法兰西》，1979年3月19日，第26页。

③ [法]《经济问题》，1978年第1603期，第23页。

④ [法]《经济问题》，1978年第1603期，第23页。

习和学徒制度。从六十年代末起，法国的企业主们就开始更广泛地使用临时性雇工来完成紧急订货、进行企业建设和重新装备，而在商业领域内，则主要是在重大节日、学年开始之前以及季节性拍卖时使用临时性雇工。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大公司，它们从事为企业提供临时劳动力的中介活动，是临时劳动力的雇主。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时起，这种新的临时工作形式（同时是一种潜在的失业形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流行。在法国，每年有80万人至100万人(而在1980年是200万人）得到时间长短不等的断断续续的工作，最经常的是三个星期到一年的工作，而他们当中最多不过10%的人能够在这以后得到固定的工作。平均至少有18万人从事一天的临时性工作，而从事一定期限的合同工作（即不是固定的工作）的人计有120万人①。

七十年代末，在许多大公司里，都出现了减少固定工人和职员，首先是从事辅助工作的固定工人和职员名额的明显趋势。例如，最大的跨国康采因“罗尼—普朗克公司”在其纺织企业中，仅1977年一年就雇佣了70.7%的为期仅一年的工作人员②。

根据法国总工会的材料，1978年在冶金工业中，有一半的雇佣是根据限期合同，而不是固定工作合同来实现的③。集体合同不适用于临时工作者，不必向他们支付解雇补助金

① 见［苏］B·B·柳比莫娃：《法国：对就业、失业和工资的国家调节》，莫斯科，1976年版，第90—96页；
［法］《展望》，1978年3月8日，第17页；
［法］《人民报》，1980年2月16—21日，第12页；
［法］《经济与政治》，1980年第310期，第50页；
［法］《世界报》，1981年5月30日。

② ［法］《选择》，1979年6月20日，第15页。

③ ［法］《展望》，1979年3月8日，第21页。

和工龄津贴，等等，这样一来企业主便减少了劳动力的开支。十分明显，这严重地损害着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劳动者的利益。况且，根据企业主们的估计，大约30%的临时工的工资是在可增长最低工资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在临时工当中的低薪工作者的比重，至少比全体雇佣工作者中低薪者的比重高六倍①。临时雇工制度不仅加剧了工人就业的不稳定，而且也加剧了许多办公室职员、技术员、工程师的就业不稳定性和他们对明天没有信心的情绪。

延长试用期和各种见习期的做法（在学校毕业后或者在把见习同企业的职业训练相结合的情况下），越来越经常地为企业所采用。因为许多公司都只是雇佣青年工人和职员做临时性工作，而且只为他们当中的很少一部分人保留固定的工作，所以，在所有临时工作者当中，几乎50%是年龄为18—25岁的青年，就不足为奇了②。

以各种形式推广临时性工作的做法，不仅加剧着就业的普遍不稳定和失业，而且也成为工会工作的一个重大障碍，按照《展望》杂志的说法，这使得企业中的“劳动集体发生动摇”③。

法国工人阶级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甚至就是在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困难条件下它也仍然保持着这种战斗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工资政策，使它们不得不把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同在物质上做一定的让步结合起来。

在七十年代后半期以前，法国统治集团采用了五十和六

---

① ［法］《人民报》，1980年2月16—21日，第12页。
② ［法］《新工厂》，1979年4月19日，第80页。
③ ［法］《展望》，1979年3月8日，第21页。

十年代就已形成的一些在限制通货膨胀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增长工资和社会津贴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在经济发展的国家指示性计划中规定提高工资的上限，通过定期修订“可增长最低工资”来直接调节低薪劳动者的工资，通过官方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价格（通常被大大降低了的）指数来间接调节所有工资，工资应该以这种官方消费价格指数的摆动为基准，尤其是在签订集体合同的时候更是如此。与工资领域内的政策紧密衔接的还有这样一些方法；如：“关心企业事务”的奖金制度，以及从1969年起实行的对企业利润和企业自筹资金的义务“参与”，这种“参与”的数额是很微不足道的。

尽管七十年代初国家干预对工资和社会津贴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即把生活费用的上涨计算在内）的变化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它还是没能采取象英国和荷兰那样的明确的“收入政策”形式。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会对类似政策持否定态度，阻止了这种政策的实施。此外，在失业日益增长的同时，还存在着新职业高度熟练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这使企业主，特别是工业主导部门中的企业主不得不规定出高于国家方针所允许的可增长工资极限的工资额。一般说来，企业主同意给新职业高度熟练工人、技师、技术员、调整工、修理工等以及管理人员提高工资，但对于非熟练工人和职员，特别是对于妇女、青年和外籍工人则保持着低工资。

妇女的工资平均比男人的工资低33.6%①。总的来说，妇女大多是低薪工作者；例如，在1977年，在领取可增长最低工资水平工资的70万名工人和职员当中，妇女占52.3%。

---

① 法国雇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企业主》，1978年7—8月号，第27页。

在劳动报酬方面，青年也受到歧视；许多青年人的工资还不及成年工人工资的一半，而最年轻的青年人的工资只有成年工人工资的1/4。如上所述，从事生产劳动的学徒工得到的工资更是微薄得很①。老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通常也比中年工作者的工资低，只是高级行政人员和某些专家例外。

在七十年代前半期，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对不同类型的工作人员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企业、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工资水平是很不相同的。特别是在缝纫、纺织、制革、造纸工业中存在着许多低薪的工人和职员，在这些部门中女劳力的比重是很大的。尽管这些部门中的一些部门（造纸、缝纫），在集体合同中保留了一些“浮动工资率”的成分（一年两次重新修订工资，或者在物价指数上涨的情况下每季度稍微提高工资的1%），在七十年代，这些部门中的总的工资水平仍然大大低于象石油加工、电机制造、电子工业以及一些化学工业等部门的工资水平。

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几年中行情的极度疲软和不稳定的复苏，引出了1976—1978年四个“巴尔计划”中规定的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国家调节措施体系（见第四章）。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巴尔计划”首先意味着遏止名义工资的增长，随后就是降低实际工资。尽管如此，这些计划，尤其是第二个计划（1977年4月），同时都规定了以提高可增长最低工资和实行部分家庭补贴的方式，部分地提高居民低薪阶层的购买力；但是物价的上涨把这种提高缩小到了最小的程度。提高可增长最低工资对低工资产生的一些积极影响，明显地减弱了；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在一些类别的

① ［法］《新法兰西》，1979年3月19日，第26页。

雇佣劳动者中间，例如在女壮工中间，最低工资的增长略高于可增长最低工资，而在其他各类雇佣劳动者中间，最低工资仍旧低于可增长最低工资，这反映出政府避免各类劳动者工资“自动”提高的意图。例如，1978年7月，提高可增长最低工资整个来说涉及到了大约4%的工人和职员，但在一些服务行业的部门中则涉及到了10%到33%的人①。在随后的几年里，工资在可增长最低工资水平线上的人数没有发生变化②。同时，根据官方价格指数计算，实际可增长最低月工资（把工作持续时间和社会基金费用计算在内），从1974年7月到1979年1月仅增长了2.3%，而根据法国总工会的更完整、更准确的价格指数计算，则减少了9.6%③。因此，政府所公布的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实际上变成了抑制最低工资，而随后就是降低最低工资。

“严厉限制”政策对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要比对物价的影响大得多。根据官方的指数，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0月，物价几乎上涨了20%，实际月工资总额只增加了2%，而净实际工资（扣除所得税并加上家庭补贴）仅增加了1.7%，也就是说，名义工资勉强能够赶上物价的上涨。根据法国总工会的指数计算，物价上涨了24%以上，实际月工资总额减少了1.7%，而净实际工资则减少了3%④。

1980年初，有一半雇佣劳动者的名义“净”工资（扣除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低于每月3,330法郎，而且大约30%的人的名义“净”工资低于3,000法郎；这时的可增长最低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108期，第41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0期，第22页。
③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298期，第25页。
④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298期，第25页。

工资为2,071法郎，法国总工会则要求把它提高到每月3,300法郎，而随后又要求提高到每月4,000法郎。1981年上半年，近40%的工人和职员所得到的“净”工资低于每月3,000法郎，也就是说，有700—800万人的工资低于法国总工会所提出的最低名义工资额①。由于政府采取了小幅度提高低工资的政策，雇佣劳动者工资上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但这并没有涉及到高级行政人员。1977—1979年的限制工资增长以及从1978年秋天起明显表现出来的工资下降，主要是涉及到工人和职员。

在政府的指示中始终不变地表现出了限制雇佣劳动者工资增长的意图，而且在这些指示中着重强调在签订集体合同的时候必须体现“节制性”②。提出要在提高某些工作者的工资的同时，降低另一些工作者的工资。1979年年中，巴尔重新宣布将加强对工资的限制，不增加企业的社会需求开支，而社会保证的必要补充拨款应该由享用这些拨款的人来提供。

物价的日益昂贵、实际收入的下降——所有这些使得许多劳动者，首先是工人不得不求助于额外的工作，这种工作被称为“黑工作”。每年大约有80万人从事这种工作，而且这种工作的工资在工资总额当中占将近3%③。

社会补贴制度的变化是决定法国劳动人民经济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社会补贴的基本特征是在战后民主高涨时期形成的。

---

①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6期,第21、24页；《人民报》,1981年2月16—28日,第17页。

② [法]《经济与统计》,1979年第108期，第35页。

③ [法]《新工厂》,1979年4月19日,第80页。

在七十年代中期，各种社会保证补贴的经费来源包括：工人和职员交纳的保险费（19.11%）、私营部门企业主交纳的款项（43.76%）、国营企业交纳的款项(11.56%)、地方政权机关交纳的款项（0.97%）以及国家补贴（19.46%）等。国家补贴款项其中包括家庭补贴（2.83%），地方政权机关的补贴（1.60%），税收扣款（1.91%）以及其他扣款（1.63%）①。企业主们坚决要求减少自己的款项，似乎这些款项损害了法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他们还坚决要求把国家的款项提高到“共同市场”其他国家的水平②。企业主们特别起劲地反对为家庭补贴费用付钱，特别是为疾病和失业支付他们认为，过大的费用比重*。

垄断组织企图把很大一部分社会费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反抗，垄断组织的这种企图没能实现。然而，多年来，社会基金经费的各个来源的比例还是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劳动人民交纳的保险费的数额增加了。到1980年劳动人民交纳的保险费占工资的11.95%，而1975年只占8.40%，也就是说这项费用增加了21.7%，然而企业主的缴款只增加了15.8%③。

从1976年开始，劳动群众向老年保险基金的缴款从3%增长到了3.25%，向疾病保险基金的缴款从1%增长到了1.5%④。同时，根据第七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1976—

---

① 法国雇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企业主》，1978年12月号，第28页。

② 法国雇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企业主》，1979年2月号，第3页。

* 国家机关补贴的款项在联邦德国占40.7%，英国占56.7%，丹麦占88.4%(法国雇主联合会：《企业主》，1978年12月号，第29页)。

③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6期，第24页；
［法］《经济与统计》，1980年，第128期，第76页。

④ ［法］《费加罗报》，1976年1月1日。

1980年这一时期，国家的卫生保健开支减少了40亿法郎①。第一个“巴尔计划”就已经拟定首先要通过增加劳动人民本身的医药医疗服务开支，来节省社会保证拨款。在劳动人民积极抗议的压力之下，第二个“巴尔计划”列入了关于少量提高最低优抚金额、降低某些类别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限制的条文。但是，养老金仍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比1979年初的可增长最低工资的每月2,018法郎的一半略多一些②。在七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后半期，曾多次提高保医疗服务和医药险的被保人的付款额（从25%提高到了35%），而且从1979年开始，这种做法也扩大到了领养老金者的身上，也就是说扩大到了特别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的身上。

国家和垄断组织对社会保证的进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对社会保证的周期性进攻产生于五十和六十年代，而且从1974—1975年经济危机时候起这种进攻便大大加强了。对法律规定的那部分社会补贴（即除企业主按照集体合同提供的补贴或捐款之外的其他各项补贴）的国家调节政策，对于工人和职员总收入的差别和波动有着重要意义。从理论上说，社会补贴平均占家庭收入的20%，但是按其性质和数额来说，这些社会补贴在各个居民集团当中的分配情况是不相同的。例如，1972年在所有社会补贴当中，家庭补贴占20%，疾病补贴占27.4%，养老金、供养人死亡等情况下的补贴占39%，其他补贴占14%③。社会补贴制度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是战后最初几年劳动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但这

① ［法］《人民报》，1976年1月1—15日，第15页。
② ［法］《人道报》，1979年8月28日。
③ ［法］《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丛书》（社会资料），巴黎，1974年版，第91页。

种社会补贴制度不止一次地被修改，这些修改逐步地降低了许多类别的社会补贴，尤其是对家庭补贴的数额。家庭补贴与其他各类补贴不同，家庭补贴只是靠企业主交纳的款项来提供经费的。表30中的材料明显地表明了家庭补贴在工人家庭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情况。

表30　家庭补贴在工人名义月工资总额中所占比重(%)

年　分	有两个三岁以上子女的家庭	有三个三岁以上子女的家庭	有五个子女的家庭
1946	47.7	79.3	128.6
1947	39.7	66.0	105.5
1957	27.7	53.2	92.0
1973	12.1	32.5	69.0
1979(1月)	8.5	33.8	59.5

资料来源：[法]《经济与政治》，1979年第25期，第31页。

战后年代里，史无前例的失业人数增长把救济失去劳动收入的人的问题提到了首位。从1958年到1979年，在法国曾存在过一种虚伪的失业补贴制度：国家救济只提供给很有限的一部分人，而且数额也很小，1976年为每天16法郎，在有需要赡养的人的情况下略多一些。1978年秋天，在总人数为112.7万失业者中只有22.8万人，或者说只有15.9%的失业者得到了这种补贴①。国家的救济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这使得一种独特的失业保险制度应运而生了，这种失业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工会同法国雇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协定的基础上

① [法]《经济与政治》，1979年第296期，第62页。

的，而后由政府1959年1月7日法令所批准。这种制度囊括了这样一些企业中的80%的就业者，这些企业在法国雇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中有代表资格。保险补贴基金的构成情况如下：企业主的缴款占80%，劳动者自己的缴款占20%。这种保险补贴制度不适用于国有化企业、码头工人、海员以及那些劳动条件不同寻常和在大多数情况下享受其他专门类型社会保险的人。为了对新的保险制度进行管理，成立了工商业就业问题协会，该协会合并在全国跨行业就业问题联合会中。保险（或附加）补贴制度逐渐囊括了范围更加广泛的人，而补贴的数额也开始有所提高，一开始提高是不定期的，而从1974年开始便根据可增长最低工资的变动情况每年提高两次，补贴应该不低于可增长最低工资数额的45%①。

除保险补贴之外，一部分失业者还有权同时享受国家的救济。1978年，有22.3万失业者，或者说16.3%的失业者得到两种补贴，而且在三个月内保险补贴等于以前工资的40%，随后的一年内一直为35%（对于50岁以上的人这个期限还有可能延长）。11.1万人，或者说7.7%的失业者只得到一种保险补贴。此外，1972年设立了专门救济年龄为60岁以上的失业者的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收入保证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在退休年龄以前（年龄为60岁至65岁）失去工作、其工龄不少于10年并且拒绝再寻找工作的人，能够得到数额为基本工资定额68%的补贴，而晚些时候为70%。这样一来，这些人便不再被列入失业者的行列，但同时他们也不能期望获得工作。从1976年起，这种退休前的“收入保证制度”也推广到了60岁以上的工作者的身上，以此来刺激他们“自

① ［法］《工人生活》，1977年3月13日，第13页。

愿”辞去工作。1928年，享受这些补贴的总人数达到了大约14万人（即几乎占全体失业者的10％），而1975年年初，则只有5.7万人①。

1974—1975年经济危机时期的大规模解雇造成社会局势急剧紧张，这使政府和企业主不得不扩大对因经济原因，即因危机而失去工作的人的救济。1974年10月，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签订了关于附加补贴（等待工作补贴）的协定，随后该协定得到了劳动部的批准。根据这项协定，一年以内的各种补贴共计可达到作为计算基础的基本工资的90％。1975年底，只有8％的失业者，而1978年只有12.8％的失业者（18,200人）能够享用这种累积总数②。

与此同时，全体失业者中有37％以上的人没有得到任何补贴，而且在这些人中间多数是第一次失业的妇女和青年。到1980年年底，已经有50％的失业者没有得到补贴了，而数十万人只得到最低的补贴——每天20—25法郎③。

失业的增长不仅导致了补贴开支的增长，而且也导致了劳动者的保险缴款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多而减少。找工作持续时间的延长、使失业补贴随物价的不断上涨而迅速贬值，这些引起了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提出关于改革社会保证的要求，其中包括失业救济制度的要求。在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1979年3月16日签订了协定，在此之前曾于1979年1月16日通过了失业救济法案。结果，从1979年7月1日起，新的形式上统一的补贴制度生效了，这

① ［法］《经济与政治》，1979年第296期，第62页；
［法］《统计月报》，1975年第4期，第10页。

② ［法］《经济与政治》，1976年第266期，第76页；1979年第109期，第62页。

③ ［法］《经济与政治》，1981年第319期，第17页。

种补贴制度在行政方面把国家救济和保险补贴统一起来，而保险补贴则移交给工商业就业问题协会管理①。这种统一的制度仍旧没有涉及到国有化企业的工作者、国家职员、地方机关的工作者有权得到与工商业就业问题协会所发放的补贴相等的补贴问题。除了把管理职权转交给工商业就业问题协会之外，新的制度同旧的制度没有多大的区别。有一些积极的新措施，如：扩大了补贴的范围，即青年和一些类别的失业妇女也有权得到很少量的补贴——每天20—40法郎；向长期寻找工作和已经无权接受国家救济成保险补贴的人提供专门的补贴。失业者可以在一年期间、50岁以上的失业者还可以在更长时间内领到这种专门的补贴，这种专门补贴的数额每天不超过20法郎。但是，规定了逐季减少因经济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的专门补贴数额（从65%到50%），而且明文规定这种补贴的最低限额为可增长最低工资的80%并且每天再补加20法郎，最高限额为基本工资的90%。只有低工资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这种最高限额的补贴②。新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对那些处境最困难的失业者的救济，但恶化了对其他的失业者，特别是因经济原因而被解雇的人的救济。正如《经济与政治》杂志所指出③，在两种补贴制度合并起来之后，每年将有1.3万失业者得不到补贴，他们最多只能寄希望于私人慈善事业和市政当局的所谓“社会救济”。总的来说，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千百万雇佣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了。

---

① [法]《人民报》，1979年4月15—30日，第21页；
[法]《工运》，1979年4月19日，第7页。

② [法]《工运》，1979年4月19日，第38页；
《经济与政治》，1980年第310期，第53页。

③ [法]《经济与政治》，1981年第319期，第17页。

第二节　群众反抗情绪的增长

六十至七十年代，法国所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过程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锐化，导致了居民阶层的最广泛的抗议和群众反对国家垄断秩序斗争的加强。这些过程明显地削弱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那些最传统、最保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特点——经济增长缓慢、金融资产阶级凌驾于工业资产阶级之上、帝国主义的高利贷性质——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群众的意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一些经济上较先进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崇尚进取精神和个人成功，而在法国得到更广泛流行的却是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准则和精神价值——天赋的“社会秩序”、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制度、追求稳定、耽溺于“中庸之道”。财产的占有被看作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家庭和家庭财产被看作是个人利益的主要圈子。而个人的理想和志向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所决定的，即幻想通过耐心经营、节俭和学习而沿着社会阶梯一代一代地缓慢地得到升迁。传统的土地所有者和私有者的法国是保守价值观的群众基础。在农业地区，这种保守价值观特别顽强，但在城市私有者中间，甚至在一部分雇佣劳动者中间这种保守价值观也以削弱了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意识和行为的“模式”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信奉宗教、定期做礼拜，而这种“模式”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投票支持右翼资产阶级政党。

法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意识形态机构——教会、学校、大众宣传工具——力图把传统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群众意识中

去。无论是教会还是学校，都把以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或个人升迁为目标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当作民族的理想来加以宣传。电视连续剧中的主人公都是独立的雇主，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成为典范。在有关家庭的电视节目中不涉及任何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政治冲突。

如果说保守的口号是要把小资产者阶层和不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吸引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轨道上来，那么，在新的中间阶层中则宣扬了技术统治的价值观。战后的经济增长使经理、工程技术工作者和国家官员产生了一种幻想，认为法国资本主义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有能力借助高速的现代化来消除经济领域内和社会领域内的“薄弱环节”。在这些阶层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意识中，经济进步是与普遍的福利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进步也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缩小社会不平等的手段。生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成为目的本身，资本主义的效率已成为国家的任务。

同时，产生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意识中所特有的那些传统，也阻碍了保守价值观稳固统治的形成。其中，忠实于共和政体思想，曾经是并且今天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传统。

小资产阶级乃是社会保守主义的支柱，但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却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立场之上的，他们在政治方面曾经是激进力量。马克思指出：“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①

早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反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92页。

教斗争的传统”①，曾经在很长的时期内培育着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潮。这种传统是“反对反动势力的、世俗的、共和政体的”传统，它忠实于代议制、共和政体和激进政党②。这在极大的程度上与小资产阶级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反对教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十九世纪末共和党人领袖甘必大所宣布的“教权主义就是敌人”的口号，长期以来成了法国人民进步力量的座右铭③。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也促进了群众对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反抗情绪。激进思想家阿兰断言：“反抗权力比改良活动更为重要”，必须“在反抗的条件下服从”④。个人的义务不是与政府和官员们进行合作，而相反，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止政府和官员们扩大自己对个人的统治权力。

共和文化的主要精华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牢牢地扎了根。然而，作为共和思想的继承人，工人阶级加深了法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传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特别尖锐和突出，这加速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的发展。法国资产阶级在比英国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晚得多的时候才懂得了必须对无产阶级做出局部的让步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法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了顽固的社会保守主义，反对最微小的改革，奉行了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在法国社会中，无产阶级曾经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地位。意识到自己属于没有得到足够分配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对社会进行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卷，第384页。

② ［法］什·博德洛、尔·埃斯塔布莱、日·马莱莫尔：《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巴黎，1974年版，第17、32页。

③ ［苏］弗·普·斯米尔诺夫：《法国现代史》，莫斯科，1979年版，第14页。

④ 阿兰：《公民们反抗权力》，巴黎，1931年版。

抗议的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也推动了一部分工人特别引人注目地把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道德、宗教和权利对立起来。这种意识削弱了工人中间的个人主义，加强了阶级团结，并且有助于制定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方针。由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客观地位及其历史经验（巴黎公社、人民阵线、抵抗运动）、由于法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广泛传播，阶级自觉性得到了巩固①。革命的传统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成为防止改良主义倾向渗透到法国工人阶级中来的强有力的心理屏障。

结果，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阶级价值观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认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以及“他们”之间的，即雇主和“我——工人中间的一个工人”之间的对立，乃是阶级价值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们认为自己的阶级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并且认为对自己阶级的权利的侵犯也是对自己的威胁。因此，他们高度评价工会的活动。这种意识是左翼政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能够有威信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②。

保守类型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重要的客观基础受到了荡涤，这是最近几十年来国家社会结构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性质急剧变化的主要后果之一。小私有者阶层受到排挤、劳动者生活水平一定程度的提高、社会保证制度的建立、受广告和消费信贷所刺激的大众消费的扩大，最后还有破坏储蓄的稳定性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使得把积累作为最高生

① 见[苏]格·格·季利根斯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莫斯科，1969年版，第35—44页。

② [法]热·米什拉、姆·西蒙：《阶级、宗教和政治行为》，巴黎，1977年版。

活目的的方针的重要性下降了。同时，教育作用的日益增长、两代人之间变化的增加、从“大”家庭向中心家庭的过渡，这些动摇了小资产阶级“向上”升迁的模式，把家庭而不是把个人提到了首位*。

随着妇女这个人数众多的传统居民范畴加入到雇佣劳动中来，法国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统治的社会心理潜力被削弱了。妇女大量涌入工人和职员队伍，使工人和职员的保守社会心理观点的基础发生动摇，使他们的意识变得激进。

在居民成分中青年所占比重的增加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根据七十年代的一些民意测验材料，正是青年表现出最为敌视保守的意识形态，最少受宗教和民族主义观点的影响。保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下降，伴随着对法国社会、对法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态度的加强。例如，1972年，有45—50％的年龄在16岁至24岁之间的法国人断言：“法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①。法国青年对笼罩着法国社会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极为愤慨。例如，1977年，在被询问的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人当中有56％的人（而在全部被询问到的人当中只占45％）宣称：在最近十年期间，不同阶级在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现象增加了②。因此，他们更加向往改革，更加希望生活在另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里。

青年们的“抗议的潜力”不仅表现在投票支持左翼政党，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准备直接参加政治搏斗——参加总罢工、游行示威，甚至革命。正如一些社会学研究著作所表

---

* 1973年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小资产阶级行为模式的吸引力已经减弱了。只有10％被询问的人认为，实现个人的事业才能使他们幸福（［法］《新观察家》，1973年，第460期，第43页）。

① ［法］《今日政治》，1978年，第3—4期，第28页。

② ［法］《扩展》，1977年，第104期，第77—78页。

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小学毕业或受过职业教育的法国青年最拥护共产党的思想①。他们的激进思想和对共产党的好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1973年秋曾在青年工人中间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如下：在年龄为16岁的工人中间有24%的人，而在年龄为23岁的工人中间有55%的人表示赞成对法国社会进行深刻的改造。“随着年龄的增长，保守的选择减少了，而随着在工厂里不断获得劳动经验，要求深刻变革的愿望更强烈了”②。

在七十年代，资产阶级从思想上统治群众的机构出现了明显的危机。进步报刊的影响增强了。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对资本主义制度持反对态度的定期出版物的数量增加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广播和电视工作者采取了比较进步的立场。许多在“红五月”之后大学毕业的教师成了在中小学生们中间宣传左派思想的宣传者。甚至在天主教教会学校里，大多数教员也不再是天主教徒，并且也不总是遵守教会当局的命令。

教会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了。在六十年代末，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毕业于国立学校。只有15.5%的学生曾经就学于天主教教会小学，18%的学生曾经就学于天主教教会中学（在十九世纪末是50%）③。1973年议会选举前夕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根据这次民意测验的材料，只有1/3的天主教徒宣称：基督教信仰在他们的职业、工会和政

① ［法］《1977年的法国舆论》，巴黎，1978年版，第151页。

② ［法］《青年工人》，巴黎，1974年版，第87页。

③ ［法］尔·梅尔：《现实社会中的法国天主教》，巴黎，1977年版，第39—40页。

治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6％的法国人说天主教会所持的立场对他们的政治选择有影响①。

最近几年中，一些群众性的天主教组织——“天主教工人运动”、“基督教青年工人”、“基督教大学生运动”、“基督教大学青年”——开始迅速地“激进化”。在这个时期可以看到，大量的基督教积极分子涌入到社会党里来了。投票拥护“左派”，特别是拥护法国社会党的神职人员的人数增加了。在1973年，有25％的神职人员投了社会党的票，7％投了统一社会党的票，2％投了法国共产党的票。而且，在40岁以下的神职人员当中有64％的人愿意投左翼政党的赞成票②。

左翼天主教组织，尤其是青年组织以及左翼天主教报刊，宣传一种新的宗教观念，这种观念特别注重人在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中的个人责任。1975年在三家天主教杂志的读者中间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教会的许多传统观点并未被天主教徒们所接受。例如，在被询问的《新生》杂志的读者中，有76％的人认为：阶级斗争同“基督教的博爱”没有丝毫抵触③。

在七十年代，信教的人脱离宗教的过程也加快了。从1974年到1977年，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的比例从86.5％降到了81％。换句话说，教会失掉了200万人。在最近几年中，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和坚持最保守观点的人的人数以特别快的速度减少了。如果说从1946年到1972年，他们的比重从36％降到了23％，那么从1974年到1977年又从21％降到了17％④。在最近这一时期内，偶而去教堂做礼拜的人的比例

① ［法］《当左派能够得到……的时候》，巴黎，1973年版，第62页。
② ［法］《当左派能够得到……的时候》，巴黎，1973年版，第67页。
③ ［法］《计划》，1978年，2月号，第211、215页。
④ ［法］《探索》，1977年，第3—4期，第14页，

也急剧下降了——从18％降到了14％①。首先在法国战后一代人中间，传统的天主教思想体系的影响减弱了。根据法国社会学家们的材料，从1966年到1978年，40岁以上的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的天主教徒同不信神的人之间的比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相反，在年轻一代（40岁以下）中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78年，只有4％的男人和7％的妇女每周去做弥撒（而1966年则分别是18％和17％），有25％的男人却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1966年只有7％）②。

同时，无产阶级的阶级价值观在新的劳动者阶层中间传播开来。在工人中间，个人主义宗旨的影响下降了，希望转到职员范畴中去的人的比重下降了*。与此同时，法国工人们不再感到自己是置身于社会之外的人，不再认为自己是注定要生活在“社会的集中居住地”里的阶级。在七十年代，无产阶级的自豪感加强了：1978年有64％被询问的人宣称，他们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

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增强了。过分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把自己列入到“中间阶级”中去的企图，在工人们中间越来越罕见了。工人们经常把自己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在1966年，有44％的工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③，而1977年就有56％的工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了。在职员无产阶级化的客观过程的影响下，他们阶级意识的发展过程加快了。1977年，28％的商业和办公室职员、12％的“中级干

---

① [法]《1977年的法国舆论》，巴黎，1978年版，第118—119页。

② [法]《左翼的法国投右翼的票》，巴黎，1981年版，第157、314页。

* 1978年，有67％的工人宣称：他们宁愿留在工厂里，而不愿从事办公室职员的工作（[法]《新经济学家》，1978年第156期，第49页）。

③ [法]《法国社会学杂志》，1971年，第4期，第509页。

部”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①。

七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使得工资增长受到了限制，使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的失业变成了“脱缰之马”无法控制，使暴力、犯罪、吸毒现象增多了。这次经济危机使得普通法国人的不满情绪和批判态度高涨了起来。在这里，失业率的急速增长乃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最重要的根源。85%有工作的人断言：他们现在要比十五年前更加为就业问题而担忧。76%的私营部门雇佣劳动者和72%的法国青年（年龄为18岁到24岁）宣称：他们有可能遭受到失业的命运。85%的法国人认为失业的“威胁殃及到每一个法国人”②。

广大劳动者阶层生活水平下降，是群众不满情绪的另一个根源。六十年代经济的迅速增长，提高了劳动者对自己物质状况的主观估计。在1969年，有52%的法国无产者认为，在最近五年中他们的物质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了（34%的人则认为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经济危机使这类情绪发生了动摇。在1977年，有52%的工人宣称，五年来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20%的工人认为是提高了，另外20%则认为仍同过去一样）。其他各类劳动者的评价也同样是悲观的：64%的技术员、52%的办公室和商业职员以及55%的服务工作者认为最近五年来他们的物质状况恶化了③。

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使人们越来越怀疑大多数执政者是否有能力成为法国经济的“最理想的管理者”。劳动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下降了。1977年只有很少一部分法国人

① 根据［法］1977年第104期《发展》第75—76页的材料计算得出。

② ［法］《新经济学家》，1978年，第154期，第43页；［法］《新观察家》，1978年，第734期，第86页；［法］《人道报》，1979年4月30日。

③ ［法］《1970年的法国工人》，巴黎，1970年版，第229页；［法］《人道报》，1977年2月27日。

相信执政党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维护“普通人”的利益或者缩小社会的水平等。

对政府政策和日常生活条件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同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技术统治价值观和生活消费方向的危机结合在一起了。

在六十年代，群众物质生活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改善、受教育机会的增多以及他们文化和职业水平的提高，劳动者阶层在社会文化方面打破了与世隔绝的状况，大众通讯工具的革命——所有这些开阔了“普通人”的视野，增加了他们对个人生活内容的要求。法国劳动人民不再满足于整个资产阶级宣传武库硬塞给他们的消费标准。与个人的社会尊严以及个性自由发展的可能性有关的需求在群众意识中固定了下来。超出“纯经济”要求范围的抗议的“总体”性质及其对物质生活水平的相对独立性，已成为各个群众阶层本身的共同特点。

这些社会心理倾向的发展，特别明显地反映在 1968 年 5 — 6 月事件时期劳动人民的行动中。按其心理内容来说，按积极性的程度和形式来说，“红五月”表现出了群众对现代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不满，是对强加给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抗议。根据1968年 6 月初的材料，在巴黎的一个工人区里，大约 1/3 的被询问的人认识到，事件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工人和大学生所提出的具体的经济、社会要求，而是在于渴望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条件。28%的被询问的人把意识的觉醒和开辟表现自我的可能性看作是“红五月”的基本经验①。

① [法]《对1968年6月14—18日选举前的质量研究》，巴黎，1969 年版，第13页。

5—6月事件促进了一些社会心理倾向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社会心理倾向使得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霸权发生危机。在七十年代，劳动人民作为对他们地位的日益不稳定的直接反应而提出的种种要求，同旨在使社会秩序民主化和参与决策的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反而使之增加了，这特别涉及到处在社会结构对立两极上的那些集团。与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而平行发展的消费的增长，实际上使社会的不满情绪更加加剧了。在1972年，只有19%的法国人认为：经济进步促进了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减少（17%的人认为不平等现象增加了，43%的人认为还和从前一样）。57%被询问的人宣称，最近十年来，法国经济的发展要比社会公正的发展快一些（12%的人持否定意见，31%的人没有表态）①。与此同时，在法国劳动者中间，要求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更高了：1977年，86%被询问的人赞成对拥有200万法郎以上财产的人征税，77%的人赞成把个人收入最高限额限制在每月25,000法郎以下②。

在七十年代，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技术统治论意识开始发生危机。现在，过去的一些经济增长的提倡者（例如尔·阿隆）公开宣称已对科学和技术"万能"丧失了信心。一些技术统治论者开始认识到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和个人进步的主要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增长的积极因素不能抵销它的消极后果——生态问题的尖锐化、"生活质量"的恶化。结果，技术统治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的信念，对市场

① [法]《企业》，1972年6月23日，第13页。
② [法]《1977年的法国舆论》，巴黎，1978年版，第287—288页。

经济有能力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建立“普遍的福利社会”、满足贫穷社会阶层需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从而，“技术统治论”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分裂日益加剧。

在七十年代，作为价值观体系的“技术统治论”已经不能发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了。根据1977年的民意测验，绝大多数法国人（73%）认为与经济增长相比，建立充分的社会公正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而只有15%的人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最重要的意义；78%的人认为，现代类型的进步将威胁到未来几代人的生活；66%的人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恐惧；62%的人对个人的前途感到不安①。

消费价值观和消费理想的危机加深了。在指出这种现象的时候，法国社会家们写道：“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直到不久前，法国人一直拥有如此强大的发动机，如劳动生产率、迅速的增长、无法遏止的消费，从而参加到一种独特的太空角逐中去。但是，突然发生了事故。发动机开始不转动了”②。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是对“消费社会”的原则——“更多的劳动，是为了更多的消费”——日益增长的抗议。如果说在1971年有53%的法国人愿意去挣更多的钱，而有31%的法国人则愿意去更多的休息，那么，在1973年是41%的人更愿意去挣钱，而40%的人更愿意去休息了。到1978年，更愿意去休息的人的比重上升到了55%，而更希望挣钱的人的比重则下降到了32%③。

---

① ［法］《探索》，1974年第1—2期，第8页；
［法］日·阿尔布瓦、日·希德洛：《法国人的真实生活》，巴黎，1978年版，第129、131页。

② ［法］日·阿尔布瓦、日·希德洛：《法国人的真实生活》，巴黎，1978年版，第129、131页。

③ ［法］《新观察家》，1973年，第460期，第44页；1976年第734期，第98页。

消费理想危机的另一种表现是，“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优先次序在群众的意识中发生了变化。从1973年到1978年，赞成增加“社会”消费而缩减个人消费的人从23%增长到了44%①。

劳动人民的不满越来越经常地表现为反对缺乏创造内容的劳动、以及劳动组织的等级制度和专横制度。1977年，49%的工人宣称，他们在生产活动中感觉到自己是螺丝钉、傀儡、工厂的附属品。同时，这样的劳动活动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90%被询问的人拒绝把劳动看作是“一种诅咒”，79%的人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枯燥无味的职责”，而60%的人则断言：劳动是个性自我表现的工具②。

尽管存在着对工作的“工具主义”态度，即仅仅把工作看作是满足自己填补空闲时间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工具，但是一些新的方针目标还是在法国劳动人民中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发展。在1978年，50%被询问的人宣称，他们宁愿少拿报酬，但对所参加的工作要求更加有趣（39%的人持相反的意见）③。毫无疑问，在具有高级教育水平的人和青年中间，对内容丰富的劳动的需要特别强烈。在工人中间也有1/3被询问的人认为，有趣的工作比报酬高的工作更好一些。总之，在所有各类劳动者中间，其中也包括在工人中间，“劳动道德观”正在发生变化，这表现在人们更加渴望进行创造性的、内容丰富的劳动上。

---

① ［法］《扩展》，1977年，第110期，第295页。

② ［法］日·阿尔布瓦、日·希德洛：《法国人的真实生活》，巴黎，1978年版，第154、143页。

③ ［法］《新观察家》，1978年，第734期，第93页。

在群众阶层中，对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的不满日益加强，这同日益增加的向往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愿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劳动者团体都准备以街道、消费者团体或者以车间为单位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根据1977年的材料，72%被询问的人希望街道居民自己解决与自己有关的事务；69%的人赞成消费者团体能够对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监督。这类情绪在法国无产阶级中间也得到了广泛传播：1977年年底，被询问的86%的工人表示赞同工人委员会应对车间问题进行调节，60%的工人赞同由劳动者大会选举企业领导人的思想①。

在群众的意识中出现了明显的“路标的转换”：法国人开始放弃他们所特有的传统的个人主义。根据1977年的材料，52%被询问的人参加了各种类型的志愿组织——政党、工会、生态运动、消费者团体、家长委员会、体育运动俱乐部、市政委员会、街道委员会，等等。社会积极性增长的潜在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只有11%被询问的人已参加了街道委员会的活动，那么，还有32%的人正准备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②。有一半被询问的人断言，自愿结成的团体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大部分法国人（60%）表示希望扩大地方权力机关的职权③。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阶层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乃是社会不满增长以及群众渴望进行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

① [法]《晨报》，1977年12月8日；
[法]《快报》，1977年，第1375期，第51页。

② [法]《新观察家》，1977年，第684期，第68、69页。

③ [法]《1977年的法国舆论》，巴黎，1978年版，第220页。

法国资产阶级思想霸权的危机以及法国劳动人民阶级意识的增长，使得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增加了，它的自发的和有组织的积极性加强了*，战斗的工会指挥中心的威信提高了。除此之外，社会情绪方面的新现象导致了工人阶级相当大量的阶层向左转，使得劳动者群众队伍的政治意识更加激进了。

第三节　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斗争

在七十年代，罢工运动被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次数的频繁。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队伍在为满足自己的迫切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都增加了。法国劳动人民的最大的工会组织——劳工总联合会（以下简称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影响增强了。

生产的现代化、劳动人民受剥削程度的加深以及他们需要的客观增长，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使得工人阶级的“传统的”要求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内容。七十年代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广大的居民阶层被吸引到社会经济斗争中来，劳动人民和最大的工会指挥中心都力求进行统一的行动。“红五月”之后的十多年来，工会的政治作用得到了加强，劳动人民斗争的社会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明显地接近了起来。

1972年左翼联盟的形成对社会经济斗争的增长和激进化

---

* 在1978年被询问的人当中，有71%的工人和78%的企业主宣称：与六十年代初期相比，现今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严格性和顽强性（[法]《新经济学家》，1978年，第156期，第51页）。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多数劳动者都把自己对国家经济和政治深刻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左翼联盟的身上。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执政集团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又对罢工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968年5—6月法国劳动人民运动的高潮开辟了社会斗争发展的新阶段。罢工斗争异常广泛的规模、它的群众性、罢工参加者们的积极性、高度组织性、觉悟性和主动性，所有这些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增长了，证明工人阶级保卫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增长了。

在五月以后的最初几次罢工的实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群众性罢工运动的所有这些特点。在一些企业里，罢工者赢得了确立对工资、劳动生产率、雇佣和解雇工人的监督，从而远远超出了罢工的一般经济目的的范围。尽管大部分劳资冲突仍旧是由参加人数不多的短期罢工所构成，但五月后斗争的逻辑以及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日益加深的信心，还是导致了全国性罢工和部门罢工比重的增长，通常这种罢工伴随着示威、抗议游行、集合和其他群众性的斗争形式。

在这些活动的进程中，一个工业部门中各企业的工人之间建立了联系，企业内部不同类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巩固，社会舆论被动员了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斗争效率的提高。群众性的运动，以及把那些与罢工企业的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居民阶层吸收到群众性运动中来，对罢工者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在七十年代所出现的一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上述因素有关，这种趋势就是在一个部门或甚至在一个企业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斗争趋于“密集化”，同一种类型的行动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例如，15,000名有就业保证的码头工人仅在1970年9

月至1971年2月这段时间内，就进行了13次24小时罢工和一次48小时罢工。这种策略以及拒绝加班和做夜班的做法，使码头工人们的斗争变得特别有效。邮政电报工作者、铁路员工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也不止一次地有效地使用过这种斗争方式。定期重复的罢工使企业主和政府陷入经常性的紧张状态中，使企业主们难于采取相应的对策。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国家的主导工业部门都处在紧张状态之中。由于企业主们企图对工人阶级的成果发动进攻，劳动人民的这样一些“古典型的”要求，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等要求的比重增加了*。

七十年代罢工运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专业化”工人的战斗积极性明显提高了。这类劳动者最初的一次大规模行动，是1971年4—5月“雷诺”汽车制造厂的6万名流水作业工人持续两个月的罢工。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对于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就业的所有专业化工人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通过增加基本工资率来提高工资；实行全体人员——从工人到工程师统一的差别较小的工资等级制；使专化业工人普遍转到更高的技能等级上去；使将来的这种技能等级升迁变得容易一些。

在左翼各政党之间达成关于共同执政纲领的协议之后，从1972年开始群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不仅表现为劳资冲突在数量上增长了，而且也表现为提出的要求的范围扩大了，阶级搏斗的规模扩大了，时间更长了，也更加激烈

---

* 在每个具体的场合，“一般”要求可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按以下几个方向进行的：增加一定数量的工资，提高奖金数额，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实行浮动工资制，实行十三级工资制（详见《罢工运动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莫斯科，1978年，第4章）。

了。在这一时期，劳动人民的职业组织采取了新的策略，即最大限度地进行联合行动，提出与整个生产部门工作人员的处境有关的要求。

这些特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就业问题为中心问题的群众运动中。为抗议大规模解雇和关闭企业而进行的罢工，其特点是斗争持续的时间长，采取的斗争形式更为尖锐。在1973年，26%的这类劳资冲突持续的时间为一个星期到一个月，30.5%为一个月以上，其中52%的冲突采取了占领企业无限期罢工的形式，而56.5%的冲突根据资产阶级法律概念是“非法的”行为而采取：强制性地扣留行政当局的代表，在被工人占领的车间里继续进行生产活动，出售制成品①。

贝藏松的“利普”钟表公司工作者、巴黎的《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印刷厂的印刷工人和职员持续了许多个月的罢工，法国广播电视公司工作者持续了数年的紧张斗争，“法兰西号”远洋轮船海员坚持了持久而顽强的罢工——这些是最近几年来这类阶级冲突的最明显的例子。“利普”公司的工作者们并不仅限于占领企业，他们还独立自主地组织生产和出售钟表，在企业中保持了极为良好的秩序。仅在1975年一年内，就有20多家企业发生过这种类型的罢工②。保护就业的罢工在对罢工者给以道义和物质支援的居民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没有这种支援，《解放了的巴黎人报》的印刷工人未必能取得胜利。这些印刷工人与行政当局对抗了28个月之久，而行政当局曾经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不止一次地企图借助警察以镇压和挑拨离间来瓦解劳动者的意志。罢工的劳动者占领自己的企业，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能够阻止来自

① [法]《法国社会事务杂志》，1974年，第1期，第135—136页。

② [法]《工运》，1975年5月8日，第3页。

企业主方面的同盟歇业和其他反工人的措施，能够动员社会舆论。被占领的企业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中心，在这里组织各种集会，进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就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当前紧要问题进行讨论。

罢工运动的激进化和政治化表现为在最大的工会指挥中心，在法国总工会领导下进行的全国性罢工的次数增加了。

这些罢工与全国范围内千百次的示威游行和集会相结合，使全国性的罢工具有特别强大的威力，有助于以符合劳动者利益的方式来解决许多拖延日久的劳资冲突。全国性的罢工必然带有政治火药味，因为罢工的斗争锋芒不仅指向企业主，而且也指向政府的政策。

劳动人民对巴尔总理的“严厉的经济”计划极为不满，这种不满于1976年10月7日汇成了继五月事件以后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法国总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和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共同要求，在这一时期围绕着这些要求展开了社会政治斗争。这些要求包括：维护居民的购买力，把工资下限提高到2,000法郎，增加优抚金和家庭补贴的数额；保证充分就业，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40个小时，规定年满60岁的人有权领取退休金；对税收制度进行民主改革，使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实现民主化，保证劳动人民子女受不间断的完全合乎要求的教育的权利，使正常的劳动安置得到保证；尊重并扩大工会的自由。有6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罢工；200多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支持工会提出的要求。

许多国营经济部门企业中都爆发了持续而又激烈的冲突，行政当局不愿意按劳动者提出的条件签订集体合同，导致了1977年4月28日的全国罢工。发电厂、城市运输、铁路

运输、邮局、电话、电报工作者，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师，广播和电视职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和调度员——共计约300万人停止了工作。国营各个部门和机关的工会组织无一例外地都响应了最大的工会指挥中心的号召。根据最大的工会指挥中心1977年12月1日的号召进行的总罢工，迫使政府宣布增加最低计时工资和最低优抚补贴。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内，这样一些社会斗争形式，如在各个经济部门范围内和在国内不同地区举行行动日、行动周和周期性的行动非常流行。这类活动有助于使生产职能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各劳动者集团彼此接近起来。1971年和1975—1976年，社会服务工作者举行的行动日和行动周，其规模特别广泛。参加这些行动日和行动国的有教师，邮局、电话、电报、海关、医院的工作者以及市政府和省政府、劳工部、卫生部和社会保证部的职员。社会服务部门的劳动者在自己的要求中提出了整个社会保证制度民主化的问题。

1976年6月和1978年11月大众宣传工作者们的行动对国内的社会舆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印刷工人、技术人员、新闻工作者、编辑人员、行政部门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两次行动。除了要求提高工资、保证就业等等之外，还提出了宣传报导自由、完整和客观的口号，提出了全体人员参加编排节目以及为反对法国电视“美国化”而斗争的口号。

工会指挥中心注意到国家经济的总的状况，常常有意识地把各省或各地区范围内的劳动者们的行动集中起来。洛林冶金工人反对缩减生产和大量解雇工人，因为这种做法将使这个工业发达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居民丧失生活来源，这种斗争一直持续了许多个月，从未减弱。南锡、隆尼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城市的工人、职员、商贩和手工业者的行动，引起了居

民同警察之间激烈的冲突，居民构筑起了街垒。洛林的总罢工和行动日十分引人注目，实际上全体居民都走上了城市和镇市的街头，整班整班的中小学生在他们教师的带领下参加了示威游行。根据法国总工会的号召，冶金工人于1979年3月23日完成了向巴黎的进军。在法国首都的各中央广场上，工人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搏斗。

最有影响的工会指挥中心针对一定问题而组织的行动日和行动周，已成为民主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法国总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和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注意到数万名青年人在学校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而处在困苦的状态中，便于1976年10月举办了捍卫青年权利全国行动日。法国总工会召集了青年失业者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的活动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反响。教育制度和社会保证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危害着刚毕业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状况。工会提出了一些旨在纠正这些严重缺陷的经过详细研究而制订出的措施。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实施旨在削减劳动人民社会成果的计划的斗争，成了罢工运动的主要起因。在1980年一年中，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数千次捍卫保健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全国性运动。1980年夏天开始的法国海员罢工具有极为尖锐的性质。罢工者同雇主和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封锁了法国的所有大港口。他们的基本要求是：保留工作岗位、捍卫社会权利、保持燃料价格的稳定。海员们团结一致的行动和其他劳动者队伍的支援，迫使企业主做出了让步。

不管工人、职员的部门性和全国性行动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它们都最大限度地扩大着斗争的范围，促进着各个劳

动者集团的彼此接近，都能对当局和企业主所实行的政策产生有效的影响。群众性的行动乃是反对企业主独断专横的一种有效方法，后者竭力企图阻止进步工会组织在工厂扩大影响。

在七十年代，企业主们为了瓦解劳动人民的意志，曾经不止一次地求助于警察或者纯粹雇佣的匪徒。警察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雷诺公司”各工厂的土地上。在1978年初，罢工者所占领的许多邮政分局成了劳动者同“维持秩序力量”的代表人物之间激战的舞台。同“西姆基—克莱斯耐”行政当局一样，许多企业主都组织起了固定的厂内“维持秩序力量”，这种力量的使命是及时防止工人们爆发行动。

但是，企业主更经常地采用一些更为巧妙的方法来防止劳资冲突：向不参加罢工的人发放奖金、以各种借口解雇最积极的罢工者和工会积极分子、把主要生产转到社会气候更“安定”的企业中去。

企业主们顽固地拒绝向全体人员提供关于工厂事务状况的情报，尽可能长久地就关闭企业或大量解雇工人的决定进行保密，以各种借口拖延关于签订新的集体合同的谈判，等等。

尽管如此，企业中的力量对比还是逐渐发生了有利于雇佣工作者的变化。工会小组的数量明显增多了，这些工会小组是在劳动人民5—6月行动的直接影响下于1968年底取得合法地位的。最近几年来，在拥有50到149名雇佣工作者的中等企业中，工会小组数量增长特别迅速①。

群众组织的新的民主的形式，对于有效地反抗企业主具

① ［法］《回声》，1977年10月7日。

有重要的意义。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为解决被工人占领的企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而成立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全体职工大会的活动，所有这些都证明：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积累了管理生产和社会事务的丰富而有价值的经验。法国最大的工会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新形式和新方法的首倡者。

第四节　法国劳动人民的职业组织　工会统一问题

法国工会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会联合会和工会组织为数众多。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个大的工会指挥中心——法国总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工人力量总工会*，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比较小的组织**。

参加各派工会组织的劳动者的比重并不大——占全体雇佣劳动力的20.5%。然而，各工会，首先是一贯站在捍卫劳动人民社会经济利益的阶级立场上的法国总工会的部门组织和地方组织的高度积极性，以及其他一些工会指挥中心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针的激进化，使得法国的工会运动成为国家生活的一个有影响的因素。执政集团和企业主集团都企图"驯服"工会，企图成立类似于法国劳工联合会这样的工会组织，他们的所有这些企图都收效甚微。就其群众影响来说，妥协主义的工会组织大大逊色于比较一贯地从事阶级斗争实践活动的那些工会。

法国总工会站在劳动人民社会经济斗争的前列，1978年

---

* 1948年从法国总工会中分裂出来的妥协主义组织。

** 公务人员总工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法国工人联合会，等等。

年底它共有235万名会员①。人数占第二位的组织是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在它的各支队伍中共有115万名会员②。由右倾改良主义领导集团所把持的工人力量总工会约有100万名会员。按会员人数来说大大落后于“三巨头”的其他组织还有：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约55万人，公务人员总工会约32.5万人，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近20万人③。

各个工会在企业和机关里的基层组织的比例关系，在七十年代是相当稳定的（见表31）。

表31 各工会指挥中心在企业中的小组的数量

	1970年		1975年		1976年	
	小组数量	占总数的%	小组数量	占总数的%	小组数量	占总数的%
法国总工会	5,215	44.54	11,135	41.61	12,239	40.56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	3,002	25.49	6,608	24.68	7,483	24.80
工人力量总工会	1,203	10.21	3,143	11.74	3,700	12.26
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	502	4.26	1,325	4.95	1,542	5.11
公务人员总工会	1,183	10.04	2,986	11.16	3,516	11.65
法国工人联合会	192	1.63	405	1.51	414	1.37

资料来源：[法]《文献摘记和研究》，1978年11月17日，第158页。

法国总工会在冶金工人、铁路员工、印刷工人、采矿工业工作者、建筑工作者、码头工人、商业和银行系统劳动者中间有着很大的影响。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虽然大大落后于法国总工会，但就各行业选举情况来说，在化学工业、金属加工

① [法]《人道报》，1978年11月27日。
② [法]《工运》，1978年1月26日，第3页。
③ [法]《人道报》，1976年2月9日；
[法]《回声》，1977年6月8日；1977年11月17日。

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得到的票数最多①。在最近几年，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在工资、就业、优抚保证、工会权利诸方面提出的直接要求明显地接近了。这反映在它们之间所签订的某些共同协议之中。

在制定总战略和就每个具体场合拟定综合性要求的时候，法国总工会所持的出发点是把工会运动的职能同左翼政党的职能区分开来。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于1964年成立，是由一些天主教工会分裂出来的派别组成的，它不仅力图使自己被看作是工会指挥中心之一，而且也力图被看作是民主力量广泛同盟的可能的核心，这种民主力量受到自治思想的鼓舞，并且在对待左翼政党方面持自主态度。

在拟定和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的时候，法国总工会是以经济合理性为出发点的，它引导劳动者在同样的情况下以最小的物质损失取得最大的成果。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是在天主教社会学说的长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曾经喜欢用模糊不清的道德标准来论证自己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便不具有法国总工会那种同企业主就其做出让步的程度和范围进行谈判的能力。

从开始活动的最初年代起，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就同法国总工会进行竞争，力图通过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代替似乎是“保守的”法国总工会的“现代”工会运动中心。由于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状况的变化，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有时这些矛盾减少了，这两个工会指挥中心在许多问题上的立

① ［法］日·德·雷诺：《法国的工会》，巴黎，1975年版，第145页。

场也就明显地接近了。毫无疑问，这些矛盾对各工会的社会经济斗争战略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会统一问题的极端复杂性。

法国总工会依靠自己积极分子的纪律性、自己的广泛的基层组织网以及同法国共产党的合作，力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人民行动的规模，使罢工运动具有政治尖锐性。法国劳动人民的这个阶级的工会组织把罢工运动看作是一般民主斗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最终目的是对社会关系进行深刻的改造。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社会经济战略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在制定这种战略的时候，这个组织不仅要考虑现实状况和当时劳动人民斗争的最尖锐的问题，而且还死抱住这样的信条不放，即不能受法国总工会的影响，不能服从于法国总工会的逻辑。正因为这样，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领导有时拒绝同法国总工会采取全国规模的或个别部门规模的联合行动。在对法国总工会关于联合行动的号召做出否定答复的时候，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经常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的：似乎大规模的行动必然带有纯政治的性质，面对捍卫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没有多大意义。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坚决主张社会经济斗争必须脱离党政斗争而完全独立自主，因而它常常充当“小事务”战略的捍卫者，这种战略的目标只是获取一些有限的成果。这类策略显然是与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傲慢自负的政治目标相矛盾的。

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活动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工人力量总工会是与政府政策相联系的，它宣称自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学说的唯一当之无愧的捍卫者，声称超出纯职业利益狭隘范围的工会活动都是危险而徒劳无益的。工人力量总

工会对这类观点的忠诚，在它1972年发表的正式文件《工会在社会中的地位》①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在死抱着陈腐的反共主义宗旨的情况下，工人力量总工会甚至拒绝同法国总工会达成局部协议和进行定期接触。工人力量总工会认为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自治理论也是不小的威胁，工人力量总工会的首领们把自治理论视为“对工团主义的致命威胁”②。

最近以来，在工人力量总工会中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派，另一个自称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派或托洛茨基派。在维希召开的工人力量总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77年5月10—14日）上，除了获得83.5%的票的多数派决议案之外，这两个在许多方面都对现领导持反对立场的派别还分别提出了两个行动纲领，有9.1%和6.9%的大会代表分别投票赞成这两个行动纲领③。“社会主义”决议案的作者们提出：放弃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传统的、不合时宜的学说，使组织活动政治化，在坚持工会指挥中心完全的独立地位的情况下建立同社会党的合作。在代表大会上对工人力量总工会正式路线的批评，毫无疑问反映出在普通会员群众中间出现了重新评价价值观问题的过程。这些普通会员对在不同政治的工团主义基础上所获得的成果很不满意。

现在，在其他一些改良主义的小团体组织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这些组织仅仅把捍卫个别的劳动者集团的权利和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

公务人员总工会继续举行着阶级合作的政策，拒绝同工

---

① ［法］《工人力量总工会杂志》，1972年，第59期。

② ［法］阿·贝尔热隆：《我的道路和我的斗争》，巴黎，1976年版，第156页。

③ ［法］《计划》，1977年9—10月号，第997页。

人工会进行联合行动，尽管在它的队伍中经常有人提出使总工会变得更活跃，更开放的要求。正如在公务人员总工会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冶金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联盟的一位代表所宣称，有意识地把工会工作的要求和方针限制在工资、等级制度和地位的小圈子里，会使组织同全国性的社会经济斗争战略相隔离①。

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所持的立场比公务人员总工会的立场要激进一些，在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里保留着法国教员所特有的共和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在举行全国性的运动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经常同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采取联合行动。在这个联合会的内部存在着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在对工会活动和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在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派别是“联盟、自主和民主”派，这个派别继续奉行改良主义方针，不允许同左翼政党和最大的工人工会指挥中心进行长期的合作。“统一与行动”派主张同阶级合作和小集团主义政策实行坚决的决裂。这派的代表人物不止一次地要求领导集团赞同左翼政党的联合纲领，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整个社会生活不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系统中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革。关于这种倾向在教育工作者全国联合会中的影响程度，可以用如下事实加以说明：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有56%的代表赞成领导的报告②。

对于法国总工会来说，实现工会运动的统一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尽管法国总工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工会运动仍极为分散。在现代条件下，克服工会运动分裂状况的主

① ［法］《回声》，1977年6月8日。
② ［法］《人道报》，1976年12月9日。

要途径，就是在保持各自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实现最大的工会指挥中心——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联合行动。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于1964年成立以后的发展与演变，对法国工会运动中联合的趋势产生了矛盾的影响。这个与法国总工会一样有影响的工会指挥中心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并宣称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工会指挥中心的出现，加强了工会运动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性。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定义为：剥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人们的劳动和消费者的需要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平等的社会以及“异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促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从而剥夺了劳动人民任何参加制定和采取最重要决定的机会）①。根据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决定着劳动者对自己雇主的依附地位。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劳动者并获得企业利润。经济秩序乃是建筑在等级制度和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此外，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它力图确立自己对全社会的思想统治②。

在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理论研究工作中，等级制度问题、异化问题以及改造意识的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该组织较

---

① ［法］埃·麦尔：《为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贡献》，巴黎，1971年版，第39、40页。

② ［法］埃·麦尔、日·朱利亚尔：《今日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巴黎，1975年版，第91页。

少注意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关于“自治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是不彻底的，按照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意见，这种社会的使命是代替现存的秩序。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在思想原则方面、对工会运动任务的态度上都存在着差别，因此，对这两个组织的接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领导正在逐步认识工会阵线的状况、摆脱改良主义的和极左的幻想、重新制定组织战略，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关于共同行动和协调争取劳动人民基本权利的斗争的第一个正式协定，是在1966年10月10日签订的。5—6月危机以及以后事件的经验，促使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去寻找与法国总工会合作的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既不损害任何一个组织的权利，又不限制它们的独立地位，并且能够使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多方面的有效活动得到发展。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1970年签订的新协定，包含了工人和职员的普遍要求，并且拟定了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两个工会指挥中心在不回避所有分歧焦点上的争论的同时，就相互关系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以便在双方观点十分接近的问题上谋求一致。1970年协定的主要条款在1974年6月26日签订的新文件中得到了确认和发展。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把1970年的协定评价为从纯战术性的、偶然的协调行动向共同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手段的转变①。法国两个最大的工会指挥中心的彼此接近，对社会经济斗争的发展，对总的政治气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们的彼此接近得到了

① [法] 埃·麦尔、日·朱利亚尔：《今日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巴黎，1975年版，第123—124页。

左翼政党的高度评价，因为这增加了它们在同执政的多数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

一些大规模的、成功的联合行动，以及两个组织的领导之间的经常接触，对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1978年议会选举前夕，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于1977年6月制定出了有关工会联合的最重要要求和目标的行动纲领。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坚决主张必须以增加最低工资额为基点普遍提高工资，它还提出一些旨在解决就业问题的提案，并且着重指出家庭补贴、优抚金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方面的其他津贴等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至于说到一般民主问题，那么，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则特别注意教育制度、对大众宣传工具的民主监督以及扩大企业中工会小组的职权的问题。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提出要使生产人员的组织享有更广泛的权力，以便能够从根本上限制企业主的权力并“开始企业权力的真正社会化过程”①。

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劳动市场情况的急剧恶化，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加紧对雇主和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建立新的工作岗位，在企业主和劳动者组织之间举行谈判，必须为被解雇的工人和职员安排工作。共同的行动、对在一系列文件中得到了巩固的工会运动某些重要问题的一致的看法，改善了各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批评开始比较有克制、富于建设性了。最近几年，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在社会政治问题立场方面明显地接近了起来，与此同时，它们并没有克服由它们不同的政治思想方针所造成的矛盾。

---

① [法]《工会》，1977年6月9日，第28页。

这些差异对有关工会联合会在七十年代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法国总工会富有丰富的社会政治斗争经验，它在自己的活动中所持的出发点是这样一项原则，即把工会和政党的职能明确区分开来。法国总工会在其纲领性声明中始终如一地强调，必须保持工会对政治组织的独立性。法国总工会把工会运动看作是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工会运动应当为解决根本改造社会关系的问题做出有分量的贡献。同时，法国总工会也明确地认识到，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方案将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得以实现，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将不是工会，而是工人政党。法国总工会从一开始就支持左翼政党的共同纲领，声明这个文件符合工人群众的期望和要求。同时，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还着重指出，他们的工会指挥中心保留如下各项权力，即有权在任何一届政府的情况下捍卫群众的利益，有权提出比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要求更为广泛、更为完整的要求，有权同政府就工会职权范围内的一切问题举行谈判①。

法国总工会的领袖和普通会员（其中有不少人支持社会党*）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一贯地赞成保持和巩固左派力量的合作。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对共同纲领的态度、它对各左翼政党政策和反垄断斗争前景的评价，根本不同于法国总工会的观点。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认为工会运动是依据自治社会主

① ［法］《人道报》，1977年6月21日。

* 根据在法国总工会会员中进行的民意测验，他们当中有47%的人投法国共产党的票，31%的人投法国社会党的票，4%的人投统一社会党的票，3%的人投左翼激进党人的票，15%的人投多数派各政党的票（［法］《快报》，1978年，第1427期，第56页）。

义原则改造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

在法国社会党成立之前，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是工人运动中唯一的一个用十分模糊不清的、抽象的自治口号武装起来的有影响的组织。自治思想不仅与资产阶级的高度集权相对立，而且也与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形式相对立。自治思想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不理解或者不赞成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又渴望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有了新的思想宗旨，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在它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并且在劳动者中间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是，要宣传新的社会政治口号，要指出实现这些口号的具体途径，光靠参加社会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原则上否认同某个政党结盟或者那怕是进行协调行动的可能性，它试图既行使工会的职能，又行使政治的职能，它不断地寻找把这两种职能结合起来的途径和方法。这是该联合会活动中存在严重自相矛盾现象的一个原因。

从自治学说出发，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对共同纲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左翼政党的主要目标是掌握国家并通过生产的加速增长来满足群众的社会经济需要，因而不能保证同过去的社会组织实行坚决的决裂。这种批评的矛头始终是指向法国共产党的，似乎法国共产党是建立强有力的集权制国家的鼓舞者，这样的国家要把生活的各方面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共同纲领中所论述的社会改革计划的不足，他们着重指出实现这些社会改革计划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为更深刻的、更全面的改造提供条件。

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积极参加社会经济斗争，感觉到群众的热情和群众对于广泛的民主改革的信心，因而不能站在

人民运动的边上袖手旁观。它在仍旧对左翼政党的纲领性方针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同左翼政党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和协商。

左翼力量在1978年3月的选举中受挫之后，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里实用主义的倾向得到了加强。该组织的领导把迫使雇主作出有限经济让步这种纯工会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强调工会运动政治化的危险性，并从这种立场出发对法国总工会进行批评①。然而，社会经济状况发展的逻辑要求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与法国总工会保持行动统一来共同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在1979年5月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第三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应该继续与法国总工会保持行动统一"，并且确认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忠实于两个工会指挥中心1974年6月26日的联合声明②。尽管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方针出现了倒退倾向，但这个组织的领导还是明确地认为同法国总工会保持行动统一是极为重要的，法国总工会仍然是为劳动人民的权利而斗争的最彻底、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斗士。

1979年9月，这两个工会指挥中心的领袖日·塞居伊和埃·麦尔签订了关于联合行动的新协定。在协定中指出摆在工会运动面前的首要目标是：把有保证的工资最低限额增加到每月2,700法郎，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扩大企业全体人员的权利。这两个组织的代表们一致认为，为了尽快地达到这些目标，必须加强各企业范围内以及全国规模的罢工斗争。

最大的法国工会指挥中心都热情地祝贺左翼力量在1981年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F·密特朗总统

① [法]《世界报》，1978年8月7日；
[法]《工运》，1978年5月4日，第5页。

② [法]《工运》，1979年5月10日，第27页。

的内政方面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与各工会组织的代表团进行协商，在这些协商中讨论了新政府的社会经济计划。工会指挥中心向总统保证，它们在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同时，将全力支持左翼政府旨在整顿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使工会更多地参与国家生活的各项措施。所有最大的工会的领袖都声明，他们准备同政府进行合作和建设性的对话。

左翼力量获胜以后，出现了各工会指挥中心彼此接近的明显征兆。一些拖延许多个月的劳资冲突，都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政府的压力下，雇主们同工会举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关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39小时）的协定。

在同政府的关系方面，大多数工会都持现实主义态度，不向它提出过高的要求。法国总工会指出，政府采取了一些它所期望的积极的措施。同时，法国总工会提出了比政府更广泛的社会改革纲领。它一再地着重指出，必须竭尽全力进行反失业和反通货膨胀的斗争。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把左翼力量的胜利看作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自己自治纲领的首要条件。相反，改良主义的工会指挥中心工人力量总工会却认为，左翼多数派进行社会改造过于仓促，因而有可能引起企业主们的不信任并招致国内经营积极性的下降。

工会行动的统一，以及各工会指挥中心就一些最尖锐的社会问题采取共同的立场，这仍然是工会运动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第九章·

七十年代的党派和政治结构以及国内政治斗争

法国八十年代初的特点，是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了最大左翼政党之一的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为国家总统。这一胜利在提前的国会选举中又得到加强，结果形成了由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左翼力量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令人信服的胜利，乃是法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和社会—心理过程的反映。这些过程是：都市主义化、工业化、城市小私有者阶层受到排挤、新中间阶层的发展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分化的加剧、普通职员的无产阶级化及由此引起的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危机（见第七、第八章）。

社会—阶级结构和群众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决定了法国六十年代所形成的党派—政治体系的深刻变化。在第五共和国的戴高乐时期，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乃是统治集团的主导力量。1974年以前，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还具有主导党的一切特征：它长期掌握政权；在议会选举中明显优于其它

党，由于多数制选举办法，它的席位比重高于其得票比重；最后，在政府、高级行政机关以及地方情报手段方面，它都处于统治地位。经过1968年5—6月剧烈的社会—政治动荡，1969年4月戴高乐的国家行政区划和参议院改革方案在全民投票中惨遭失败，第五共和国奠基人夏尔·戴高乐引退，在1969年的总统选举中乔治·蓬皮杜获胜和社会党惨遭失败之后，传统的党派—政治体制便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节　党派政治斗争发展的主要趋向

1968年5月至7月明显地所反映出来的法国社会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尖锐地提出了以民主制度取代国家垄断的政权问题。法国劳动人民在“红五月”所表现出的活动规模、力量和战斗性，实质上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家垄断制度的极为广泛的人民运动。它证明了群众性的反垄断力量普遍增长，表明了广大群众对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的渴望。但是，这一运动直接的政治成果，只是使统治集团阵营内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整个说来，在国内，右翼力量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因为他们能够利用部分劳动者对反对派采取实际政治行动的能力丧失信心这一情绪（从1967至1969年，相信左派政党能够统一的人数减少了一半）①。因此，制止左翼反对派的分裂，就成了发展反垄断斗争，使政治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民主阵营方面转化的决定性条件。

---

① ［法］《测量》，1970年，第1—2期，第39页。

法国共产党乃是为工人阶级与法国社会所有反垄断政权的阶层和集团的统一而斗争的主导力量，它清楚地意识到制止分裂的必要性。5至6月危机之后，它继续坚定地贯彻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制定出的建立所有民主党派和组织广泛联盟的方针。七十年代初，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取得了成果：各种左翼力量统一的趋势已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决定性特点。法国国内整个政治形势急剧改变。

在这个时期，法国社会党开展的各种活动也促进了这一事态的转变。以吉·莫尔为首的旧社会党领导集团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政策，同国内形势以及社会党人从中寻求支持的那些劳动者阶层的情绪和愿望发生了愈来愈大的矛盾。在5至6月危机中，上述政策完全破产了，1969年总统选举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惨败就是证明。面对全面崩溃的威胁，社会党被迫实行重大改组，并对党的思想纲领特别是政治方针进行了重大修改。在1971年埃皮内代表大会上，由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和制度大会党”（以密特朗为首的左翼分子政治俱乐部的联合会）的合并，产生了新的法国社会党。它的第一任书记密特朗，是同威信扫地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脱离关系的“第四共和国”中为数不多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是国内著名的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是共和民主传统的积极支持者和私有制度的反对者。密特朗的名字与左翼力量统一思想的联系，对于他的政治声望有着特殊意义。196年，他充任所有左翼力量（其中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统一候选人参加了竞选。社会党的新领导者宣布，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即反对同资产阶级力量无原则联合，反对“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的方针，提出了“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口号。在埃皮内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密特朗声明，社会主义以

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结构民主化为前提。他主张所有左翼力量的统一，主张同共产党在选举和组阁方面达成协议。

1972年6月27日，共产党和社会党签署了关于所有左翼力量共同执政纲领。此后不久，同激进派和激进社会党脱离关系的左派激进者运动也参加了这一协议。纲领规定，要在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实行深入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在纲领的社会经济部分，写进了许多共产党多年以来所坚持的条款，如：关于银行和大工业垄断公司国有化，大幅度提高无保证劳动者阶层的生活水平，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服务，扩大工会权利等。纲领规定的基本措施是：大大限制垄断资本的势力，扩大各种劳动者组织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影响。

在制定文件时，各左翼政党都极力要人同意自己有关未来民主政府政策的观点，从而使共同纲领带有妥协性质。在许多条款中，特别是在国家制度和对外政策方面（保持“第五共和国”宪法，法国仍参加大西洋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反映了社会党人的影响。

各左翼政党之间所缔结的协议，对国内政治形势有重大影响。左翼联盟成了团结所有对垄断组织的专横和执政多数派政策反民主倾向不满的力量的轴心，给他们指出了实现社会民主改革的现实前景。结果，在左翼联盟成立的头几年，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左派政党在共同执政纲领的基础上参加了1973年3月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就得到了1,120万张选票，占投票总人数的46.2%①。从而，左

① ［法］《世界报》，1973年3月8日。

派在国民议会的议席大大增加。法国共产党的议员增加了一倍多。社会党和左翼激进活动的议席也超过了1968年的水平。

1974年总统选举，左翼力量的统一候选人密特朗在第一轮投票时得到1,100万张选票（占43.2%），第二轮投票得到1,290万张（占49.2%），取得了1945年以后左翼力量共同参加选举以来的最好结果。由于左翼力量克服了分裂，形成了“统一的态势”。因此，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左翼激进组织共同取得的选票，远比这些党和组织单独参与竞选所取得的选票总和多。

左派联盟的建立，决定性地促进了所有中右翼力量的联合。在左翼政党所取得的胜利威胁下，一些政党和组织先后加入执政派联盟。除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外，1962年加入的有以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独立共和国国家联盟”，1969年加入的有以热·德尤阿米为首的民主和进步中心，1974年加入的有两个中派政党，它们是“民主中心”和“左翼激进者组织”。自从中派加入执政多数派后，执政联盟就失去了其复兴的全部后备力量。1974年后，它既无处寻找新的政治力量，也无处寻求新的政治干部。

在第二轮选举中仅留有两名候选人的总统选举制度以及在两轮之间各党派可以撤消自己的候选人而让位于“同类”政治组织的同名多数票表决制度，促成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和主要政治力量围绕着左派民主党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这两极的组合。所有这些导致了两个对立政治联盟的形成。

中右翼多数派联盟的建立，早在蓬皮杜总统执政期间（1969—1974年），就已导致执政党营垒内部团结的削弱。那时，戴高乐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正统

派、自由主义派和左派。以前任总理米·德勃雷为首的正统戴高乐主义者，鼓吹要对戴高乐思想无条件地信仰，是民族独立的狂热辩护者和对西欧联邦结构的强烈反对者。这个派别对鼓励中派主义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对独立共和主义持谨慎态度。部分正统戴高乐主义者，对蓬皮杜背离戴高乐政治路线表示不满。在正统戴高乐主义者中间，有许多是戴高乐运动的“贵族”，属于戴高乐主义政治活动家中的一代军人，他们对于依靠中间派来扩大多数的前途越来越不安，因为后者会破坏他们对于权力的垄断。

自由戴高乐主义派首脑（沙邦-戴尔马、奥·基夏尔、阿·皮尔费特和埃·富尔等等），采取了较之戴高乐主义的固定原则更为实用主义的立场。自由戴高乐主义者比正统戴高乐主义更具改革精神，甚至在正统戴高乐主义者中间也存在改革方针的拥护者。许多自由戴高乐主义者支持沙邦-戴尔马的“新社会”纲领。

蓬皮杜对戴高乐某些改革思想的背离，以及在1972年沙邦-戴尔马辞职以后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国家制度向更加保守主义的转变，使左翼戴高乐主义者从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中分裂出来。早在1969年，从戴高乐党中已经分化出一个左翼戴高乐主义者派别（劳工民主联盟）。后来，这个派别的几乎所有主要领袖，都转到反对第五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上去了。

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在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几代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即“历史戴高乐主义者”、“贵族”戴高乐主义者和青年戴高乐主义者（所谓“年青的狼”），后者在蓬皮杜执政年代的戴高乐主义运动中占据关键地位，它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人，是蓬皮杜去逝之前占据内务部长职位的雅

克·希拉克。希拉克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同“贵族”戴高乐主义者相比，他以及“新戴高乐派”较少注意戴高乐思想。然而希拉克和他的同伙毫无疑问都是秩序、纪律和国家权力思想培育出来的保守主义者。

这样，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就以一种分化状态迎接了1974年的总统选举。蓬皮杜的猝死，加速了执政多数派及戴高乐运动危机的到来。

1974年总统选举，执政多数派推举了两个主要候选人：得到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正式支持的沙邦-戴尔马和德斯坦，后者不仅得到独立共和派、让·勒卡尼埃的民主中心的支持，而且得到以希拉克为首的由13名戴高乐主义派代表组成的集团的全力支持。德斯坦利用戴高乐运动分裂的机会，团结了执政多数派选民中的中间派和保守分子，很轻松地战胜了沙邦-戴尔马。

1974年总统选举以后，执政多数派的影响继续下降。1974年末至1975年初的民意测验表明，左翼力量将能赢得全部选票的半数以上。1976年3月的县选举，左翼力量取得了52.5%的选票，这是他们影响进一步扩大的证明。1976年11月进行的部分议员选举也证明了这一趋向。最后，在1977年3月组织的市镇选举中，左派在3万人以上的城市中都获得了50%以上的选票（和自然环境—生态保护运动一起占了52.5%）。在全部221个市镇中，他们在157个市镇（其中包括61个新的城市）取得了胜利，失掉的只有3个城镇①。

所有这些选举结果，就其本身的意义来说，远远超出了部分举棋不定的选民选票通常根据“行情”再配置的界限。

① [法]《政治与议会杂志》，1976年，11—12月号，第21—30页；[法]《观点》周刊，1977年，第236期，第60页。

它们反映了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经济危机影响下就日益加强的群众性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反映了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由实际选择现政权所引起的社会各阶层立场的重大变化。群众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急剧提高（据民意测验资料，关心政治的人员比重从1969年的20%增加到1977年的63%①）。群众对左派政党的支持具有更加积极的性质。例如在1972年，有45%接受民意测验的左派选民表示，他们选举左翼联盟是为了表示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仅有22%的选民表示同意左派纲领；但到1977年，有54%的选民表示，他们之所以选举左翼联盟，首先是支持其思想和纲领②。

1972—1977年，左翼联盟实际上已在法国社会各个群众阶层和集团中都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工人阶级对左派政党的支持大大加强。1977年，71%接受调查的工人表示，左翼力量掌权对工人阶级是幸福的③。在职员、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行政干部中，左翼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在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中间，左派联盟的地位仅在较小的范围内有了明显加强，近2/3的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左派政党掌权后威胁私有制和“经营自由”，因而继续支持右派④。

当然，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对左翼联盟支持的积极程度和可靠性是不同的。这种支持的动机以及对共同纲领某一条款的态度也常常是各式各样的。不仅左翼选民，而且许多右翼政党的选民也支持左翼联盟的下述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水

① [法]《测量》，1969年，第1—2期，第12页；
[法]《政观察家》，1977年，第670期，第33页。
② [法]《左派胜利之时……》，巴黎，1973年版，第39页；
[法]《测量》，1978年，第2—3期，第155页。
③ [法]《快报》，1977年，第1375期，第51页。
④ [法]《快报》，1978年，第1387期，第23页。

平，缩小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通过规定个人收入的最高限额），降低享受养老金的年龄起点，增加对大产业的税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得到了工人和普通职员的最广泛支持。因为他们把国有化视为加强劳动者社会地位和防止解雇的保障。大多数工人、职员和那些人数最多的知识分子集团（如教师），把左派掌权和实现共同纲领看作是解决使人焦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可靠手段。

换言之，在左翼联盟支持者中，那些中间阶层中具有较多特权的集团，特别归入“高级干部”这一范畴的职员和知识分子，对左翼联盟的态度具有矛盾和两面性。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同意共同纲领中最激进的社会经济原则，认为诸如国有化和提高利润税等措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和更大的通货膨涨。上述见解，反映了资产阶级技术治国论思想对这个阶层思想意识的影响，害怕自己的物质状况和企业纪律在左派掌权后受到损害也加强了这种想法。这些人支持左翼联盟的主要动机是，他们认识到了法国社会的危机状况，看到执政多数派不能摆脱危机，不能把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从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官僚主义机构的专制管理下拯救出来。1977年被调查的“高级干部”有67％认为，左派掌权以后能够进行“必要的改革”，76％认为，这是对统治阶级的一次警告①。工程技术和行政干部期待，在由左派胜利引起的制度民主化过程中，能够加强自己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地位。

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状态的阶层，包括国家机关的职员，他们之所以左倾化，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在七十年代，左派政治力量急剧加强，他们把社会发展的远景及本身

① ［法］《观点》，1977年，第244期，第81—88页，

的未来同中间阶层越来越经常地联系起来。“左倾化”——即许多过去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也向左翼（主要是向社会党人）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稳定和动摇的性质。其中有一部分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政治选择，持观望态度。社会政治意识变动的方向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战略；这种或那种政治组织所传播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政府的具体政策和左翼力量选择的纲领。

中右翼联合的危机，是促使左翼力量影响增强的重要因素。1974年总统选举胜利以后，德斯坦虽然占据了总统的优势，但在会议中却不具稳定的多数。由于他自己处于少数地位，他的支持者不能保证得到国民议会执行机构的支持，也不能以占优势的多数派集团的资格代替“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当然，戴高乐运动仍保持了执政的多数；但它已不是“总统党”。当了部长的戴高乐主义者，只能以个人名义进入政府，而没有党的委任状。

为了建立会议中的多数，德斯坦需要在两种政治战略中作出选择：或者解散议会并利用戴高乐阵营分裂的机会，大大扩大“独立共和国国家联盟”的选举基础；或者做出一切努力团结占多数的四个执政党团（戴高乐主义者、独立共和主义者、中派和右翼激进分子）。总统选举以后，德斯坦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战略。

为了改组执政多数派内部关系，德斯坦试图借助于1974年12月14日当选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总书记的希拉克总理，以使戴高乐运动服从自己，使它“吉斯卡尔化”。与此同时，共和国总统还一步一步地把戴高乐主义者从政府、国家高级机关、国有化企业的领导岗位和公用信息机构中排挤出去。独立共和派和中派的德斯坦的直接支持者，得到了

政府和行政管理职位中的最大一部分。为了抵消“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在执政多数派中的影响，吉斯卡尔派试图联合所有中右派政党。在议会一级，建立了包括所有中派议员在内的“中派联盟”。1976年5月，勒卡尼埃的民主中心实现了联合。社会民主中心党新的领导人勒卡尼埃宣布了他同独立共和主义者结成紧密联盟、联合所有中派组织的目标。独立共和主义者同样打算改组自己的党，使它成为群众性的、同戴高乐主义者有竞争能力的党。1977年5月在福列日尤斯市举行的“独立共和主义者国家联盟”代表大会上，该党改名为“共和党”。年青的技术治国论者日·普·苏阿松成了该党的总书记。该党纲领的轴心，是对总统的忠诚。

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领导人，从中派联盟的建立方案中看到了使戴高乐运动变成二等政治力量的危险。国家总统依靠中派扩大多数派的尝试，对于作为明显右翼的戴高乐运动来说是一种政治孤立的威胁。

从1976年春开始，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领导人希拉克拒绝无条件地支持总统的政策，并提出了自己关于摆脱法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方案。如果说爱丽舍宫采取的是有利于加快生产集中和积极推行社会改革政策的决定的话，那么在马提翁大厦（总理官邸）则越来越经常地倾听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意见和中小企业主的抗议。

在此时期，法国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跨国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现代派和风向派，他们对诸如向跨国公司提供税务优惠、采取刺激出口措施以及政府所执行的社会政策感到满意*①。二是中

---

* 实例可参见对法国大公司136名领导人民意测验的材料。

① ［法］《情报》，1975年6月16日，第40—50页。

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开始反对政府的制度。1975年末，中小企业主全体代表大会主席勒·让扎木普尔指责共和国总统成了“中产阶级大多数灾难的根源”，并号召“企业主动员起来对付经济社会主义化的威胁”①。让扎木普尔建立了“企业主和企业领导者联盟”。在几周的时间里，就有25,000名以上的企业主、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加入该组织。

1976年春，政府在国民议会上颁布投机利润（倒卖股票、黄金、不动产和艺术品所获利润）税法案以后，中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活动加强了。从1976年2月至4月，总统在商人和手工业者中的拥护者减少了10%，在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中间减少了90%②。几乎所有中小资产阶级组织都提出抗议，反对实行投机利润税。不动产所有者全国联盟表示，“法案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公平。”包括有10万家中小企业的辛迪加首脑德·哥本断定：“先进的自由社会，这只不过是我们通向死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③。国民议会讨论会实际上超出了有关投机利润税问题的范围。“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议员团，利用辩论的机会来表明自己对整个制度的态度，从而成了法国资产阶级保守集团利益的辩护士。

七十年代，在戴高乐派的代表中，这样一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比重提高了，他们中间贵族出身的人士比共和派领导核心要少，同官僚上层的联系也较少，毕业于二流学校，但对保守观点的信奉比吉斯卡尔派人士还虔诚。

由于总统的改革活动吓坏了具有保守情绪的选民，却未

---

① ［法］《回声报》，1975年12月10日，第10版。
② ［法］《剧幕》，1976年，第3—4期，第12页。
③ ［法］《快报》，1976年，第1294期，第36页；
［法］《观点》，1976年，第188期，第68页。

能诱惑对保守情绪的反对者，所以希拉克呼吁推翻社会改革计划，进行反对左翼政党的“十字军远征”，反对同社会党的任何妥协。他提出了摆脱困难政治形势的“决定性”方法：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从而干扰左翼联盟掌权。

总统和总理间的冲突，导致希拉克在1976年8月25日辞职。卸任总理提出了把“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改组为“广泛的人民运动”的口号，并于1976年12月5日建立了“保卫共和国联盟”。在该党成立大会上，希拉克实际上被一致推举为党的主席。

1977年1月19日，希拉克提出要做巴黎市市长候选人，从而向独立共和主义者支持的代表、国家领导人姆·多尔纳诺提出了公开挑战。执政多数派投入了竞选活动，但缺少必要的联合和团结。因而，希拉克当选为巴黎市长，执政派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的市政选举中都遭到了失败。

1978年2月，在德斯坦的倡导下，建立了“法国民主联盟”这一竞选联合组织，它把共和派、社会民主人士中心、激进党以及激进社会党人联合了起来。执政联盟的这两个派别（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在许多早已决定提出统一候选人的选区，又提出了新的候选人。执政多数派之间的竞争，波及到大多数选区。这两个派别，也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并与左翼力量进行共同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许多方面采取不同的政治战略，其宣传也针对着不同的劳动者阶层。

沙邦-戴尔马卸职以后，当时法国总统蓬皮杜的主要方针是，加强政府对自己保持忠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农场主、食利者等社会阶层的影响。他利用法律和秩序等口号，指责左派力量是无政府主义和无秩序的代表，指望以此把动

摇不定的选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随着政权的转移，德斯坦提出的政府政策目标是：吸引反对派的选民，依靠中左派（左派激进分子和部分社会党人）来扩大多数派阵营，分裂左翼联盟，在中派和中左派党团联盟的基础上，建立除法国共产党和戴高乐运动保守势力之外的“自由主义”多数派。换言之，德斯坦试图借助于中间力量来管理法国。注重变革的吉斯卡尔主义者力图把具有中、中左情绪的新中间阶层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斯坦认为，法国的社会变革，会使“轮廓模糊不清的巨大的中派集团”得到发展，并能坚持不逾、和和平平地使整个法国社会融为一体”①*。德斯坦任职初期采取的改革措施，首先是满足新中间阶层的要求和愿望。这主要是，从18岁起有投票权，1974年12月份通过的禁止堕胎法，1975年7月通过的简化离婚手续法，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保护等。与此相适应，他还提出按英国方式确立反对派的地位，避免对反对派进行尖刻的论战式攻击。

吉斯卡尔主义者的欧洲式自由主义的思想格调，适合法国那些越出国界变成跨国公司的垄断组织的利益和愿望。在吉斯卡尔主义者看来，法国要适应国际竞争的新条件，就要完全取消保护关税措施、扩大跨国公司活动的范围、执行加强西欧一体化和在经济上同美国有一定接近的政策。吉斯卡尔主义者赋予垄断组织以特权地位，并且断定：人为地保护无盈利企业，是与“先进的盈利社会”原则相矛盾的。他们主张把家庭式农场逐渐联合为商业化的农业企业，停止对无利

① 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的民主》，巴黎，1976年版，第56页。

* 斯塔列留·阿，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最亲近的顾问，他认为：“法国期望借助中派管理国家，以便在中派集团周围建立民主社会。政权的交替将在或左或右的中派集团内部实现。

的中小企业进行补贴，使企业变为垄断公司的附属承包单位。换言之，传统的独立共和主义者、社会民主分子和左翼激进派，在六十—七十年代都放弃了中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而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审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战略。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在“独立共和国国家联盟”的政治机关及其议员团中，技术治国论者和垄断组织代表的比重增加了。吉斯卡尔主义者同老一代独立共和分子的不同之处是：他们是技术治国论者，推行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他们呼吁要效法美国发展工业的办法，鼓吹合理化、效率和现代化等思想。随着中派组织的领导层愈来愈接近于权力门槛，来自资产阶级集团的人员比重提高了。在法国民主同盟成立的前夕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共和党和社会民主中心的议员团几乎完全合而为一。

早在六十年代末，中派就曾提出同“权力过分集中”和国家机构中的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专横作斗争的口号，并宣布把努力确立“社会民主”和逐渐减少社会的不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从而他们早先一步提出了吉斯卡尔主义者的“先进自由社会”这一概念的基本原则。1974年以后，大多数中间派领袖都背离了他们在《法国的民主》一书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

相反，戴高乐主义者关于巩固政权、加强秩序、呼吁保持传统价值等口号，却深入到法国社会具有保守和具有民族情绪的阶层以及最害怕某种变革的社会阶层，如农民、小商人、中小企业者、暮年人、虔诚的天主教徒等。希拉克也极力向法国资产阶级中具有自由主义情绪的人士鼓吹，共和国总统的战略会导致社会党的统治，其危险性并不亚于法国共

产党。同时，希拉克还利用各种民族主义口号以及诸如消灭失业、迅速改善最贫困劳动人民阶层的生活水平等许诺，试图把工人阶级中政治落后的阶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戴高乐主义者和中派似乎交换了位置：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反映法国统治阶级最"现代"派利益的戴高乐主义成了保守资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代表；而在"先进自由社会"口号下联合到法国民主联盟中去的中派联盟却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中间跨国公司有着密切联系的那一阶层的利益。

直接依靠技术治国论集团和部分垄断资产阶级、推行限制中小资产阶级利益政策的法国民主联盟的拥护者，极其需要从七十年代中期就标榜是"中间的法国人"、中小企业家和地方利益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支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要把握正统中间阶层的选民，不使他们转到左派方面去。同时，这两个派别在战略上、价值观上的分歧，使得执政多数派内部的矛盾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长期因素。

这样，以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作为主导党团的执政联盟，形成了一个实质上有两种政治力量和两个领袖的新体系：一个是依靠法国民主联盟和掌握执行权力的吉德斯坦；一个是控制着强大的执政多数派党团和国民议会中最大议员团的希拉克。

执政多数派的两个党团——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之间角逐的日益尖锐化，1977年由于左翼联盟的分裂引起的左翼阵营之间、法国社会党同法国共产党之间矛盾的深化，导致了由两极政治体系向四级结构的过渡。1978年议会选举表明，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四种政治力量（法国民主同盟、保卫共和联盟、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其中每一方几乎都获得了20%以上的选票。1978年以后，这四个主要党

派开始执行相对独立的政治战略，在总统选举中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他们不仅为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奋斗，而且还为改变这两种政治联盟内部力量的对比而奋斗。虽然，这个斗争过程并没消除左和右之间的界限，但这个界限，和德斯坦当总统初期相比，变得愈来愈脆弱和模糊了。

第二节　中右翼联盟的危机

执政多数派各党，在组织机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加入法国民主联盟各党的特点是组织性较差，其主要支柱是一些上流人物（市长、高级顾问、众议员、参议员）。实质上，它们只不过是议员活动机关，只是在竞选时期才活跃起来。

为了巩固在执政多数派中的地位，共和党需要使自己的组织机构现代化，变传统的“干部党”为拥有自己独立的机关和众多积极分子的群众党。1977年以后该党改组的设想是，取得共和党对上流人物的更大自主权，从而使自己完全遵从于国家总统，增强其积极分子加入党的领导机关的可能性。

为招收新党员，共和党开展了广泛的运动。当然，在这方面，同拥有党的干部培养学校、强大的技术手段、在企业和研究中心支配着250个工会分部、具有广泛读者的党的报刊的保卫共和联盟相比，“吉斯卡尔党似乎只是那种对抗职业命令分子的俱乐部”①。但是，1978年议会选举后，共和党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978年9月，300名党的干部在巴黎接受短期训练，10月份开展了支持法国民主同盟的运

① ［法］《政治与议会杂志》，1980年，7—8月号，第64页。

动。1978年12月，共和党总书记雅克·布朗访问了68个组织，召集了500次会议，举办了43个讲习班。由于所有这些措施，有2.2万名新成员加入了共和党。1979年10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是共和积极分子派诞生的主要标致之一。大会开幕的那天，有大约1.5万名党员出席了会议①。

共和党是法国民主联盟中最大的党。1979年2月，加入联盟的有：直接成员2万名、共和党员14.2万名、社会民主中心成员3万名、远景和现实俱乐部成员28万名以及法国社会进步运动三月选举以后加入法国民主联盟的成员4.7万人。据官方资料，1979年2月法国民主联盟共有24.5万个成员。1979年6月法国民主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取得成功以后，加入联盟的新成员大量增加。1980年2月，联盟领导人宣布，联盟计有30万成员，其中有6万是直接成员②。虽然上述数字未必完全可信，但法国民主同盟人数增加这一总的趋向是不应该怀疑的。

法国民主联盟的联合方式，为吉斯卡尔主义者提供了一定的优越条件，这就是：它作为加入联盟的党可继续在它的传统支持者各社会阶层中间进行独立的活动，同时如同大党和“总统党”一样，它作为法国民主联盟的榜样，又使之能够吸收那些能迎合反左派政治力量的人们。

最初，法国民主联盟只是一个简单又简单的竞选联合体。它存在的现实性仅仅表现为，成立了该联盟的政治会议，勒卡尼埃当选为联盟会议主席，而接近爱丽舍宫的彭顿当选为它的总代表。议会选举后，在国民议会建立了法国民主同盟的议员团体（众议员123名，参议员109名）。联盟成员中，

① ［法］《世界报》，1980年3月18日。
② ［法］《世界报》，1980年3月18日。

有41名大城市的市长，8名地方议会的议长，32名顾问会议主席和819个总顾问①。到1978年秋，成立了法国民主联盟的省会议，选举了省会议主席，联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1979年1月，召开了联盟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后来，联盟领导人还为欧洲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右翼激进派提出单独的候选人名单）。

法国民主联盟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要求它成为一个听命于德斯坦、无条件支持总统思想的工具。为了不损害国家首脑的权威，“总统党”需要团结，在它内部不应该象社会党那样存在各种派别。在把法国民主联盟改造为“总统党”（在戴高乐和蓬皮杜时期共和国民主人士同盟曾是这种党）的过程中遇到了在加入联盟时希望有一定自治权的那些派别的抵抗。法国民主联盟的一些成员党，企图阻挠欧洲选举后在德斯坦同意下由联盟领导人拟定的加速统一的过程。认为只有建立灵活的权力结构才有可能保持联盟的团结，既不在联盟内部形成各种派别，同时又保证各成员党有一定的独立性。

法国民主同盟的态势，保证了三个主要政党（共和党、中派和右翼激进派）在联盟最高机关——全国会议中具有均等的代表权。要在会议上通过决议，必须有3/4的多数票。因此，法国民主联盟内部的权力体系，具有集体的性质。各种决议，是在各种党派妥协的基础上协商通过的。这种灵活的结构不会威胁各成员党的独立性。

法国民主联盟内部在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也阻碍了它的最终统一。联盟代表大会代表中间的法国社会

① ［法］《世界报》，1980年3月18日。

学家进行的分析[①]表明，联盟领导集团的内部属性是共同的，他们基本上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和特权阶层（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工业家和大商人）中的成年男子组成。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盟的代表则是一些欧洲主义、反共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子的联合。

与此同时，每一个党派也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带到法国民主联盟之中。社会民主人士中心的代表和右翼激进派，属于左翼中间派；共和主义者则属于右翼。社会民主人士中心的代表，在维护国营经济部门和积极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继续推行战后时期人民共和运动的统制路线。他们反对道德自由主义化，明显倾向于对基督教传统的继承。相反，右翼激进派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统制思想，而是在道德风尚方面持愈来愈自由主义化的态度。共和主义者则对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运动抱有强烈的敌视，而对戴高乐主义则很有好感。相反，右翼激进派和中派，对保卫共和联盟却很反感，同时，左翼激进派又对法国社会党特别是“左翼激进派运动”抱有强烈的偏好。法国民主同盟各派代表在意识状态上的某种程度上的分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党对自治的意向。

法国民主联盟的许多领导人（勒卡尼埃、苏阿松、斯托列留、彭顿、富尔卡德、左翼激进派领导人斯坦基和巴里阿尼），支持依靠左翼中间派扩大执政多数派的思想，呼吁要吸引左翼中间派选民和进行社会改革。这一派把保卫共和联盟看作是右的、专横的、民族主义党。在共和党中有广泛代表性的法国民主联盟的另一个派，则力图实现执政多数派的

① ［法］《世界报》，1980年3月22日。

统一，害怕它向左扩展。但是，法国民主联盟的这两个派别，与其说是进行竞争，不如说是相互补充。一方面，吉斯卡尔主义者力图把戴高乐运动的选民维系在自己的营垒中，同时，限制保卫共和联盟的影响；另一方面，法国民主联盟又力图以自由主义和改革的面貌出现，以吸引左翼中间派的选民。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不统一，法国民主联盟没有自己独立的学说。如同戴高乐时期的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那样，他们公开宣布自己的纲领，表示无意参加意识形态的论战。正如彭顿说：联盟没有“虚构的整体的世界观念，不是以某种社会范畴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建立起来的党”①。法国民主联盟制定的不是总体性理论，而是根据政治形势制定局部性规划。

法国民主联盟意识形态在实际上的统一，是靠经常借用德斯坦所著的《法国的民主》②一书的思想来作保证的。在法国民主联盟章程中规定：“它信赖《法国的民主》一书所表达共和国总统的方针”。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法国民主联盟的职能与其说就是制定自己的学说，不如说是捍卫共和国总统的思想。

戴高乐主义党的组织结构是另一种类型。它由执政党转变为半反对派，不能不影响到它的组织形式和活动风格。保卫共和联盟必须改变组织结构的形式，要象法兰西人民联盟那样按等级原则建立包括成千上万积极分子的群众性政党。同战后经常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不同，“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一下子就成了执政党。它在支持总统活动的同时，还注意到要限制新成员大量涌入党内，害怕一

① [法]《政治与议会杂志》，1980年，11—12月号，第64页。
② [法]《政治与议会杂志》，1980年，11—12月号，第63页。

些积极分子变为制定政策的第二个中心①。

由于失掉了国家总统和总理的职位以及在选民中丧失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戴高乐运动需要放弃给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带来成功的“选民党”模式。为了重新掌权，它一方面需要有大批盟员和成千上万能够把党的口号贯彻到群众中去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党又需要有善于组织总统竞选活动的精力充沛的领袖和强大的党的机关。

在保卫共和联盟成立大会以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招收新党员的活动。据该党的正式资料，保卫共和联盟成员从1976年11月的28.5万增加到1979年3月的76万人，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其它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的社会—职业构成是：农民占11.1%（共和党为9.6%），自由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及商人占25.1%（共和党为12.6%），工业家和高级行政管理干部占4.5%（共和党为4.1%），中级管理干部和官员占14.5%（共和党为22.1%，其中包括15.4%的国家职员），贸易和商业办事处职员占19.9%（共和党为18.2%），工人占11.3%（共和党为8.6%），没有固定职业者（主要是领退休金者）占13.6%（共和党② 为24.8%）。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组成已青年化和女性化。它与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相比，尽管劳动者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工人的比重还是高于其它资产阶级政党。同时，在保卫共和联盟中，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数急剧增加。在这方面，现代戴高乐运动与其说接近于共和民主人士

① ［苏］格·姆·法捷耶夫：《现代法国资产阶级改革战略》，莫斯科，1975年，第104—106页。

② ［法］《世界报》，1979年3月24日；
［法］《政治与议会杂志》，1980年，7—8月号，第38页。

联盟，不如说更接近于法兰西人民联盟。保卫共和联盟是商人、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占优势，按左派报纸《晨报》的话说，它是一个“保守模式”①。相反，共和党中国家职员的比重却很高，这明显地说明了它同国家的密切关系。

在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执政时期，是按“顾客原则”对党员进行改组。加入党的人往往是为了对戴高乐派的代表和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领导所给予的某些好处表示感谢。随着保卫共和联盟失去权力和变为半反对党，戴高乐派积极分子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新党员更多的不是党的顾客，而是党的积极分子，有了意识形态选择的性质，戴高乐派根据新戴高乐主义的基本思想，按照社会和国家的一定概念吸引新党员，把对左翼极端敌视，反共主义以及有“坚强个性的信仰”，使保卫共和联盟的拥护者联合起来。加入保卫共和联盟的人，是因为：“为了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和保卫个性自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②。

保卫共和联盟的多数成员，从未加入过戴高乐运动。联盟的拥护者声称：“我们不是戴高乐主义者，而是希拉克主义者”③。保守主义、反对变革是这些人的特点。他们特别强调秩序的必要性，多半是强权国家和私人教育制度的拥护者，反对德斯坦在道德风尚方面的改革。就其政治观点而言，保卫共和联盟多数成员更接近于正统的戴高乐主义。他们认为，政府还不够坚强，对左翼过分忍让，政府的对外政策造成了国家以及国家政治、军事地位的降低。根据法国社会

① ［法］《晨报》，1980年7月28日，第2版。
② ［法］《观点》，1979年，第340期，第57页。
③ ［法］《费加罗报》，1978年12月22日。

学家的统计，在保卫共和联盟中有反吉斯卡尔情绪的积极分子占党员总数的50％至80％。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表示：在希拉克竞选失败的情况下，他们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将不投德斯坦的票①。

作为社会—政治信仰上保守主义者的保卫共和联盟成员，其政治活动比其它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积极得多。戴高乐主义者通常不局限于向党的金库交纳党费，而是在群众中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党的号召就是“到处存在”！党号召自己的党员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会议、家长委员会、青年俱乐部，在某些企业建立基层组织。

这一时期，新戴高乐主义运动，没能达到战后戴高乐主义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那种群众性、组织性和积极性。只是在巴黎市、巴黎地区和某些大城市，保卫共和联盟才有一些和左派党进行竞争的强有力的地方组织。

同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相比，保卫共和联盟的组织结构越来越集中化。如果说从前戴高乐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国家总统、总理以及遴选进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领导机构的戴高乐贵族小集团（“寡头”领导型式）的话，那么保卫共和联盟则是按照法兰西人民联盟过去所固有的“独裁”方式进行活动。1976年以后，所有管理杠杆都集中在党的主席之手：他个人指定实施常务领导的高级机关——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保卫共和联盟政治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也由他个人挑选。

希拉克虽然充分掌握了党的机构，但他不能不承认保卫共和联盟的议员团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戴高乐和蓬皮杜任

① ［法］《世界报》，1980年3月20日。

总统期间，大部分戴高乐主义的议员都是作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的候选人简单地由党派到各选区。他们在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性很薄弱，在选区没有自己的支持者和稳固的地位。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党的领导和政府。这样，就使得他们难以应付竞选，甚至有部分人转移到反对派方面去。戴高乐派议员，利用10—15年的时间建立了自己的选民网，并成了省区的知名人士，即在选区成了享有声望的人物。结果，在第五共和国整个历史上，当时的戴高乐派的议员团对党的领导拥有最大的独立性，这突出表现在1978年4月国民议会议长的选举上。当时在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团的会议上，该党提出由埃德加·富尔作为戴高乐派的正式候选人。与此相抗衡，沙邦-戴尔马提名自己为候选人，他不仅得到法国民主联盟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而且还至少得到30名保卫共和联盟议员的支持，从而当选为国民议会的新议长。

执政多数派内部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同加入多数派的各党选民的相应变化相关联的。分析1978年在殖民地所属国所进行的议会选举结果（不计海外选票）表明，执政多数派两个派别的选票基本持平：在2,780万票中，保卫共和联盟得640万张，占22.6%（1973年为23.9%）；法国民主联盟得600万张，占21.5%（1973年改革派和独立派占19.5%）。选举使执政多数派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国民主联盟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极为有限的：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在多数派议会党团中的比重，总共才从57%降为52%①。当然，戴高乐运动在执政派联盟中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党；但是，自1974年失去了总统和总理的职位之后，戴

① ［法］《新社会主义者杂志》，1978年，第32期，第30、38页。

高乐派的选票只比1973年选举减少了1.3%。

戴高乐主义在1978年的议会选举中，相对来说，所取得的成功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保卫共和联盟通过自己的领袖、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党的机构和善于组织宣传运动的整个积极分子队伍，保持住了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保卫共和联盟具有自己强大的议会组织，也有助于它在地方上“扎根”。

执政派在议会选举中的角逐，与其说是在党派之间进行，不如说是在贵族之间进行。在议员竞选中，那些在任期内经常关心自己选区的议员，会提高自己在选民中的威望，从而取得较其他候选人的一定优势。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为渗入到法国政治生活中去而曾同正统资产阶级政党的贵族们进行过厮杀的戴高乐主义，在1978年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议员才得以生存下来。

但是，对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后就会看出，如果说保卫共和联盟能够保住过去的地盘，并使自己的多数议员重新当选的话，那么在占领新区方面它的能力就比法国民主联盟弱。年青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偏向于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总统党”，而不是保卫共和联盟。由于美好职业前景和德斯坦的新资本主义思想的吸引，使得大官僚、高级管理人员和著名的律师都加入了共和党。正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福巴尔所说的：“1974年以后，在争夺选民的战斗中，戴高乐运动打的是防御战。当然，这个退却是在明智的指挥者率领下完全有秩序地进行的。但是，这里说的毕竟是退却，要使这次战斗具有进攻的色彩，就要看希拉克的全部天才”①。

① ［法］《1978年立法卷宗》；见［法］《晨报》，1978年，号外，第11页。

从社会阶级的构成来看，戴高乐运动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点。在七十年代，它与传统的中左翼政党的界线已逐渐消失。尽管占多数的右翼中间派中两个流派的领导人在许多方面执行不同的政策，并借助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但到1981年总统选举，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的选民，总的来说是来自于同一社会成分。1978年议会选举前夕，两党选民的姓别、年龄和社会结构是相类似的。这两党的选民中青年（从18岁至24岁）的代表性小，而50岁以上的老年人却占有优势。在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的选民中间，很大一部分是特权阶层和小私有者阶层——企业主、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教授、农场主、商人和手工业者。

早期戴高乐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选民中雇佣劳动者的比重相当大。1978年，工人投保卫共和联盟票的只占14%，而投法国民主联盟票的占16%①。如果把执政多数派两党选民基础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在保卫共和联盟选民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仅占有极小的优势；而法国民主同盟则在科技、行政管理人员中占据某些优势。

如果说左派选民主要赞成改造法国社会，改变政权的性质和实现左派关于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建议的话，那么右派选民的要求则具有消极性质。他们主张首先反对左派提出的共同执政的纲领。同时法国民主联盟的选民更多的是倾听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左翼政党掌权以后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断言：生产下降，经济生活官僚主义化，通货膨胀加剧，法国工业竞争能力下降。而保卫共和联盟则主要诉诸于选民的

① ［法］《新观察家》，1978年，第702期，第58页。

反共产主义偏见，使他们相信法国共产党在左翼联盟中确立领导地位的“威胁”。

执政多数派的选民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极为单一和保守的。在所有执政党联盟的选民中间，希望对法国社会进行深刻改革的选民占极少数。无疑，戴高乐派选民是最为保守的，但这个差异并不具有实质性。两派选民之间社会心理差别最重要的表现是：保卫共和联盟选民的特点是，支持露骨的沙文主义和专治—镇压政策。1978至1979年保卫共和联盟所宣传的“反欧洲化主义”、“反美主义”也已经不是戴高乐主义选民的特点。1978年9月有68%的戴高乐主义选民，违反保卫共和联盟关于国家在军事领域保持独立的正式规定，赞成建立西欧防卫体系。1978年初，有63%的保卫共和联盟的支持者认为，德斯坦的政策同戴高乐民族独立的概念是一致的，而68%的支持者则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值得肯定的”①。

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选民的社会同类性及它们思想主张的共同性，是建立在反共产主义和对法国社会不进行任何激进的变革基础之上的。这些都使得选民从一个党转向另一个党更加容易。在法国缺乏具有群众影响的稳定的资产阶级政党（英国保守党类型），执政多数派经常改组，妨碍了右派选民牢固地依恋于某一个政党，促使他们的政治选择具有随意性。除了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选民团的核心以及它们的坚强支持者外，执政多数派的选民都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因素作出选择的。

在执政多数派选民中间，就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说，

① ［法］《快报》，1978年，第1419期，第36页；
［法］《世界报》，1978年3月11日。

最突出的是中间派，也就是社会民主派和左翼激进派的支持者。在多数派中，他们赞同（不同于保卫共和联盟和共和党）在政府组成中吸收社会主义者。与保卫共和联盟、共和党的拥护者相比，他们对左派和工会有较少的敌对情绪。他们区别于共和派的政治观点的显著特点是，反戴高乐主义，对保卫共和联盟及希拉克持敌对态度。

保卫共和联盟的领袖一直到1981年总统选举时，尚未能建立起反对政府首脑的选民队伍。执政多数派各党的选民，对共和国总统的态度是忠心耿耿的。1979年2月，在保卫共和联盟中有68%的坚强追随者信任德斯坦，而30%的法国民主联盟的坚定选民，则期望希拉克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戴高乐派的选民中在1978至1980年也认为德斯坦是执政多数派最优秀的候选人。

保卫共和联盟在法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本身，大大限制了希拉克策略的施展。一方面，他不能不经常批评政府的政策，否则保卫共和联盟就会溶化在"吉斯卡尔主义"之中，从而丧失自己的特点和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希拉克又不能同德斯克脱离关系和提出指责政府的议案。否则，不仅多数珍视自己地位的戴高乐派议员不追随他，就是保卫共和联盟本身，由于扮演了中右翼联盟分裂者的角色也会丧失其一部分对国家首脑忠心耿耿的选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戴高乐运动选民中的优势地位及其选民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他的领导者的社会地位及世界观，决定了保卫共和联盟在执政派联合中的地位，阻碍了它最终同政府的决裂和向反对派转化。如果说保卫共和联盟的积极分子和戴高乐主义中的保守派别能够阻止希拉克坚持更强烈的欧洲主义、自由主义和改革立场的任何尝试；那么相反，对法国总统的剧烈

抨击就会引起戴高乐主义的自由主义派和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团的反对，导致希拉克威信的降低和戴高乐运动选民基础的收缩。

从1978至1980年，保卫共和联盟的选民比例持续下降。在欧洲选举时，保卫共和联盟遭受到真正的失败。戴高乐党总共仅得到16.1%的选票，居法国民主联盟（占27.4%）、法国社会党（占23.7%）和法国共产党（20.6%）之后占第四位。

保卫共和联盟未能经得起吉斯卡尔主义者的竞争。在1978年3月，戴高乐派候选人在85个选区战胜了吉斯卡尔派，在欧洲选举时保卫共和联盟仅在5个选区战胜了法国民主同盟①。由于1979年6月10日以前所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使作为民族主义政党的戴高乐运动本身的存在成了问题。与此同时，保卫共和联盟还能局部地限制德斯坦的行动自由。结果，总统和政府不得不以某种形式考虑戴高乐派的立场，同他们达成某种妥协。在议会中，戴高乐主义者和部分具有保守情绪的共和主义者，阻止了许多政府的改革倡议（在执法和立法关系、税收、政府和反对派关系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制度总的右倾化，使之放弃一系列旨在吸引中左翼选民的改革思想和方案。从1978年起，政府在许多问题上（教育、移民政策、公民权力、同左翼政党关系等方面）越来越经常地持保守主义立场。

1981年总统选举中的资产阶级政党

保卫共和联盟在欧洲选举中的失败，引起戴高乐党的新危机。戴高乐自由主义派和正统派或者对希拉克对德斯坦的

① ［法］《观点》，1979年，第352期，第52—54页。

忍让表示不满，或者对希拉克破坏总统权力的企图表示不满。欧洲选举以后，希拉克本人曾一度赞成同吉斯卡尔主义者进行建设性对话，但接着就开始对总统的经济和对外政治活动进行尖锐的批评，并试图同社会党接融。1979年11月，希拉克利用法国市长开会的机会，在巴黎马提翁大厦自己的住宅里会见了密特朗。保卫共和联盟表示，戴高乐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在一系列观点上是吻合的。希拉克断言"社会主义者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特别是在国防和外交方面"①。

由于戴高乐运动未能制定出明确的政治方针，以至在总统选举前夕，不论是它的领导者还是选民都出现了分裂。戴高乐派的一些部长们，直接支持德斯坦作为候选人。从戴高乐主义五花八门的派别中分离出来的希拉克反对者，联合在作为候选人的前总理米歇尔·德勃雷的周围，德勃雷得到42名戴高乐派议员的支持。他的支持者由各种不同的分子组成：强烈反对德斯坦的正统戴高乐主义者、准备同吉斯卡尔主义者妥协的戴高乐主义自由派的代表、许多从蓬皮杜时期就指责"执政"的戴高乐主义向右转的左翼戴高乐主义者。把德勃雷的支持者联合起来的仅仅是"反吉斯卡尔主义"。继德勃雷之后，在1979年欧洲选举之前进入希拉克最亲密顾问圈子的玛·弗·加罗夫人被提名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加罗夫人尖锐地批评德斯坦的政策，指责他在对苏关系方面"软弱"和缺乏坚定性，做出了极其反共和反苏的声明。1981年2月3日，得到保卫共和联盟非常代表大会、党的机关和戴高乐运动绝大多数积极分子支持的希拉克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戴高乐运动的危机在保卫共和联盟的竞选中也反映出

① ［法］《观点》，1980年，第420期，第73页。

来。在1981年1月的投票中，它的选民约50%选德斯坦，约30%选希拉克，约20%选德勃雷①。

希拉克关于对政府态度声明的调子带有挑衅性质。他实际上批评了德斯坦活动的所有方面。按照保卫共和联盟主席的观点，继续执行吉斯卡尔政策，就要出现“无秩序”状态，这对法国就意味着“无法改变的危险”，而要贯彻密特朗纲领将会引起“灾祸”。希拉克断定，1981年法国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象1974年和1978年那样是两种社会类型的选择问题，因为“传统的政治界限已被冲垮”②。

在自己的宣传中，希拉克越来越转向小资产阶级阶层，注意考虑他们的情绪和偏见。他在自己的经济纲领中，借用尔·雷甘的基本原则，建议急剧减轻税务负担（降低所得税率，反对实行财产税，取消投机利润税和职业税）。通过减少国家机关的费用，大大压缩国家开支。希拉克把德斯坦执政时期称为“集体爬行”③年代，因而他允诺取消妨碍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法律、社会、财政和官僚主义障碍。换言之，希拉克几乎完全放弃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时期一直到1981年总统选举之前仍在保卫共和联盟纲领中保持的戴高乐主义的所有重要命题（必须对社会经济领域给以积极的国家干预，必须实行国家经济活动计划，必须发展“参与”制）。

为了把执政多数派中的反共和反苏分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拉克卖力地攻击同苏联对话的外政方针，指责德斯坦破坏了西方的团结。希拉克断言，法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已经

---

① [法]《快报》，1981年，第1542期，第31页。

② [法]《世界报》，1981年3月8—9日，
[法]《费加罗报》，1981年3月3日。

③ [法]《世界报》，1981年2月12日。

削弱，因为它经常过分地妥协。他声称："缓和就意味着要坚强，而不是退让"①。希拉克修订缓和政策，把基点放在同西方的团结方面，这就完全放弃了戴高乐主义对外政策的主要命题——忠实于民族独立和同苏联对话政策这一思想。

戴高乐主义领导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斯坦在竞选活动中的政治战略，使他放弃了1974年利用过的曾经得到一部分中左翼选民赞成的"继承性改革"口号，把希望主要寄托于当时执政多数派的追随者。同过去的戴高乐和蓬皮杜一样，德斯坦试图借助法律和秩序口号争夺选民，把左翼政党描绘成"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体现者。他重复戴高乐"或者是我，或者是混乱"的著名格言，声称："或者是我，或者是失败"。他的纲领转向了戴高乐主义，即捍卫第五共和国制度，主张强权，反对对外政策中的"中立主义"。

在社会计划方面，德斯坦提出了比1974年大为压缩了的规划。甚至在已成为法国社会最尖锐问题的就业方面，它的所有提案（发展职业教育、增加非全日工作的工作岗位、禁止移民和鼓励外国工人离境）只不过重复了1978年以来所采取的措施。

德斯坦在宣传中试图向法国人证明，尽管执政派存在着分歧和左翼联盟出现了分裂，但1981年选民也应当重新在两种形式的社会——集体主义的和自由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吉斯卡尔主义者认为，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保卫共和联盟将在执政多数派中处于原来的地位，而法国共产党将在左翼联盟中处于原来的地位。由于忽视了希拉克，吉斯卡尔主义

① ［法］《费加罗报》，1981年4月16日。

者特别攻击了密特朗，说他是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传统反对者、是法国共产党的“人质”。

戴高乐主义的领导人对德斯坦的攻击，在拥护保卫共和联盟的选民中间引起了对德斯坦的信任危机。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在戴高乐派选民中间对其政策“满意”者从62%下降为46%。1980年11月，保卫共和联盟的选民几乎有一半期望吉斯卡尔重新当选，而到1981年仅有32%①。

由于依靠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党的机关、整个积极分子的队伍以及有效的竞选准备工作（保卫共和联盟的候选人巡访了法国100个城市和22个地区，举行了52次集会和60次其他会议*），希拉克才得以制止戴高乐运动的危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希拉克掌握住了戴高乐派的选民，得到了18%的选票，大胜德勃雷（获1.6%的选票）和加罗夫人（获1.3%）。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和保卫共和联盟在1979年的欧洲选举中，希拉克获得的票数也多于沙邦-戴尔马。

在1981年总统竞选中，保卫共和联盟的选民具有稳定性和特殊性。从1974年开始，中右翼联盟两个派别的选民首次出现了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希拉克的选民中男子（占50%）多于德斯坦（占42%）。戴高乐派在青年选民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在18岁至34岁青年中，他们得到19%的选票（吉斯卡尔派得到16%）。相反，在德斯坦的选民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多出一倍。德斯坦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没有活动能力”分子（领养老金者和家庭妇女等等）中间占据了牢固的地位。在第一轮投票中，他们有44%的人投票选举德斯坦

① ［法］《观点》，1981年，第434期，第31—32页。

* 1981年4月18日［法］《快报》写道：“希拉克比自己的所有对手多握了100倍手和多拥抱了100倍的儿童”。

（11%选举希拉克）。前国家总统在争夺工人方面也胜过戴高乐派，他在无产者中获得了18%的选票，希拉克仅得到9%的选票①。

然而，前国家总理在小资产阶级中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农场主、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占了希拉克选民的27%，而德斯坦只占13%。各个阶层的私有者成了希拉克竞选的基础，他们在希拉克选民团中占了37%（德斯坦仅占23%）②。

因此，保卫共和联盟同战后的戴高乐主义一样，在政治上最活跃的构成最有权势的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的右翼选民中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德斯坦虽然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28.2%的选票，但没有能形成足够稳定的选民基础。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中右翼选民中的政治上消极的那些阶层（妇女、老年人和优抚金领取者）。在他们当中，保守的政治倾向同对国家首脑的帝王正统态度结合在一起。

同过去一样，中右翼阵营两个派别的选民都持有极端保守的观点，并同样敌视法国共产党。然而，在希拉克的选民中，反吉斯卡尔主义情绪强烈，对吉斯卡尔政体和巴尔政府极为不满。结果，在戴高乐主义选民中间，出现了改变政策和改换政府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当中对密特朗和社会党人抱有好感，并对同社会主义者结盟有足够准备的人比吉斯卡尔派要多。执政多数派的团结，在总统第二轮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在保卫共和联盟积极分子中间，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吉斯卡尔情绪在广泛传播。在第二轮选举之前，他们

① [法]《世界报》，1981年4月16日；
[法]《观点》，1981年，第449期，第66页。

② [法]《世界报》，1981年4月16日；
[法]《观点》，1981年，第449期，第66页。

之中有许多人帮助法国社会党人到处张贴宣传投密特朗的票的宣传画和广告。与此同时，从1974年起，反吉斯卡尔派首次超出了保卫共和联盟党员群众的范围，并囊括了它的很大一部分选民。根据1981年4月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资料，在第二轮选举中，原支持希拉克的选民中，仅有62%的人打算投德斯坦的票，而有15%的人打算支持密特朗，另有23%弃权①。

第一轮选举之后，保卫共和联盟的领导人明显地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们不最终脱离同吉斯卡尔主义者的联盟，另一方面又拒不积极参加德斯坦的竞选活动。希拉克声称他个人将投德斯坦的票，但却回避同他会见，并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凭自己的良心投票”。保卫共和联盟拒绝做出有利于德斯坦的集体声明，某些戴高乐主义的议员和著名活动家甚至呼吁投密特朗的票。

德斯坦也得不到其他戴高乐派候选人方面的积极支持。同时，加罗夫人一般说来也不同意在两个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她建议自己的选民投空白票。结果，德斯坦未能把所有的中右翼选民动员起来，总共只得了48.24%的选票，遭到了惨败。部分戴高乐派选民弃权或者投了空白票（废票从1974年的35万张增加到1981年的90万张），部分保卫共和联盟的支持者投了密特朗的票。在戴高乐派控制的地区，德斯坦受到的损失最明显。在科雷兹省，他只得到13.67%的选票，比在第一轮选举中所有中右翼候选人都要少②。

德斯坦的失败，使得中右翼联盟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统选举以后，保卫共和联盟同法国民主联盟立

① ［法］《观点》，1981年，第448期，第43页。

② ［法］《团结报》，1981年5月16日，第3版。

刻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团主席科·利别声言：无论是德斯坦还是巴尔，他们的“政策和个人行为是有罪的”，因而不能领导议会选举的斗争。而德斯坦则谴责希拉克是“有意背叛”。

法国民主联盟的议员不支持德斯坦对保卫共和联盟的攻击，他们为了在议会中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宁愿同希拉克妥协。根据保卫共和联盟的建议，两个执政多数派政党签署了关于建立“新多数派联盟”的协议。他们商定在议员额外选举中，在350个选区的第一轮选举时提出统一的候选人(1978年候选人总共118名）。其余的选区，提两名候选人（从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中出），但约定不互相辩论、为有利于已处领先地位候选人的当选要自动放弃自己候选人的资格、在第二轮选举之前要积极支持统一的候选人。

在议员额外选举之前，法国民主联盟处于危机状态，吉斯卡尔派已没有领导人，因为德斯坦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吉斯卡尔派受到失败的冲击而又没能立刻改组，它的队伍离心倾向加剧了。

在1981年6月14—21日的选举中，中右翼联盟遭到惨败。保卫共和联盟得到了20.8%的选票(1978年为22.6%)，总共只得到了83个议席(1978年为148个)。法国民主联盟的成果更差：在第一轮选举中只得了19.2%的票(1978年为21.5%)，在国民议会中只得了71席（1978年为137席）①。选举之后法国民主联盟失去了领袖。保卫共和联盟被迅速确定为中左翼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戴高乐运动尽管遭到失败，它已开始准备报复，逐渐修订了自己的战略、策略和政治理论。

① ［法］《世界报》，1981年6月23日。

第三节　左翼联盟

左翼联盟的社会基础极为广泛，决定了联盟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以及巩固和发展这个联盟的复杂性。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加强民主统一倾向的重要因素：法国社会最广大的阶层希望变革，并寄希望于左翼联盟能成为实现这些变革的现实力量。在这种条件下，联盟的现状和未来，都直接依赖于左派政党的政策：他们提出令人信服而牢靠的改造现状方面的选择方案的能力；在统一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自己的合作关系，从而确立了与右翼联盟相比而拥有的决定性的优势力量。

毫无疑问，在组织左翼联盟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是最大、最有影响以及最能团结其它力量的组织。在1973年的选举中，法国共产党候选人在第一轮获得了515.7万张选票，占参加投票人数的21.25%，这个数字超过了法国社会党选民的人数①。法国共产党选民基础的规模，仅落后于戴高乐派的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而选民的数量，则大大超过法国所有其它政党。法国共产党在劳动者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巨大的职业联盟（其中在许多工业企业中，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在积极地工作）——劳工总联合会（即法国总工会）中，占有强有力的地位。

法国共产党同社会党人以及左翼激进派的联盟，为实施它早先拟定的战略方针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同时，在许多方面也改变了党的活动条件，需要解决一系列新任务。这些，

① ［法］《世界报》，1973年3月8日。

在1973年3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予以了详尽地分析。全会特别指出，由于社会党吸取了共同纲领中的有益成分而出现了新的面貌，因此，在议会选举中社会党选民基础呈现出相对迅速增长的趋势。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二轮选举的结果，证实了上述耽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在选民中间的地位基本是稳定的并在20%至30%之间波动的话，那么法国社会党的支持者则有了急剧增长。

当然，七十年代，摆在法国共产党面前的新问题和新任务，绝不仅限于“选举数字”。法国共产党成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联盟不仅把不同观点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还把相反观点的人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之下。推翻现政府和实现共同纲领，是联盟的近期目标，也就是从某种方式把联盟的参加者联合起来的目标。但是要把联盟变成改造国家的现实力量和国家发展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则需要更高程度的统一。今后，对于法国共产党人来说，左派力量联盟（共产党在其建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已成了他们为顽强地与垄断集团进行斗争以及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领域。这就需要党发展这样一种战略和策略思想，即估计到纳入左派力量联盟的各个集团社会政治觉悟和行动的多样性，在始终不渝的反垄断斗争中使它们团结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法国共产党力图把在左翼联盟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壮大自己的选民基础，同解决上述任务结合起来。1973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月全会指出，必须发展左翼力量联盟，同时要发展理论，特别是通向与法国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方面的理论，必须以每个劳动者阶层所能接受的方式，把共同纲领的目标和法

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

法国共产党的上述理论成果，在总书记乔治·马歇1973年发表的《民主的挑战》一书和一系列中央全会特别是第二十一次（1974年）和第二十二次（1976年）党代表大会文件中得到了反映。这些文件确定了早在六十年代末提出的“先进民主制”思想，或者简单地说，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阶段的民主制思想，拟定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或者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法国领导人在阐述这一理论时指出，对党来说，选举投票不仅是夺取政权的手段，也是未来社会政治制度的活动原则。马歇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考虑按比例原则由全体直接秘密投票所通过的决议，而不管它们对我们是有利还是无利”①。这一轮流执政的原则也写进了共同纲领之中。稍后，法国共产党又把自治原则纳入自己的纲领性文件。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72年），提出要把左翼力量联盟发展成更加广泛的联盟——包括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法国人民联盟，它包括：雇佣劳动者、农场主和手工业者、中小业主、军人、各政治派别的代表、特别是对执政多数派政策不满的戴高乐主义者以及所有对铲除大资本政权感兴趣的人们②。

法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民主和自由”是党关于社会主义斗争战略的基本原则。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指出：“为民主而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党，对于负有消灭大资本剥削和压迫使命的党，是斗争的基本方向”③。

---

① ［法］乔治·马歇：《民主的挑战》，1973年版，第116—117页。

② ［苏］《法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73年。

③ ［法］《共产主义手册》，1976年，第2—3期，第41页。

代表大会通过了从党的文件中去掉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决议，同时在法国共产党人的文件中强调了工人阶级在社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主导作用。

在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中，上述理论原则和口号，是在左翼力量联盟内缺少权力和义务平等原则和“共同忠实地履行所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制定的①。

法国共产党从参加左翼联盟和为政权而斗争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它在新条件下进行活动时对所担负的任务所产生的理解，不仅影响到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战略方针，而且还影响到它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立场，特别是它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方面的立场。譬如，在1977年5月，法国共产党在继续反对由于西欧的政治一体化对法国国家主权任何限制的同时，还撤销了自己反对通过民主投票进行欧洲议会选举的意见。

同时，法国共产党还支持早在戴高乐将军时期就曾提出的“全方位防御”原则。

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代为保护劳动人民的直接利益，以及为反对垄断组织和政府把经济危机后果转嫁给劳动人民的做法进行了坚定的、顽强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目的主要在于制定解决有关就业、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改善最贫困阶层状况以及摆脱能源危机等问题的措施。1974年1月，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济部拟定了一项文件，它分析了能源和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关于改造和发展石油、煤炭和汽车工业的建议”②。

关于保护劳动者社会经济利益和以民主方式摆脱危机

① ［苏］《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莫斯科，1975年，第53页。

② ［法］《人道报》，1975年1月27日。

的问题，是1973—1975年法国共产党各次中央全会讨论的中心。除了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具体建议外，1974年9月23日和1975年8月，法国共产党还提出了两次反危机综合规划。

法国共产党参加左翼力量联盟和它为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斗争，加强了党的影响，这首先表现为党的队伍大大扩大。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这种做法看作是提高它在左翼力量联盟中的作用的主要途径之一。1970—1979年间，法国共产党党员从48.7万增加到70.2万。增加的党员，主要来自青年工人和普通职员。现在，法国共产党按其年龄构成来说，是法国政党中最“年青”的党。它的一半成员是40岁以下的人。女共产党员的数量从1966年的9万人增加到1979年的2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36%。在党员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仍旧保持了自己的阶级面貌，工人党员仍占多数，按1978年4月的数字工人占党员的51%①。同时，在近几年里，党的职员和知识分子的比重有所提高（分别占28%和13.5%）。这两个阶层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代表比重仍较高。比如，1976年，在联邦行政区委员会成员中他们占48.9%（工人占39.62%）②。

法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增强，还表现在改善了那些未包括在自己群众基础范围之内的各居民阶层与它的关系，表现在它冲击了多年来资产阶级所宣传的、在社会思想意识当中培植起来的反共信条。根据民意测验资料，对法国共产党在全

① ［法］《共产主义手册》，1970年，第2—3期，第94页；
［法］《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6—7期，第79页；
［法］《人道报》，1976年4月28日。

② ［法］《法兰西新闻》，1976年12月13日

国范围内的活动作积极评价的法国人，从1964年的38％增加到1979年的53％；反对法国共产党入阁的人，从1966年的30％减少到1976年的19％①。法国共产党在工会和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有效活动也有助于扩大党的影响。在这些组织中，它有2.8万名党员担任市长、总顾问和市顾问，他们有效地满足了居民刻不容缓的社会需要，从而展示了他们在解决复杂经济和行政问题的才干。

六十至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在选民社会成分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工人约占50％，职员约占15—20％），近几年，在青年劳动者中间的影响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说法国工人中约有1/3投共产党的票的话，那么18—25岁的青年工人的比重则为40—42％。从地区方面看，法国共产党主要在经济萧条的地区（如在布勒特伊、埃里札斯，中部和北部地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这些地区，工业结构改组、生产下降和失业，都极为严重地影响着劳动人民的状况。所有这些都说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政策，首先在那些由于经济危机和执政集团政策的原因而承受了更大苦难的居民阶层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②。

七十年代，左翼联盟的另一个参加者——法国社会党，它的发展处于一种变化和矛盾的过程之中。法国社会党是由五花八门的派别——从改良分子到革命方针的支持者，从反共分子到左翼联合的坚定信仰者——妥协和融合而成的。从1971年成立时起，它经历了一条从组织结构到思想理论基础

① [法]《共产主义在法国》，1969年，第259—260页；
[法]《测量》，1976年，第3—4期，第28—29页；
[法]《新观察》，1979年，第756期，第32页。

② [法]《人道报》，1978年3月30日。

中枢性改组的复杂道路。

社会党至今尚未能克服派别现象。它仍保存着自己的俱乐部性的组织结构，其中存在着大量流派和集团。社会党领导机关是按党内各派按比例派出代表的原则组成的。近年来，法国社会党主要派别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建党最初几年，当时构成俱乐部左翼的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心对制定党的思想和政治方针有很大影响。1966年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由让—皮埃尔·谢韦内芒、迪之埃·莫查纳和乔治·萨尔创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与宣传中心，联合了年青的一代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工程师、教师、职员的主要代表。在法国社会党党内各派别的意识形态方面，该中心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在原则上承认工人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领导作用。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心主张积极开展群众运动、社会经济改革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七十年代初，正是它成为签署共同纲领最积极的支持者。在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心影响下，法国社会党的纲领性文件写进了党旨在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决裂以及同资本主义作斗争这些最激进的原则。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心是借用共产党人的办法在企业建立党支部和按地区—生产原则改组党的结构的倡导者。后来，中心内部出现了分裂，它联合的党员也从1975年的25%下降到1979年的14%①。

以密特朗为支柱的另一个左翼组织是日·波布朗俱乐部。正是这个组织的“阶级阵线”思想，在法国社会党反垄断的正式战略中占核心地位。如果说起初“阶级阵线”首先是一个联合工人阶级、劳动者及被剥削者的口号的话，那么

① [法]《团结报》，1975年2月7日，第3版；
[法]《新观察家》，1979年，第752期，第33页。

后来它成了联合一切劳动者——从工人到高级行政干部的口号。同时，波布朗特别强调了与党内知识分子比重高相联系的“技术治国主义”的危险，主张法国社会党必须吸收工人、农民和普通职员①。

在六十年代领导法国社会党另外两个组织的马赛市市长加斯乐·德费尔和里昂市市长皮埃尔·莫鲁瓦，坚持类似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但与社会党国际领袖们不同，在七十年代，他们支持同共产主义者结盟的理论。德费尔指出：“左、右两翼的两极分化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只有在左翼力量统一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②。莫鲁瓦派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要求加强地方自治和分权以及克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泛滥”同群众民主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保护生态运动及地区性运动）的活动协调上。

1974至1975年间，从米歇尔·罗卡尔为首的统一社会党（1960年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左翼基础上成立的）以及天主教左翼工会积极分子组织的领导核心并入党内，使党的思想面貌越来越复杂。罗卡尔和他的支持者，用从六十年代起各左翼派别所持的、反映新中间阶层情绪和信念的思想，补充了法国社会党的理论武库。左翼联盟在1978年议会选举失败以后，罗卡尔主张重新审查法国社会党的政治和思想路线，放弃旨在夺取国家政权的“国家主义”及“选民”战略。按他的意见，必须侧重于“占领公民社会”，支持群众运动和非政治性的民主组织。他指责强调加强集权国家的雅各宾式的左翼传统，坚持要求使权力机关广泛的分权化。同时，

① [法] 日·波布朗：《左派的团结(1965—1973)》，1975年版，第443页。

② [法] 日·弗·毕左特：《社会党论—自由加入一个大党的思潮》，1975 年版，第177页。

罗卡尔和他的支持者还呼吁在社会领域实行“成熟的现实主义”，要精确地估计到国家的经济能力及其对外经济关系。在“罗卡尔分子”的社会纲领中，改善“生活质量”，即改变劳动和余暇时间的比例、提高社会联系的能力以及扩大个人参加社会生活的范围占了中心地位。

法国社会党成长最快的组织，是以密特朗为首的共和制度大会党。密特朗的可靠支柱，是大会中由老同事组成的小集团和1971年后开始支持他这一派的“新社会党人”。党的新拥护者的比重和影响不断增长，这些新拥护者在法国社会党领导机构中占据日益显著的地位。

依靠“新社会党人”的支持，党的领导核心力图加强党内的团结，使党内各派在思想政治方面能达成妥协。密特朗强调，法国社会党应力求综合所有社会主义流派（合作制的、基督教的等等），避免形成在他看来是教条主义的终结式的“官方学说”。在他们看来，法国社会党纲领的独特性是由于左翼力量联盟、“阶级因素”和自治的“溶合”①。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不同意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力图证明该党实践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不可能性。法国社会党打算首先通过国家机构的非集中化，提高国营经济企业自主水平及其管理的民主化，发展地区、城市、公社的自治等途径来发展自治。“要自决……是人而不是工具”——这就是它的党歌所表达的自治思想。

法国社会党的社会经济纲领规定，对信贷银行机构和某些关键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和实行民主计划方法。计划应当仅仅规定方向和限制市场机制（其中包括利润）的作用。服

① ［法］《团结报》，1975年10月31日，第6版。

从国家监督和国家总体计划的混合性的国营企业，应在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正如法国社会党纲领性文件《社会主义方案》指出的，“党不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旨在建立混合经济”。

尽管在《社会主义方案》中也谈到，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条件”，但没有具体说明国有化的范围。国有化的只应是那些满足全国需要的经济部门：国防、宇航、能源和运输业。社会党人反对象左翼力量联盟共同纲领中所提到的那样，将教育和保健事业整个体系同时国有化。它建议，考虑国家少数民族和个别地区的特点，稳步地向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过渡，宣布通过建立国家保健中心“逐步发展免费医疗”。《社会主义方案》还保证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这对工人阶级中的低薪阶层，特别对青年和妇女具有很大意义。提高工资为实现纲领宣布的劳动人民权力平等打下了物质基础。方案规定对所有价值在200万法郎以上的财产征累进税的税收改革①，其目的也在于此。

戴高乐主义与法国社会党人传统的和平主义结合，是法国社会党对外政治立场的突出特点。它们认为提高法国和整个西欧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立地位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在七十年代，法国社会党还坚持按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订的协议精神加强缓和和巩固欧洲集体安全的路线。法国社会党也属于那些发展同苏共联系和接触的社会主义政党之列。1975年密特朗访问苏联以及苏联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代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和欧洲问题的两次会晤（分别在1976年和1977年），证明了这一点。

---

① [法]《社会党纲领：关于八十年代》，1980年版，第33，174，194，330页。

在法国社会党的文件中，对美帝国主义和跨国垄断组织的批评占不小的地位。社会党反对把法国武装力量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在坚持法国必须保持对大西洋联盟忠诚的同时，批评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关系的性质。密特朗认为，西欧对美国的信任是基于在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会干涉的幻想而不是基于同盟者的坚定义务。用他的话说就是，“无论是联盟的意义，还是它的相互义务”，至今都尚未确定。结果，法国只有靠克制力才能捍卫自己的领土。但是，密特朗强调说，这不应“导致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与我们最亲密朋友关系方面的中立主义”①。

法国社会党宣布同民族解放运动保持团结，谴责智利比诺切特政权，谴责萨尔瓦多的军事专治制度和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它主张法国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全面援助，特别是通过拨出一定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主张实行公平的原料价格政策和建立“新经济秩序”。

在战争问题上，法国社会党把反对核武器和解散现有的军事集团，作为党的长期目标。同时，它还坚决主张继续执行“核遏制”战略。法国社会党打算，在七年内要把核潜艇的数量增加到两位数，提高法国核力量的可靠性，消除它同国外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的军事政策特别是它的核政策，引起党内的争论。某些地方组织和活动家坚决主张，法国应分阶段地放弃核武器。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在某一问题上同法国共产党接近），法国核力量应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国家联盟。

---

① 弗·密特朗：《此时此地》，巴黎，1980年版，第232—233页。

法国社会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及其组织的改组，使党的成分及其群众基础获得了很大的扩大和更新。据官方资料：1971年至1980年，党员数量从5.6万人增加到18万人。它的选民比重从1973年的19％增加到37.6％①。

法国社会党对共同纲领的签署以及它在工业企业的积极活动，使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有所扩大。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同，它同工会运动的联系受到机会主义的"工人力量"的限制，而在巨大的工会联盟——劳工总联合会，特别是在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中取得不少支持者。工人在党的选民中的比重有了提高。但是，在特别广泛的范围内，它是依靠脑力劳动者——中小职员和知识分子来扩大其群众基础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其选民中的比重比六十年代有所降低。整个说来，各社会阶层代表在法国社会党选民中的比例，近似于居民的社会构成（工人和普通职员的比重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比重小）。

社会党选民基础的扩大，首先是依靠广大劳动者阶层。许多工人和不满现时生活条件的中小职员，把法国社会党看作是比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更彻底、更能起作用的反对党，它能够借助左翼力量联盟推动执政多数派选择切合实际的政策。

1974年以后，对执政派联盟的政策失去信心的中间派选民开始支持社会党。同社会党的传统选民（即在1974年投密特朗赞成票的）相比，它的"新选民"常常是多少具有特权的各阶层的代表——"高级干部"、自由职业者和小私有者。其中还有许多经常去教堂的天主教徒。"新选民"有很大部分是妇女，其中有许多是家庭主妇和文化水平不高的老

① [法]《世界报》，1980年5月18日；
[法]《世界报》，1981年7月16日。

年人。社会党“新选民”的愿望是，要对法国社会进行“深刻”改革，同时又要力图避免任何政治风险和避免对资本主义关系造成严重威胁①。由于社会党人缺乏足够严谨的纲领和思想上的坚定性以及在内部存在着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思想流派，使它不仅要在社会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中而且还要在中间派选民中征募新的选民。

社会党自身以及它的党员，特别是他的积极分子，在社会特征上与其群众基础有着重大区别。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相比，社会党大大年青化了。在党内，力图利用群众工作方法的青年积极分子的作用加强了。它广泛使用了有工会和政治活动经验的人。党员群众的大多数是教员、高级学校的教师、科技界知识分子和医生，总之，都是脑力劳动者的代表。知识分子的这种优势，在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阶层表现得更加突出。1977年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36%是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教员，19%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高级干部”)，16%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中级干部”），9%是职员，5%是工人。在17个国务书记中有6个是教师，在27个指导委员中有7个是教师。在社会党领导中，还有许多教师和其他知识界的代表（四个记者、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翻译等等）②。

受过国家行政学校、理工学校第一流教育的所谓技术治国论者，给法国社会党领导的社会面貌打上了强烈的印记。1977年，在法国社会党指导委员会中，有5名是国家行政学校的毕业生。

对法国社会党议员团成分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

① ［法］《世界报》，1978年3月11日。

② ［法］《当今政治》，1978年，第1—2期，第61页。

向。在议员中，实际上完全没有工人成分，只有极少企业主和经理的代表，受过中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比重高于资产阶级议员团（达全体议员的1/4），而占优势的主要还是有高等技能的知识界代表①。

法国社会党的诸如强调“自治”、技术治国论倾向以及“生活质量”理论等思想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知识分子一定阶层的地位和思想特点以及他们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和动机相联系的。同时，法国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立场的杂乱不一，也给党的组织结构打上了印记，妨碍领导人执行严格的纪律和集中化，妨碍他们扼制派别斗争。

左翼联盟的第三个参加者——左翼激进运动，是1972年6月在激进党左翼和激进社会主义者这些法国传统性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些左翼力量之所以从自己的党派中分裂出来，是因为他们抗议党的领导人试图使党向右转而加入中右翼联盟。左翼激进派运动是一个小党（有1至1.2万党员），但在各种选举性机构中却有令人注目的比重。1980年它有9名众议员，14名参议员，200名总顾问②。左翼激进派运动的社会支柱，也同激进党一样，是一些在法国居民中比重迅速下降的中小企业主、商人、手工业者、土地占有者和自由职业者。左翼激进运动的主要营垒是南比利牛斯。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左翼激进派赞成旨在支持小私人企业主、小手工业者的纲领（扩大生产、消费、销售合作社，对中小企业实行优惠津贴）。左翼激进派还提出许多有关自然保护的要求。它赞同社会党人关于在全民投票之前停止建设或设计原子能发电站的建议。

---

① ［法］《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80年，第2期，第37页。

② ［法］《晨报》，1980年8月6日。

左翼激进运动中的右翼组织，有时也有同激进党重新合并的愿望，但每一次都遭到拒绝。这种步骤导致了在议会和直接依靠左翼党派支持的市政机构中席位的减少。

在法国，还有另外几个左翼团体发挥作用。其中最大的是统一社会党，它的支持者是某些知识分子团体和部分青年学生。由于它的传统口号（自治、生态）已纳入其它左派党的纲领之中，因此该党的影响在逐渐降低（选票的比重从1969年的3.6%降到1981年的1.3%），党的积极分子数量也在减少（从1969年的1.5万人下降到1980年的0.7万人）①。在发展原有的思想的同时，统一社会党还提出了一些新主张，如要求在八十年代向不减少工资的30小时工作周过渡，完全停止所有原子能发电站的工作，反对为原子能提供任何形式的投资，同时实行核裁军等。

生态主义者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都与统一社会党有许多共同点，这就是开展生态运动。它反映了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抗议。在竞选时，生态运动成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提出广泛的问题，要求不要指靠核电站和防止过分都市化、保护周围环境、改善“生活质量”、国家事业管理分散化、同发展中国家保持团结等等。

生态主义者主要是试图吸引部分选民在通常的政党结构范围之外活动。在指责左翼和右翼政党都迷恋于工业无节制发展和巨大建设项目的同时，他们试图作为真正改革的体现者，认为他们能够赋予文明发展以新的逻辑。

生态运动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使各种生态组织联合起来并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制定对待左派的战略。各种生态组

① ［法］《世界报》，1981年6月16日；
［法］《晨报》，1981年7月7日。

织对政治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有些组织反对参加任何政治对抗和政治联盟；而另一些组织则坚信，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接近实现（哪怕部分地）生态运动计划。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生态主义者完全与外界隔绝。1981年第二轮总统选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投票赞成社会党候选人，这绝非偶然。

左翼力量联盟的矛盾和问题（1977 — 1980年）。一直到1977年春，尽管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时出现激烈的争论，但左翼力量联盟仍然是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主导因素。法国共产党保护劳动人民社会经济利益的积极活动，有助于加强各左翼政党的行动统一。比如，1974年4月和1975年4月，左翼各党通过了减少失业、提高劳动人民购买力、扼制通货膨胀的共同文件。1975年初，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一些大城市共同召开了一百次群众大会。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共产党巩固左翼力量联盟的意图。

然而，1977年市政选举之后，左翼力量联盟的形式复杂化了。自签署共同纲领以来，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左派政党之间出现尖锐的分歧打下了客观基础。1974至1975年的经济危机，对左翼力量联盟和它们的基本群众的团结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左翼联盟的所有支持者，都试图限制垄断上层人物的权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然而，正如前边已表明的，他们对有关改革的概念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具有重大分歧。危机和生产萧条使得保证实现共同纲领的社会经济原则的物质资源问题复杂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分歧。自然，在危机的条件下，深受危机之苦的劳动者阶层对物质要求的强烈程度提高了。但是，害怕满足这些要求和实现共同纲领的相应原则会触及自身利益的中间阶层的担

心也随之增加。这些阶层更加容易受资产阶级宣传的感染了。他们认为实现共同纲领会使危机更加加重，更多地限制投资会使通货膨胀加剧，最后导致经济彻底崩溃。

两个左派党在危机的性质和摆脱危机的途径方面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党人，都赞同通过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劳动者收入水平的途径来保证经济的高涨和提高就业率。然而，对法国共产党来说，头等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满足最贫困社会阶层的直接社会经济需要和通过国有化坚决限制垄断组织地位；而法国社会党在危机、特别是在保证其选举胜利的选民基础中那些最右的、主张温和改革的选民的情绪影响下，则力图对资产阶级持“谨慎”和妥协的态度。正如社会党书记罗卡尔所强调的，将来的左翼政府，不仅应该达到“劳动世界”的真正和谐，而且还应该达到“货币世界”的真正和谐。

为了扩大共产党在左翼力量联盟中的影响，党的领导人从剖析危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出发，决定重新提出自己的民主改革纲领，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党的政策周围。在1977年3月21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歇讲道：“共产党的形象应该越来越与这样一种事实相适应，即它是劳动人民的党，是从事劳动的普通人的党，是人们关心和寄于期望的党，是要结束贫穷、困苦、不公正和剥削的党”①。

1977年4月，法国共产党根据共同纲领签署以来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对该纲领加以调整（使其现实化）的建议。他们比过去更加强调要提高有保证的最低工资、失业津贴、养老金及家庭津贴，缩小收入差距。共产党

① ［法］《人道报》，1977年4月1日。

建议：增加应该国有化的垄断公司及其分公司的数量，由全体职工选举国有化企业的总经理（随后由国家机关批准），提高工会在这些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最后，法国共产党关于国防和国家核武器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要求相应改变共同纲领中的某些章节。同年五月，法国共产党公布了为实现自己的议案所需资金规模的计算书，并指出了这些资金的可能来源。

从1977年5月开始，左派政党就修订共同纲领问题进行了谈判。在左翼联盟中法国共产党的伙伴，不同意共产党关于收入分配（课大财产税，减少收入“剪刀差”）和国防问题的议案，反对共产党人关于法国武装力量完全独立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样就会威胁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地位。

1977年9月，关于修改共同纲领的谈判中断。在左翼各党激烈争论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坚定地强调了恢复左翼力量联合的可能性，并表示如果各党在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上立场能够接近，自己就同社会党人一起参加左派政府。

左翼政党间的分歧，影响到1978年3月议会选举的结果。左翼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48.6%的选票，少于多次民意测验所意料的结果。共产党人得到580万张选票，占20.6%，在冶金、纺织和采掘工业的工人集中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在自己传统的选区—巴黎地区失去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因为那里一部分原来支持它的选民因左翼力量分裂看不到光明的政治前途而没有参加选举。

社会党在选举前民意测验中得到24—28%选票，但在第一轮选举时获得了22.6%（640万张）的选票*。离开它们的，

---

* 左翼激进派得到2.1%的选票，极左派得到3.3%，生态派得到2.1%（[法]《新社会主义杂志》，1978年，第32期，第30页）。

首先是那些不久前争取过来的、具有温和改良立场的支持者和不赞成社会党自1977年9月以来在社会方面和国有化问题上向共产党让步的支持者。在可能的参加者之间所存在的激烈矛盾的情况下，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对左翼政府能否稳定局面缺乏信心，这也影响到竞选的总结果。譬如，参加民意测验的人中，只有21%（其中有29%是社会党的选民）认为左翼政党能够建立稳定的联合政府①。

中右翼联盟实行的“制造紧张空气”战略，也影响到动摇不定的选民中的立场。为此目的，他们利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什么法郎汇价的下跌是将来经济混乱的第一期症候，什么法国共产党对部长职位有“过分”奢望的传言，什么总理声明，左翼政党试图摧毁第五共和制度，什么美国政府要对国家内政进一步干涉等等。德斯坦的竞选演说，对这部分选民的情绪也有很大影响。选举前，他声明，即使在左派执政的情况下，他也将要捍卫自己的纲领。有许多倾向于左翼联盟但又害怕“过激”改革的人，从总统这一立场中看到了一种稳定的保证和对左翼政府“危险”倾向的抗衡。在这次演说中总统强调指出：如果法国人投他们的赞成票，共同纲领“就能实行”。“不要认为宪法赋予了共和国总统干涉这一点的手段”②。总统强调了左翼联盟的脆弱性，要人们认识到，如果共同纲领的社会部分得以实现，那么打击的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法国的独立和尊严。

第一轮选举，左翼政党虽然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但却是自第五共和国以来第一次成了执政多数派（46.5%）。这就使它有理由指望在恢复左翼联合条件下取得第二轮选举

① ［法］《计划》，1978年，6月号，第144页。

② ［法］《世界报》，1978年1月28日。

的胜利。经过左派三方领导人的会谈，发表了联合政治声明。在声明中各党表明了自己有关在共同纲领（包括已商定的有关修改纲领的措施）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的意愿。声明指出，左派政府的组成，反映了选民的意志，它的活动将建立在权力和义务平等的基础之上。三党共同商定，为有利于在第一轮选举时得票多的左翼候选人当选，候选人可以互相撤换。

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一起上阵，匆忙采取对策。执政多数派各党动员了自己全部后备军，把没有参加第一轮投票的大部分选民吸引到自己的一方。第二轮选举结果，他们获得了50.5%的选票。左翼政党得到了许多小团体代表的支持，也改善了自己的选举结果，取得了49.3%的选票①。

这样，竞选的结局表明，在七十年代法国形成的右翼资产阶级联盟与左翼民主政治联盟的力量对比，取得了相对平衡。如果我们用每个联盟对群众影响的大小来衡量这一结果，那么可以说选举没有表明任何一方取得了胜利。同时，这次选举还表明，反对执政集团政策的民主反对派力量的加强，已成为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趋向。这种趋向表现在，同前一次议会竞选相比，左翼力量壮大了。他们之所以仍然没能冲破胜利的障碍，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一些中间社会阶层，由于右派势力的压力和恐吓，在最后时期表现得不够稳定和动摇；第二，由于在竞选最后阶段左翼力量联盟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它的部分支持者对其丧失了信心。

反映在国民议会席位的分配比例上的正式选举结果，同其实际政治成果有很大不同。在竞选中取得几乎一半选票的

① ［法］《世界报》，1978年3月21日。

左派政党，总共才得到200个议席（法国共产党占86席，比1973年多13席；社会党占103席，增加了14席；左翼激进运动占10席，比1973年减少2席），而执政联盟却得到290个①。

1978年议会选举的经验，对左翼反对派阵营的形势具有深刻影响。如何估计这些教训，成了左翼政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也成了政治方针变革的主要因素。

在法国共产党内部，这些教训以及整个左翼联盟的经验，在中央委员会全会特别是在1979年3月召开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全面的分析。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刊物上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党内讨论的结果，在党的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上得到了反映②。报告指出了竞选失利的客观原因：群众思想中的矛盾，经济危机以及在某些重要关头党的策略中的某些因素不妥当。比如，代表大会指出，党主要是致力于全民投票这一方针在一些群众中造成了消极情绪和错觉，他们期望一些迫切问题将由“上边”解决而无需他们参加。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为民主和反垄断力量联合和统一而斗争的新路线。这一路线首先是在为劳动人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而斗争的过程中，要自下而上地形成联盟。在总结报告中，马歇指出，现在，党不打算把人民运动限制在“纲领”范围内，而是将要提出一系列争取在民主改革斗争中把劳动人民联合起来的复杂任务。这正如法共刊物上所指出的，共同纲领不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协议没有从下面得到群众行动的有力支持③。

---

① ［法］《世界报》，1978年4月4日。

② ［法］《人道报》，1979年5月15日。

③ ［法］《共产主义手册》，1979年，第5期，第44、47页。

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关于社会经济的要求，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主要地位，这就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居住的权利、社会保障和实现妇女、青年以及移民劳动者的真正平等。该党还提出了为创建经济发展新形式而斗争的任务。在现阶段，这种新形式首先要扩大国有化经济成分，增加国有化资源，区域合理发展，建立和谐的对外经济关系。在政治方面，法国共产党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为劳动者参加管理而奋斗①。

法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二十二大”通过的主要理论原则，同时对其中某些部分又进一步加以发展和明确。比如，“二十三大”指出：向社会主义民主迈进的基础，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需要在工人阶级政治上起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加以实现。代表大会赋予法国将来的社会以“自治社会主义”的性质。那时，社会将是一种自治的、相互依存的、和谐的集体性结构，并且服从原则将被参与原则所取代，命令将被主动性所取代。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国共产党新章程的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为基础，“被工人运动主要活动家的著作所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特点②。

法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肯定了法国共产党所贯彻的争取缓和和裁军的方针。法国共产党主张法国在裁军谈判中发挥更为积极和创造性作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在争取和平、裁军、和平共处、民族自治权利的斗争中，法国共产党表现出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一致性。在对外政策方面，法国共产党提出了签署法、苏和平协

① ［法］《人道报》，1979年5月15日。
② ［法］《人道报》，1979年5月15日。

定的建议①。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用核导弹武装西欧的计划。法国共产党还反对加深和扩大西欧一体化，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接纳新成员国。

1979年末至1980年初，国际形势因美国领导集团的挑动而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坚持了国际主义精神和保持了坚定不移的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加强了反对“冷战”复发的斗争，等等。

1980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烈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会谈公报反映了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主要问题上观点的一致。例如公报指出：“在苏联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建立在独立、平等和互不干涉基础上的友谊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兄弟关系。两党认为，立场的差异和存在的分歧，不应成为为达到双方共同的主要目标而合作的障碍，这特别是包括为和平、裁军、国际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同各国共产党以及同所有社会和民族解放力量保持国际主义的团结”②。

苏共同法共会谈之后，反动势力发动了一场猖狂的反共运动，试图离间法共同劳动人民以及其他民主力量之间的关系。同反共和反苏势力进行艰苦、紧张的斗争，已成为八十年代初法国共产党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

左翼力量在1981年竞选中的胜利。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因素都表明，无论是中右翼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统治地位，还是左翼阵营中的日益复杂了的形势，都不适应国内的社会形势和群众愿望、情绪的主

① ［苏］《真理报》，1979年12月12日。

② ［苏］《真理报》，1980年1月11日。

要趋向。在1979年的县级竞选中，左翼政党得到52.1%的选票，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1980年11—12月进行的部分议员选举中，法国社会党的候选人在两个选区战胜了吉斯卡尔派。左翼两党之间的争论，并未破坏左翼选民统一的愿望：在第二轮选举时，共产党的支持者投了社会党候选人的票。

在国内，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强了，反对总统和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力量进一步加强。1980年末至1981年初，德斯坦的威信出现下降的趋势。据多次民意测验的资料表明，巴尔总理的威望下降已打破第五共和国以来历届政府领导人的记录。相反，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已终止。密特朗被提名为党的候选人，这就使法国社会党的竞选活动积极化。密特朗的威望开始上升。

在竞选期间，群众的思想状况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存在着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愿望和要求，即：一方面希望改革，另一方面又希望稳定；一方面对政府方针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不相信任何改变的可能性。不论那一部分的任何选举结果通常都要取决于他们的选民，其政治抉择最不确定。直到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最动摇的选民集团选谁尚不明确：选德斯坦还是选生态主义者，或者选密特朗，或者干脆弃权。争取这部分选民的可能性，取决于左翼政党的战略，取决于他们提出代替中左翼联盟的可靠抉择方案的能力以及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性质。

法国共产党选择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上述选民集团的坚定方针，以便动员群众为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革而斗争和巩固反垄断力量的地位。它努力把尽可能多的支持在法国经济、政治发展中进行坚决改革的人团结在候选人马歇的周围。党的领导人深知竞选这一复杂时期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他们遵循第

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战略，向劳动人民提出了满足最低层居民需要的广泛社会政治要求的纲领。共产党人的建议，符合力图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进行深刻变革的广大劳动阶层的最追切的需要①。

左翼阵营的分歧，仍然是实现上述努力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在进行竞选活动时，法国共产党一方面从有可能恢复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这一点出发，另一方面强调指出共产党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和足够的影响。用马歇的话说就是，在密特朗当选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将坚持由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代表组成政府，使政府毫不拖延地采取一系列深刻的社会改革措施。

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时，法共得到了15.4%的选票②。法国共产党的影响明显降低，在不小程度上是因为法国共产党的某些支持者，担心有两个左翼候选人进入第二轮，因此在第一轮就投了密特朗的赞成票。有相当数量的法共选民在总统选举中投了密特朗的票，后者在总统选举中实际上第三次（由于传统原因）代表了左翼力量。反共产主义的宣传以及忽视法共候选人建议的竞选辩论形式本身，也都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作为左翼联盟的一支主要力量，法国共产党认识到自己实现劳动人民要求和愿望这一责任的分量。估计到本党群众要求统一的心情，因此在第二轮选举中对社会党候选人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促使密特朗以51.7%的选票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③。

---

① ［法］《人道报》，1981年1月14日。
② ［法］《世界报》，1981年4月28日。
③ ［法］《世界报》，1981年4月13日。

法国社会党的竞选策略，是基于吸引各种政治观点、各个社会阶层的支持者。比如，为了取得中派选民的支持，社会党领导人曾力图冲淡共产党参加政府的问题，声称能够建立单一的社会党政府。为了吸收生态主义者的选票，他们比过去更多地利用了保护环境、“新的生活质量”、国家制度的非集中化和自治等口号。密特朗号召，在国际舞台上“法国应停止退却”并支持戴高乐派对德斯坦对外政策方针的攻击，从而把注意力又转向了戴高乐运动的支持者。最后，密特朗还采纳了和法国共产党的议案十分接近的社会经济纲领，以巩固自己在共产党选民中的地位。

在竞选过程中，密特朗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社会经济战略。他的建议和在1981年1月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竞选宣言，比“社会主义方案”更为妥贴。在密特朗的竞选宣言中，提出在1981年把工作周缩减到35小时，实行5周假期制，男人退休年龄降为60岁，妇女降为55岁①。根据竞选宣言，密特朗赞同把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冶金、核工业、军用和宇航部门的11个大工业联合公司国有化。

在第二轮选举前，密特朗不仅得到法共及其它左翼候选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一些左翼戴高乐派的支持。这样，密特朗既能够维系住法国共产党的选民，又能得到保卫共和联盟部分选民的支持，还能把该联盟一些以温和观点而著称的“新选民”纳入社会党的轨道，并把大多数保护生态运动的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某些具有保守情绪但财产较少的选民投密特朗的票是指望：在持续危机的条件下，左翼能保证社会稳定，保证他们的购买力和就业。部分选民，特别是观点虽

① ［法］《世界报》，1981年1月25—26日。

然较左但拥有一定财产或者有较稳定社会地位的新中间阶层，他们支持密特朗是因为，他们认为左翼所进行的所有社会改革，将是逐步的，不会对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有剧烈冲击。结果，法国社会党在同吉斯卡尔派争夺新中间阶层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同1977—1978年相比，它在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干部、政府官员及教师当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据"社会舆论研究所"的资料，1981年2月，全部国家职员中有44.5%在第一轮投票时投了密特朗的票（投德斯坦票的占14.5%）。在第二轮中，71%的国家职员投密特朗票，而投德斯坦票的仅为26%。在争取国家职员选票的竞争中，德斯坦仅在内务部官员和军官中间战胜了社会党候选人。由于在社会党队伍中存在大量高级官员，密特朗实际上不仅使得国家机关忠于自己，而且还得到它的积极支持。1981年2月，50%以上的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师在第一轮选举时投了密特朗的票，而在第二轮选举时达到了80%①。密特朗在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据1981年3月进行的民意测验，前总统在这些人中间仅得到55%的票，而密特朗则得到45%票②。

法国社会党在通常广泛支持共产党的社会阶层中间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青年选民中（从18到20岁），密特朗在第一轮得到48.5%的选票。在工人中间他在第一轮得到30%的选票（1962年，工人国际法支部在工人中间仅得到14%选票）。1981年5月，共产党在工人选民中得到32%的选票③。

这样，密特朗以超过对手100万张选票或3%的优势取得了胜利，首次当选为"不满意人的法国"的总统。力图过

① ［法］《观点》，1981年，第441期，第53页。
② ［法］《观点》，1981年，第443期，第56页。
③ ［法］《观点》，1981年，第449期，第66页。

“另一种生活”的劳动知识分子、希望马上得到明显成果的绝大多数低薪阶层、想首先扩大自己社会地位的那部分“没有权力的技术治国论者”、工业化对其已成为真正灾难的南卢瓦尔地区的居民以及对于国家和公司的价值体系抱有反感的官员等，也都支持密特朗。

在密特朗开始执行共和国总统义务之后，他建立了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以莫鲁瓦为首的过渡性政府。借助于一系列果断措施（通过空前高的信贷贴现率限制外汇投机和资本外流），法国新政府保持住了法郎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使大资本和交易所集团不能在经济危机时制造怀疑和恐慌气氛。

1981年5月底，政府就广泛的问题征询了工会和企业主组织的意见。在谈判中，法国重要的工会中心（劳工总联合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工人力量》）都采取了现实和审慎的立场。所有最大工会的领导人都表示，他们准备同新的行政当局合作和进行建设性对话。

政府方面立刻着手实行竞选前密特朗纲领许下的某些诺言。最低工资提高了10%，退休金提高了20%，家庭和住房津贴提高了25%①。还宣布，在国营部门提供数万个新工作岗位。后来又宣布，为了增加就业机会，要向中小企业提供援助。

为了使1981年的预算得到平衡，政府决定向国民议会提出关于对大约10万个最高收入的纳税人征收特别税、对银行和石油公司征收特别利润税的新法案。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各种社会措施对于国家经济的消极影响，政府强调指

① ［法］《新观察家》，1981年，第862期，第27页。

出，所有社会措施都将逐步和稳妥地实行。

新总统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中的一项，就是解散国民议会和提前进行议会选举。1981年6月14日和21日，大多数法国选民都倾向于左翼政党，他们得到了55.73%的选票①。

左翼力量取得了法国整个历史中最巨大的胜利，大大超过了1936年人民阵线党取得的成果。密特朗的胜利和首批社会措施所取得的成果，给选举以决定性的影响。有940万选民（占37.6%）选举法国社会党和左翼激进运动的候选人。这样，根据多数选举制，就保证了社会党人在国民议会中的主导地位②。

作为“总统党”，法国社会党可以利用国家首脑就是首要人物这一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同1958、1962和1968年一样，选民力图使国家总统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以妇女和老年人占多数的“王朝正统主义”派选民以及至今也未决定无条件支持社会党的选民也都选举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这些人曾在地方选举时投他们的票，并在前一次议会和总统选举时表示信任社会党。极左派及生态派选民也转向了法国社会党。

有400万选民（占16.18%）投了法国共产党的票。在社会党占优势的选区，法共支持者常常支持社会党候选人。还在第一轮选举时，他们就“按有利原则”投票。同时，法共在总统选举时，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当时，在它传统上占优势的选区，所取得的选票甚至超过了1978年。

议会提前选举的结果，由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左翼激进运动及一些较小左翼组织组成的新多数派取得了国家

① ［法］《新观察家》，1981年，第864期，第40页。

② ［法］《世界报》，1981年6月16日。

政权，他们占了国民议会的2/3。社会党人和左翼激进派取得了283个议席，共产党人获得了44个议席①。左翼力量所取得的成功，在不小程度上促进了法共和社会党旨在联合的努力。由于这种努力，在选举前夕，两党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广泛问题上彼此的立场得到接近，并在第二轮选举时达成了双方候选人相互代替的协议。

选举结束几天之后，社会党和法共签署了执政协议。按照这个协议，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有四名共产党代表作为共和国新政府的成员。在以法国社会党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莫鲁瓦为首的政府中，各党的名额是这样分配的：社会党37名，共产党4名，左翼激进派2名，左翼民主运动的代表1名——蓬皮杜政府前外交部长米·若贝尔。法国社会党在政府中占据最重要的部长职位：内政与权力下放国务部长加·德费尔，对外关系部长克·谢松，国防部部长夏·埃尔尼，经济与财政部长雅·德洛尔，计划与领土整治国务部长米·罗卡尔，科学研究与工业国务部长让-皮·舍韦内芒。法共政治局委员夏·菲泰尔芒任运输国务部长——为五个国务部长之一。

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在密特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以后声明，“决心执行男女公民所选择的新政策。两党将在国会已经获得的多数范围内执行这种政策，在政府牢不可破的团结基础上执行这种政策。两党将在地方和省区的权力机关、在企业执行这种政策，同时遵重各种机构和政党的作用和职能”②。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强调指出，旨在提高最贫困劳动阶

① [法]《世界报》，1981年6月24日。
② [法]《人道报》，1981年6月24日。

层生活水平、康复经济和实行国家生活民主化的变革政策，将坚定不移地加以实行。而各执政党在国内和国际生活方面最重要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将是实现这一点的保证。

法国劳动人民是与左翼多数派掌权休戚相关的，他们期待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实现重大变革。

·第十章·

法国对外政策的关键问题

七十年代法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和形式，是在世界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下形成的。要认识这一时期形势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只需把七十年代初同七十年代末比较一下就够了。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采取了新的、更加有效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之间的摩擦增加了，各国阶级斗争白热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指出："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统治范围缩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加剧了"。由于对形势恶化无能为力，"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政策的侵略性大为增长"①。

在整个七十年代，法国内部的社会、阶级力量及党派政治力量，出现了重新组合和两极分化的活跃过程。在此过程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页。

中，早在1972年就联合起来的左翼反对派，为反对执政多数派所执行的违反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专制政策，实现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深刻改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翼反对派在国内的影响不断增长，处于掌权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七十年代，执政多数派的成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派政策方面，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通过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重新组合表现出来，并导致戴高乐派最终失败和国家政治领导转向中右翼政党。中右翼政党，既没有坚定性，又没有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些都是戴高乐将军的总统党在六十年代所固有的特点，这就导致执政多数派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某种程度上缺乏信心和矛盾。

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显现出的世界发展条件的变化，就要求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针上进行某些修正。早在1969—1974年和1974—1981年，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蓬皮杜和德斯坦就在“继承性和改革”的口号下，分别进行过这种修正。实际上，两个总统的对外活动既包含有戴高乐时期的重要方针，也包含有一些重要的新因素。只要研究一下他们全部活动的方向就能发现这些新因素，主要表现在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合作的经验、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的伙伴关系、同美国的关系以及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方面。

第一节　“东方—西方”：缓和与合作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国家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关系史

上，七十年代占有特殊地位。到七十年代初，苏联为争取消除战争威胁、建立稳固的和平共处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的长期顽强的斗争已取得了自己的成果。多年来，不仅保持了和平（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而且在加强世界安全、相互谅解、互利合作方面也有了显著的进展。

在缓和和为加强国际安全而斗争的过程中，法国一开始就处于先驱者的特殊地位。苏、法之间签署的协议，成了苏联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协议的典范。法国在七十年代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特点，用德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法国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保持了“缓和政策、友好和合作政策的继承性”①。尽管从1979年末起，要求法国政府加入同苏联断绝关系行列的美国当局所给予的压力日益增强，但这种继承性仍然得到了保持。在德斯坦以总统身分同记者最后的一次谈话中，再一次强调法国要努力同愿意维护和平的大国对话，特别是同其他国家首先是苏联的高级对话②。

在纪念反纳粹入侵苏联四十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密特朗的回函中表示，确信“法、苏之间的合作在保证欧洲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中发挥良好作用”③是十分重要的。

和平与安全问题，是现代的中心问题。无论法国对外政策的其它方面多么重要，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以及欧洲和世界安全问题，总是法国政治和民主集团最为注意的对象。苏、法合作的经验，不仅仅具有双边意义。当苏联和法国合作促进

① ［苏］《法国总统瓦·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苏联的访问》，莫斯科，1979年版，第9页。

② ［苏］《真理报》，1981年1月29日。

③ ［苏］《真理报》，1981年6月25日。

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欧洲安全的形成和巩固的时候，这个经验就具有更加广泛的而且是长期和迫切的意义。

七十年代苏、法关系的中心，是欧洲安全问题。欧洲问题在法国对外政策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一系列政治、军事战略、历史和地理因素决定的。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给了它对欧洲事务予以特别关心的权利。

在战后以来，法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法国是首先反对欧洲分裂的西方大国之一。从1956年开始，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戴高乐将军经常强调欧洲的两个部分应该寻觅妥协的途径，继之实行互利合作。1966年10月，戴高乐总统说过："我们大陆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应该自己建立缓和、协调和合作……在东西方国家还未取得谅解的时候，欧洲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稳定"①。近二十年来法国欧洲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要求使欧洲地理现状固定下来，这就要寻求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方面的支持。

在西方阵营中，法国是实行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新政策以及缓和和合作政策的倡导者。它在筹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共和国的领导人始终遵循着戴高乐的著名格言"缓和—协调—合作"。在整个七十年代，这一方针得到了全面贯彻，这就决定了苏、法关系相对缓和的特点。

法国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意义、创造欧洲大陆安全条件的途径以及法国在此过程中的地位等问题的理解，于七十年代在戴高乐和蓬皮杜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缓和

① ［法］《法国1966年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巴黎，1967年版，第418页。

“独立概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这一概念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法国对缓和各个发展阶段（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命运，都具有特殊责任。缓和“独立概念”，是从在核时代必须选择和平共处政策，两种制度的国家必须和平共处这一认识出发的。在这一概念中，把缓和视为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此出发，应该消除“任何急躁情绪和给对方以压力的任何企图”。①

在缓和的“独立概念”中，不得不对缓和的军事方面保持缄默。长期以来，法国欧洲政策的特点是，对大陆军事缓和方面的措施持消极态度，实际上是忽视相应的国际谈判，借口这种谈判似乎具有集团的性质。

关于缓和及欧洲安全问题，在七十年代的法、苏关系上是如何反映的呢？这种关系在这一时期对加强两种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1966年夏，戴高乐总统在访苏期间，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此后，苏、法关系成了缓和欧洲和全世界紧张局势的一个重大因素。

戴高乐将军的继承人继续强调发展法国与苏联及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为保证欧洲大陆和平和缓和的关键因素。蓬皮杜在讲到同苏联关系时指出：“……我们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合作……是我们力图拆除集团取得相互谅解、相互对话和可能的合作这一总政策的组成部分”②。1970年，苏联领导人同蓬皮杜总统在莫斯科会谈中，签署了旨在给苏、法政治合作以新的推

① ［法］《费加罗报》，1975年11月12日。
② ［法］《世界报》，1969年7月12日。

动，并使政治协商具有“经常性质”①的议定书。协议的关键性条款是，在出现双方认为是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者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苏联和法国政府将毫不迟延地相互接触，以协调他们对整个形势的立场以及应付这一形势的措施②。双方确定要定期举行这种协商。议定书指出：“双方外交部长或负责这一使命的特命代表，在必要的时候应经常会见，原则上，要一年两次”③。议定书的签署，标致着苏、法1966年确定的方针有了发展。法国《民族》报评价协议书时指出：“这个文件已超出了迄今为止任何西方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已经做到的一切”④。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指出，由于签署了关于政治协商议定书，苏、法合作的可能性扩大了。同时强调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苏、法关系”的方针。勃列日涅夫说：“我们认为这是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⑤。

苏、法议定书，为在苏联同其它西方国家关系方面签订类似文件开创了先例，它的某些原则已运用于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实践。

蓬皮杜1970年对苏联的访问，是在欧洲发生了积极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苏联和联邦德国在1970年8月12日签

---

①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15、116页。

②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15页。

③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16页。

④ [法]《民族报》，1970年10月14日。

⑤ [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莫斯科，1971年版，第42页。

署了协议，欧洲政治方面出现了新前景。波兰人民共和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就签署协议进行了谈判，就西柏林问题举行了四方会谈。

自然，在法、苏关于国际问题的会谈中，欧洲安全问题占据中心地位。会谈结果表明了双方立场有许多共同点。法国方面表示了对所有欧洲国家进一步发展接触的良好愿望，表示准备扩大和加强法、苏之间的接触和合作以发展欧洲的缓和事业。双方把下述努力视为改善欧洲形势的最有利的因素之一，即"努力使政治关系正常化并得到改善，保证欧洲各国现有边界的不可变更性得到承认，排除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①。这里指的是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都毫无例外地不可变更。法国对苏联与联邦德国签署的协议表示满意，"认为它是对发展欧洲缓和及加强欧洲安全的重要贡献"②。

苏联方面的愿望也得到了实现。它同蓬皮杜的会谈，加强了关于准备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的相互了解。法国总统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所有有关国家参加的共同讨论中，提出加强欧洲安全问题是有益的"。他表示，法国赞成苏联及其盟国提出的会议方案。蓬皮杜也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这一会议现在有可能进入积极准备阶段"③。正如苏共中央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的，"苏、法关系的改善，对欧洲事务的整个进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④。

---

①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17—118页。

②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18页。

③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02页。

④ [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42页。

如果说苏法最初的高级接触是同缓和过程的开始相联系的话，那末到1970年，已经有可能通过双方的努力来发展这一过程。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法国的访问（1971年10月25—30日），在形成苏法合作方面占据特殊地位。两国领导人指出，苏、法关系发展中已取得的成果可以使这种关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决定“要使苏、法间的合作，特别是他们之间服务于和平目的政治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稳定”①。这一任务反映在1971年10月30日勃列日涅夫蓬皮杜在爱丽舍宫签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法国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协议里，这一原则在苏、法签署的主要文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苏、法两国承担的义务是，“两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政策以后要在执行中进一步推向前进，使它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长期政策和国际生活中的长期因素”②。这是一项崭新的因素，它反映了两国面临的应在长期历史前景中加以考察的目标。

在总结双方接触（在许多情况下是协调行动）经验的基础上，在合作原则中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它们是两国在尔后的政治合作中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实质上都应遵循的。

欧洲问题被提到了首位，同时特别强调了在保卫和平、坚持缓和方针、巩固安全、加强所有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等方面，法国和苏联在欧洲紧密合作的意义。其次，还谈到了防止全球“热点”冲突问题。这指的是在和平受到威胁或破

---

①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53—156页。

②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50页。

坏的地区，苏联和法国将做出努力，尽快实现政治协调。最后，两国讨论了裁军、克服世界军事对抗、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文件指出："双方将全力促使全面彻底裁军、首先是核裁军，防止世界分裂成军事—政治集团，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加强联合国的作用"①。至于苏、法双边关系，两国有义务"使这种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合作的范例"②。

苏联和法国之间的合作原则，不是一种条约，但却是由两国领导人签署的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文件。把协商结果固定下来的这种形式，尔后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所采用。

和平共处的原则，在苏联同一个资本主义大国拟定的文件中第一次得到了如此具体的体现。该文件的国际意义首先是在于，它的许多原则，在后来苏联同其它国家签署的双边文件中得到了反映。

如上所述，欧洲安全问题在会见过程中占据了特殊地位。在总结访问成果的苏、法宣言中表示确信，苏联同联邦德国以及波兰同联邦德国之间协议的生效，"对于巩固欧洲和平将具有重要意义"③。

这次访问，表现出苏联和法国合作在缔结西柏林四方协议方面所起的良好作用。协议本身被认为是缓和欧洲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重大步骤。在苏、法共同文件中，第一次谈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联合国吸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①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51页。

②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51页。

③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54页。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加强安全的前途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行动。

在这次访问中，苏、法两国不是简单地表示赞成为召开全欧会议进行多方面准备，而且还对这种准备工作的内容有了一致的看法。后来，在实际拟定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草案时，苏联和法国对有关固定现有边界、不干涉内部事务、平等、独立、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原则的协议，以及在解决所产生的问题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联坚定不移地执行同一切愿意同它合作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的方针。特别是在1971—1973年，苏联同美利坚合众国逐渐接近，这一点对于减轻核战争威胁具有重要意义。在法国某些集团看来，这种接近是两个最大的国家试图背着西欧国家进行谈判，并损害它们的利益。实际上，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坚定的、始终不渝的、旨在加速召开全欧洲会议的政策，正是要提高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如果说在战后几十年里，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稳定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消极作用的话，那么苏联领导人坚信，苏、美关系的改善将为所有各国之间建设性合作开创更大的可能性①。

这一问题以及有关欧洲和世界安全的其他一些问题，于1973年1月和1974年3月在苏联以及1973年6月在法国举行的高级会谈中，都有所涉及。

苏、法领导人的会谈，特别有助于消除未来赫尔辛基会谈道路上的人为障碍。这种障碍是与某些西方政府试图把举行全欧会谈同这一时期拟议中的其他会谈特别是裁减中欧军备的会谈扯在一起相联系的。1973年1月会谈公报指出：

---

① ［苏］《真理报》，1973年6月30日。

“苏联和法国的出发点在于，全欧会谈不应同某种其他会谈混在一起，它应是有关欧洲政策和国际政策方面的一次巨大的独立行动”①。

1974年5月当选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不止一次地声明，要继承和加强法国旨在缓和的外交方针。他说，如果说缓和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么它至少是和平发展的唯一途径。德斯坦还指出，他将象前任总统戴高乐将军和蓬皮杜一样，把苏、法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视为头等意义的事业。

法国进一步加强它的国际地位和参加讨论决定重大国际问题的愿望，将继续经常地促使它必须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的关系。

1974年12月4至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朗布依埃举行了会谈。当时确定全欧会议最后阶段的政治级别问题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日内瓦的准备工作取得了进展。全欧会议参加国人民对会议及其前途寄予越来越大的关注。但是，正如德斯坦坦率承认的那样，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起着制肘作用②。

关于第三阶段的政治级别以及加快会议召开的全部问题，成了朗布依埃会谈的中心议题。会谈导致了两国立场的接近。公报指出：双方“认为，现已为在最短时期内召开会议、进行会议的第三阶段以及签署高级别的最后文件创立了良好的前提”③。勃列日涅夫和德斯坦之间的这一会谈，给

①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64页。

② [法]《世界报》，1975年1月4日。

③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84页。

会议进程以很大的积极影响。1975年8月1日，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33位高级政治领导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

勃列日涅夫在评价苏联和法国在欧洲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时指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和法国之间的合作，为顺利召开全欧会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认为，苏、法两国间的良好关系也将成为欧洲（甚至不止欧洲）稳定和平与安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在巩固和加强欧洲和世界缓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把缓和的军事方面提到首位。

在限制和裁减军备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的苏联，在苏法会谈中也积极提出了这一问题。早在七十年代初，两国就对裁军方面所做努力的最终目标取得了相互理解。例如，1971年苏法宣言就曾讲到，"苏联和法国赞成在国际有效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的裁军"②。勃列日涅夫把德斯坦关于法国确信全面、彻底有效的裁军的讲话视为"一个重要声明"③。

与此同时，法国在有关裁军的所有具体问题上的消极立场，妨碍了苏、法两国在裁军问题上交换意见。法国对日内瓦裁军委员会采取了"缺席"的政策，它批评裁军"无效"，因而也不同意委员会拟定的任何一个协议。法国没有在1963年莫斯科关于三个领域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上签字，虽然从1974年夏起它没有在大气层进行核爆炸，限制了地下核试验。

---

①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演讲和论文集）》，莫斯科，1978年版，第6卷，第118页。

②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155页。

③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演讲和论文集）》，莫斯科，1978年版，第6卷，第394页。

法国不是1968年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参加国，虽然在联合国讲坛上，它的代表声明，在这个方面，法国将象条约参加国那样做①。在这一对和平事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苏、法之间缺乏共同承担的政治义务，这自然就缩小了两个国家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法国拒绝参加维也纳关于减少中欧武装力量和武器的会谈。

法国进步力量和法国广泛的社会阶层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政府应积极执行裁军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法国要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积极发挥作用的问题。缓和过程的发展，广大人民对裁军问题的日益关心，使这个问题在苏、法交换意见当中占居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1975年德斯坦访苏结束后的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国在努力减少军事对抗和促进裁军方面观点的接近，这就使得缓和扩展到了新的领域②。《政治年鉴》在谈到莫斯科会谈时写道："法国已同列·伊·勃列日涅夫阐明的政策接近，这就是缓和必然要触及到裁军"③。

勃列日涅夫和德斯坦在朗布依埃和莫斯科的会晤和接触期间，为苏、法签订关于预防偶然和未经批准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奠定了基础。相应的协议是1976年7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通过交换信件的方式签订的。苏联方面的信件是由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签署的，法国方面的文件是由专程来莫斯科

---

① ［法］《世界报》，1975年9月28—29日。

②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233—241页。

③ ［法］《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之年》，巴黎，1975年版，第165—166页。

的对外关系部长乔·索瓦尼亚格签署的①。在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观点的接近，也是一种新的因素。

缓和问题，在1977年6月20—22日巴黎苏、法高级会谈中成了核心问题。根据勃列日涅夫和德斯坦的会谈，签署了苏、法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联合声明。这是第一个全面和专门阐述这一问题的双边文件。

当然，苏联和法国并非在缓和政策的所有观点上都取得了一致。例如，勃列日涅夫在访法前夕，全面阐述了苏联对缓和和意识形态斗争关系的看法。他表示相信欧洲可以成为持久和平的大陆，但同时指出："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即使在这个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不会停止"②。评论家们公正地指出，法国方面所坚持的关于"思想共处"的理论，对苏联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苏、法双方在专门文件中宣布了为缓和而进一步积极活动的决心，并强调了双方继续沿着赫尔辛基会议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意愿。

在关于缓和的联合声明中所反映出的协商精神，对国际生活是一个刺激因素。在联合国第三十二届大会上，苏联提出了关于加强和巩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防止核战争危险的提案。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两个文件草案之一，在许多地方援引了苏、法关于缓和联合声明的内容。这个草案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它得到了法国代表的支持。联合国大会在这个草案基础上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巩固缓和国际紧张局

---

① [苏]《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第244—246页。

② [苏] 列·伊·勃列日涅夫，《遵循列宁的方针（演讲和论文集）》，莫斯科，1978年版，第6卷，第429页。

势的宣言，乃是对执行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事业的重要贡献。

与1975年10月协议相比较，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1977年访问结束后苏、法签署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声明，是对广泛的国际计划中已经作出努力的补充，它反映了两国在解决这一任务方面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在声明中，苏联和法国表明了尽一切努力防止扩散核武器的共同决心”①。

七十年代末，法国在关于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有了一定变化。在国际关系发展越来越需要严肃地考虑裁军问题，在全世界对制止无节制的、极其危险的军备竞赛的要求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如果法国政府继续置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外，它就要冒损害自己加深缓和意图真诚性的风险。因此，在1978年5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专门会议上，法国总统德斯坦提出了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建议。1978年9月法国宣布，它决定在改组后的日内瓦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保留自己的席位，但它只在形式上是委员会的成员，而不参加会议。

法国许多新闻机构把德斯坦对裁军问题的态度评价为，是法国总统对苏联愿望的反应，因为苏联“从赫尔辛基会议以来就力图把政治缓和扩展到军事方面，并力图把法国拉入裁军主要谈判者的行列中去”②。

七十年代初，由于所采取的接近和合作的方针，苏联和法国促进了缓和政策的发展。八十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任务，即要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政策“导致国际紧

① 《1977年6月20—22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访法演讲、文件和材料汇编》，莫斯科，1977年，第50页。

② ［法］《世界报》，1977年6月24日。

张局势大大加剧，并由此产生种种危险后果”的情况下①，保持和加强缓和。1979年4月26—28日法国总统德斯坦对苏联正式国事访问期间所达成的协议，其目的也在于此。正如勃列日涅夫所指出的，这次会见，“导致了一些重要文件和协议的签订，特别是苏、法两国之间有利于缓和与和平事业的合作进一步发展的纲要。在纲要中，不仅确定了加强国际缓和政策的方针，而且还指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这一纲要乃是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一项新事务”②。

在纲要中，两国在过去五年合作中所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都得到加强。纲要提出了合作的远景目标，宣布要为两国人民及全人类的和平未来而积极合作。纲要强调指出，“这种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和平的巩固、缓和的加强、紧张局势策源地的消除以及在裁军的道路上取得实际进步”③。苏联和法国认为：防止战争是所有国家的根本任务。两国庄严声明，要尽一切努力使人类免受战争威胁。同时，双方确信，在现代形势下，缓和政策是保证和平的唯一途径。两国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即为了缓和，无论是在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共同合作方面都要继续做出努力。同时，苏联和法国都表示了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由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终文件所有签字国实现该文件的所有原则，是加强欧洲大陆缓和的基本方面。“实力”政策，集团或霸权政策，同和平、缓和以及人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得到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页。

② [苏]《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苏联》，莫斯科，1979年版，第55—56页。

③ [苏]《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苏联》，莫斯科，1979年版，第24页。

任何形式的鼓励。会谈结果扩大了苏、法在裁军问题上寻求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双方不仅表明了促使停止军备竞赛和转入实际裁军的各自意愿，而且还指出了在这方面共同努力的某些具体方向①。

苏、法为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全面关系拟定了广泛的措施，并将它们具体写入了根据会谈而签订的另一些文件里，这包括：1980—1990年苏、法两国加强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的长期纲要；苏、法1980—1985期间经济合作协议；关于改进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直通电话线路方面的措施协议；俄语和法语研究协议；计算技术和电子科学技术和工业合作协议；世界海洋研究合作协议等。并决定将发展经济、技术和工业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从1971年10月27日延长到1990年②。

七十年代末，国际局势出现恶化。美帝国主义企图使世界紧张局势加剧，发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卡特政府，继之里根政府，对其北大西洋组织的盟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它们增加军费，同意在西欧配置中程导弹，从而导致欧洲战争危险升级，限制同苏联发展经济关系，减少同苏联的政治和外交联系。

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主张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国家之间进行双边或多边接触本身，特别是进行最高级对话，具有巨大的意义。法国领导人同苏联国家领导人就相互关心的复杂国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说明他们继续采取十五年来富有成效地合作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原则。1980年

① [苏]《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苏联》，莫斯科，1979年版，第23—31页。

② [苏]《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苏联》，莫斯科，1979年版，第21—22页。

6月勃列日涅夫同德斯坦的会见，使苏、法彼此更好地了解了各自对国际局势迫切问题的立场。

这样，到八十年代初，苏、法两国为和平事业而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合作，承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对苏、法关系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我们同法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制度……虽然我们并不赞同法国在国际上采取的所有行动，但我们的关系仍是国际局势缓和的重要因素，我们主张继续而迅速地发展这种关系"①。

苏、法七十年代的合作是一个范例。在双方具有政治诚意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促进和平共处原则的加强，为减少战争危险做出贡献，保障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和缓和。同时，从保障本国民族利益、贯彻独立对外政策以及参加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的经验也表明了同苏联合作对于法国的重要性。

第二节　法国和西欧政治一体化问题

在同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在整个七十年代，法国都把巩固和发展作为西欧核心力量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任务放在了无可争议的首要地位，并且试图继续在这个核心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同时，与共同体的发展取决于国家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能力的前一时期不同，七十年代法国领导集团不得不同自己的伙伴紧密合作。德斯坦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来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法国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3页。

立场的变化，他说："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自己单独行动，这一点特别适用于法国"①。法国领导人继续把欧洲经济共同体视为在国际舞台上保证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支柱和手段。这项任务经常作为第五共和国西欧政策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方针是稳定的，它的主要因素是一贯的。然而，在第五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二十年来，这一方针的实现途径和方法改变了。

六十年代的法国西欧政策，可用新戴高乐主义的"多祖国的欧洲"这一概念来概括，而这一概念与超国家原则相对立，是基于"民族"主权参加国的国际合作原则。这些年里，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机构内部，法国外交同五个伙伴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反对这些国家在共同体组织结构中坚持"超国家"原则，主张各民族国家在制定决策过程中保有决定权。

在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多祖国的欧洲"被视为同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一支独立、积极的力量。这种方针要求，既要确定西欧对于美国的政治独立，又要实行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缓和和合作的方针。这就在法国同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国的相互关系上造成很大困难。因为在六十年代，后者保持着同美国的强烈依赖关系，并长期拒绝缓和政策。

当时，法国政策同以联邦德国为首的五个伙伴国的主要冲突，是围绕着共同体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展开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五国集团"就反对法国以跨国合作原则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计划。而法国则抵制"五国集团"实现罗马条约"超国家"趋向的任何尝试。结果是政治一体化

① ［法］《世界报》，1979年4月2日，

过程发展缓慢，这就成为打击整个共同体的下一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十年代末，法国统治集团重新审查了戴高乐外交政策的某些原则，转而采取创造性的西欧政策。这一时期总的特点是：一方面，西欧在法国对外政策重点中的作用急剧提高；另一方面，逐渐地从批评转为鼓励政治一体化，接受了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针，寻求同“欧洲九国”主要伙伴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平衡关系。

戴高乐的继承者，在“多祖国的欧洲”这一政治选择的主要原则问题上保持继承性的同时，为自己提出了建立一种能反映“在现代世界上西欧独立存在”① 的“强大的欧洲联盟”的目标。在这方面，蓬皮杜迈出了头几步。同其“扩大、加强和完成”西欧建设的规划相适应，蓬皮杜还为长期以来戴高乐所反对的英国及其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两个伙伴国打开了共同体的大门，并提出了分阶段地使扩大的共同体由关税联盟经过经济和货币联盟向政治联盟过渡的计划。在1972年10月召开的“欧洲九国”第一次高级会议上，在法国的倡导下，通过了“七十年代末，在充分履行已有协议的条件下，把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整个关系改组为欧洲联盟关系”② 的决议。

法国领导人还决定，首先要把那种既能保证共同体顺利发展，又能保证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机构体系引入“欧洲九国”。在法国倡议下，“欧洲九国”政治体系中出现了罗马条约以外的跨国合作的新机构。七十年代初，在外交部一级建立了国际咨询机构，即所谓以专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

① ［法］《世界报》，1977年7月2日。

② 《欧罗巴档案》，F1972/21，S.D508。

的政治委员会为首的“政治合作”研究机构。同主要是在贸易经济方面实现欧洲经济共同体对外政策职能的欧洲共同体跨国委员会不同，政治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还是国家政策的不可侵犯的禁区。

蓬皮杜时期，还奠定了各成员国在最高一级即九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经常政治合作的基础，从而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机构——欧洲议会的出现，这一点下边我们还要讲到。

但是，尽管“欧洲九国”在政治合作积极化方面有了某些进展，然而，整个说来，蓬皮杜的西欧建设计划，无论在组织经济和货币联盟方面，还是在政治联盟方面，都未得到实现。七十年代初爆发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危机以及经济和能源危机，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危机的情况下，不仅上述计划落空，而且还已取得的成果——关税同盟和农产品“共同市场”——也受到威胁。

1974年，取得法国总统职位的德斯坦，把实现蓬皮杜计划宣布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头等任务。他拟定了实现这一任务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改进共同体的机构体系；第二阶段，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进展。

德斯坦打算在政治一体化方面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他说，他的前任在这方面“过于拘谨和犹豫不决”，“但我认为，时代正在变化，现在法国方面存在着建立一种特殊联盟或政治联盟的积极愿望……如果在我任期期满之前还不能坚决地促进‘（小）欧洲’政治联盟的建立，那么我将认为，我没有完成赋予我的一项最重要的使命”①。

---

① ［法］斯·福尔尼尔：《吉斯卡尔和我们》，巴黎，1976年版，第28页。

1974年12月，这一思想在“九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得到发展，法国提出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政治上层建筑的倡议。法国计划规定，首先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建立一个新的跨国机构，这一机构在共同体应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这样，就产生了欧洲议会，成员国的所有合作领域，都划入了它的职权范围。

紧接着，法国倡议对欧洲议会进行直接选举（在此以前，多年以来它一直阻挠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在共同体内已丧失政治实权的议会机构的政治地位又得到了提高。

然而，按照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未来联邦制联盟基础而签署的罗马条约的构想，作为共同体政治体系中超国家权力体现者的欧洲议会的权力，将来应与各国国民立法会议的权力相类似（就象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被视为“超国家的政府”那样）。但是，在西欧建设过程中，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各种跨国合作机构手中，这些机构在七十年代首先从欧洲理事会方面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加强。这就决定了德斯坦对欧洲直接选举的立场。他说，这些机构组成包括欧洲理事会机关在内的“统一整体的一部分”①。按照法国总统的意思，共同体政治实体似乎可以在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两者的统一中体现出来，因为在二者的活动中，联盟原则似乎将逐渐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②。

在法国，欧洲选举从一开始就转变为围绕着未来议会机构权力这一主要问题而展开的尖锐政治斗争。社会舆论也理所当然地焦虑不安。因为选举不仅是一种只涉及为欧洲议

① ［法］《世界报》，1977年4月19日。

② 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的民主》，巴黎，1976年版，第162—163页。

会组成确定程序的因素，而且紧接着由全民直接选举代替由国民议会简单任命“欧洲议员”，还要把重新组建的大会的咨询职能转变为立法职能。法国政府和总统在这方面的立场，如果说不是含糊不清的话，那也是相当动摇不定的。由于来自反对党和戴高乐派的压力，对进行欧洲选举持积极态度的德斯坦，在此之后不得不退却和审时度势。最后，政府法案规定了如下原则：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丝毫不会改变它的权力，关于它的权力变化问题，仍然由各国国民议会决定。

欧洲理事会的建立和在保持其过去权力的条件下直接进行欧洲议会选举，表现出“邦联欧洲”支持者（法国和英国）同“邦联欧洲”支持者（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之间的妥协。法国外交迈出了迁就反对派的一步。

1974年12月，在法国倡导下，“高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会议制定决策过程中部分地限制其成员国行使否决权的决议，也是妥协的一种表现。众所周知，戴高乐当时曾为保持部长会议的一致原则同伙伴国进行了顽强斗争。

可见，法国对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上层建筑的态度，在七十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没有完全背离过去在欧洲事务中保持国家主权的路线，但法国的立场变得不那么强硬而更加实际了。

类似的趋向在法国统治集团对西欧军事政治一体化问题的态度方面也可看到。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它的演变是同法国整个对外政策首先是同它的西欧和大西洋政策紧密相联的。

众所周知，在五十年代初，支持全力发展一体化的人们曾提出过，在同美国紧密结盟的基础上，在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计划。这一计划曾被法国议会推翻，因为一个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在共同体中谁起主导作用——法国还是联邦德国？在拟议中的集团范围内，两个大国军事地位形式上的平衡，显然并不能保证复活军国主义的联邦德国在对法国的关系上奉公守法。因此，所有具有爱国主义情绪和清醒头脑的政治家都反对这个计划。

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落空以后，西欧国家的军事合作集中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随着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国家的军事理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法国“小欧洲”军事政治联盟的概念反映了这一点。这一概念预定，联盟会谈建立在主权国家国际合作原则之上，这个原则的使命就是保证法国在军事方面，首先是在核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在这方面法国打算保持充分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是它的西欧伙伴所不具备的。

法国在“欧洲六国”发展军事政治合作的计划，在第五共和国的最初年代，是同国家逐步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便过渡到独立的民族防务政策并行实现的。在第五共和国领导人这个两位一体、具有明显反美倾向的方针中，已孕育着深刻的矛盾。问题在于：西欧国家的军事政策，首先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同美国军事政治紧密结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结盟首先就决定了，法国以自有核武器为基础的独立的民族防务政策实际上是在美国“核保护伞”下实现的。关于美国的“核保护伞”，法国领导人从策略上考虑并不予以宣传，虽然现实政策是从西欧同美国在军事领域相互依存这一事实出发的。上述矛盾使法国与他国的军事政治合

作的计划必然失败，这无论是在法国庇护下的“欧洲六国”范围内（福舍计划），还是在法国——联邦德国为基础的双边关系上（爱丽舍协议）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戴高乐将军得出结论：在纯西欧或者纯大西洋关系的狭小范围内，不存在解决对法国性命攸关问题的令人满意的途径；法国安全的问题应该在更加广泛的国际关系范围里予以考察。六十年代中期，戴高乐转向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搞缓和、友好和合作的政策，是合乎逻辑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步骤。从这时起，法国实际上对西欧军事一体化逐渐失去了兴趣。

在缓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法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对西欧军事一体化问题表示任何的主动性，而且对其它西欧国家与美国共同表现出的积极性持否定态度①。

七十年代初，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过程已包括联邦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下，法国害怕自己降到二等地位，因而开始寻找所谓同时考虑到“东、西方伙伴”的理由，重新注意西欧国家的军事合作问题。在这期间，法国讨论了同英国双边核合作的问题。1973年春天和夏天，在法国倡导下，“欧洲九国”积极讨论了西欧的防务问题。法国甚至打算恢复西欧联盟，以此作为西欧国家军事政治合作的组织中心，然而却遇到了联邦德国的坚决反对。因为西欧联盟对联邦德国的军事地位带有歧视性质。结果，法国外交不能按其直接目的来实现所有这些行动。蓬皮杜的继承人德斯坦曾把建立“邦联欧洲”宣布为自己的任务，1975年又主张要调整法国对西欧军事一体化的态度。在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有两个连

① [苏]《法兰西》，莫斯科，1973年，第8章，第3节；
[苏]《现代世界中的西欧》，莫斯科，1978年，第1卷，第4章。

续性的阶段："第一阶段，保证西欧政治上的独立性，继之便可进入执行某些防务职能的第二阶段"①。同时总统指出，这两个问题要同时考察，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先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

整个说来，这一立场表明了总统的现实主义态度。从近期前景来看，西欧军事一体化的发展至少存在着三个障碍。除了德斯坦所列举的缺乏政治统一外，法国独立民族防务概念同共同体伙伴旨在和美国紧密结盟的"防务"政策之间也包含着重大的矛盾。后者对法国共同防务计划抱有很大戒心。因为法国作为共同体唯一真正独立的核大国企图在核方面谋求西欧领导者的地位。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这特别表现在：七十年代末，英、法核合作这一议题已从日程上取消。最后，法国领导人还要考虑苏联对军事政治一体化的否定立场。总之，法国七十年代关于西欧军事合作问题上的政策，是要寻求同伙伴国的妥协。法国一方面在北大西洋公约这一军事组织和"欧洲集团"范围内仍旧持反对意见，而另一方面又积极参加西欧国家在武器生产方面的协作，并通过1976年建立的把"欧洲集团"成员与法国联合起来的欧洲规划组织协调各国军事工业方面的政策。

西欧一体化过程，不仅向纵深发展，而且还向广度发展。一体化的客观因素，刺激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扩大过程，但它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个成员国的立场。六十年代，法国扼制一体化过程向广度发展，以便在"小欧洲"特别在农业"共同市场"及关税联盟等组织内部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六十年

① ［法］《费加罗报》，1975年5月21日。

代末，在完成这一阶段后，法国的立场改变了，它主张欧洲经济共同体接纳英国、荷兰、挪威和丹麦。

“欧洲六国”变为“欧洲九国”（挪威人民反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提高了共同体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同时也加剧了伙伴国之间的内部竞争。新成员国适应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相当复杂的过程尚未完结，七十年代中期又提出要吸收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以进一步扩大“九国”队伍。然而，这一次法国的立场表现出两重性，即原则性和灵活性并用。法国领导人成为一体化过程向广度发展的拥护者，因为这符合它把帝国主义的西欧中心团结起来的总方针。法国在南欧国家集团关系方面的政治计划进一步说明了上述结论。这一计划的实质是，法国利用南欧国家作为它争夺西欧领导权的同盟者。除此之外，法国领导集团还把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视为稳定资本主义在西南欧的地位以及阻止这一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办法。在这些国家的法西斯专政跨台后的过渡时期，法国外交通过支持这些国家的中间力量和抵制革命政治力量，给这些国家国内政策的发展以一定的影响。它力图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模式的内部政治演化上施加影响。因此，当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认为接纳希腊加入共同体为时过早时，法国表示了反对意见，并积极促使在1979年5月签署关于接纳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葡萄牙革命高涨时期，当涉及到向其提供财政援助时，法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它成员国一起持反对立场。

然而，这些年来法国在同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关的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归根到底受其实用主义和看风使舵思想的

驱使。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二阶段的中心问题，是法国同西班牙的关系。法国对西班牙作为新成员候选人问题的官方立场是，从政治上说是"可以"的，在技术上却提出了许多重要保留条件。德斯坦在1978年6月正式访问西班牙时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回答西班牙《埃菲通讯社》记者时声明："我们为西班牙承认自己的欧洲使命而高兴……我们希望在共同体中加强地中海国家的影响……但是，接受象西班牙这样的大国，从两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重大、微妙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①。

在法国看来，问题的"严重性"和"微妙性"就在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对法国农业特别是对其南部地区带来威胁。法国的某些工业部门——黑色冶金、船舶制造和纺织业也将受到打击。围绕着共同体的扩大问题，在国内产生了尖锐的政治斗争。法国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坚决抗议南欧国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为这会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法国共产党完全支持这一立场。戴高乐派也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接纳新成员。

总统选举初期，法国领导人不得不顾及国内强大反对力量的存在。下述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即德斯坦在不会使自己原则上同意接纳新成员国这一态度受到怀疑的条件下，主张延长新参加国的过渡时间（由罗马条约规定的五年延长到十年）。

法国实行西欧政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寻求同共同市场伙伴国首先是同联邦德国和英国的共同行动纲领。七十年代，法国同它们的关系发展得远非顺利。

---

① ［法］《世界报》，1978年6月2日。

法国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曾具有牢固的基础，这是战后几十年内法国外交培植起来的。这个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从五十年代两国的“和解”政策，经过1963年爱丽舍协议所确立的“巴黎—波恩轴心”，到六十年代下半期的冲突，其后在七十年代又开始寻找新的平衡。蓬皮杜时期，巴黎和波恩的关系被评价为“模范伙伴”；德斯坦时期，又被称为“特惠合作”。整个说来，这种关系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这特别反映在：除了“欧洲九国”共同的大西洋和西欧的各种特殊关系之外，还由于签署双边合作协议加强了两国的关系。七十年代，双边合作的机制曾非常活跃。伦敦《泰晤士报》在1980年甚至写道：“这两个国家对外政策的配合已达到了两个主权国家少有的水平”①。

两国主要的活动区域在“欧洲九国”；两国领导人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重点也在于此。法国和联邦德国是西欧最有影响的大国，这是因为：法国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联邦德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在我们考察的年代，两国实际上决定着西欧一体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法国同联邦德国从七十年代后半期特别积极贯彻的“特惠合作”方针，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首先，在震撼西欧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条件下，联邦德国是“九国”之中具有实际经济能力来支持法国经济和法国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全部政策的唯一国家。

法国领导人通过爱丽舍协议批制，同自己的联邦德国伙伴在“欧洲九国”各个级别的机构进行了紧密联系，以协调反危机措施以及对有关形势看法的立场，保护西欧国家的利

① ［英］《泰晤士报》，1980年2月6日。

益。特别是在以美国和日本操纵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级会晤和“南—北”对话的情况下，保持西欧国家的利益和本身的独立性，以及协调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方针。

共同体内有关英国这一特殊问题的存在，也是这几年法国同联邦德国接近的一个刺激因素。诚然，在这个问题上，巴黎和波恩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对英国人的某些要求，比如重新审定整个农业政策，联邦德国明显地抱有同情。然而不管是法国还是联邦德国，都不愿意满足伦敦关于在同西欧以及同美国关系方面所享有特权地位的奢求。在这方面，两国也只是在一定限度上保持了意见一致。巴黎和波恩希望，伦敦所追求的每项目标都对自己有利。最后，法国、联邦德国对美国西欧政策估价方面的接近，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法国外交逐渐缓和了自己对美国激烈批评的调子；而联邦德国，当美国触及到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利益时，则开始更加积极地抵抗美国的强权。

同时，两国在七十年代整个时期的“特殊关系”，也包含着严重矛盾。这首先是与联邦德国关于西欧政策的长期任务有关。这一任务是，它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实现自己经济和政治潜力、彻底克服本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部弱点以及在更加遥远的将来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基础。因此，对有极大能量的莱茵河畔的对手保持有效控制这种日益增长的关注，常常在法国对外政策上占据突出的地位。两国关系的经济和货币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参见第六章）。法国已感触到，无论是在“欧洲九国”内外，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市场上，联邦德国都占据了经济优势。

法国同联邦德国关系的军事方面使得法国特别耽心。尽管法国在军事政治方面比联邦德国占据十分明显的优势，但

联邦德国总是企图利用它可以进入的常规武器领域来弥补其无核大国的地位。近些年来，联邦德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有欧洲国家中拥有最强大无核军事力量的国家。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七十年代，法国所持的方针是，在完善核武器的同时全力发展和加强常规武器，并千方百计试图巩固自己在现代世界上第三核强国的地位。对德国军事实力增长的耽心，在改变法国对裁军问题的态度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长期忽视相应的国际谈判之后，于七十年代末法国的态度有了变化。

这样，法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它们的合作和竞争，都是在两国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领导人对保证西欧力量平衡给予了极大关注，其目的是可靠地抵销联邦德国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发展。

为了保证法国同联邦德国的平衡，法国外交试图依靠英国。

众所周知，在六十年代，法国同联邦德国联合起来在西欧对付英国，阻止它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联邦德国在这个问题上也被迫支持戴高乐的政策，同他在实质上没有分歧。但在七十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欧洲九国”基础的法国—联邦德国关系开始冷却，而法国同英国的关系开始接近，其动机之一就是法国统治集团试图找到对抗联邦德国的力量。七十年代英国对外政策方针的变化以及统治集团“面向欧洲”，也促进了这种接近。

当然，七十年代法、英关系有时也有很大波动：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得到了改善；在自由派执政时期，又出现了恶化。但是，合作方针仍旧是决定性的趋向。

两国统治集团对共同体政治组织的态度具有同一“信

仰”，都是“邦联欧洲”的拥护者。他们组成了反对联邦派的统一战线，而联邦派中包括有象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强有力对手。法国和英国在联合对抗联邦德国、力图控制它的活力的同时，特别对保持他们作为西欧仅有的核大国特权地位以及不允许联邦德国达到这样的地位方面，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同西欧中心形成和发展相关的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刺激了英、法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各方面的合作。但共同体同时也是两国资产阶级在有关西欧建设具体问题上进行尖锐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场所。七十年代，在“欧洲九国”内，英、法矛盾集中在共同体的农业、能源和预算政策等问题上（参见第六章）。英国要求重新审查作为法国外交产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坚持缩减自己对共同体预算的缴款，在制定共同的能源政策时，英国企图保持自己作为石油开采国的特权地位。同时，英国外交力图在抗衡法国方面取得联邦德国和共同体其它有关伙伴的支持。因此，尽管在许多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存在着观点一致，但仍导致了七十年代中期英、法关系的恶化。1974年自由派掌权后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新领导立即针对法国提出了重新审查关于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条件的要求。1975年英国七月全民投票，决定它参加共同体，这使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关系有了某些改善，但改善的程度并不大。譬如，在这几年，法国领导人对于英、法核合作问题以及整个西欧军事一体化问题都不够关心。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七十年代英、法的矛盾和角逐，在共同体以外也显露出来。比如，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问题上，两国的立场，特别在七十年代末，发生了明显分歧。英国成了缓和政

策激烈反对者的保垒，而法国则继续遵循缓和的方针。两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角逐也是明显的。

总之，法国外交总是在共同体两个主要伙伴联邦德国和英国之间采取灵活手段。在具体问题上，它时而和这一方联合，时而和另一方联合。同时，法国在同美国艰难的对话问题上，力图取得自己西欧伙伴国家的支持。

第三节　法国与美国

法国的大西洋政策，是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特别是西方世界关系体系发生各种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随着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基础的西欧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逐渐改变了西欧同美国力量的对比。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专家之一——皮埃尔·列柳什写道："法国把向多极化世界的演变作为自然的和从总的来说积极的现象接受了。很明显，这种进化，对法国来说包含着一定好处，它为法国在世界上的活动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机动场所，有助于同华盛顿建立更加协调和平等的关系"①。

法国积极促使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重建西欧国家同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六十年代，它实际上确立了单独同美国斗争的方针。1966年，这种斗争达到了顶点，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着帝国主义角逐的三个中心的形成，作为法、美分歧内容的货币、能源、贸易一经济以及政治等基本问题，也局部地成为西欧同美国相互关系的突出问题。在西方世界帝国主义之间

① ［法］《外国政治》，1979年，第3期，第783页。

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法国外交极力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此，法国首先是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吸收日本）组织和利用集体力量来影响美国。

同时，七十年代法国的大西洋政策，也反映出统治集团要加强同所有西方国家团结一致的总方针。由于能源和原料危机，这一任务就变得特别迫切，因为能源和原料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加深了。世界人民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获得解放的国家为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选择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权利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把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命运相互依存的思想，特别反映在法国同大西洋伙伴国的军事政治关系方面。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保持了机动自由的同时，在七十年代它又明显加强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合作。法、美在防务政策问题上的关系，也经过了某种演化。法国建立独立核武器的方针，在长达二十年的期间里曾是法、美双边关系中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之一，而现在对美国来说"已不成为问题"①。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美国在法国成为一个核大国的道路上先是制造各种障碍，其后由于它没有能力阻止这一过程，则试图通过多边核力量计划对其进行控制。而在七十年代，用德斯坦的话说，美国"已承认法国独立防务对西方的意义"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渥太华宣言（1974年6月），反映了新形势的出现。在该文件中，第一次把法国核武器看成是对大西洋联盟所有成员国集体安全的贡献。

① ［法］《外国政治》，1979年，第3期，第485页。
② ［法］《世界报》，1978年1月7日。

法国的立场，首先是在它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出现了向大西洋盟国接近的变化。1976年，出现了法国反对阿伊耶尔将军“全方位防务”概念，采纳迈尔将军提出的“扩大安全区域”①这一新概念的明显迹象。1976年的新概念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过去：第一，明确确定了敌人的所在（在东欧）；第二，规定，要使常规武器现代化，与发展核武器的同时积极发展常规武器；第三，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范围内，即法国领土以外发生冲突时，法国要同大西洋盟国紧密配合行动。虽然迈尔将军强调指出，法国无意返回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并对自己军队和武器的使用保持充分的监督，但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在评论军事问题争论时作出了明显一致的估计：“很明显，在这个（迈尔将军的——著者）战略计划中指出了要同大西洋联盟实行相当紧密的合作……”②“这完全是泛大西洋理论”③等等。

一方面法国的西欧经济共同体伙伴放弃了六十年代正统的大西洋主义，另一方面这十年里法、美关系具有了更加平等的性质，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法国的大西洋政策同它的伙伴国政策接近。美国同法国的矛盾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还尖锐化了，但其表现形式却不那么激烈了。

早在六十年代末，法国领导人就已开始逐步放弃同美国公开论战的政策。1974年，德斯坦表示了“谋求不互相依赖的伙伴关系的”④意愿。美国领导人在把法国视为美国同西欧对话的主要对象的同时，也为调整两国关系作出了努力。

---

① ［法］《国防评论》，1967年12月号，第1923—1932页；
［法］《国防评论》，1976年6月号。
② ［法］《费加罗报》，1976年6月3日。
③ ［法］《回声报》，1976年6月3日。
④ ［法］《世界报》，1974年5月15日。

在七十年代恢复长期中断的法、美高级会谈中，讨论了双边迫切的国际问题，协调了各自的立场，达成了妥协。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幻觉，按照列柳什1979年的说法就是："七十年代末，美国已比较谦逊了……已不是过去那种公然蔑视法国民族尊严、粗暴、专横的领导者"①。

然而，在法、美关系上消除隔阂的过程并不是平坦的，常常是在妥协和危机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有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这就加重了上述过程的不稳定性。这种状况在七十年代上半期蓬皮杜总统任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美国对西欧盟国又采用了老办法，施加粗暴的经济压力（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改变了美元兑换率并征课10%的进口税），并且在国际活动中公然蔑视盟国的意见（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中，尼克松没有同西欧盟国协商就宣布美国处于战争准备状态）。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下半期再次出现（表现在石油进口、石油价格、贸易政策及关税保护等问题上）。

1974年，法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与制定新大西洋宪章相关的倡议破产。倡议是以所谓"欧洲年"的名义提出的。美国想以新宪章作为重建美国与西欧关系的基础。法国反对该文件一些基本原则，认为这项文件实质上是想把西欧对于美国的不平等和依附地位固定下来。这个文件的出发点是，预先在两个中心之间划分责任，即美国承担全球责任，而西欧仅仅承担地区责任。法国坚决反对这种划分。当时的外交部长若贝尔声明，西欧"用自己的力量支持其在非洲、拉丁美洲、地中海、近东以及与中国和日本关系方面的世界

① ［法］《外国政治》，1979年，第3期，第488页。

中心地位”①。

法国还反对美国在解决两个中心相互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整个态度。美国方面试图以军事作借口，在经济政治问题上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西欧国家。法国则坚决反对这样做，要求在西欧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与军事—政治关系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法国也反对美国赋予西欧同美国之间的协商以经常性和法定性的思想。法国人从这种建议中看出了美国想保持对西欧政治的控制和使它具有干涉西欧国家事务权利的企图。德斯坦在竞选期间宣称：“没有任何理由建立同美国的强制性的协商机制”②。

由于法国的努力，尽管并非总是得到欧洲共同体伙伴的支持，美国方面还是被迫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1974年6月于渥太华签署的关于大西洋关系宣言中，对新的大西洋宪章的相应原则作出了让步。法国政治评论家格罗塞尔称这个宣言，是“一个同若贝尔建议很少有出入的文件”③。渥太华宣言签署之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在法国影响下争取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行动：1973年12月，通过了欧洲地位宣言，它宣布“欧洲九国”将努力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同美国的关系。

七十年代，法国（和西欧其它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关系领域仍然是严重对抗的场所。特别是1974—1975年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整个困难，导致了新旧大陆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进一步冲突。

---

① ［法］米·若贝尔：《前途的回忆》，巴黎，1974年版，第268页。
② ［法］《世界报》，1974年5月3日。
③ ［法］阿·格罗塞尔：《西方列国》，巴黎，1978年版，第364页。

法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就改革欧洲货币体系问题提出倡议，以便结束美元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取消其储备货币的职能，限制其对西欧货币的影响，最后在西欧建立货币稳定区。在整个七十年代，法国外交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积极性，虽然远非总是成功的。

法国在能源问题上也执行了一条类似的路线。法、美从能源危机一开始就在关于如何调节危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首先是因为两国对外国能源特别是对阿拉伯能源的依赖程度不同。1974年1月若贝尔在近东旅行时声称："……法国同美国持完全相反的立场"①。美国在同石油输出国的关系方面持严厉方针。它要西方消费国集团与石油输出国相对抗，试图把前者在自己的监护之下联合到1974年成立的国防能源机构之中。法国坚决拒绝美国的路线。同美国的作法相反，它特别加强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联系，并通过"欧洲—阿拉伯的对话"，积极促进它们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合作。

1975年，法国再次向西方伙伴提出倡议。法国总统提议召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会议，讨论克服危机带来的迫切问题，共同寻求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1975年12月，在朗布依埃召开了首次会议，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每年会见的原则，预定把这种会见作为协调三个帝国主义中心政策的形式。这反映了竞争对手把他们的角逐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愿望。

但是，帝国主义竞争对手们的利益很难调和。美国力图保证自己在这种会晤之中占主导地位，而法国则积极同它对

① 引自［法］阿·格罗塞尔：《西方列国》，巴黎，1978年版，第264页。

抗，并希望在西欧、美国和日本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同时，西欧国家也对法国的态度不满，因为它奢求以欧洲共同体的名义说话，并顽固地不愿让作为“西欧九国”正式代表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这种会议的工作。后者只是以第三者的身分参加了1977年伦敦“七国”“高级”会晤。

每一次这样的会晤，都成了竞争伙伴们顽强斗争的舞台，他们都力图首先加强自己的地位。法国力图依靠“欧洲九国”向美国施加压力，并且只要有可能它还和日本联合在一起向美国施加压力。比如，在讨论能源问题时就是如此（日本国内石油消费几乎全部要进口，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西欧国家接近）。然而，在贸易——经济问题上，法国同欧洲共同体伙伴国一起，既反击美国又反击日本对西欧阵地的进攻（参见第六章）。

七十年代法、美关系可以说最明显地表明了苏共二十六大阐述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总规律。在日本和西欧垄断组织与美国资本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它们对原料、能源市场的竞争加剧了。“资本主义遇到的困难也影响到它的政策，包括它的对外政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着对外政策方针的基本问题的斗争在加剧”①。这一共同的规律性，在法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也很容易看出来。

第四节　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由于历史传统、经济特点及政治考虑等综合因素，亚洲、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页。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早在三十年前，法国殖民占领者，就伸向了太平洋、印度洋及大西洋沿岸非洲、亚洲大陆的广大区域。五十年代，前法属殖民地人民取得了政治独立，但法国并非到处“后退”和停止它对于解放了的年轻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法国在从前构成它的殖民帝国的所有法语国家，实际上还都在或大或小地保持着自己的地位。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后，从1963年起，在戴高乐将军倡导下，法国开始执行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政策”。法国发展同获得解放国家积极联系的努力，既是由于政治和战略利益决定的，又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法国本身由于缺乏自然资源，渴望从亚洲和非洲国家获得。在能源上得到可靠的保证，对法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意义。法国对大量出口自己的工业品也非常关注。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它的具有前途的市场。

发展中国家是法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七十年代，法国在获得解放国家中一直保持稳定的地位。法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约1/3的法国直接投资是投在这些国家。法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从1967年的17.28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25.64亿美元①。

在第五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中国家在法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虽说是独立的，但却不总是固定不变的。大约从七十年代中期，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已成为法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这是由一系列外部和内部原

① [苏]尤·尤达诺夫：《非洲的西欧资本》，转引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78年，第10期，第30页。

因决定的。毫无疑问，能源和经济危机以及危机所带来的生产下降、通货膨胀的迅速增长、外贸赤字、失业的逐步增加和社会冲突造成的后果，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

危机对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威胁，迫使第五共和国统治集团重新审查对发展中国家首先是石油和其他能源生产国的政策，因为它们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不可估量地提高了。法国需要保证自己有可靠的和尽可能多种渠道的能源供应。

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新方针，同它对外政治活动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法国的西欧政策及缓和政策紧密相关。七十年代中期，法国政府断定，西欧一体化的过程将会延缓，巴黎在“九国”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削弱。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可以加强法国对于其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的优势，并能对滞缓的西欧一体化过程起到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1974—1976年间，恰恰是由于法国的倡议，发展中国家与“共同市场”关系中的许多问题被提出并得到了解决。

与此相类似，六十年代中期，法国成为“东—西方”对话的倡导者。七十年代中期它又提出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同南部发展中国家进行新对话的主张。在这种对话中，也和前一种对话一样，法国打算利用自己在非洲的稳固地位以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发挥先锋作用。

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表现出如下特征和趋向：缓和法国和美国的对抗；试图承担解决整个西方世界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全球性问题的责任；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中的保守势力；法国政策集中在明显确定的区域。

戴高乐和蓬皮杜时期，法国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法、美角逐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两国在东南亚和近东的矛盾。在这些地区，巴黎和华盛顿持完全相反的立场。德斯坦在法国掌权后，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查了法、美关系。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积极寻求妥协解决办法以及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趋向可以从两国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石油生产国的谈判态度上、从“南—北对话”中、从法、美在热带非洲独特的“劳动分工”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认识。毫无疑问，协调一致的趋向同时并不排除法、美之间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法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特点还表现为，巴黎想在解决整个西方世界同获得解放国家集团之间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倡导者的作用。法国在继续积极发展同自己传统的伙伴国家（非洲、中近东国家）双边合作的同时，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还想在欧洲共同体及整个西方工业国家范围内发展多边关系以补充上述双边关系。法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同[illegible]洲、西印度洋群岛和大洋洲的46个发展中国家于1975年2月28日缔结的洛美协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1979年10月31日，在法国积极参与下，签署了第二个洛美协定，它包括了58个获得独立的国家。新的协定有效期为五年，规定由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比1975年的上述协定增加62%①。

能源危机爆发以后，法国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了所谓“欧洲—阿拉伯对话”的理论。法国新倡议的特点是：力图扩大对话的范围，预计把30左右个国家吸引到对话中来；以在代表整个西欧利益的法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对能源危机

① ［法］《世界报》，1979年11月9日。

态度上的妥协。调合这两种态度的意图，在美国和法国总统于1974年12月14—16日在马提尼克岛的会谈过程中得到了采纳。法国承认石油输入国之间“团结一致的意义（特别是节约能源方面的措施）”，而美国则接受了1974年10月24日法国总统所提出的关于召开液体燃料输入和输出国会议的建议。法国总统断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受了以全面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危机和原料首先是石油急剧涨价为特征的深刻和长期的演变，同时强调指出：“不要指望某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全部问题①。由于危机毫无例外地触及到所有参加西方经济体系的工业发达国家以及欠发达的石油输入和输出国，这样就出现了在这些国家之间达成“互惠协议”的必要性。从这一目标出发，法国总统建议在1975年初召集既包括发达国家又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会议。

法国新倡议致力于某些更为深远的目标。第一，巴黎希望避免在能源问题上同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在这方面，法国得不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的相应支持。第二，法国极力避免卷入同石油生产国的冲突，这种冲突对它的经济孕育着最不利的后果。第三，法国政府希望加强它作为三个国家集团之间以及西欧同美国之间调停人的已有作用。

1974年12月法国和美国领导人在马提尼克岛达成妥协后，法国提案在“绿色大陆”开始实施。1975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西欧、非洲及美洲大陆（美国、巴西、委内瑞拉）等27个国家代表的预备性会谈。

在1975年12月16—19日举行了巴黎会议（或者称作“南—北对话”）的第一次会议。它以模棱两可的结果结束。获得

① ［法］《世界报》，1974年2月7日，

解放的国家，不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赞成组成统一阵线，以联合解决石油，原料及其发展问题。大会按能源、原料、经济发展和财政建立了四个常设委员会。巴黎会议的下两次会议分别在1976年2月和1977年5月末—6月初举行。

关于建立经济新秩序的辩论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上都存在尖锐的分歧。新兴国家决心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消除剥削、歧视以及实行平等合作。西方工业国在“南—北对话”中在某种程度上组成了联合阵线来对抗获得解放的国家。在对话过程中，法国和美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进一步接近。同时，由于西欧团结的加强，法国在巴黎会议上的倡导者作用大大降低。1977年1月27日，前总理、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领袖希拉克声称：“由于法国期待九国在同南方会谈时用‘一个调子’说话，结果使它丧失了作为会议倡导者的一切有利地位”①。

1977年6月“南—北对话”最后阶段的失败，是对法国有关发展中国家全部政策的严重打击。它表明，法国充当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调停者的希望是站不住脚的。在法国外交影响下开始的“欧洲—阿拉伯对话”，同样也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果。同时，这种对话的迫切性也大大降低，因为无论是石油问题还是近东调节问题都超出了这种对话的范围。

法国想在解决西方世界同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一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倡导者作用和承担责任的失利，促使法国统治集团努力加强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双边合作。

在七十年代的法国政策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保守势力，并同他们积极合作；法国外交注

① [法] 雅克·希拉克：《在法国面临选择的时刻(演讲)》，1978年版，第235页。

意力集中在明确确定的区域。这一时期法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别优惠”伙伴有：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加蓬、中非共和国、扎伊尔、伊朗王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法国在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活动的重点区域包括有两个主要地区：热带非洲以及从马格里布到中、近东的地中海地区。法国之所以恰恰对这些区域有很高的兴趣是因为：一方面，法国同这些地区有传统的联系和地位（在非洲的前法国殖民地）；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有丰富的、对法国经济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动力资源（近东和中东）。

热带非洲地区——法国对它的影响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有1.4亿人（占非洲大陆全体居民的40%）讲法语①。六十年代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建设起的紧密“合作”，把法国同热带非洲各国联系起来。七十年代后半期，大约有30万法国公民，其中包括有15万法兰西人长期居住在非洲国家，有70万非洲人在法国工作②。

五十年代末，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吸取了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起义的悲惨教训，在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答应让14个法国殖民地*的人民实行独立，以防止在这里爆发反殖民占领的武装斗争。1960年法国把13个非洲年轻国家（除几内亚外）拉入法国共同体和法郎区。法国通过同所有这些国家签订双边“合作”协议，

3

① ［法］雅克·希拉克：《在法国面临选择的时刻（演讲）》，1978年版，第23页。

② ［法］雅克·希拉克：《在法国面临选择的时刻（演讲）》，1978年版，第234页。

* 14个法国殖民地是指：加蓬、几内亚、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达荷美（贝宁）、马里、尼日尔、象牙海岸共和国、乍得、多哥、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毛里塔尼亚等国。

尽可能紧密地把它们维系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内。法国同原非洲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合作”，是由1960年专门设置的共同体事务以及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总秘书处安排的。

在将近二十年里，法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政策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它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文化需要提供借款、信贷和补贴等“援助”。

这种“合作”的明显的新殖民主义性质，使得法国的非洲伙伴日益不满。它们对法国经常表现出的直接干涉这些国家内部事务的企图特别愤慨。法国“援助”的“父道主义”，忽略本地的需要和特点。垄断组织对非洲国家自然财富无耻的掠夺，破坏了戴高乐将军当时庄严宣布的“合作”基础。自七十年代初以来，非洲法语国家愈来愈坚决地要求重新审查过去同法国签订的协议。毛里塔尼亚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1972年11月29日，它宣布建立本国货币体系，脱离法郎区。非洲的其它法国伙伴国如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加蓬、塞内加尔、达荷美、乍得等也都效仿毛里塔尼亚的榜样。当然，许多非洲国家只不过局部地重新修订了同法国的旧协议。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危机——在1970—1972年就出现了危机的首批症状（原料涨价、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迫使法国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积极活动。

法国政府担心非洲国家对法国“合作”政策的结果更加不满，故在1973年决定，在三年期间把对自己伙伴国的“援助”增加50%（比1973年）①。显然，法国贸易平衡表上的巨大

① [法]《经济情报》，1973年，第2692期；
[法]《法国统计年鉴》，1977年版，第683页。

赤字，以及对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迫切需要，是促使法国修订政策方针的动机之一。1974年5月，当选总统德斯坦，主要是从利用非洲市场缩减国家外贸赤字的这一可能性来看待非洲的。1974年后，法国同非洲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法国对非洲的出口从1973年的约70亿法郎增加到1974年280亿法郎，1976年达340亿法郎，到1977年已超过420亿法郎①。

前任总统在其执政的头几天就说明了它对非洲政策的打算。以普·阿别林为首的合作事务部代替了上述声名狼藉的秘书处②。1974年7月18日，总统召集了18个非洲法语国家和印度洋区域国家的大使会议，会议为新非洲政策奠定了基础③。1974年9月23日阿别林在接受《情报》报采访时透露了新非洲政策的内容，他说：近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石油涨价）及其对我们伙伴国内外形势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确立合作政策的新方针④。合作部长构画了同非洲伙伴国家缔结的新协议的基本轮廓，并且强调指出，为了组织广泛的、综合性的和“无所不包”的大项目，法国打算放弃“狭窄的、局部的或专项的”交易和合作。法国在继续执行它同非洲国家双边“合作”的同时，还要以“多边”合作对其加以配合和补充，使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伙伴和西方其它工业国也提供“援助”。

1975年6月26日，法国部长联席会议决定，分阶段地增加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

---

① [法]《新非洲》，1973年11月号；
[法]《法国统计年鉴》，1977年，第594—595页。
② [法]《世界报》，1974年6月1日。
③ [法]《经济与财政通讯》，1974年7月19日。
④ [法]《情报》，1974年9月23日。

同时，国家“援助”的份额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①。因为“援助”的大部分是由借款构成的，因此扩大援助必然会导致非洲国家债务的增加。某些非洲国家的贫困状况，使之很难还债。根据联合国的倡议，1979年5月2日，法国政府宣布废除最落后和最贫穷国家的债务。注销的债务总额为7.47亿法郎，其中有6.20亿是非洲国家的*。

为讨论“合作”问题每年召开的法国—非洲会议具有经常的性质。1973—1981年期间，共举行了八次这样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法国和非洲之间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以及更加广泛的非洲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乃至同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从七十年代中期充当了非洲和西方调停人的角色。法国统治集团在非洲的战略原则是，把这一重要地区保持在帝国主义的影响和控制之内。

法国为保持帝国主义（首先是法国）在非洲的影响而使用的手段相当广泛。除了传统的单边“援助”之外，法国还试图组织帝国主义国家同非洲国家的多边“合作”。在巴黎第三次法国—非洲会议（1976年5月10—11日）上，法国总统提出了依靠欧洲工业发达国家自愿缴纳来建立数额为10亿美元的所谓非洲团结基金的设想。法国表示，准备为该项基金提供一半的资金②。

1977年6月26日，法兰西共和国首脑提出了新思想：缔结有阿拉伯国家参加的西欧和非洲“团结协议”。在1979年

---

① ［法］《世界报》，1975年7月28日。

* 这些非洲国家是指：上沃尔特、马里、尼日尔、乍得、中非、几内亚和喀麦隆等国家。援引自［法］《世界报》，1979年5月4日；［法］《回声报》，1979年5月21日。

② ［法］《回声报》，1976年5月12日；
［法］《人道报》，1976年5月12日。

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提出召集三个地区——欧洲（欧洲经济共同体）、阿拉伯（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国家会议。法国总统表示："在欧洲、非洲及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加强团结的协议，无论对于安全问题，还是对于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有益的"①。

法国建议的基本思想，是更加牢固地保障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首先是法国自己的石油供给，使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相信，在利用西欧的工艺和经验的同时，向非洲投资是有益的。在法国看来，实现这个提案有助于抵销美国和日本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日益加强的影响。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扩大和加强日益不安，因为这使法国在非洲大陆上的阵地有被破坏的危险。法国统治集团把非洲革命过程的客观发展，说成是"外部扩张"的结果。在反对非洲大陆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法国积极利用当地的保守制度。

法国公开充当欧洲在非洲利益"保护人"的角色。为此，它利用它所具有的一切杠杆，其中包括在非洲大陆个别地区尚保留的军事设施*。同时，法国政府还借口，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而使它无力在安哥拉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因而必须填补葡萄牙殖民帝国垮台后似乎出现的"真空"。

1977年4月，法国协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扎伊尔国内

---

① ［法］《世界报》，1979年7月12日。

* 七十年代末，法国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加蓬、吉布提和印度洋的马斯喀特岛设有军事基地，在这些基地的军事人员总数达1.5万人。除此之外，法国还在大约20个同它有军援协议的非洲国家驻扎少数军事人员。法国还同8个国家（吉布提、象牙海岸、加蓬、塞内加尔、中非共和国和多哥）签订了在必要时给予军事援助的共同防务协议。援引自《法国政治》，1978—1979年，第33卷，第177—178页。

战争进行了干涉，法国军队用运输机调运了1,550名摩洛哥伞兵同起义者作战①。在一年之后的1978年5月19日，根据蒙博托政府的“要求”，法国政府把法国国外第二伞兵陆战队派往扎伊尔的沙巴省，同比利时伞兵一起镇压新爆发的起义。这已是直接的武装干涉。它不仅在非洲而且在法国也引起了抗议的浪潮。但是，法国政府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它的“非洲盟友”邀请，它将继续干下去②。法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组它的“干涉力量”，以便提高其机动性和战斗准备的程度。

同时，法国还试图吸收自己的非洲盟国直接参加同革命运动的斗争。1978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法国—非洲例行会议上，法国总统提出了建立“泛非武装力量”的设想，以镇压和预防非洲大陆的革命烈火。法国的建议在非洲遇到了十分谨慎的反响。只有摩洛哥、加蓬、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支持这项建议，它们向扎伊尔派了少量部队。

多年以来，法国同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合作的政策，引起了非洲伙伴国家特别尖锐的批评。法国同南非共和国有着渊源已久的紧密关系。两国都未接受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这就使他们得以在原子领域发展合作。1976年5月，法国决定向南非共和国出售两个原子反应堆。1977年7月，法国从比勒陀利亚购买了1,000吨天然铀。这是法国在这方面的最大交易。法国同南非的合作，引起非洲如此强烈的抗议，以至1970年法国政府宣布，打算停止向比勒陀利亚出售武器，虽然它仍继续悄悄地出售。同时，法国表示要从道义上

① [法]《费加罗报》，1977年4月11日。
② [法]《世界报》，1978年5月20日。

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但又不同南非解放运动发生任何接触。

从1974年起，法国对南非问题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莫桑比克的非殖民化，安哥拉战争的结束，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日益加剧的政局不稳，南非共和国的内部危机，最后，法国的非洲盟国愈来愈坚决的抗议——所有这些都要求修正法国外交对南非的老态度。

还在1974年竞选时，德斯坦就宣布，他打算停止向那些不尊重民主自由的国家（其中包括南非共和国）出售武器。1977年，法国政府在非洲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宣布，如果比勒陀利亚当局仍进行核武器试验，法国就要“重新审查同它的关系”①。1976年，法国外交部同南非解放运动进行了首次接触。1977年8月，法国外交部长在东非国家旅行时表示，赞成必须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建立多数派政权以及使南非制度民主化和非种族主义化②。

法国同美国和英国一道，负有促使在纳米比亚建立欧化制度的“直接使命”，并支持英、美在罗德西亚的类似努力。法国政府赞同伦敦会议关于调整罗得西亚地位的决议（1973年12月21日），并赞成尽快承认津巴布韦（罗得西亚）。而在两年前，即1977年11月4日，法国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禁止向南非共和国出售武器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七十年代法国的非洲政策仍以支持保守制度为方向，同时不得不考虑到非洲发生的社会政治变革。它力图随机应变。近几年来，它对组织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非洲国家的合作也表示关注。法国同几内亚关系经过十年破裂之后，于

① ［法］《费加罗报》，1977年7月23日。

② ［法］《当今一瞥》，1978年，第37期，第5页。

1975年7月实现了正常化。1978年12月，德斯坦对几内亚进行了二十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1976年2月，法国正式承认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1979年3月，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路·卡布拉尔访问法国，1979年10月，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法国政府谴责了索马里对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并拒绝向它提供军事援助。当中非帝国血腥镇压的事实众所周知之后，在非洲社会舆论的要求下，法国政府于1979年宣布停止对博卡萨中非专治政权的军事援助。为了预防中非帝国事件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和防止左翼反对派掌权，法国特工人员经过准备，在1979年9月20日夜到21日，彻底推翻了威信扫地的博卡萨“帝国”。同法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居住在班吉的法国老“朋友”戴维·达科被宣布为已恢复的中非共和国的首脑①（1981年9月，由于军事政变，达科交出了政权）。

整个说来，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仍旧相当大。法国善于使自己在非洲的政治经济活动适应于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新条件。

非洲国家的社会舆论懂得法国大陆政策的真正动机。据巴黎《非洲妇女》杂志1979年末进行的民意测验资料，法语非洲国家90%的居民认为，法国在非洲大陆保护的首先是自己的利益，77%被调查的人主张法国军队应该从非洲国家撤出②。

法国在获得解放的国家具有传统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包括从马格里布到近东和中东地中海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

① [法]《世界报》，1979年9月22、25、28日。

② [法]《青年非洲》，1979年11月28日。

区。1970—1974年间，巴黎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把地中海变为“和平海”的倡议。同一时期，地中海地区被列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独立方面。1974年巴黎领导人的更替，法国对外政策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从这时起，巴黎不再泛泛地提地中海政策。法国外交方面的努力集中在马格里布以及近东和中东国家上。

同不久以前还是法国殖民地的三个国家—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关系的发展，在法国外交政策上占重要地位。到七十年代初，总的说来，法国成功地克服了同这三个北非国家非殖民化过程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麻烦与摩擦。

法国同突尼斯的关系发展得最为顺利。法国同它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给哈比卜·布尔吉巴政府以广泛的支持。1980年1月，突尼斯由于发生武装冲突，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法国政府向突尼斯领海派出了载有海军陆战队的舰队，以此对反政府力量施加压力。法国民主社会舆论把本国政府的行动称作是“炮舰政策”的表现。由于法国干涉突尼斯内部事务，急剧恶化了它同利比亚的关系，法国指责它在加富斯组织暴乱。法国同阿尔及尔的关系也出现了某些冷淡。

七十年代中期前，法国同摩洛哥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所谓“别伊—巴尔喀”事件（1965年摩洛哥的特工人员在巴黎劫持了反对派领导人），在长时期内都有深刻影响。1973年，由于摩洛哥政府没收法国殖民者大部分土地（26万公顷）* 而发生了冲突。只是在1974年8月签署了关于对国有化土地补偿措施的相应协议之后，上述问题才得到了调

---

* 1973年，在摩洛哥住有9万法国公民，其中有1万是法兰西人。

整①。1975年5月，法国总统自1956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摩洛哥。1975年7月15日，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协议特别规定，法国给摩洛哥以财政援助，鼓励法国在摩洛哥经济中进行新的投资②。1979年2月，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对法国正式访问。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法国在摩洛哥同阿尔及利亚关于西撒哈拉的争端中，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摩洛哥。

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经过长时间的极端冷淡之后，在七十年代末出现了正常化的趋向。1962年以来，在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上打上了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得独立而进行长期残酷战争（1954—1962年）及其后果的印记。战争结束后，在1962年3月签署的埃维昂协议中，规定了法国按低价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优惠条件。为了努力恢复本国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阿尔及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先限制法国各石油公司在石油价格问题上的权利。1971年2月24日，宣布把各石油公司中阿尔及利亚的股份提高到51%，并对石油管道和天然气产地实行国有化。为了报复，法国宣布抵制阿尔及利亚石油，它从阿尔及利亚购买的石油，由1970年的4,820万吨缩减到3,720万吨③。

1973年，法国在蓬皮杜新地中海政策的范围内提出“欧洲—阿拉伯对话”思想的同时，也试图使它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正常化，因为后者在阿拉伯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两国外交部长进行了互访。在访问过程中，就估价地中海形势（“地中海人的地中海”）和“欧洲—阿拉伯对话”问题达成了双边合作的协议。1975年4月，法国

① ［法］《法兰西共和国官方通报、法律和法令》，1975年8月11日。
② ［法］《世界报》，1975年8月16日。
③ ［法］《关于地中海地区研究》，1975年，第1期，第91页。

总统正式访问了阿尔及利亚，他宣称“我们两国胜利地实现了和解”①。

然而，两国预定的接近，在1976年初由于西撒哈拉地区局势的紧张化而受阻，因为法国支持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对这一地区的奢求。这立即影响到了两国的经济联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口中的比重，从1975年的33.5%缩减到1976年的27%，到1977年缩减为23%②。

1978年末，法国对西撒哈拉问题表现出更加平衡的态度，因而法国—阿尔及利亚的接近出现了一个新阶段。1979年2月15日阿尔及利亚新首脑布·沙德利在致德斯坦总统的信中，表示了“在利益平等基础上确定友好关系”③的愿望。阿尔及利亚总统对法国关于欧洲—阿拉伯—非洲合作的思想发生了兴趣。1980年，在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访问法国过程中，决定要建立两国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整个说来，从七十年代末，法国—阿尔及利亚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尽管他们当中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1973—1974年能源危机，决定了法国外交积极向中东和近东以及波斯湾地区转移的倾向，因为这里的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七十年代末，法国石油消费的80%由阿拉伯世界提供这一地区，同在非洲一样，法国首先是同保守制度合作，尽管也试图把这一重点合作同发展与进步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关系结合起来。

法国在中东的重要伙伴国，是伊朗、沙特阿拉伯这些法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七十年代后半期，这两个国家在法国

① ［法］《新型工厂》，1975年4月11日。
② ［法］《新型工厂》，1975年4月11日，
③ ［法］《世界报》，1979年2月17日。

全部石油购买量中占40%以上。

1974年，法国和伊朗签署了关于经济与科学技术合作以及核能方面合作的长期协议，交易总额达50亿美元①。1976年10月，法国总统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中，签订了价值在300亿法郎以上新的大宗合同的议定书。1978年6月，伊朗宣布从法国购买四座原子能发电站用核反应堆，价值达200亿法郎。

1978年末伊朗发生的政治危机，在巴黎引起了恐慌。法国政府在继续支持沙赫的同时，试图同居住在巴黎的伊朗阿亚多尔反对派领袖霍梅尼建立接触。

沙赫政权在伊朗的衰落，导致了对德黑兰整个政治、经济的战略进行重新估价。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止西方垄断组织在伊朗无节制的活动。伊朗新政府废除了同法国的核合作协议。伊朗的革命迫使法国统治集团积极寻找获取石油的新场所，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寻求石油。

在整个七十年代，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重要伙伴是沙特阿拉伯。1975年7月，巴黎和利雅德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按此协定，沙特阿拉伯向法国提供80亿法郎的长期贷款，以支付法国供应的工业设备和材料。法国和美国、英国一起，成为沙特阿拉伯武器的主要供应者*。1977年，法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出口中占第三位（在日本和美国之后），在进口中占第七位。两国签订的合同总额从1973年的4,300万

---

① ［法］《回声报》，1975年1月3日。

* 1974年法国对利雅得的军事供货价值估计为40亿法郎。参见《国外商情公报》，1975年，第8期，第5页。

法郎增加到1977年的6,500万法郎①。

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对近东及非洲局势估计上的一致，使两国接近起来。利雅德支持法国1977年和1978年对非洲的干预。

七十年代中期，法国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以期得到更多的石油供应。法国在同保守政权合作的同时，还同进步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它们签订了一批经济协定。七十年代末，法国在近东首要伙伴国家中，伊拉克的地位提高了，它向法国提供的石油占其进口量的17%。在伊朗—伊拉克武装冲突中，法国实际支持伊拉克，向它提供现代化武器。

法国在其试图起积极作用的近东政策中，不能不顾及到进步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它们赞成全盘解决近东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

法国对于处理近东问题的立场，从1967年以来是以三个基本因素为基础的：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出；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家园”）；所有近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毫无例外地都有权在安全的被承认的边界之内生存*。法国外交认为对这些国界提供军事保障具有特殊意义，并打算在这方面扮演一个主要保障国的角色。巴黎提出了实行这种保障的某些形式：设置联合国军队，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派观察员等。1973年十月战争以后不久，当时的对外关系部长若贝

① ［法］《回声报》，1978年5月29日。

* 关于1967—1972年近东冲突中的法国政策，详见［苏］伊·阿·卡拉斯尚夫：《第五共和国的对外政策（1958—1972年基本方向和趋向的演化）》，莫斯科，1976年版，第189—204页。

尔就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提出："我们认为，切实的解决办法，就是从1967年开始，全面执行安理会242号决议（审理以色列侵略问题——著者）①。

法国一方面主张全面解决近东问题，要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但同时又坚定地支持在美国调停下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单独媾和这一企图。德斯坦总统于1978年9月21日对开罗—特拉维夫协议作出了评价，他指出："协议开创了可能性，但内容尚不明确"②。法国政府对埃及和以色列签署的单独和平协议，也作了同样的评价。在1979年3月政府声明中指出："近东全体人民都希望得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得到保证，即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都参加以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为基础的总协调过程"③。

在决定近东冲突实质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上，德斯坦甚至比他的前任和其它"九国"成员走的更远。1974年10月，法国外交部长在贝鲁特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宣布，法国赞成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准备承认这个国家④。1975年11月初，法国政府同意在巴黎开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情报和通讯机构。从这时起，法国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近东的所有问题将进行定期协商。然而，1976年以后，法国在外交上避免使用"巴勒斯坦国"这一术语，而宁愿用更为含糊的表述——"祖国"或者"民族国家"。看来，这是同

① ［法］《世界报》，1974年1月18日。
② ［法］《世界报》，1978年9月22日。
③ ［法］《世界报》，1979年3月31日。
④ ［法］《经济与财政通讯》，1974年10月22日。

近几年来在法国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同阿拉伯保守政权（其中包括埃及）接近的趋向以及同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意图相联系的。

德斯坦的执政，是与法国改善同以色列关系（1967年之后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公开敌对）的尝试结合在一起的。法国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显示对近东敌对各方更为平衡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法国、以色列的外交部长首次互访。此后，宣布了双方关系正常化。法国代表在联合国同其它西方大国一起，投票反对关于作为一种种族主义表现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整个说来，1974年以后，法国同以色列关系有了某些改善。在它们之间，戴高乐和蓬皮杜时期剧烈的对抗和尖刻的论战消失了。但是它们并未克服在解决近东问题态度上的原则分歧。法国在近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要求它必须支持阿拉伯国家。此外，由于当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单独行动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分歧尖锐化，也促使法国要支持谴责埃及—以色列妥协的“大多数”。问题在于，法国正是从“阿拉伯大多数”（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得到它所购石油的大部分。

七十年代下半期，法国试图在黎巴嫩危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危机是以色列军国主义者和地方反动派挑起的，它对黎巴嫩生存和主权本身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行动常常损害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族爱国力量。这部分原因是，巴黎同黎巴嫩的右翼基督教团体有着传统的紧密联系，后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乃是法国影响近东局势的支柱*。

---

* 从1920年到1944年，黎巴嫩为法国的托管领土。

1976年，法国提出了和平调节黎巴嫩局势的计划，拟定进行由黎巴嫩所有民族和宗教团体代表参加的谈判。在取得“民族和解”之后，再进行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协商。1976年5月，法国总统提出，为了“恢复和维持和平”，要向黎巴嫩派出法国军队，从而引起了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在这一倡议失败后，法国外交又试图通过联合国在黎巴嫩发挥作用，提出自己的部队作为联合国军事组成部分派往黎巴嫩。1978年3月，法国伞兵营在贝鲁特着陆，补充了住在南黎巴嫩的联合国军员额。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向拉丁美洲发动了广泛的经济攻势。在拉丁美洲，法国不仅想寻找新的石油供应来源，而且也在寻求新的投资场所。值得提出的是，七十年代后半期法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投资，大大超过了在非洲的相应指标。仅在巴西（巴西是法国在拉丁美洲的头号伙伴），法国一年（1977年到1978年）的投资额就从4亿美元增加到5.11亿美元①。在1965—1975的十年期间，法国向拉丁美洲的出口额增加了4倍，1977年达70亿法郎②。1979年2月，法国石油公司同墨西哥石油公司签订了为期十年的石油供应协议，规定从1980年起每年向法国提供5,000吨石油③。1979年3月，德斯坦对墨西哥正式访问的结果，签署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协议，特别是向墨西哥提供10亿法郎信贷（作为向不同工业项目的拨款）的协议。法国政府把提供这种信贷称作“能获利的投资”④。

---

① [法]《世界报》，1978年8月29—30日；
[法]《回声报》，1979年10月9日。
② [法]《回声报》，1978年4月17日。
③ [法]《世界报》，1979年3月1日。
④ [法]《世界报》，1979年3月2日。

法国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政治接触也很活跃。1978年，法国总统正式访问了巴西，1979年，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总统访问了法国。

能源危机以后，法国对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合作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关心。1975—1976年，它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法国力图把发展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双边关系，与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对话结合起来。

在总结七十年代法国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策时必须指出，法国在保持传统意向的同时，其政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一些新的经济要求和考虑的影响，这是由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中力量配置方面的新变化决定的。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变成了法国现代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看来，从总体上说，这种政策在八十年代将得到保持。

法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一直受到左翼反对派——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的尖锐批评。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党人，都曾尖锐地指出法国的非洲政策是殖民主义的复活，并批评政府同反动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合作的方针。在密特朗和法国社会党其他领导人的声明中都指出，法国必须停止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停止同反动政权合作以及向它们供应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的政策。

·编　后·

1981年左翼力量在总统和议会竞选中获胜后，在法国形成了有利于进行民主和反垄断改革的新政治形势。

现在谈论新政权的活动成果还为时尚早。然而，已经可以大致上确定暂时还为数不多的、已经实现的和许多已提出的措施的性质，可以将其同左翼多数派和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进行比较，并考虑到世界和法国本身已形成的经济、政治形势对近期的前景作出估量。

左翼力量是在困难的历史时期（生产经受了危机的冲击；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状况，使法国很难利用外部市场扩大出口和复苏本国经济；贸易特别是外汇赤字迅速增加）得到多数人民信任的。政府尚来不及阐明自己的行动纲领，在法国企业主的喉舌《回声报》就已开始撰写关于新政府的努力不可避免要失败的文章了，说什么“社会主义者的试验不具有成功的机会。事实上原因很简单：法国国内的危机是在世界危机的形势下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实行真正的社会或经济政策的任何尝试，都不会有积极的成果”①。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并不局限于消极地等待左翼政府政策的失败，他们还积极进行对抗，特别是将自己的资本非法转移到国外。

新政府所拥有的机动能力，受到了上届政府所遗留下来

① ［法］《回声报》，1981年8月21日。

的严重后果的限制。为了集中力量巩固法国私人公司的财政状况和支持法郎的汇率，巴尔政府曾试图通过削减工人和职员的收入，以有利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方式对新创造的价值再分配以及扼制消费需求和相应地扼制生产等办法来解决这些任务。这一方针，不能不导致失业的进一步增长，恶化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同时也未给克服通货膨胀以任何保障。

实际上，在1981年总统竞选前后，上届政府所提出的任何一项任务都未解决：无论是振兴投资还是扼制通货膨胀，无论是恢复贸易平衡还是减少国家预算赤字，保障法郎汇价的稳定，均未得到解决。

国际形势的恶化，也给新政府顺利活动造成无可置疑的困难。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实行的“加紧军备竞赛的方针，是威胁和干涉别国事务、镇压解放斗争的政策”①，这种政策对国际政治形势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反动的军国主义集团所执行的破坏缓和的方针，要求法国政府对局势日益紧张的根源，以及对进步和反动的推动力量要有一个极为明确、清醒的认识。如不正确解答这些问题，原则上说，就不能保证执行稳健的内外政策。

最后，在社会主义者自己的纲领方面，在理论上，潜在地存在着许多矛盾。与其他因素比较起来同等是重要的。社会党及其领导人正式宣布他们的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然而，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概念只是一个很模糊的轮廓。

实际上，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自己所描绘的任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页。

职战略目标，就是很不明确的。他说："我决定同其他人一道，把法国变成预言家所预言的那样，第一个能以更公平的社会关系组织、更好地利用我国资源，更好地分配收入和工作时间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尤其我们所继承的是一份相当艰难的遗产"①。法国社会党全国书记勒·若斯潘，在瓦朗斯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强调指出，必须逐步地前进和审慎地活动，要遵循妥协的愿望。

法国共产党人对已形成的形势有不同的认识。1981年10月中旬公布的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指出："在法国，社会主义的问题，被首次提到议事日程，它已不再是一种遥远的抽象的前景，而是对于我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②。遵循这一原则，法国共产党利用它参加到政府中的代表，依靠群众的热情，尽一切努力加快民主化的过程，扩大结构改革的范围，使正在进行的变革向纵深发展。在左翼多数派范围内，法国共产党乃是一支坚持和发展进步创举的革命化力量。

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利的国际局势以及新政府所依靠的政治基础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第一步行动具有广泛而又相当审慎的性质。在这方面，清楚地表现为两个方面：在稳定经济方面采取丝毫不能迟缓的措施；根据总统竞选纲领，为贯彻全面改造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长期方针逐步奠定基础。

从这一原则出发，新政府宣布，决心利用一切执法和立法权力所提供的可能性来克服危机，稳定局势，为迅速而稳

① ［法］《人道报》，1981年9月25日。
② ［法］《人道报》，1981年10月13日。

定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这方面，左翼联盟的政策，不仅坚决地抛弃了先前的经济概念，而且也坚决放弃了其它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方针。经济与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讲道："我认为'无节制的货币主义'政策，绝对不适应生产工艺迅速变化时期的现实……这种政策既破坏了对未来的信心，也破坏了对就业的期望。某些邻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片面行动的危险性"①。

新政府提出了在信贷全盘国有化和大部分大工业生产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生产和分配的专门协调系统，以及在私人公司和国营公司保持广泛自主权情况下，实现灵活的国民经济计划化方面的规划。这乃是建立具有更加强大的国营部门和在某种程度上公司内部具有生活民主化的"混合经济"方案的一种尝试。关于这个问题，总理在《扩展》杂志召集的有500家公司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讲到："这并非背离基本上是由私人成分和扩大了的国营成分组成的法国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混合性质"②。

在着手为贯彻长期改组方针创造基础的同时，左翼政府将一系列结构改革法案提交议会审议。主要的有以下几项：关于国有化法案，同失业作斗争的两年过渡计划、破产企业关闭手续的调整法案、缩短工作周时间法案、降低退休年龄法案、扩大企业雇佣劳动者权利法案、国家职员权利保障法案，外国工人地位法案、广泛的行政改革和扩大地方政权机关权力法案（一批所谓非集权化法案）、废除各种反民主法律的法案等。由于通过了国家预算法，从1982年开始对大财

① ［法］《新观察家》，1981年，第864期，第29页。
② ［法］《人道报》，1981年11月11日。

产所有者课税。

1981年夏、秋，如下三项措施成了法国社会舆论的注意中心：国有化、大财产税和分权化。其中每一项措施，如果充分、坚持不渝地实行，都会引起经济和行政机制的极大变化，并能对进步的反垄断力量予以一定的推动。

经过议会数月的激烈辩论，根据宪法委员会的要求所作出的修正，关于对大私人银行和某些大工业集团国有化的法案于1982年2月付诸实施。就其规模而言，1982年的国有化可同1936和1945年的国有化相比拟。自五个大工业集团（电气总公司、贝西纳—犹齐纳—库尔曼公司、圣哥班公司、汤姆逊—布兰特公司、及罗尼—普朗克公司）转为国营、犹齐纳公司和卡西洛公司的债务转为国家参与以及国家购买了达索公司和马特拉公司的控股额后，国营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8%增加到32%，银行领域的国营成分现在已保证了75%的存款和信贷业务，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大约3,500家公司的活动①。

还有两个金融公司与银行和工业集团一起被国有化，它们是拥有法国最大银行—工业联合体的母公司——巴黎—荷兰财团和苏伊士财团，它们控制了资本总额达几千亿法郎的数百家工业企业和信贷机构。随着金融公司转变为国家财产，法国私人垄断成分受到了明显打击。因为在私人公司领域里，恰恰是金融集团构成私人公司制定最重要经济决策的主要中心。

在生产领域，除国家所有制比重有很大提高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大多数新国有化组织都是现代化的，工艺

① ［法］《人道报》，1982年2月13、19日。

先进的，科学密集程度高的生产部门（化学、电子、电子技术、机器制造）。借助于这些因素，为在国家一级实行有目的的科学技术政策以及利用国营成分作为结构改革先驱和全国经济增长的推动者创造了条件。

尽管国有化的规模很大，但它是在遵循资产阶级全部法律规章的条件下实现的。按照由旧政治制度的代表组成的宪法委员会的要求，股份赎买金从350亿法郎增至420亿法郎。股票值不是通过交易所确定的那部分银行的国有化，推迟到1982年7月份。国有化法不适用于外国财产。

在现阶段，还没提出同资本主义经营制度脱离的问题。新政府只是企图借助于国有化，为集中干预经济、影响生产和分配过程建立足够强大的杠杆。密特朗在一次同记者谈话中强调指出：他是想通过实行国有化建立一种服务于“法国利益”的“经济突击力量”①。

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把国有化法的生效，描述为“对企业主及其在国会的代表将一军，他们采用各种阴谋诡计来阻挠政府提案的通过”②。另外，1981年9月15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在国民议会发表的纲领性演说中赞同“政府批准的方案要根据适当的方向制定”，但同时强调提出，必须保证“对大公司集团及其主要的分公司实行民主管理”③。

对信贷领域和关键工业部门的控制，可以使莫鲁瓦政府着手实行下一阶段的计划——贯彻“新的经济增长”政策。关于它的内容，可以根据1981年9月15日总理阐述的政府纲

① ［法］《世界报》，1981年10月13日。
② ［法］《人道报》，1982年2月12日。
③ ［法］《人道报》，1981年9月16日。

领的基本路线加以判断。

按总理的话说，摆在政府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法国有从事劳动、尤其是制止失业增长的可能性”①。为实现这一目标，成立了以总理和工业部长为首的、有私人和国有化公司领导人参加的工业发展最高代表会议和由议员、行政当局、企业主和劳动者工会代表组成的国家就业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就业委员会。1982—1983年两年过渡计划，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它的主要原则是：使经济增长达到更高的速度和增加就业；保证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为刺激经济发展积极利用国家财政；坚决同通货膨胀作斗争②。

提高经济增长率，在政府同失业斗争的计划中占据中心地位。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不止一次地强调：“除了振兴生产，没有其他克服失业的方法”③。与此同时，还预定要采取所谓在有工作能力的人们中重新分配劳动的措施。改革方案还规定：如果劳动者“宁愿有更多自由时间，而不愿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话，将逐渐缩短工作时间（到1985年，每周工作35小时）④；实行不完全工作日或不完全工作周并相应减少工资的工作制度；降低退休年龄，特别是规定某些工龄最低的人员退休时有权享受完全的退休金；改进对青年工人的职业培训。莫鲁瓦认为，所有这些措施，到1985年能够提供100万个就业位置⑤。

显然，上述措施需要增加预算开支。莫鲁瓦总理把1982

---

① ［法］《人道报》，1981年9月16日。
② ［法］《法律与法令公报：附件第6号》，1982年1月2日，第43页。
③ ［法］《人道报》，1981年10月27日。
④ ［法］《人道报》，1981年9月16日。
⑤ ［法］《人道报》，1981年10月27日。

年预算称之为“发展和就业预算”，其中规定在一年半时间里，在国家机关和保健、社会保险、教育、邮政部门系统补充12.5万个工作岗位，需要增加对工业的援助（52%），城市和居民建筑的信贷（34%）以及科研信贷（30%）等等。

在经济措施中还包括税收改革，它在法国各种资产阶级集团之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政府决定对300万法郎以上的私人财产课税。如果私人在自己的财产中含有生产资料，那么就以500万法郎作为课税起点。改革触及到约12.5万个拥有6,500亿法郎财产的富有家庭。还决定要减少现行课税制度给高收入家庭提供的优惠。尽管实行了新的税收制度，1982年国家预算的赤字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而且这是在经济增长速度达3.3%的条件下出现的。在相反的情况下，赤字会更高。1980年已稳定在占国内生产总值1.2%的水平上。

议会通过的1982年国家预算法案表明，新政府积极履行竞选前所许下的诺言和左翼纲领中所规定的原则，即减轻法国公民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平等现象，创造更加公正的社会条件。法案也反映出，在实行改革政策的道路上存在着大量困难以及由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反抗所产生出的主、客观上的困难。

在1981年夏、秋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中，所谓分权化占有特殊地位。这包括：重新分配执行权以加强地方机关的权力，给地方以更大的财政主动权，使其有可能自主地解决地方问题。改革的中心是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即在1972年确定的经济区基础上建立行政区。行政区联合若干在经济上互相联系的省。赋予区行政上的自主权，使之有可能更加有目的地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性质。改革规定：取消从拿破仑时期就实行的长官制，实行政府委员制，其权力将大大减

少，把政府长官的其他职权转交给区和省的代表会议；减轻集中化的程度，即改变执行权高度集中于政府之手这种传统作法，加强地方自治的因素。

国内政策，是新政府活动的主要领域。这是同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和它们在左翼政党竞选纲领中的地位相一致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在1982年2月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整个说来，所采取的首批措施，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实施。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未解决的问题：失业、通货膨胀、民主的破坏等。马歇强调，在为现实现法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具体任务而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人不应忽视自己的远景目标——达到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①。

至于对外政策，按照法国评论家的看法，新政府在这方面变化很小，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甚至和上届政府的立场相比还有后退。

在同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法国表现出对“大西洋团结一致精神的信赖”和“对联盟义务的忠诚”。同时，法国和美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是有严重分歧的。法国公开指责美国执行自私的经济政策，给西欧盟国的利益带来损害。没有足够根据认为，法国在一体化和欧洲共同体作用的看法上，已出现了或者在近期会出现任何明显的变化。法国方面提出的有关加强一体化合作的社会性方面的一般希望，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实际步骤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反映。虽然法国实行了更加平衡的外交（密特朗访问伦敦和罗马），但法国的政策仍旧着眼于同联邦德国的接近。

① ［法］《人道报》，1982年2月4日。

从国防部长和总理的演说中可以看出，法国基本上采用和保留了它在七十年代后半期提出的军事战略思想。早在上届政府，就已开始增加军费开支。新政府不仅继续采纳这个路线，而且还匆忙取消了延缓实行军备现代化五年计划的原来设想。按照1982年国家预算法案，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3.85%增至3.89%。还决定再建造一艘装备核弹头战略火箭的潜艇。

必须指出，关于欧洲安全问题，新总统和他的政府在1981年末所阐明的立场不是很现实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军事—战略问题提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首位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国总统基于对欧洲军事力量对比带有偏见的估计，在欧洲大陆配置中程导弹的问题上支持里根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许多西欧成员国的立场，继续坚持增加国内军费开支和进一步加强法国核打击力量战略配备的方针。结果，官方宣布的目标——“保持东西方均势”，就与加剧军备竞赛联系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法国政策中的另一组成部分——主张苏联和美国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谈判的价值。

关于法国对近东问题的立场，密特朗1982年3月3—4日访问以色列过程中作了详尽的阐述。法国原则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按照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意见，这个问题同巴勒斯坦国国界问题一样，应当在以色列和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的巴勒斯坦组织之间的谈判过程中加以解决。法国方面准备支持任何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包括戴维营式的单独交易。法国建议向西奈半岛的国防军队派遣自己的军事人员，就是这一立场的突出表现。

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格调，出现了引人注意的变

化。从对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以及他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动机这一比较实际的认识出发，总统的外交部长作出了许多原则性声明，采取了许多具体步骤。它们说明法国确实打算就这一问题在社会党国际的原则立场范围内，实行新的方针。在1981年10月22—23日举行的坎昆会议上，密特朗总统宣布，法国打算于1985年把对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国家经济援助份额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7%。墨西哥—法国联合声明引起国际上很大反响。声明指出支持萨尔瓦多正在与军事专制政权作斗争的爱国力量。法国坚决谴责南非军队侵入安哥拉，主张从纳米比亚撤军。这些行动，得到进步的社会舆论和许多国家政府的赞许。

勃烈日涅夫在为密特朗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出的贺电中强调指出："苏联和法国，我们两国人民，是由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希望"这种关系在各个领域得到发展，并在将来成为和平的重大因素"，期望"苏联和法国将进一步促进东西方的了解，以有利于扼制军备竞赛、实现裁军、消除军事冲突的策源地以及加强欧洲和全世界的安全"①。

法国总统就职以后，发表了多次原则性声明。从中可以看到，新政府准备继续执行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苏联合作的方针。在反纳粹侵略苏联四十周年之际，密特朗在致苏联的电报中表示相信，"苏联和法国人民能够保卫和平，应珍惜两国人民赢得的和平"，法国同苏联之间的对话，能够给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昂贵代价而加强的传统友好关系以新的推动力量②。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重

① ［苏］《真理报》，1981年5月12日。
② ［苏］《真理报》，1981年6月25日。

中："法国希望保持与苏联及其它东欧国家互利的、与其历史和地理条件相适应的关系"，他说，"我不会忘记把苏联、东欧人民与我国人民联系起来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①。

苏联和法国关系在近十五年来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只要具有良好愿望并理解欧洲大国所要承担的保卫大陆和平和加强大陆安全、加强相互信赖和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责任，就完全能够建立起一种友善和相互理解的气氛，这就有利于解决任何问题，包括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问题。苏联和法国已成为缓和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紧张局势政策的发源地。八十年代初，由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罪过所造成的局势，使保持并尽一切可能加强和发展六十—七十年代苏、法富有成果合作过程中所积累的全部有益的经验和成果，显得特别重要。

① [苏]《真理报》，1981年11月2日。]

苏联作者论述法国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著作

Э·А·阿尔谢尼耶夫：《法国的问题与政策·社会政治生活述评》，莫斯科，1978年版。

Ю·А·博耶夫：《苏联—法国 传统与现实》，基辅，1977年版。

И·М·布宁：《现代法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成，心理，政治立场》。莫斯科，1978年版。

Р·С·瓦尔福洛梅耶娃：《1945—1970年法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莫斯科，1972年版。

А·В·伏斯特罗夫：《对外经济联系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影响（以法国现代经济发展为例）》，莫斯科，1979年版。

Б·Л·武尔夫松：《现代法国的教训》，莫斯科，1970年版。

Л·И·格卢哈列夫：《西欧一体化和国际垄断组织》，莫斯科，1978年版。

И·А·戈巴佐夫：《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剖析》，莫斯科，1978年版。

П·С·格拉齐安斯基：《法国政治学评述》，莫斯科，1975年版。

В·М·达林：《十九—二十世纪法国历史》，莫斯科，1980年版。

《法国动力系统研究之二十五年》，列宁格勒，1977年版。

Э·И·多莫拉兹卡娅：《法国社会立法》，莫斯科，1975年版。

Э·И·多莫拉茨卡娅、В·В·马克拉科夫：《法国国家与经济》，莫斯科，1981年版。

Ю·В·杜比宁、В·Н·克林：《苏法合作经验（六十—七十年代）》，莫斯科，1979年版。

А·Л·叶菲莫娃：《市政机构中的法国共产党人·法共群众工作经验》，莫斯科，1975年版。

В·Н·舍纳耶夫、Д·Е·梅里尼柯夫、Л·马伊耶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代世界中的西欧》，第2卷，莫斯科，1979年版。

К·П·祖也娃：《时代精神之外》，莫斯科，1979年版。

А·Е·约菲、М·М·纳林斯基：《苏法合作：传统和现实》，莫斯科，1975年版。

《法国史》，第三卷，莫斯科，1973年版。

Н·И·基列伊：《1962—1971年的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莫斯科，1973年版。

И·А·科洛斯科夫：《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主要方针和趋向的演变（1958—1972年）》，莫斯科，1976年版。

Л·Н·克拉萨维娜：《法国的财政和货币—信贷体系》，莫斯科，1978年版。

М·А·克鲁托戈洛夫：《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律地位》，莫斯科，1980年版。

В·И·库兹涅佐夫：《法国经济的国家垄断调节机制》，莫斯科，1979年版。

А·И·库普林：《法国与马格里布国家·干部的形成和培训》，莫斯科，1980年版。

В·В·柳比莫夫：《法国对就业、失业和工资的国家调节》，莫斯科，1976年版。

И·Т·迈博罗达：《法国的国家垄断组织》，基辅，1973年版。

B·C·马克西莫娃：《法国科学技术界及其在为社会进步而斗争中的地位》，彼德罗查沃德斯克，1978年版。

И·А·曼弗列德：《巴黎—波恩·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中的法国—西德关系（1958—1968年）》，莫斯科，1970年版。

《缓和的物质化：经济方面》，责任编辑：В·Н·舍纳耶夫、Ю·В·安德烈也夫，莫斯科，1978年版。

Е·М·米哈伊洛夫：《法国国外工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莫斯科，1977年版。

Ю·М·奥西波夫：《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规划（以法国为例）》，莫斯科，1979年版。

М·А·巴甫洛娃：《法国的地区政策》，莫斯科，1974年版。

Ю 波良科夫：《法国青年的道路及理想》，莫斯科，1974年版。

Г·М·拉季阿尼：《法国两种共和的命运》，莫斯科，1980年版。

В·А·鲁比：《垄断统治下的中小企业(以法国为例)》，莫斯科，1978年版。

В·Г·鲁别茨：《第五共和时期法国基督教工会运动（1958—1978年）》，莫斯科，1980年版。

П·И·萨维茨基：《法国第五共和国的政府机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9年版。

В·І·西罗特金：《七十年代中期的法国》，莫斯科，1976年版。

В·П·斯拉维诺夫：《1974—1981年法国的对外政策》，莫斯科，1981年版。

В·П·斯米尔诺夫：《法国最新历史》，莫斯科，1979年版。

《1965—1976年苏法关系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6年版。

А·А·特拉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市化的国家调节（法国资料）》，莫斯科，1979年版。

Т·М·法捷耶娃：《现代法国资产阶级改革战略》，莫斯科，1975年版。

В·Д·福基娜、Т·М·克拉索夫斯卡娅：《法国的自然环境保护》，莫斯科，1975年版。

《法兰西》，责任编辑：Ю·И·鲁宾斯基，莫斯科，1973年版。

《法国年鉴·1970—1979年法国历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莫斯科，1971—1980年版。

Н·М·弗罗尔金：《法国新近的劳动移民》，基辅，1975年版。

П·П·切尔卡索夫：《法国与印度支那（1945—1975年间法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莫斯科，1976年版。

Г·П·切尔尼科夫、Л·А·切尔尼科娃：《法苏合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莫斯科，1971年版。

З·В·切尔努哈：《法国共产党的建立》，莫斯科，1976年版。

А·М·奇科洛夫：《法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机构》，莫斯科，1979年版。

И·Б·亚斯特列博夫：《现代法国的天主教·社会政治立场述评》，莫斯科，1973年版。